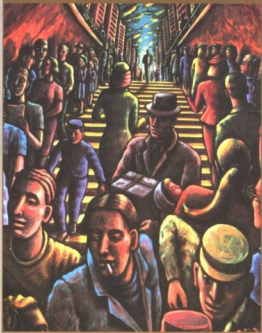


④ 现代社会学文库·性社会学译丛



男性气质

Masculinities

[美] R. W. 康奈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分析了男性气质问题，并对男性气质的研究和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价。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理解男性气质的方法，回顾了本世纪以来通过精神分析研究和社会研究来创建男性气质科学的主要尝试。第二部分阐述了作者在实地研究中获得的有关男性气质的观点，展示了男性气质变化的复杂性以及变化的多种可能性。第三部分在更大范围内考察了近几个世纪中男性气质的全球历史，分析了当代西方男性政治的具体形态。最后从性别关系中社会公正的观点出发，思考了当今有关男性气质知识中的政治含义。

ISBN 7-80149-974-3



9 787801 499745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974-3/D·163

定价：

24.00元



第一部分

知识及其问题

知识及其问题

PDG

1. 男性气质学

对立的知識

弗洛伊德在附注中黯然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科学中最含混的概念^①。在许多实际情况中，词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却很少引起疑惑。这一矛盾的情况并没有影响我们大量的交谈和行动。但同样的术语在进行逻辑研究时就像多瑙河上的雾一样模糊不清。它们极不引人注目，很难进行界定。

这究竟是为什呢？在本书中，我将指出根本的原因在于性别的特征本身，它随历史而变化，充满了政治性。日常生活是性别政治的舞台，而不是远离它的避难所。

由于相互矛盾的话语和知识体系都认为自己有解释性别一词的权力，所以围绕着性别术语就展开了争论。这种情况我们既可在日常环境，也可在高深的理论中见到。

^① 弗洛伊德 1953 [1905]: 219-220.

在我前面的桌上放着一份悉尼当地《圣地》周刊的剪辑，抬头是

妇女为什么要问路

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更可能在街上拦住某人问路，这仅仅是因为男女的想法不同。

这篇署名为阿曼达·帕克的新闻特写引用了心理学家和辅导员玛丽·贝思·朗摩尔的观点，说明男女在讲话时有不同的目的。

女人也不理解男性这一点：把拥有信息看成是一种等级形式，拥有较多信息的人居于等级的上层……朗摩尔女士认为正因为如此，男性不向陌生人问路，问路就等于承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人一等。

接下来的星期五，那些希望了解为什么男女语言有别的读者被邀请到朗摩尔女士主持的研讨会^①。

当地报纸的内容从无新意，然而这一条报导对我的帮助极大，至少在澄清性别知识方面如此。首先它诉诸于常识性知识：男女行为不同（“女性更倾向于拦住某人”），他们之所以行为不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同（“性别不同想法不一”）。如果不借助

^① 《圣地和西部周刊》（悉尼），1993年7月7号。

公认的性别差异，这篇文章就无法理解。

但该文也批判了常识。“男性和女性常常都不理解对方（在谈话中）的目的”，“女性也不理解……”这一批判是从科学的立场上阐述的。朗摩尔女士被认为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称自己的资料为“发现”，从而以科学的用语结束了辩论（她的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部）。科学修正了性别差异的常识，确保了一种新的实践，并将在研讨会上讨论。科学的本质是无需说明出处的，但有一点似乎是可能的，即朗摩尔女士的结论是建立在她作为辅导员所拥有的经验之上的。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可看出有关男性和女性气质的两类知识——常识和心理学知识。它们一方面相互强化，一方面又相互斗争。我们也可看到心理学知识产生并运用在两种实践中：个体咨询和集体研讨。

这篇特写还间接地将我们引入其他有关男女气质的知识类型。在产生当代“男人运动”（第九章将论及）的环境中，治疗专家广泛使用了研讨会。这一运动主张一种超越科学和常识的知识，即“深层男性气质”的直觉知识^①。

但如果心理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在生理性别差异这一问题上受到非难，他们将更可能诉诸于生物学。他们可能想到性别在身体和行为、大脑性本能、协调性和遗传基因上的差异。这些都已成为新闻媒体一贯的报道内容。

若《圣地》热衷于调研性的新闻工作并且作者信步从帕拉玛

^① K. 汤普森 1991 年为这些言论做过极有帮助的收集。

塔路走到悉尼大学，她将发现那些在生物科学中无可争议的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观点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却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在校园的那些区域，学者们谈论“性角色”或“性别关系”，并提出男性和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或是“在话语中形成的”。

当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驾车离开悉尼大学转到帕拉玛塔路后，会经过一座被煤烟熏黑的教堂—圣巴纳巴斯。那里的牧师通过一块众人皆知的广告牌向世人宣称性别秩序是上帝规定的，就如道德秩序的其他部分一样，干涉它是很危险的。高速公路对面的旅馆主人也竖起牌子，从世俗工人阶级的享乐主义出发^①，对这块神圣广告牌上的文字逐条批驳。

我能给出更多的例子，但这些可能就已足够了。我们关于性别的常识容易被各种矛盾的理解、解释和评价所影响。

《圣地》呈献的这些知识类型是与特定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这对于知识而言一般是适用的，虽然学术争论常常让人误认为知识是从天而降的。大约六十年前，知识社会学就说明了主要的世界观是怎样建立在主要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体验之上的。科学社会学是研究实验室的生活和科学家的声望等级的学科，它揭示了社会关系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这一观点在迈克尔·福柯著名的“权力—知识”研究中得到了强化，即新科学（如医学、犯罪学和性学）与社会控制的新机构和形式（如诊所、监狱、工厂和

^① 这些当地著名的论战已经被精心地改编为神学化版本，现在已由酒店老板埃利奥特于1992年出版。

精神治疗)是紧密相连的^①。

所以,性别相互矛盾的知识显示了存在着与性别有关的不同社会实践。为了了解对男性气质的日常描述和科学描述,我们不能停留在纯理念的层面上,而必须看它们的实践基础。

例如,性别的常识性知识绝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的理性认识,通过这些实践,性别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或“完成了”,民族方法学家精心构思的研究展现了这些实践^②。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玛丽·贝思·朗摩尔应用的性别知识是与他们职业的经验实践紧密相连的,即精神治疗的实践。社会科学中的建构主义者提出的性别知识具有双重谱系,一种来源于持反对政见的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另一种来自学院式的社会研究结果。

因而,在讨论各种主要的男性气质知识时,我将探询什么样的实践产生这类知识,以及这些实践怎样形成和限制知识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知识不是站在同一点之上的。多数情况下,科学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优势。《圣地》的报道仅具有一点点的科学性就足以拥有批判常识性知识的权力,而常识不能批驳科学。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媒体中,科学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

这就形成了20世纪对男性气质的观念发展。所有重要的观

① 1985年再版的曼海姆著作(原著1929年出版)是知识社会的经典。科学家实地调查的例子参见查尔斯沃思等人1989年的作品。1977年出版的福柯著作是对知识的实践背景的优秀历史研究。

② 凯斯勒和麦肯纳,1978;韦斯特和齐默尔曼,1987

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宣称自己是科学的，或使用了科学的“发现”这一词语，而不管这种宣称是多么的荒诞无稽。甚至连罗伯特·布莱也在《铁人约翰》中把科学的语言用于他那扣人心弦的观点：我们大脑的1/3是“勇士大脑”，我们的DNA含有勇士的本能。

但对科学的依赖使我们陷入了循环论。因为令人信服的历史细节显示自然科学本身就具有性别的特征。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文化上是男性化的。虽然大多数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男性这一点千真万确，但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人的问题。科学研究的主要隐喻、它的语言的非人格性、科学中权力和交往的结构及其内部文化的再现所有这一切都来自性别化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男性的社会地位。因此，在对男性气质的讨论中，科学的支配地位反映了男性气质（或具体的男性特质）在性别化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①。

在这种情况下，由男人创立的男性气质学又怎么能研究男人自身呢？如同帝国主义者所创建的人种学或资本家编纂的资本主义知识一样，这样的男性气质学不会坚持道德标准。事实上一些有关男性气质的科学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科学的种族主义和新传统经济学，已屈从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

然而科学中还有其他潜能。从哥白尼抛弃地球中心说到达尔文抛弃物种神造的观点，自然科学是作为一种批判而出现

^① 武士DNA见布莱，1990：150。有关性别和科学的丰富文献见凯勒，1985；哈丁，1991；有关男性气质的专述参见伊斯利，1983。

的。批判、实证和想像力令人兴奋的结合在每一次伟大的科学革命中都发挥了作用。在日常的科学研究中，假设的检验和归纳不断地超越表面既定的一切，使科学不仅仅只是存在的一种简单反映^①。

我们能否采用另一种方法把自然科学的批判与男性气质分析中所涉及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或者把科学归纳法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可归纳的思想和对公正的界定？这些建议完全受到后现代“宏伟叙事”怀疑论和经济理性主义的公正怀疑论的影响^②。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回到男性气质的批判。在这里我仅想提及科学知识的政治歧义。男性气质科学可能是自由的，也可能是受束缚的，或者同时兼具二者。

20世纪有三种主要的男性气质学。一种基于由治疗专家所获得的医疗知识，它的主导思想来自弗洛伊德的理论。第二种基于社会心理学，它以极为流行的“性角色”观点为中心。第三种涉及到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本章中我将分析每一学说所得出的有关男性气质知识的特点，然后转向性别和性政治中抵抗运动所产生的知识。这些学说的不同取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男性气质的知识到底是什么？本章的结尾我将回答此问题。

① 进化科学与社会批判的联系在德斯蒙德和摩尔撰写的达尔文传记中陈述得很清楚。拉卡托斯对科学永恒的重构特性作了最具代表性的陈述，1970。

② 宏伟叙事参见利奥塔德，1984。经济理性主义参见普西，1991。

临床知识

恋母情结

由弗洛伊德于本世纪初开创的革命的精神分析学首先对男性气质科学作了不懈的努力。精神分析发展的复杂性，对现代文化的巨大影响，使它来源于医学实践这一点很容易让人遗忘。开创者本人倒一直都明白精神分析的知识依赖于临床观察，需要在治疗实践中得到检验。

同医学的联系使精神分析在它的整个历史中都致力于规范化和社会控制的努力相连。然而，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就已具有激进的潜势^①。弗洛伊德早期的工作与欧洲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激情相符，后者创造了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派绘画和音乐、激进的社会思潮、生气勃勃的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最初的同性恋解放运动。这种激情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在临床实践中抛弃了正统的学术观点，向欧洲文化中有关性别的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了质疑。

以上这些使弗洛伊德的工作成为研究男性气质的现代思想的开端，但多数后来的研究者对他观点的细节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毫不关心。因而弗洛伊德比别人更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弗洛伊德反对“男性气质”是自然天成的观点，对它那些不仅是可

^① 如马库斯 1955 和米切尔 1975 所探讨的。

能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必然的构成成分进行了探究。

弗洛伊德从未做过有关男性气质方面的系统论述，但在他的著作中，这一主题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他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精神分析原理的最初陈述：这包括正常的心理生活和神经症的心理生活之间呈现连续性的观点，压抑和无意识的概念，以及通过梦、笑语、口误和症状“解读”无意识心理过程的方法。弗洛伊德认为成人的性和性别并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在一个长期痛苦的冲突过程中形成的。

他后来逐渐了解到，发生在童年中期被称为“恋母情结”的情感纠葛是性和性别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它涉及到儿童对父母一方的性可望及对另一方的敌意。对男孩而言，与父亲的对抗和对阉割的恐惧加深了他们的俄狄浦斯危机感。这些思想体现在1909年的“小汉斯”和“鼠人”两个著名的个案研究中。在此，弗洛伊德确定了男性气质的一个形成时期，并描绘了一种男性气质形成环节的动力学^①。

然而，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弗洛伊德已将这种描绘趋向复杂化。他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简单的性别变换：“很大一部分男性换性者仍保留着男性气质的心理特质”。面对相反的事实，弗洛伊德提出假设：人类生来就是双性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男性和女性倾向共存。

这就暗示成年男性气质必定是一个复合体，并且在某种程度

^① 弗洛伊德 1953 [1900]，1955 [1909]，1955 [1909]。

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建构。弗洛伊德分析男性气质的第二步是研究性别的建构过程。弗洛伊德在大战期间所发表的“狼人”充分体现了他的观点，这是他历时最长的个案研究。弗洛伊德发现，在恋母情结的背后，还存在一种前俄狄浦斯的自恋男性气质，对阉割的焦虑就基于此种气质之上。弗洛伊德进一步探索了男孩对父亲的性渴望、自恋男性气质、和仆人的关系、对女性的认同和对母亲的嫉妒这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弗洛伊德运用这些矛盾来解释狼人在青少年及早期成年生活中从一种涉足不深的异性恋混乱状态向具有神经症倾向的情感冷漠的转变^①。

在这最卓越的个案研究中，弗洛伊德展示了临床方法在一层层分解情感并描绘它们之间变化关系方面的能力。一维的方法——一般仍视为精神分析的“发现”——已不能给予更多的说明了。狼人的研究对任何后来有关男性气质的研究都是一个挑战。任何研究只有吸收了男性性格中存在张力这一经验及其贯穿一生的变迁后，才是适当的。

大战之后，弗洛伊德发展了他对人格结构的研究，尤其是超我的概念，它是判断、检查和展现理想的无意识行为。这个概念是分析男性气质第三步的基础。超我是恋母情结的后继者，是恋母情结之后从父母禁令的内化中形成的。弗洛伊德渐渐了解到超我具有性别的特征，关键在于，它是孩子与父亲关系的产物，在这方面男孩比女孩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文明及其缺憾》和其他有

^① 弗洛伊德 1955 [1905]，1955 [1917]。任何对此个案感兴趣的人应该阅读一份令人惊讶的文献——弗洛伊德的狼人描述；潘克杰夫 1971。

关文化的论文中，他也开始论及超我中的社会学维度，将超我视为文化控制个人欲望特别是攻击倾向的手段^①。

这些思想虽然仍是思辨性的和不全面的，但它们具有深刻内涵。这是男权制组织文化的理论根源，此种文化通过男性气质的建构而在代际间传递。发展这种理论就将比弗洛伊德和他的那些正统的追随者们更进一步向社会分析倾斜。而激进的精神分析正是向此方向发展。

弗洛伊德开创了一些他未曾尝试过的研究途径。这些途径足以分析男性气质。他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精神分析”，给出了指导性的概念——动态无意识，描述了男性气质发展的第一幅图景并告诫男性气质具有必然的复杂性及多种维度。对于男性气质他坚持认为它从不存在于一种单纯的状态之中，而是多层情感共存并相互矛盾。每一人格都是充满差异的复杂建构，而不是一个透明的单位。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语言改变了，但他仍确信性别的经验复杂性和男人性格中永远存在女性气质。后来，当更为保守的精神分析学家放弃了雌雄同体的理论时，弗洛伊德重要的并令人不安的洞察被彻底抛弃了。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很早就蕴含男性气质学的内容。但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大战之前，就已着手过这方面的工作。下面我们将简要讨论他的“男性抗争”理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更为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参与了有关女性气质的激烈

^① 弗洛伊德 1961 [1930]。拉普朗热和蓬塔利斯 1973：435-8 总结了超我理论；运用超我理论解释男性气质参见希尔弗曼 1986。

争辩，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男性气质的小小争论。这场争辩集中于童年的最早阶段。最初的研究者惊奇地发现在男孩中存在前俄狄浦斯女性气质的临床证据，它来自对母亲的认同，并也表现为对她的嫉妒。

1932年在一篇名为“对妇女的恐惧”的论文中，卡伦·霍尼的讨论更偏向于女性方面。就霍尼而言，儿童对母亲的害怕比之对要阉割他的父亲的恐惧更加根深蒂固，压抑更为强烈。阴道就是这一过程的象征性核心。男孩不满的感觉使他收回对母亲的情感而集中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殖器，因而就为阉割的焦虑奠定了基础。这些情愫后来激起了男人的反应，他们趋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作为恋爱对象，并习惯于积极地贬损女性的自尊以便维持“正常男人”曾“不平衡的自尊”^①。

霍尼的论文是古典精神分析中批判男性气质的佼佼者，它明确了两个重要论点：成年男性气质取决于对女性气质过度反应的程度，及男性气质的产生和女性从属地位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主流精神分析而言，这是一个结束而不是开端。

1930~1960年，精神分析在大多数问题上过于右倾，性别理论也毫不例外。50年代像西奥多·赖克这些精神分析学家成为性别问题的大众作家之时，他们已不再强调性别的矛盾性质或社会秩序与欲望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要点是以正统的性别尤其是传统的异性恋和婚姻为标准来鉴定心理的健康状态。儿童趋向成人

^① 关于女性气质争论的记载参见乔多罗 1978 和加里森 1981。有关男性气质的最早论文见克莱因 1928，贝姆 1930，霍尼 1932。

异性恋的过程被逐渐认为是毫无问题可言的，是自然的发展，而不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复杂的而又脆弱的建构过程。以欧文·比伯为首的一组纽约精神分析家在 1962 年宣称异性恋以外的任何行为都是病理的症状——特别是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病态，是“父母——子女关系失常”的产物，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实践，慢慢地变成了规范化的一种工具，试图将它的病人调整到性别秩序中来^①。

肯尼思·刘易斯对男同性恋的精神分析的光辉业绩表明，由于恋母情结的存在，成长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②。对弗洛伊德及其早期追随者而言，恋母情结必定导致精神创伤，它的过程必然是破坏性的。这是成人男性气质脆弱的根源，因为它建立在欲望和文化的悲剧性碰撞之上。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无悲剧的、规范化的精神分析失去了弗洛伊德传统理论对男性气质的批判能力。此后，精神分析在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后才又恢复这种能力。

原型和身份

临床经验相当复杂，以致于存在多种解释。对个案的不同解释导致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历史上，精神分析也有多种体系，为情感生活提供了不同解读方式。有几个人开创了男性气质理论，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卡尔·荣格。

性别问题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后所发展的体系中居核心地

① 赖克 1967 [1957]；比伯等人 1962；作为治疗的规范化例子参见多尔托 1974。

② 刘易斯 1988。

位。荣格区分了他称为“人格面具”和“阿妮玛”之间的差异。“人格面具”是指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建构的自我，而“阿妮玛”是指无意识中形成于压抑因素下的自我。他指出二者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性别的对立：

如果女性的特征和倾向受到压抑，那么对立的性要求就会在无意识中积累^①。

同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一样，荣格也关注男人的女性气质，但对它的描述渐渐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色彩，他不关心压抑的过程而专注于男性的人格面具和女性的阿妮玛之间的平衡结果。

此外，荣格逐渐认为充满阳刚之气男性的内在女性气质不仅是由特定男性的生活史所营造，而且由与生俱来的女性“原型”的意象所形塑。积累的无意识中的原型这一概念最初是在一些讨论中被用来解释情感生活的矛盾。在与临床知识分开后，原型就成为了荣格后期讨论性别的主题。

在荣格的笔下，像“阿妮玛”这样的概念能被巧妙地使用。他阐述了一种有关男权制婚姻的情感动态的有趣理论。他利用男性和女性气质对立的思想呼吁心理的和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平衡，这在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一种进步的立场。他甚至认为“特定类型的现代男性”已不再能抑制弱点，并为此制定了男性气质治疗方

^① 荣格 1953 [1928]: 187。这儿陈述的主题在一系列的论文和书籍中被精心建构，但是，对照 1982 年出版的荣格著作，没有太多根本性的改变。有关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决裂参见韦尔 1987。

法。在引人注目的一段文字中，荣格预示了五十年后广为流行的治疗技术，他提出以下方法：同自己的阿妮玛对话，如同与一个分离的人格说话，并对它进行教育^①。

但从其他方面看，荣格的分析变得极具规定性和思辨性。当弗洛伊德还在努力克服男女气质对立时，荣格不但已解决了它，并指出了它是根植于人类心灵的永恒真理。

由于没有临床个案研究的规定，所以“原型”很容易找到。荣格的后期作品在深奥的艺术和世界宗教中找到了它们，他的追随者也搜寻了其他神学体系。这就导致了完全混乱的原型的出现，如马歇尔·贝瑟尔的“神话男性”，断章取义地从希腊-罗马神话中任意寻找可能体现现代“男性意识模式”的男性神。罗伯特·布莱的作品——《铁人约翰》与此几乎一脉相承，不同的是，他的原型来自格林兄弟改编过的民间故事，不如奥维德的更贴近原版。布莱忽视了故事的文化根源，他用“宙斯的神力”观念胡乱解释，甚至还从口语文化中借用了许多^②。

荣格视同体两性对立为心灵的普遍构成也陷入了困境。根据荣格的理论，这种构成不可能发生历史改变，只有两性之间的平衡变化。

在现代荣格学派的作品中，女性主义不是被解释为反抗女性受压迫的产物，而是原型女性的再次体现。在过去的历史中，不是男人统治妇女，同样也可以说不是男性统治女性。由此可以看

^① 荣格 1953：199-208。

^② 贝瑟尔 1985，布莱 1990，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在此不便详述。

出为什么荣格的理论成为昔日进步男性在今天反戈一击的凭据^①。从这种说法可直接导出以下观点：现代女性主义正使平衡大大地向另一方倾斜，并压抑男性。布莱批评“懦弱男人”陷入女性主义而失去了“深层男性气质”这一有影响力的理论明显依据了荣格关于原型平衡的说法。

由于荣格的原著现在很少有人研究，所以他的理论在早期精神分析中的根源也被人遗忘了。失去的东西是值得回记的。荣格把他的性别研究建立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抽象对立上，而弗洛伊德的研究超越了此点。荣格的学说失去了弗洛伊德描述精神性欲发展中的大多数复杂状态。通过寻求无种族意识的性别的主要决定因素——种种假设的原型，荣格背离了阿德勒和霍尼提出的社会文化精神分析学。

在近来流行的男性气质心理学中，“性别身份”概念已成为性别原型的主要替代物，它来自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后的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中，艾里克森认为20世纪中叶情感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自我认同的确立有关。“认同”成为了流行语，艾里克森的发展阶段模式也广为流传^②。

将认同概念主要运用于性别的是美国精神病学者罗伯特·斯托勒。他的工作以性别实践中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发展——变性的发明为中心。为“变性”而创制的外科技术引起了评定谁需要做手术，并导致了对个人认同自身性别的研究。

① 例如，考夫曼和蒂默斯 1983，K. 汤普森 1991。

② 埃里克森 1950。

斯托勒对想成为妇女的成年男子和似乎倾向于女性化的男孩——他称为“男童性别倒错，一种清晰的，潜在的恶性人格失调”——进行了临床研究。这项研究没有使他得出传统的弗洛伊德观点：性别是矛盾的结构，而是使他认为发现了一种“核心性别认同”，这种“认同”在生活的最初阶段就被确立了。性别认同在父母和孩子的情感互动中建立（斯托勒对母亲颇有微辞），而且足以使人可以不顾身体的自然事实。因而对男性而言，性别倒错不是被定义为渴望成为妇女，而是一个人已存有的信念。当然，在正常情况下，男孩获得了一种男性性别认同，就不会有问题了。性别认同理论作为对性发展的一种描述极为流行。它影响了近来有关儿童发展和同性恋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关于男性气质的人类学探讨^①。

虽然性别认同学说建立在性别倒错者生活的严重不和谐之上，但毫无疑问它是一种规范化的理论。它没有把对女性的认同置于所有男性的无意识中，而只限定于一类特定的越轨群体。（例如，社会学家安妮·博林就曾指出，想变性的男人都特别注意遵从医生对女性服饰和行为的看法。）在尖锐地批判中，罗伯特·梅提出了质疑：这到底是不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梅认为埃里克森的理论事实上是一种改良自我的心理学，斯托勒的“核心性别认同”概念已失去了对冲突、幻想和无意识的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洞察力。他的观点很难反驳。如果说荣格将性别的矛盾化约为心灵内部的两

^① 核心性别身份，斯托勒 1968, 1976。儿童发展，泰森 1986；同性恋，弗里德曼 1988；人类学应用，斯托勒和赫特 1982。变性的发明，金 1981，著名的社区研究，博林 1988。

个对立部分，性别认同理论就更进了一步，完全消除了矛盾^①。

因此，在狼人的个案研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和它的两种最有影响力的替代分析发展了传统的性别实践和男性气质的规范化理论，即：采用性和情感方面狭隘的正统思想鉴定心理健康的理论。但这不是弗洛伊德思想的惟一导向。在医学领域的边缘，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意外的应用，其中的一些理论对性别具有独特的见解。

激进的精神分析

第一个持异议的分析家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他是一位确信社会因素在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医生。1911年与弗洛伊德决裂时，他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产生矛盾的原因是阿德勒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男性气质理论。

阿德勒的论述以我们所熟悉的男女两性对立开始，但随即就强调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对立的一方在文化中被贬值并与柔弱联系起来。男孩和女孩面对成人时是柔弱的，因而他们被迫居于女性地位。他们逐渐显示出女性气质感，怀疑自己成为男性的能力。对男女两性对立的“幼稚的价值判断”在以后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动机持续着。

服从和努力寻求独立一起出现于孩子的生活中，造成了男性

^① 梅 1986。梅撰写的性别作品（1980）强调幻觉，但基于严格的性别二分法之上。

气质与女性气质间的内部矛盾。在正常的发展中，两性气质达到某种平衡。因而成人的人格形成于妥协，并存在于张力之下。

但如果存在弱点（阿德勒认为某种生理缺陷或自卑经常引发神经衰弱症），焦虑将激发过分的男性气质。在阿德勒著名的惯用语中，“男性抗争”是神经衰弱症的中心。它意味着对攻击倾向的过分补偿和对胜利的无休止的追求。

阿德勒认为男性抗争在正常的心理生活以及神经病的心里生活中都是充满活力的。这一观点接近于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批判。男性抗争不仅是男性心理的特征也是女性心理的特征，但它却过分取决于女性的从属性社会地位。在男性中，它可能会成为公开的威胁。阿德勒高度批判了统治型男性气质：

我们文化的主要不幸是男子气概的过分张扬。

大战期间，阿德勒在澳大利亚军队医院工作，他自然了解了男性气质、权力和公共暴力之间的联系。他于1927年所著的《理解人性》对女性主义清晰明了的精神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为世界之冠^①。

^① 阿德勒 1956：55；1992 1927；1928。近来人们又对精神分析有了兴趣，而阿德勒却被忽视了。艾伦博格（1970）略述了阿德勒的事迹。斯特潘斯基 1983 年最详尽地描述了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我一向赞同斯氏对两者决裂的分析。然而斯氏的观点令人惊讶，他认为阿德勒对性别的分析既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社会性的”，并且阿德勒有关社会问题的重要著作仅是为发展心理学思想的“托词”。斯特潘斯基完全忽视了阿德勒著作中的女性主义暴露了他视角的狭窄。

作为在《理解人性》中对神经衰弱症病源的描述已远离了弗洛伊德的利比多理论。阿德勒批评压抑理论是机械论，他视恋母情结仅是更大动力——“男性抗争”阶段的一种形式。两者中，他认为“男性抗争”先于恋母情结。弗洛伊德指责阿德勒的观点是对神经衰弱症无根据的简化（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弗洛伊德断定他不再需要阿德勒及其追随者的支持，并强迫他们退出精神分析的活动。

这次分裂对双方都有损失。阿德勒疏远了弗洛伊德对心理生活错综复杂性的非凡见识，再未对此进行理论研究。在弗洛伊德学派方面，精神分析变成了一个逐渐封闭的系统，与阿德勒提出的社会影响理论相抗衡。然而，其他的学术运动，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继承和发展了阿德勒的思想。

试图衔接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许多尝试都围绕着男性气质这一论题，但并不直接涉及它。威廉·赖克可能是两次战争间弗洛伊德主义左派中最具创新精神的人，他提出了“性格分析”的方法，将注意力从个人症状转移到整个人格的类型。他试图综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和弗洛伊德性科学的尝试导致了对意识形态的卓越分析，突出了“专制家庭”是阶级社会再现和男权制形成的场所。赖克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仅比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晚三年发表，这部著作在完善和发展社会科学方面居于世界前列。赖克把较大权威结构浓缩于家庭精神动力学，准确提供了从社会现实研究问题的角度，而这正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对男性气质的思考所

欠缺的^①。

但赖克对阿德勒著作中关于女性主义的精辟见解缺乏正确的评价，以至于没有把男性气质视为一个问题。之后四十年继承他的性格分析思想——他对权威主义的关注及调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也没有这样做。在马克斯·霍克海默、埃里克·弗罗姆和西奥多·阿多诺的作品中，“权威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性格类型——或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则是一种男性气质的类型。

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精神分析著作——弗罗姆的《对自由的恐惧》（1942年）和集体之作《权威人格》（1950年）实际上是关于男性气质及产生它们的条件的目录。弗罗姆提出了几个世纪以来性格类型广泛的历史连续性。《权威人格》则更接近中心。它包含二个著名的个案——“麦克”和“拉里”，是把男性气质与其经济和文化背景审慎相连的首次详细的临床研究。这种“权威主义者”的类型是一种与维护男权制特别相关的男性气质，它的特征是憎恨同性恋，藐视女性，更普遍的是对上司的服从和对下级的苛责。这些特性可溯源到父母严格的教育、父亲对家庭的统治、性压抑和传统道德。虽然《权威人格》对“民主”的特征描绘得不甚清晰，但很显然，它包含了更多的容忍，并与较放松的、充满情感的家庭关系联系在一起^②。

广阔的社会背景拥有各种心理性特征的经验依据。受精神分

^① 赖克 1970 [1993]，1972。

^② 霍克海默 1936，弗罗姆 1942，阿多诺等人 1950。美国人对《权力人格》的争论参见克里斯蒂和亚霍达。

析影响的人类学家，如杰出的民族志学者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①展现了文化在控制性欲和形塑性格方面的多样性。我们会渐渐明了，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一般不能用来分析男性气质。然而恋母情结是一种历史上可能的男性气质模式，涉及其他男性气质的类型时必须考虑到这种特殊模式。这一结论对男性气质理论具有广泛含义，后几章中将再探讨。

赖克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没像阿德勒那样对利比多理论提出质疑，然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年）中却提出了疑点。他认为弗洛伊德学派和“经验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派一样，都是把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由性欲决定的）当做所有生活的机械论。萨特阐述了一种惊人的替代观点，即“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他提出用人们对自我的不同认知代替无意识的概念。通过追溯个人生活的主要义务的形成史，“明朗日光中的神秘事物”就能得以明了。

萨特本人仅在文学传记中采用了这一方法。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则在《第二性》（1949年）中把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直接运用于性别。她最著名的论点是：相对于男性主体而言，妇女被视为“他者”。但此书也包括了一系列有关不同类型女性气质的内容，女性的欲望被赋予了积极向上的意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使她超越了心理学中熟知的静态类型学。在她的分析中，性别是在与环境和社会结构不断的参与中形成的。与其说不同的性别类型

^① 马林诺夫斯基 1927；后来对马氏理论的支持参见帕森斯 1964。

是固定的性格类型，不如说它们是不同的生活方式^①。

据我所知，“第一性”的男性气质理论从未运用过波伏娃的研究方法。潜在的同样方法却在苏格兰精神病学家 R.D. 莱恩的作品中很明显。莱恩的精神分裂症研究生动地刻画了家庭情感生活中男性的行为，他还作了几个男性的个案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大卫”。大卫是一名学生，他刻意的怪异行为为集于一身的不和谐的戏剧角色提供了线索。这些戏剧角色中最强的是女性的角色，女性角色会使男人因母亲的死亡所引起的家庭变故而受到情绪上的影响。大卫的“精神分裂症”是他与无法控制的性别矛盾进行斗争的结果。在逃避对女性气质认同的过程中，大卫建立了整套系列的其他角色，构成了他精心伪装的自我体系^②。

大卫的行为不是男性气质的一种“类型”；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中，性别对立不是恒定的，它们的结果也不是同一的。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但它们的矛盾却被认为是不相容的行为造成的。这一研究人格的方式可与社会结构理论相连系，然而它强调的是参与和行动而非社会机制^③。

除波伏娃外，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很少出现交互作用。但精神分析的激进潜势以两种主要的形式逐渐出现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

第一种来自雅克·拉康。受拉康影响的女性主义者更关注女性气质而不是男性气质的理论化，如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和法

① 萨特 1958，波伏娃 1972 [1949]。

② 莱恩 1960：73；莱恩 1961，莱恩和艾斯特森 1964。

③ 见萨特后期作品 1968，1976。有关它与性别的关系见康奈尔 1982。

国的卢斯·伊莉嘉瑞。然而她们的著作含蓄地描述了男性气质。拉康的理论强调符号过程，其中，弗洛伊德的家庭情感关系模式显而易见。“父亲的法规”构成了文化和交往的可能性。在此男性气质不是一个经验事实（如经典精神分析），也不是一种永恒的原型（如荣格理论），而是处于符号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俄狄浦斯压抑产生了一个符号秩序系统，阴茎（一种象征，明确区别于任何真实的阴茎）的拥有者处于其中心^①。

把性别视为符号关系系统，而不是有关人的固定事实，那么承认阴茎的地位就是一种高度的政治行为。否认它的地位总是可能的，即使否定的后果是严重的。吉利斯·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在晦涩但有影响力的著作《反俄狄浦斯》中研究了对俄狄浦斯欲望的拒斥。这为盖伊·奥康让将男性同性恋戏剧性地解读为拒斥阴茎性欲和俄狄浦斯压抑奠定了基础^②。

当欧洲的拉康女性主义提出了男性气质的政治、符号解读方式时，北美的女性主义转向了家庭关系的寻常问题，改变了对男孩精神性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认识。经典精神分析着重于俄狄浦斯是如何获得男性气质的（无论关键的因素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父亲，还是霍尼认为的母亲）。在南希·乔多萝和多萝西·迪内斯泰因的研究中，着眼点放在前俄狄浦斯与女性气质的分离，明确强调母亲的作用。

① 这是对一组复杂的位置的简单总结。拉康学派的历史参见鲁迪纳斯科 1990。拉康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分析见米切尔（1975）、伊莉嘉瑞（1985）和格罗斯（1990）。

② 德勒兹和瓜塔里（1977），奥康让（1978）。

乔多萝对这种分离的描述极大地影响了近期有关男性的论著。她提出男孩被迫中断了他们对母亲的最初认同，部分是由于母亲对性别差异的自我情感认识，其结果导致了注重人与人之间存在界限的性格结构，以及不需求女性的性格结构。迪内斯泰因的论点更突出对母亲的前俄狄浦斯恐惧，及“早期儿童保育的女性垄断”产生的后果——男性暴力^①。

根据她们的理论，人格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紧紧相连。儿童保育是工作，工作人员是性别化的，这个事实对情感的发展很重要。无论我们对她们理论的细节如何修改，这一简单而强有力的论点在以后对男性气质形成的任何描述中都必须予以承认。

回顾上述内容，很清楚，弗洛伊德给予了我们一种重要的工具，但它压根不完整，对这种不完整性的辩护构成了正统精神分析学的部分内容。精神分析在探索男性气质方面的价值将最终有赖于在人类建构社会关系的时候，我们掌握他们矛盾和动态的人格构造和欲望复杂性的能力。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域。

男性角色

创建男性气质社会科学的第一次重要尝试以男性性角色的观点为基础。它起源于19世纪后期有关性差异的争论，当时对妇

^① 乔多萝 1978, 1985; 迪内斯泰因 1976。克莱伯 (1987) 运用客体-关系方法，更清晰地评价了男性统治的制度基础，但没有继续下去。对建立男性气质理论的方法的批判参见麦克马洪 1993。

女解放的阻抗受到性天生存在差异的科学学说的支持。例如，妇女不能进入大学是正当的，因为妇女的大脑被认为太脆弱而无法处理学术工作的严谨性。从事学术工作而产生的心理骚动对于她们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能力将是不利的。第一代进入北美大学的妇女不仅打破了这一传统，而且通过研究男人和妇女间的智力差异对这一学说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她们没有发现什么差异^①。

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引发了随后的大量研究，从19世纪90年代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研究不仅涵盖了智力，而且还包括情感、态度、人格特征、旨趣以及心理学家所想到的任何问题。“性差异”研究的数目引人注目，它在技术上较容易进行，同时人们对其结论有持久的兴趣。

研究结果很奇怪，没有发现任何不利于女性的证据。几乎在每一个测量的心理特征上，性差异或不存在或相当小。它们比社会环境的差异，如不平等收入、儿童保育的不平等责任和掌握社会权力等小得多，而社会环境的差异一向被认为是导致心理差异的原因。当研究群体采用统计的因素分析法进行总计时，更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心理特征中存在某些性差异，但是差异不大。如果我们不是在文化上就已被提示要夸大它们，它们就像本章开头谈到的男人和妇女语言不同一样，不是重要现象。辛西娅·爱泼斯坦把她有关这类问题的著作适宜地称为《欺骗性的差异》^②。

① 罗森伯格 1982。

② 爱泼斯坦 1988。麦科比和杰克林汇集了大量资料，于1975年建立了性差异的一般模式。以后的分析文献，如伊格里1987年的文章，试图建立更好的模式。从早到晚他费尽心力，也未能证明性差异是性格的决定因素。

中世纪前后，性差异研究偶遇了“社会角色”的概念，它似乎是以一种最新的方式来解释性差异。这次相遇产生了术语“性角色”，后来它进入了日常用语。

现在性角色的观点很普通，所以了解它的近代来源是必要的。把人们的生活比作戏剧当然是一个古老的比喻，莎士比亚曾用过。但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专门概念，以及作为一般解释社会行为的真正方式，“角色”的使用仅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提供了将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文化规范连结起来的便利途径。通过一大群显赫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一概念便进入了社会科学的常规术语库^①。

角色概念能以两种方式运用于性别。其一，角色被看成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角色。例如，米拉·科马罗夫斯科在对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杰出研究成果《蓝领婚姻》（1964年）里，详细描述了求爱和婚姻中的信件手稿。

但第二种更为普遍，其中，做一个男人或一个妇女就意味着扮演人们对某一性别的一整套期望——“性角色”。根据这一理论，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两种性角色：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很容易被解释为内化的性角色，它们是社会习得或“社会化”的产物。

性角色与性差异的概念紧密相连，而它又很容易解释后者，以至于这两个概念自20世纪40年代起便一直混淆不清。学术杂

^① 他们中有兹纳涅克、帕森斯、林顿、纳德尔。我在1979年的著作中叙述了这一历史。

志上仍在发表那些把性差异（通常是细微的）简单的称为“性角色”的论文。

通常，性角色被看成是性差异的文化建构。但这并不是一定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帕森斯在《家庭、社会化和互动过程》中对性角色理论所作的复杂陈述有另一种说法。他认为在小群体的家庭里，男女性角色的差异表现为“工具性”和“表现性”两种不同的角色。因而性别是由社会群体中功能分化的一般社会学法则演绎而来的^①。

男性气质是内化的男性性角色的观点考虑了社会变迁，这有时被看成是角色理论优于精神分析的地方。由于角色规范是社会事实，所以社会过程能改变它们。只要社会化的承担者——家庭、学校和大众媒体——传达新的期望，角色规范就会发生变化。

最初对“男性性角色”所进行的详细讨论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变迁是其中心主题。最有名的是海伦·哈克的一篇论文《男性气质的新义务》，它提出表现性功能现在正加入工具性功能中。因而男性在被期望成为“坚实的橡木”的同时也被期望展现人际关系的技巧，——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过时了。这种角色理论甚至可能认可男性气质内存在有冲突的思想，认为它来自冲突性的或无法控制的社会期望，而不是来自压抑^②。

① 科马罗夫斯基 1964；帕森斯和巴勒斯 1956。对这一历史更详细的描述参见卡里根等人 1985。

② 哈克 1957；参照哈特利 1959 年的著作。

然而在极大程度上，第一代性角色理论家们假定角色是完美的，社会化过程和谐的发展，以及性角色的学习十分完满。内化性角色有助于社会稳定、心理健康和完成必要的社会功能。正式而言就是，功能理论假定社会制度、性角色规范和真实人格间是和谐的。

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瓦解了这种框架的政治自满，而没有破坏“性角色”这一概念本身。事实上，随着学术性女性主义的推进，性角色研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但这时女性角色一般都被假定是受压制的，角色内化则是将女孩和妇女固定在从属地位上的一种手段。角色研究变成了政治工具，即界定某一问题并提出改革策略。性角色会随教室里期望的改变、新角色模式的树立等等而得到改变。性角色改革的策略兴起于美国，不久便在全球兴起，1975年著名的澳大利亚政府报告《女孩、学校和社会》和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妇女十年就说明了此点^①。

西方女性知识分子中的骚动逐渐影响了男性。70年代中期，美国有一次小型的但讨论较多的男人解放运动，其他国家也有男性提高觉悟的小群体网络。如沃伦·法雷利在《解放的男人》，及杰克·尼克尔斯在《男人的解放》中，认为男性角色是受压制的，应该改变或放弃这种角色。新版男性丛书和辅导性的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小有发展。下列两个题目表现了它们的特点：“无表现力的男性：美国社会的悲剧”和“警告：男性角色会对你的健康

^① 学校委员会 1975。性角色改革后的最流行的模式之一是“雌雄同体”；见贝姆 1974，莱尼 1979。

有害”。“男性研究”的思想随着女性主义者对妇女的研究而扩展开^①。

大多数此类文献对男性角色的描绘是相当传统的，由于没有进行新的研究，这种情况不足为奇。然而，有关男性角色的文献汇集了常见的内容如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批评、男性气质的媒体形象、问卷调查的态度结果、性差异的发现和自传体的体育运动轶事，这一切被统称为“角色”。

很少人尝试研究社会生活中期望或规范的效果。它们被简单地假定为存在的并且是有效的。有些人试图勾勒出男性角色变迁的过程。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普莱克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位多产作家，他比较了“传统”与“现代”的男性角色。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著作利用治疗、提高觉悟小组、政治讨论和婚姻中的角色共享或自助等方法鼓励男性跨入现代角色。

这些研究始于妇女解放运动，曾一度对女性主义持同情态度。关于性别中权力维度的一些论述是相当清楚的，如普莱克1977年的论文《对女性、其他男性和社会的男性权力：一种男性运动分析》和乔恩·斯诺德哥拉斯活泼轻快的文集《反性别歧视的男性》。这些论文将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男性中的权力等级，尤其是黑人男性和男同性恋者的被压迫之间建立了联系。但在论及男性角色类型的其他方面时，文章对于女性存有矛盾情绪，对女性主义承担的义务避而不谈。一些作家把男人的被压迫等同于

① 普莱克和索耶1974，法雷利（1974）和尼克尔斯（1975）提出了男人解放运动的早期理论。法雷利后来转向右派，第九章将讨论此事。所提及的论文是鲍尔思维克和皮克（1971），哈里森（1978）撰写的。

妇女的被压迫，否认存在任何“被压迫阶级”^①。

这种矛盾情绪根植于“性角色”结构。因为根据性角色分析的逻辑预设，两种角色是相互的。角色由期望和规范确定，被期望的性角色依附于生理身份，这无需对权力进行分析。同时，在性角色理论中有一种基本趋势：把男人和妇女的地位理解为互补的。帕森斯的工具性（男性）和表现性（女性）取向的理论明确地指出了此点。

在角色系统中当压制达到一定程度，角色就会把它作为约束力置于自我之上。这在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中都易发生。这种压力实际上是 20 世纪 70 年代“男性丛书”的主题。作者列举了一件又一件奇闻轶事，证明体育播音员、不善言辞的父亲和夸夸其谈的同龄群体对本国青年具有巨蟒般的束缚力。

1981 年普莱克发表了《男性气质神话》，对男性角色文献进行了全面审视，将重点放在角色和自我的关系上。他特别批判了“男性性角色身份”理论（他对功能主义性角色理论的称谓）的假设：规范和人格是和谐的，服从性角色规范并促进心理调整。

这一批判是非常有效的。普莱克指出在功能主义性角色的论述中想当然的东西太多，而支持它的主要观点的经验证据又太少。更为有趣的是，普莱克提出了一个几乎是福柯的论点：规范化角色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性别政治。性别关系的历史变迁需要社会对男性控制的形式从外向内转变。

^① 普莱克 1976, 1977; 斯诺德格拉斯 1977。反对女性主义的开端见 1973 年伯克利的男人中心宣言，普莱克和索耶 1974: 174; 和戈德堡 1976 年的著作中都转载了该宣言。

性角色身份的概念阻止那些企图违反传统性角色的个体向它挑战；否则，他们会感到人格的不完整性和不安全性^①。

因此，规范化的性角色理论有助于抑制社会变迁。

普莱克所建议的是非规范化的性角色理论，一种将角色和自我分离的理论。他期望这样一种男性角色模式理论：男性服从性角色规范，但角色规范会改变，并且应不时地改变；许多人确实违反了规范，但可能会受到惩罚，所以他们就会过分遵从。这将使男性角色理论更具内在的一致性，从而摆脱生物决定论和本体理论的桎梏。但它不能打破角色理论的知识限制。

这些限制不断地反复出现^②。因为角色理论家几乎一致地忽视了普莱克的批评，仍然广泛使用术语“男性角色”，所以我将斗胆矫枉过正，并细述主要的论点。

一般而言角色理论在逻辑上是含糊的。同样的术语被用来描述职业、政治地位、瞬间的交往、嗜好、生活的一个阶段及性别。由于界定“角色”的基础是变动不居的，所以角色理论导致了社会生活分析中严重的不连贯性。角色理论夸大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被规定的程度。但同时，由于规定被假设是互惠的，于是就掩盖了社会不平等和权力。所以“角色”作为社会分析的一般框

① 普莱克 1981：160。

② 一般而言的角色概念见厄里（1970），库尔森（1972）和康奈尔（1979）。性角色理论见爱德华兹（1983），斯泰西和托尔纳（1985）。对男性气质研究中性角色理论的批判见卡里根等人 1985，金梅尔 1987。

架是行不通的。

这并不是说角色的这种戏剧性隐喻在理解社会情景方面一无是处。它对于下列情景是适当的：(1) 有界定得很好的剧本供演出；(2) 有头脑清楚的观众观看表演；(3) 成本不要太高（这样，某种演出可能就是正在进行的重要社会活动）。通常这些条件对性别关系不适用。“性角色”对性别互动而言根本是不合适的比喻。（当然，一个人可以想象性别互动的具体情景，角色在其中被明确地扮演。例如，舞厅的跳舞竞赛——就像轻松愉快的电影《绝对舞厅》中的那样。）

在性角色理论中，行动（角色扮演）与由生理差别即男女两种性别所定义的结构——而不是由社会关系所定义的结构——相联系。这导致了范畴化，性别简化为两种同质的范畴，混淆了性别差异和性角色的区别。根据性角色理论，性角色被界定为互惠的，因此性角色必然存在差异。这引起了对社会现实的误解，对男人和妇女间差异的夸大，同时使种族、阶级和性别结构模糊不清。还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男性角色”的讨论多半忽视了男同性恋者并很少谈论种族和种族划分。

行为和期望的区别是角色的根基。但有关男性性角色的文献没有分别证明它们，只是以其中之一作为另一个的依据。结果性别政治中的对抗就无法理解。角逐权力的人们（例如，像同性恋解放运动那样，参与者使用“不光彩”的身份来表明团结，动员反抗。）不能用“规范”和“越轨”的角色范畴来简单地说明。

性角色理论在解释权力问题方面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困难。诉

诸角色分化来解释男人和妇女状况的差异掩盖了暴力行为，并且运用泛泛的“赞同”假定排除了强迫的问题。虽然普莱克对权力问题很敏感并对“赞同”表示怀疑，但他也不能把这些涉及男人的事情与性角色框架的其他部分融合起来。结果这些问题便从他的作品中溜掉了。

这一困难只是解释社会变迁更大困难中的一部分。男性性角色理论虽然意识到性角色的变迁，也经常对它很热心，但始终把它看成是来自外界影响的结果（如被看成是技术变迁的结果）。没有把变迁理解为性别关系内的辩证法。

其次，对男性性角色的研究在根本上是保守的，它没有产生战略性的男性气质政治。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为性角色的改变而努力的男性，在 80 年代却没能对那些视现代性为懦弱、崇拜虚幻过去的空想家们作有效的反抗。

新的社会科学

文学类

受男人解放运动和性角色心理学的激励，社会科学的几个领域都突破了角色理论，应用新方法研究男性气质。其中，历史学和民族志为男性气质的多样性和变形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然，学院式的历史著作总是关于男人的，至少是关于那些富有并著名的男人。女性主义者指出此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展开了一场旨在撰写“妇女史”和恢复两性平衡的声势浩大的运

动。如果假定性角色是相互的，那么很快就会有人认为必须写一部相应的“男性史”。这一点已被宣布并予以实施直到 70 年代末^①。

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男性史。因而新男性史的中心主题仅可能来自男人的非性别历史中所遗漏的内容——男性气质。它通常被称为男性角色的历史，在美国，此类研究的第一股浪潮与刚刚讨论的性角色文献重叠了。它的特征是范围同样模糊，经常在一个较高的抽象层次上讨论。

虽然对男性阳刚之气的文化规范仍在进行广泛的调查，但针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更深刻的研究出现了，它从妇女史的大量区域研究中找到了线索。一些著作比期望的更具多样化和竞争性，其中的优秀作品已超越了规范本身而探讨制定规范的社会机构。

克里斯廷·休厄德的《使男人成为他自己》就是此类研究，它描绘了一所英国私立中小学校的变迁与特点。她不仅展示了学校的校规、服装、学术等级和运动比赛的实施怎样建构了受人尊敬的男性气质，并展现了学校怎样策应男孩家庭对性别和阶级的态度。另一个例子是迈克尔·格罗斯贝格对 19 世纪美国法律业务的研究。他说明了当这一职业的内部组织（如法庭听证会的“巡回律师会”）维持男性气质的特有形式时，它的职业界线怎样被控制而用来反对妇女，并当法律事务所的兴起改变了性别的状况，使妇女进入法律界成为可能之时，律师行业的男性气质最终

^① 斯特恩斯（1979），普莱克和普莱克（1980）的著作是好的例子。还有其他差的多的例子我出于惭愧之心不在此提及。

又是怎样得到转变的^①。

同样的逻辑适合更大的机构如劳动市场。男性角色文献想当然地认为养家糊口是男性气质的核心部分。但这一联系来自哪儿呢？沃利·赛科姆指出男性“养家糊口者”的工资是一种近代产物，而且工资制度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被普遍接受。工资制度形成于英国19世纪中期社会力量广泛再联盟的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在工资问题上都被深深分割开来。工会逐渐采用了“养家糊口者”的工资目标，代价是促进了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的划分^②。

从这些研究可清楚的看出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深深根植于机构和经济结构的历史之中的。男性气质不只是头脑中的一个概念或一种人格身份，它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融入组织化的社会关系之中。为了历史的理解男性气质，我们必须研究那些社会关系中的变迁。正如迈克尔·吉尔丁在近来发表的《澳大利亚家庭的组建和破裂》中所显示的，我们需要打开一个像“家庭”这样的单位进入到组成它的不同关系之中，就家庭而言，就是抚养子女、就业、性关系和劳动分工。它们可能以不同的节奏变化，于是造成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中的张力^③。

欧洲权力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关系，是那些

- ① 大规模的调查方法参见罗通多1993；地区研究，卡恩斯和格里芬1990，罗珀和托什1991，特别是休厄德1988，格罗斯贝格1990。
- ② 赛科姆1986。细致的地方性研究如梅特卡夫（1988）对澳大利亚矿工和罗丝（1992）对英国织布工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家庭的政治特性。
- ③ 吉尔丁1991。

已发表的有关男性气质最著名的历史研究的主题。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乔克·菲利普斯对殖民地时期的新西兰和 20 世纪的新西兰所作的研究^①。

从殖民地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入手，菲利普指出殖民造成白人移民中男性人口的过剩，也为边境上全是男性的工作团体造就了适当职务。于是狂暴的男性亚文化诞生了，它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秩序问题。殖民政府试图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家庭农场的农业移民而施以控制。这就把男性气质约束到婚姻和更有秩序的生活方式中去。

世纪之交，随着性别比率的更加平衡，城市化的加快，以及毛利人的彻底臣服，对社会控制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政府转变了态度，开始激励粗暴的男性气质。首先是因为布尔战争，其次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新西兰白人男性被动员加入英国皇家军队。在对那诱人的军队到达和出发的公共仪式所进行的个案研究中，菲利普斯展示了政治家和新闻界怎样虚构新西兰男人的公众形象。它融合了农夫移民者的气质和种族主义帝国团结的思想。与此同时，毛利男性被动员入伍时，武士神话成为蛊惑他们参战的手段。

解决男性暴力和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的方法是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当国家足球队从 1905 年的英格兰巡回赛返回时，在群众载歌载舞的热情欢迎中，总理接见了他们。此时，团队比赛成为发扬传统的竞技运动而发展起来，横跨整

^① 菲利普斯 1980, 1984, 1987。

个英语世界。运动作为测试男性气质的示范地位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虽然我们现在理所当然地予以接受。竞技运动是历史的产物，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能看出它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而特意营造的。

这个例子的细节对新西兰而言具有独特性，但这种研究有更宽泛的含意。菲利普斯说明示范性男性气质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制造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在把男人推向死亡）。它是在殖民地居民中变化的社会关系、当地政府、英国帝国体系和帝国主义权力全球竞争之间的相互影响下产生的。性别模式不是这些力量的机械效果，它的产生是对既定环境的策略性反应。它也不是这种环境中可能出现的惟一模式。如果劳工或和平主义的力量变得更强大，足球不再名声显赫，毛利人和白人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性别关系就会是另一种模式。一种特殊的示范性男性气质的产生需要政治斗争，它意味着摧毁过去类型的男性气质。

因此，有关男性气质的历史研究从机构着手，进而指向媒介和社会斗争的问题。类似的逻辑出现于人类学中。

另一类人的民族志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欧洲人和北美人在他们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小型社会。20世纪早期民族志成为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根据个人观察并与被调查者用本地方言进行交谈，细致描述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生活方式。

民族志试图掌握的是不同于世俗的、基于市场和国家调控的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殖民化文化。这导致了对宗教和神话的注意，也引起了对通常被认为提供了“初始”社会结构的亲属体系的重视。这两类调查都是有关性别信息的丰富来源。因而堆积在帝国主义强国图书馆中的民族志报告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性角色理论相互辩论的信息宝库。

从而，人类学成为了这些争论的重要来源。我已提到马林诺夫斯基依据他在特罗布里恩岛收集的民族志资料发起了对恋母情结普遍性的论战。玛格丽特·米德 20 世纪 30 年代撰写的《三个原始社会的性和气质》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文化涵义多样性的有力证据，尽管她从未克服过这一信念：自然的异性恋是两性气质文化的基础^①。正如历史上妇女首先发起了大多数关于两性的新研究并试图记录女性的生活以及随后才有了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一样，在 70 年代的第二次浪潮中，女性主义又开创了性别人类学的新研究。

这类研究的一些作品集中于男性气质的文化意象。一个例子就是迈克尔·赫茨菲尔德风趣的佳作《阳刚之气的诗意》，其中讲述了在克雷坦山地村落中偷羊是显示男性气质的机会。关于拉丁美洲“大男子气概”——一种强调对女性的统治、男人间的竞争、攻击性的表现、掠夺性的性行为 and 双重标准^② 的男性典范——的民族志争论也给予了意识形态以众多的关注。

吉尔伯特·赫特的《长笛的守护者》是最近以来有关男性气

① 米德 1963 [1935]。她后来的性别理论变得更保守；米德 1950。

② 赫茨菲尔德 1985；讨论男子气概的例子见伯尔顿 1979。

质的民族志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在该文中，意识形态更稳固的体现在实践里。本书反应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部高地“桑比亚”的一种传统甚至保守的民族志文化。它叙述了园艺和采集经济、小型村落的政治秩序、一种宇宙观和一套神话以及仪式系统。这种文化的特征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明显的性别分工并极为强调攻击性的男性气质。

赫特著作的核心是男性膜拜和它的人社仪式。入社涉及到新加入的男孩和年轻的成年男人间持续的性关系，其中要吮吸阴茎，吞下精液。精液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精华，必须在男人代际间传承以保证社会的生存。这一信念受整个故事体系和仪式的支持，包含了自然环境、桑比亚的社会秩序和神圣的长笛，用它吹奏的音乐是男性膜拜的一个特征。

性的内容使赫特的民族志令人反感。他呈现了一幅狂暴的、攻击性的男性气质图景，很显然就像我们自己文化中所熟悉的那种夸张的男性气质，但前者是建立于同性恋关系基础之上，而我们的文化认为同性恋会导致女人气。这种民族志更加违背了我们文化的顽固假定（通常是科学家和政治家的信仰）：同性恋局限于少数人。在桑比亚人中，所有的男性或多或少地在生活的某一阶段都是同性恋。赫特给这种模式起了一个绰号“仪式化的同性恋”，并收集了其他美拉尼西亚社会类似的实践研究^①。

诸如此类的研究能产生哪种知识呢？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

^① 赫特 1981, 1982, 1984。摩杰斯卡 (1990) 对“仪式化同性恋”的范围提出质疑。

法把大量的个案放在一起试图得到跨文化的归纳及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这正好是戴维·吉尔摩在《形成中的男子气概》中所使用的方法，它是近年来应用人类学说明男性气质最具雄心的尝试。

吉尔摩正确地指出人类学是有关男人和男性气质信息的宝库。他依靠良好的图书馆，整理了全世界的资料，总结了来自西班牙、特鲁克群岛、巴西、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玻利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民族志以及“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零星资料。他的目的是为概括男性成年期及其实现的广泛基础，用以回答下列问题：“存在男性气质的深层结构吗？存在男子气概的全球化原型吗？”

吉尔摩的答案很明了：男性成年期较难实现，它涉及到特定男性领域内的努力，因此，它的实现必须以入社的仪式为特征。男性意识的文化功能激励男人们工作：

只要存在要进行的战斗，要获胜的战争，要跨越的高度，要做的艰苦工作，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必须“像男人一样行动”。

心理学上的男性气质是一种保障，它可以抵御男人回归到认同母亲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吉尔摩认为在多数文化中这种男性气质都是真的，但有一些例外，在塔希提岛人和马来西亚的西迈人中就存在更轻松的，更“温顺”的男性气质模式^①。

^① 吉尔摩 1990。

从世界范围收集到的民族志证据如此平淡无奇，令人感到惊奇。民族志有问题吗？我想不是的，问题是它们被使用的方式。吉尔摩的分析框架是性角色理论，他的著作体现了上述所讨论过的混乱和简略。在更深层次上，他的著作说明了通过跨文化的归纳建立有关男性气质的实证主义科学是行不通的。

实证主义方法事先假定了知识的固定客体，它在所有个案中都是恒定的。“男性成年期”或“男性气质”是这种客体吗？有些民族志指出它不是。玛里琳·斯特拉森对新几内亚高地哈根人中她称之为“性的实现”的复杂分析显示性别是隐喻，而不是性角色。当哈根的某人（意味深长的）说“我们的部落是男人的部落”，他们不是说部落中没有妇女，也不是说妇女采用了一种男性角色。他们在某一程度上是说部落作为一个集体具有能力和力量。这一习语和性差异的观点相抵触并使男性气质的实证主义定义陷入混乱^①。

斯特拉森的民族志迫使我们去理解性别不同的意义。赫特对桑比亚的最初描述也是一部动人的民族志，它传达给西方读者某些真正外国的东西，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经验和实践的知识。用现代欧洲或美国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正如对男性气质的传统研究所做的那样（见第三章）——去研究男性气质的学科肯定会失败。

那么，民族志怎样才能成为研究性别的社会科学呢？这需要识别出那些构成民族志知识的社会关系才行。

^① 斯特拉森 1978, 1981。

当赫特 1982 年汇集他的比较研究丛书《男性成年期仪式》时，他收入了 E.L. 席费林有关巴布亚高地卡路里人进入仪式性的男性狩猎小屋的研究。席费林对较年长的和较年轻的男性定期从世俗社会中的撤离进行了详细的民族志描述。这一风俗涉及与精神世界、女性的仪式回避、当地社会地方性冲突中的和平时期、及仪式性分配狩猎所获取的熏肉所激起的兴奋高潮等方面的变化关系。

事实证明席费林从未目睹过土著男性进入狩猎小屋的场面。1958 年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开始定期派警察到这一地区巡逻。1964 年传教士和一群工人来到这儿开始修建车站和飞机跑道。两个卡路里社团恰巧正在那时主办狩猎小屋的进入仪式，他们的年轻人在森林狩猎。由于种种原因如果外来者走进了狩猎小屋，对仪式而言将是一种灾难。依据对以往巡逻的经验，卡路里人特别害怕熏肉被偷，所以他们匆忙结束了仪式，分配了肉，从此再也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①。

民族志一直关注土著社会与西方经济和政治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点。近来对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再思考强调了民族志者的身份及其被谴责的社会关系：殖民者对被殖民化者的观察，权力关系规定了谁是认识者，谁是被认识者^②。

实证科学放弃这一历史维度而进行研究。它让我们忘记那些偷熏肉的人，但我们做不到。我将表明民族志关于男性气质的知

① 席费林 1982。

② 克利福德和马库斯 1986，斯特拉森 1991。

识对于我们一定程度上把它理解为全球历史的组成部分，理解为一部以剥夺、斗争和变革为特征的历史是有价值的。当土著人越来越要求获得权力，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关于西方男性气质的知识无疑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社会建构和性别动力学

社会学是有关男性气质最早的性角色理论研究的学术发源地，又是与性角色框架决然分离的领域。最近十年，工业国家中的田野研究成倍增长，新的理论出现了。这种新的研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以下共同的主题是清楚的：男性气质在日常生活中的建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重要影响，男性气质中差异的意义，以及性别的矛盾和变化的特性。

性别虽然在社会互动的进程中不是固定的却是在互动中建构的，这是现代性别社会学一个重要的主题——从常人方法学细致的谈话研究到对组织中歧视的研究。它是近来论述男性气质的主要关注点，如迈克尔·梅斯纳对职业运动员的访谈研究《比赛中的权力》，以及艾伦·克莱因对健美运动的参与观察研究《小大男人》^①。

如性角色研究一样，社会学关注男性气质的公共习俗，但不是把这些当成被动内化和被动扮演的预先存在的规范，而是一种探究社会实践自身中习俗的制定和再制定的新研究。一方面，社

^① 论互动和性别，韦斯特和齐默尔曼 1987；论男性气质，梅斯纳 1992，克莱因 1993。

社会学研究引起了对规范政治的兴趣：被调动起来的利益和用于建构它们的手段。理查德·格吕诺和戴维·惠特森的《加拿大的冰球之夜》很详细地说明了商业和政治利益怎样建构了富于攻击性的职业冰球的男性化世界。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引起了对抵消或限制一种特定男性气质的兴趣。限制运动员生涯的伤害作用及围绕健美运动而引起的性别矛盾来自梅斯纳和克莱因的研究。

男性气质在体育运动中的建构也体现了机构背景的重要性。梅斯纳强调当男孩开始参与竞赛运动时，他们不仅是在学一种游戏，而且进入了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仅有极少数人作为职业运动员而达到顶峰，然而整个运动世界中男性气质的产生却要通过一个科层、竞争的机构体系。这种结构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正如加里·法恩指出的，不仅企业而且全美国都卷入了通过“小联盟”棒球运动来组织男孩的空闲时间。J. 埃德加·胡佛就是主管者之一^①。

一般而言，工作场所和体育运动的情况一样。在最深层次上，经济环境和组织结构成为了男性气质发展的一部分。正如迈克·唐纳森在《我们生活的时间》中所指出的，工厂和矿井中的艰苦劳动几乎耗尽了工人的体力；那种摧残——工作和工人艰苦的证明——可能是显示男性气质的方法。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因为体力劳动必定是破坏性的，而是因为经济压力和监督控制之下体力劳动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进行^②。

^① 格伦诺和惠特森 1993，法恩 1987。

^② 唐纳森 1991。

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形成具有不同于空调办公室的中产阶级男性气质形成的动力，虽然像 D. 柯林森，奈特和 M. 柯林森在《管理到歧视》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男性化白领职业的创造和维护可能只是一种意识过程。自从安德鲁·托尔森的开拓性著作《男性气质的限制》收集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以来，男性气质中的阶级差异就已成为英国研究的一个主题。美国的阶级差异是詹姆斯·梅塞施密特《男性气质与犯罪》一书中的主题，它说明了白领和街头犯罪怎样成为构建特定阶级男性气质的资源。罗伯特·斯特普尔思的著作《黑人的男性气质》是对种族差异的开创性研究，其中经济问题和意识形态具有同样突出的地位。斯特普尔思把美国种族主义中黑人男子的社会环境与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结合起来，但这种见识没有进一步发展^①。

认识到阶级或种族差异是重要的，但它们不是惟一存在的差异模式。人们越来越清楚同样的文化或制度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男性气质。这首先反映在对学校的研究中，如保罗·威力的著作《学会劳动》中有关英国工人阶级中学的研究。他指出粗暴“青年”逐渐形成抗争性男性气质并因此进入了工厂，与那些服从学校要求并努力学习的那些来自同一环境的男孩划清界限。令人惊奇的是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一所澳大利亚的贵族子弟学校和其他学校中^②。

这些观察及上述的性格精神分析研究和以下将要讨论的同性

① 柯林森，奈特和柯林森 1990，托尔森 1977，梅塞施密特 1993，斯特普尔思 1982。

② 威力斯 1977，凯斯勒等人 1985。

恋解放引发了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思考。认识男性气质的多样性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明了不同类型男性气质之间的联盟、支配和从属的关系。通过排斥、包容、亲近和剥削等实践活动，这些关系得以建构。男性气质内存在性别政治^①。

学校研究生动展现了支配模式。在某些学校，经由竞赛运动而得到赞扬的男性气质是支配性的，这意味着运动能力也是对男性气质的一种测试，甚至对那些讨厌运动的男孩而言也是如此。那些拒绝这种支配模式的人不得不斗争或妥协。詹姆斯·沃克对一所澳大利亚旧市区男校的民族志描述《笨蛋和传奇》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例举了“三个朋友”的案例，这三人蔑视学校的足球崇拜。但他们不能轻易地抵御崇拜的诱惑，从而不得不寻找某些其他获得敬仰的方法，通过接管校刊他们做到了^②。

其次，支配并不意味着控制一切。它不能自我保护，可能会被瓦解或甚至破坏它自己。例如，运动场上会有过多的勇猛行为。梅斯纳引用了美国橄榄球员案例，说明“合法”暴力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当其他队员被严重伤害时，允许男性攻击行为的规定会使体育运动作为一个整体面临丧失名誉的危险。

这些观察显示建构男性气质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不符合社会化模型的单向因果关系。像《学会劳动》中所描述的那些“青年”的男性气质当然不是学校有意造成的，而是男孩建构抗争性男性气质以反抗学校权威的结果。另一类矛盾多见于克莱因的健

① 卡里根、康奈尔和李 1985 年的著作界定了支配性男性气质；对这一概念的批判见唐纳森 1993。

② 沃克 1988。

美运动研究。一些经济拮据的健美者须通过向爱慕和渴望他们的中产阶级男同性恋者卖淫和提供其他服务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在一种共识的文化中，同性恋行为给这些男性实际所拥有的男性气质带来了耻辱。所以那些“男妓”寻找重新解释他们所作所为的绝妙方法，否认他们自己的同性恋行为^①。

其次，在认识男性气质的不同类型时，我们不必把它们当成固定的范畴。性格类型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此可能会产生误导。认识构建性别关系的动力机制是相当重要的。辛西娅·科伯恩的著作《兄弟》是对伦敦印刷车间中男性气质集体构建的极好研究，她写到：

伴随工人阶级内部旧结构的崩溃和统治手工业传统的男权制关系的瓦解，年长者的权威，“青年”的服从，宗教生活的成年仪式以及最重要的对女性的排斥都消失了。

科伯恩强调男性气质建构和男性气质变迁的政治特性。一个加拿大研究小组在《重铸钢铁般劳工》一书中也陈述了同样的观点，该书是结合调查研究和民族志对男性气质所作的第一次重要研究。在哈密尔顿钢铁厂，男人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愿意接受妇女为同事并对男性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工会的推动下，这些变化打破了性别歧视。但这与为追求利润而缩减员工的管理策略发生了冲突，结果是性别的改变比可能会发生的

^① 论学校中的辩证法，康奈尔 1989；论体育中的辩证法，克莱因 1993。

要小^①。

尽管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男性气质的多样性及其区别，但他们一致认为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是一个系统过程。英国在发展男性气质普遍理论的主要尝试中一向强调这一点。这种研究针对政治左派，对男人左派政治的传统形式提出了深刻的质疑。杰夫·赫恩在《性别的压迫》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男性对妇女的劳动并更为普遍地对妇女的“人的价值”的占有。他雄心勃勃（虽然有些武断）的建立了一个男权制的模型，用以解释男人剥削妇女的非人格和复杂的关系结构，这是男权制二分理论的一个相当大的进步。维克托·塞德勒的《重现男性气质》对文化所作的研究正如赫恩对社会结构所进行的研究，将男人的日常经验置于男权制的宏大框架内。塞德勒着重于男性气质建构中的情感控制和对性的否定，并将此与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抽象理性联系起来。这种理论研究仍在进行中。不过，大家达到了一种共识，即男性气质必须作为宏观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个方面来理解^②。

除赫恩的研究外，探讨男性气质的新社会学没有提出确定性的模型。萨特认为，社会学研究了男性气质的不同影象，指出了它们所产生的环境以及带来的影响。这类知识无助于研究男性气质的实证科学，但能说明社会实践。在这方面，它和来源于社会运动的男性气质知识有很多共同之处。

① 科伯恩 1983: 171~2。她后来的研究强调这一过程的政治特性：科伯恩 1991。论钢铁工人。科尔曼，勒克斯顿，利文斯通和塞科姆 1993。

② 赫恩 1987，塞德勒 1989。英国左派的其他人追寻类似的主题，如布里坦 1989，赫恩和摩根 1990，以及西格尔 1990（下一节讨论）。

政治知识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临床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的男性气质系统知识的主要形式。但这些还不是了解男性气质的惟一方式。多种实践，也许是全部实践都会产生知识。有关性别问题的社会斗争无疑会带给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信息和对男性气质的理解。

这种知识不同于临床和学术知识。它不是群体中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经常被发现有非常简明的形式存在于计划、争论和策略的争辩中。学术知识大多采用描述的形式，关注是什么或已是什么，而政治知识多采取积极的形式，关注可做什么以及必定遭受什么。

关于男性气质的政治知识在来源于不同的背景。反性别歧视者的男人解放运动及其以后的运动（如当代在美国的男性反性别歧视的全国性组织）一直对男性气质争论不休。保守党派和原教旨主义者教会也在谈论男性气质，主张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传统”（很遗憾，相当现代的）家庭^①。在创新和学术的意义上，最最重要的是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这两种反抗运动对男性气质的分析。

受男同性恋者长期排斥和侮辱的男同性恋者行动起来了，他们为争取公民权利、安全和文化空间而斗争。术语“同性恐惧症”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明的，用来描述同性恋者的经

^① 运动杂志，如《阿喀琉斯的脚踵》（英国），《变化中的男人》（美国）以及XY（澳大利亚）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从“牧师到男人”的原教旨主义作品（“耶稣将比尔的男子气发展到极至”）见科尔1974。

历。同性恐惧症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和统治型男性气质的紧密关系是研究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关键^①。

然而，男同性恋者也注意到男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迷恋。一些人把同性恐惧症看成是秘密欲望的表达，异性恋者被其逼得发疯而转化为对同性恋的憎恨。这种观点在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同性恋作家中尤其明显，如，马里奥·米耶利的《同性恋与解放》一书就是代表作。其他人已注意到男异性恋者在适当的时间和隐蔽的地点会奇怪地乐意接受引诱；并且同性恋性行为在全男性的机构如军队和监狱中十分普遍。标语“男异性恋者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目标”暗示了男异性恋者的心态和行为。它指出在男人的社会中存在普遍但通常难于启齿的性表达，在学术研究中这种观点很少得到承认^②。

同性恐惧症不仅是一种态度。男异性恋者对男同性恋者的敌意涉及真实的社会实践，从工作歧视、媒体中伤到关押及不时的谋杀，同性恋解放运动称这一系列行为为“压迫”。这些实践的要点在于它不只中伤个人，而且还划清社会界线，以与被排斥者的距离来界定“真正的”男性气质。早期的同性恋解放运动认为压迫同性恋者是权威的社会秩序为维持现状的部分行为，它和压迫妇女出于同样的目的^③。

在同性恐惧症的意识形态中，异性恋和同性恋间的界线随着男性和女性的界线的含混而变得模糊了，男同性恋者被想像成女

① 温伯格 1973，赫里克 1986。

② 米耶利 1980，秘密欲望；康奈尔、戴维斯和多塞特 1993，论性别化。

③ 阿尔特曼 1972，沃特尼 1980。

性化的男人，女同性恋者为男性化的妇女。然而男同性恋者也知道在具有明显男性气质的男性中也普遍存在同性恋欲望（同性恋运动员、强奸男犯的监狱看守和军队“密友”）。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手段包括身着奇装异服和公开接吻等，用以直接攻击性别习俗，这些手段被同性恋联盟沿袭至今。西方城市的同性恋群体的作风从矫揉造作转变为过于男子气，这可能随同性恋者的改变而再次改变。因此，男同性恋者群体的特点包括性别的含混，身体和身份间的张力以及男性气质内和气质外的矛盾。

妇女解放运动与同性恋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的黑人权力运动）分享了“被压迫”的概念，但给予了它不同的强调。女性主义的分析着重于男人的结构位置。女性主义研究者证明了男性对政府、企业和媒体的控制；指出男性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财富的支配权；揭露了男性对暴力手段的操纵以及将女性赶回家并漠视她们对平等的要求这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对女性主义者而言男同性恋者更像统治阶级而不是解放的目标。术语“男权制”1970年左右广泛用来描述这种性别支配体系^①。

女性主义的分析也涉及对男权制的个体层次。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的作品强调家庭是女性被压迫的场所。理论家和激进主义分子罗列了妻子为丈夫所做的不计费劳动，母亲被局限于家中以及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权。李·科默所写的《已婚妇女》以及赛尔玛·詹姆斯和女性集体权力组织都要求为家务工作付费。许多女性主义者做了新家庭安排的实验，试图与男人们协商一种新的

^① 摩尔根 1970，米切尔 1971。最近对这一概念有益的考察见沃尔比 1989。

劳动分工和新的儿童保育体系^①。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西方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批判从享受不计费劳动的家庭内的男权转移到强调男人对妇女的攻击。在避难所里女性对家庭暴力觉醒了，反对强暴的运动将每一个男人都视为是潜在的强暴者。20世纪80年代的反色情文学的女性主义将此推向更深一层，认为男人的性行为都是暴力，色情文学是对妇女的攻击。不仅越轨群体的行为，而且主流男性气质也是暴力的观点在女性主义的和平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中传播开来^②。

女性主义者在男异性恋者是否能够变化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分歧：通过协商能够建立较好的两性之间的关系吗？通过孤立或强制手段能够改变男人根深蒂固的嫌女症吗？经济优势使大多数男人对改革兴趣不大。在《男人的心》一书中，芭芭拉·埃伦赖希将美国男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行为归结为“逃避责任”。女性主义者认为男人解放运动没有触动男性的基本特权——现代化的男权制，而是成为男人在不放弃特权的情况下从女性主义那儿诈取利益的一种手段。女性主义者对“新型父亲”，“新敏感男人”和其他较友好的，较温和的男性气质形象普遍存有怀疑^③。

同时，也有许多女性主义者欢迎男人的进步迹象，并注意到

① 科默 1974；达拉卡斯特和詹姆斯 1972。西格尔（1983）评注了英国对于重构家庭关系的争论。

② 对女性主义思潮中这一转变的综述见西格尔 1987。持续相关的证据见史密斯 1989。

③ 埃伦赖希 1983。女性主义者对学术性男人运动的怀疑见卡南和格里芬 1990。

男人们的差异与他们和妇女关系的复杂性。例如，菲利斯·切斯勒的生动论文《关于男人》研究了男人与妇女情感关系的种类。对男性气质最系统、最尖锐的女性主义分析要属林恩·西格尔的《慢动作》，该书大量讲述了男人们的分歧及他们对女性主义政治的看法。西格尔强调改革的步调不是单独由男性心理决定的，它也受男人的客观环境的强烈影响，如可以支持父亲全日照看小孩的经济财力。在此，女性主义的政治论点就和强调男性气质的制度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谋而合了^①。

同性恋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都认为主流男性气质（至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权力有重大关系，男人因权力关系组织起来进行统治并抵制变迁。简言之，男性气质事实上就是权力最赤裸的表现形式。

这种批评对许多男异性恋者而言是难以接受的。男人运动坚决否认男性气质和权力的联系，这是他们转向反女性主义的关键原因，这一否认因大众心理学和新荣格理论对男性气质的解释（第九章中详细可见）而得以强化。但同性恋和女性主义的见解非常重要。我将在本书中探究它与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两者间的关系。

知识的客体

一旦我们认可了性别的制度因素就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性别

^① 切斯勒 1978；西格尔 1990。

政治中男性气质真是一个障碍吗？还是制度的安排产生了不平等，从而引起了张力，导致了对“男性气质”的审查？

承认社会本身的能动性而不是试图从男性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当然是重要的。然而很难否认男同性恋者在同性恐惧症中遭遇的个人情感经历，否认女性遭遇的男性厌女症的经历或者否认女性主义者对男权制再生产的欲望和动机的剖析。在男性气质的问题中，无论何事只要具有意义就会涉及到人格和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它还涉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

但这种相互作用中存在知识的固定客体吗？是否可能真正存在一种男性气质的知识？

在讨论民族志时，我提到了斯特拉森的证据：在哈根，人们对性别的认识不同于欧洲或美国文化的概念。在哪里，一个男人、一个妇女或一个部落是否“像一个男人”取决于他们的成就；“一位妇女被挑选出来作为女性特征的典范是对她的侮辱”；因而，很清楚哈根人是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性别概念来管理社会的，相反，采用西方的性别身份概念将曲解哈根人的社会过程。

这类差异就逻辑而言排除了男性气质的实证知识。我们无法归纳存在于所有社会的男性气质实体。在不同情况下的男性气质在逻辑上是无法比较的。

实证主义有逃脱此种困难的一线生机。经过文化的更替，或多或少保持永恒的是解剖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男性身体。我们能努力追求有关“男人”的知识，界定“男性气质”为任何拥有阴茎、Y染色体并定期提供睾酮激素的人的特性。最近有一本关于男人的较好的法国书被简称为《XY》。这也许就是“男性研究”

最终的含意^①。

如此便解决了逻辑问题，但不可能产生一种值得拥有的知识。那么世上男人的什么行为“不是”男性气质的？这一点相当含混。在这种框架中探究精神分析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妇女拥有男性气质和男人拥有女性气质——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通过生理划分就能理解世界的观点是对身体和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误解（见第二章说明）。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自然相关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划分和文化对立，它们只有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无论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时期中这种划分的内容有什么变化，这一点都将永远不变。男性气质作为知识的一种客体总是指两性关系中的男性气质。

陈述这种观点的另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就是“性别关系”组成了科学知识的明晰客体。男性气质的知识正是产生于对性别关系的研究中。按照第三章的定义，男性气质是性别关系构成的实践结构。它们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形成和再现是一个政治过程，影响了社会中利益的平衡和社会变迁的方向。

我们可能拥有以上各方面的系统知识，但这种知识不遵循实证主义科学的模式。一种历史和政治实事的研究必须在可能的范畴内进行。社会行动有两种：一种是可能发生却没有实现的，另一种是已经实现的。科学研究就是要掌握由社会行动造就的世

^① 巴丹泰 1992。肯珀（1990）查阅了有关睾丸激素的研究，并指出了社会/生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界。由此而获得的知识基于对现实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它的一种反映。

批判的社会科学需要一条符合道德的底线，这条底线在经验上处于被研究的环境之中。本书中用来分析的底线便是社会公正：性别关系中公正的客观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时实现了，有时却没有。采用这种底线不是为了提出与认识行动相分离的一种武断的价值指涉，而是要承认我们的男性气质知识本质上的政治特性。我们可将它视为一种认识论的宝贵财产，而不是令人窘迫的标准^①。

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种有意义的男性气质知识。它是性别关系及其历史过程的批判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对人类可能性及其被否定所进行的更大探究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和应用政治学二者都需要这样的知识。

^① 我在这儿的论点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批判中经验知识的重要性。批判性知识应比实证主义更科学，而不是相反：因为批判性知识更尊重事实，所以对社会现实的探究更深刻。在教育研究中已经建立了实用的模型：吉鲁 1983，沙利文 1984，韦克斯勒 1992。

2. 男人的身体

真正的男性气质

是否男性气质应该改变的争论经常归于失败，这不是因为有反对改变的意见，而是有一种信念认为男人不能改变，因此改变不仅徒劳无益甚至是危险的。大众文化一般设想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真正的男性气质蕴涵在日常生活的潮起潮落之下。我们都听说过“真正的男人”、“自然的男人”和“深沉的男性气质”的说法。这种观点现在分布的范围很广，包括那些神话诗般的男人运动、荣格精神分析学派、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社会生物学家以及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学派等。

真正的男性气质几乎总是被认为是从男人身体内产生的——它内在于男性身体或者是表达出男性身体的某些东西。要么是身体引起和指导着行动（例如，男人天生比女人富有侵略性；强奸来自不受控制的欲望或一种本能的攻击欲），要么是身体限制行动（例如，男人天生不会照顾婴儿；同性恋是违背自然的，所以只属于乖僻的少数人）。

这些信念是现代性别意识形态中的关键部分，至少在英语世界中是如此。所以，社会分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理解男人的身体以及它们与男性气质的关系。

最近几十年来，两种对立的身体观念垄断着这个问题的讨论。其中一个基本上是由生物学解释的主导观念，即身体是一个自然机器，它通过遗传程序、荷尔蒙含量的差异或是在传宗接代中性角色的不同产生出性别差异。另一种是流行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观念，即把身体看成是有点中性的表象或图景，在它上面打着社会的烙印。面对这些古老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争论的新翻版，另外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常识性的折中观点：生物因素和社会影响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人们行为上的性别差异。

在本章，我将说明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对于男人的身体和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理解。但是仅仅抽象的讨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将稍稍打断一下顺序，先来介绍一些从生活史研究中得到的案例，然后在第二部分中再做更全面的叙述。

机器、图景和折衷

自从宗教作为裁决性别的权威力量崩溃以来，生物学就被用来填补这一空缺。从保守的大众传媒对那些所谓能证明性差异的科学发现的极度热衷，就可以看出对生物学的需要。我最爱举的例子是那种据说女人之所以停车困难是因为男女头脑的功能不同

的故事（但从一开始就没有实际证据表明男女在停车中有什么不同）。

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研究是社会生物学的主流，它是人类社会进化论观点的复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变得流行起来。这种流派的一个早期代表作是莱昂内尔·泰格的《群体中的男人》，该书以我们都是一个狩猎民族的后代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彻底的生物还原论的男性气质理论。泰格的一个惯用语“男性联结”甚至成为流行用语。

根据这些理论家们的说法，男人的身体是自然的男性气质的携带者，男人身体承载的男性气质是进化压力赋予人类的。我们继承了祖先的男性气质的遗传基因倾向，如喜爱攻击、家庭生活、竞争、政治权力、等级制、领土、淫乱以及组成男人俱乐部等。在这些理论家之间，上面所列举的内容只是某些局部的不同，但精神实质都是一样的。根据社会生物学的先驱爱德华·威尔森的说法，是“男女之间在身体和性格上的差异为文化所扩大，形成普遍性的男性统治”。其他一些人则更具体地声称目前的社会安排是内分泌系统造成的一个自然结果：比如说，男权制的基础是荷尔蒙的“攻击优势”，它使得男性控制女性^①。

这种男性气质的内分泌理论，就像那种大脑——性别理论一样，也成为媒体的常识。比如，这里是最近的一篇有关滑雪安全的报纸文章的开头：

^① 关于早期社会生物学，参见 L. 泰格 (Tiger) 1969, L. 泰格和 R. 福克斯 1971 (《男人俱乐部》)；社会生物学后来的进展，见威尔森 1978。戈德堡 1993 是内分泌说的拥护者。

世界上最速惑人、诱人冒险的鸡尾酒不是冰冻果汁、哈维伏特加橙汁酒或著名的新加坡甜酒，而是在十几岁的少年和年轻的男人血管中奔流着的一股混合着睾酮和肾上腺激素的热血。这就是为什么滑雪中95%以上的受伤者都是30岁以下的男人，而且受伤者的平均年龄是21岁。^①

这种在社会生物学中已成形的男性气质天生论几乎完全是想像出来的。它预设了男女在性格、特征和行动方面的广泛差异。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大量的研究在做。但是经常的发现是在智力、性格和其他个人特征上，完全不存在什么显著差异。即使在某一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小于同一性别内的差异，更远远小于男女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这种男性气质天生的学术论点需要生物学拿出有力的解释在复杂社会行为（如创建家庭和军队）中存在的群体差异的决定性证据。但是在这点上，还缺乏有力的决定性的证明。对于简单的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性差异，生物学上的证据甚至是微弱的决定性证据也很少。但是在性别方面，交叉文化和历史多样性的证据倒多得多。例如，有一些没有强奸或是强奸事件极少的文化和历史情形，在那里，同性恋行为是主流（在生命周期的某个特定阶段）；母亲不主管照顾孩子（例如，这个工作由老人、其他孩子或保姆承担）；男人在正常情况下也没有攻击性。

生物决定论所借助的证据并未赋予它力量。对这些证据的仔

^① 《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94.2.3。——一种报纸《旧金山新闻》。

细审查（比如，西奥多·肯珀的《社会结构和禀赋》）表明，这些证据不支持任何结论，比如，生物学提出的社会单一决定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就像肯珀坦率承认的，“当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被说成是基于生物学对某种等级化的社会制度的认可时，这种生物学往往是伪科学。”^①

所以不如说，这种生物决定论观点的力量是在于其身体即机器的隐喻中。包含这些隐喻的说法有：身体具有“功能”，能够“运作”；研究者们发现在行为中蕴涵着生理机制；大脑是产生男性气质的“硬件”；遗传程序决定了男人的统治，攻击性就存在于我们的生物程序中，等等。关于这个方面的隐喻，不管是学术的还是媒体的文本都很多。例如，读过刚才引用的滑雪文章的美国读者很少有人会错过燃料发动机的比喻，它与鸡尾酒的隐喻混合在一起。这个隐喻巧妙地把意外的滑雪伤害比做粗心大意的年轻人所造成的摩托车事故这一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件——如此一来，生物学的解释就被广泛接受。

当一个隐喻确定下来，它就成为讨论的前在框架，型塑着解读证据的方式。这种状况已随着有关生物机理的隐喻确定无疑地发生了，甚至影响到细致严谨的学术研究（当然大多数社会生物学研究不是这样）。有一个很典型的引起广泛争论的例子是由朱莉安娜·英佩拉托-麦金利与其他人所做的研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两个村庄，发现有 18 个携带男性基因的婴儿，因为罕见

^① 肯珀 1990: 221. 对社会生物学逻辑的精英批判，见罗斯、卡明和莱温廷 1984 著作的第六章。

的酶缺乏症导致他们长出了像是女孩的生殖器，所以他们被当做女孩抚养。这类似于美国人罗伯特·斯托勒所描述的变性人早期生活的情形。根据斯托勒的理论，这应该导致一种女性“核心性别身份”。但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孩子在青春期发生了变化，正常的睾酮激素水平给青春期的身体带来了男性气质。根据作者的报告，后来18个人中有17个转换为男性“性别身份”，有16个转换为男性“性别角色”。研究者们把这看作是身体的机制超过社会环境条件的证明。^①

但如果仔细检查，这篇文章还可以显示出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根据英佩拉托-麦金利和她的同事们的描绘，这是一个既有着严格的劳动性别分工，又有着反对区分男女气质的显著文化特征的乡村社会——这两种特征都是社会事实。作者通过追踪调查发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孩子及其家长逐渐认识到是社会犯了一个错误，孩子被错误看待了。最后，这种错误又被社会纠正过来。青春期身体的变化明显引发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再评价和再塑造的过程。这个研究所驳斥的不是对性别的社会性解释，而是那种儿童早期的核心性别身份往往预定了其以后的社会性发展的特别论点。

除此之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研究还不经意地显示出一些东西。作者观察到，自从医学研究者来到这个社区，5- α -还原酶不足可以在出生时就测定出来，这类儿童的大部分被当作男孩抚养。这样，医药手段被引入使性别正常化：保证成年男人将有一

^① 因佩拉托-麦金利等合著 1979。

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儿童时代，始终一致的性别二分将被保持下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托勒对美国变性者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果。性别再造手术（现在已是一个常规程序，虽然还不太普遍）消除了女性社会仪态与男性生殖器之间的矛盾。医药手段的实施使得人们的身体与性别二分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

这就是性别符号分析所预言的东西。把女性的身体视做社会符号论的对象的视角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会合点上兴盛起来。目前，关于电影、摄影和其他可视艺术中的身体形象以及女性气质建构的研究数以百计。女性主义者对时尚和美的研究更贴近于日常生活实践，如伊丽莎白·威尔森的《梦中的装饰》以及温迪·沙普克斯的《美的秘密》都揭示了复杂而有力的形象系统，是它定义了什么样的身体是美的或丑的，瘦的或胖的。通过这种形象系统的作用，一个完整系列的与身体有关的需要产生了：减肥、美容、时装和瘦身计划等等。

这种研究为社会理论中出现的后结构主义所支持并时常是直接激励。米歇尔·福柯对身体“规训”的分析是他对话语中真理生产的解释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当被新的权力技术置于越来越细微的控制之下时，身体就变成了新的规训科学的对象。由布赖恩·特纳所发展的身体社会学沿着同一方向在某种更物质化的层次上向前推进。通过对“身体是我们辛苦劳作的对象——吃、睡、清洁、减肥和锻炼”这一现象的观察，特纳提出了个体和集体的“身体的实践”这一观点，来囊括社会劳动以满足身体的方式方法。

这些实践在很大规模上被制度化地精心创造着。这种现象在

近来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得到阐明，并且把它与性别的生产联系起来。南希·西伯奇的文章“体育社会学对身体的反思”令人信服的揭示了，男女不同的锻炼体制——这一包括教育和组织体育运动在内的身体规训实践——是如何被设计出来产生有性别区分的身体的。并且，如果社会的规训还不能如期产生有明确性别的身体的话，医学手术可以做到。现在，美容手术提供了一系列非常丰富的塑造更符合社会要求的身体的方法，从传统的面部除皱拉皮术、隆胸术到比较新的苗条术、增高术，等等。正如黛安娜·达尔和坎达斯·韦斯特对美国的美容师及其病人的访问所发现的，美容术现在对于女人来说已被视为很自然的事情；虽然对于男人来说还不太自然，但是现在技术已经扩展到通过植入能够坚挺的阴茎这一手术来产生男性气质。^①

虽然性别的符号学研究几乎完全是针对女性气质的，但也不时地扩展到男性气质方面。安东尼·伊斯特霍普在《一个男人必须做什么》一书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且证明男人的身体是如何在广告、影视和新闻报导的形象系统中被定义为具有男性气质的。有一些更具体的研究，其中最出色的也许是苏珊·杰福兹的著作《美国的男性化复苏》，它追踪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后，有关越战的电影和小说中重建和庆祝男性气质的过程。近来还出现了一种对性别模糊现象的研究兴趣。马乔里·加伯对文学作品、

^① 关于女性主义的视符号学的近来例子，参见《女性主义评论》1994年第46期。关于时尚和美，参见威尔森1987，沙普克斯1986。关于规则，参见福柯（Foucault）1977，特纳1984。关于体育，参见西伯奇1991；关于再成型手术和性别，参见达尔和韦斯特1991，以及蒂夫尔1986。

舞台剧和电影中反串角色的百科全书式的论著《装扮的兴趣》就采用了性别研究的符号学视角，它力图表明，所谓身体与衣饰的不和谐是“隐喻本身造成的一种结果”。^①

社会建构主义者对性别和性的研究为身体的符号学视角所支持，他们提出了近乎与社会生物学完全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与其说社会制度是身体——机器作用的结果，不如说身体是一块社会决定因素在上面任意建构的土壤。这种视角也有它主导的隐喻，该隐喻倾向于一种艺术品而非机械物：身体是一块待着色的画布，一个待铭刻的外表，一幅待描绘的图景。

这种视角虽然硕果甚丰，但也遭遇到了困难。因为过于关注能指，所指反而趋于消失了。在对不可避免的身体活动——性的研究方面，这个问题特别严重。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当然是对金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实证主义性学理论的改进，但是他们的讨论已出现了性脱离肉体的附加影响。正如卡罗尔·万斯不无遗憾指出的：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性活动、身份认同甚至欲望都是由文化和历史因素调节的。这样，研究的对象——性——就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有消失的可能。^②

当性别变得仅仅在话语中处于一种从属位置、成为人们讲话

① 伊斯特雷普 1986；杰福兹 1989；加伯 1992。

② 万斯 1989：21。

的内容时，当性别首先被看作是一种表演的时候，或者把性别生活中分裂的矛盾变成“一种隐喻的设置”的时候，性别几乎不可能处于更好的境地。正如罗斯玛丽·普林格尔在她最近对性与性别关系的回顾文章《绝对的性?》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性别的完全符号或文化的解释不再比生物还原论的解释更站得住脚。^① 铭刻着文化意义的外表是具有特征的，它不会保持静止不变。

身体作为身体本身的权利至关重要。它们成熟、生病、享受、产生性别意识和生育。在经验和实践中有一种不可减缩的身体维度，起码身体的出汗不能被排除在外。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从性角色文学作品中有了解。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男性角色的文学作品和男人手册都是根据男性的身体进行问题分类的，从阳痿和老龄到职业健康威胁、暴力伤害、缺乏运动技能以及早逝，并告诫读者：男性角色可能有害于您的健康。^②

那么，我们能否采取一种常识性的折衷观点，把生物学和文化的两种意见都放进一个混合模型中去呢？正如第一章所示的，这在本质上正是性角色理论的公式，它在生物的性别二分中添加了一个社会矫正项。现代社会生物学的观点经常认为有一种生理规则之上的文化建构过程。社会学的女性主义先驱之一艾丽斯·罗西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有类似的讨论：

性别差异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或者男

^① 普林格尔 1992。

^② 哈里森 1978。关于男性手册中这种偏见的最近例子，参见法雷利 1993：第 4-7 章。

权制的功能问题。它植根于性别二态性，这种二态性是为人类种族繁衍的基本目的服务的。^①

随之而来的结论就是，男性气质是父系制生物功能的社会建构。

如果说生物决定论是错的，社会决定论也是错的，那么两者的结合就不可能是对的。有理由认为这两种“分析理论”不能被满意地叠加在一起。一方面，它们不是相当的，生物学常常被认为更真实一些，在两者之中更基本一些。甚至社会学家艾丽斯·罗西也认为社会进步是立足于性别二分之上的，人类繁衍的目的是“基本的”。这一点在社会学中被想当然的认为是对的。（我将指出，这些隐喻代表了对历史和生物进化之间关系的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

建立在这两种理论上的不同模式决不会统一起来——虽然这一点时常被设想为是可以做到的，有时还在有关“行为中的性别二分”的论述中明确化。社会进程确实可能造成了身体的差异（请看那些垫高的胸部、阴茎鞘，男子紧身裤的下体盖片），但它也可能破坏、反驳、复杂化、拒斥、减小或缓和身体的差异。它可能会定义单一的性别（如不分性别的时尚、性别中立的劳动）、两种性别（如好莱坞电影），三种性别（如许多北美本土文化），四种性别（如欧洲都市文化在18世纪后一度赋予同性恋者特殊的性别），或是一个包括所有部分、差异和方式的完整谱系。正如托马斯·拉科尔对医学和社会流行观念中从单性模式到双性模

^① 罗西 1985：161。

式的转变的出色历史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社会进程已重塑了我们对性别身体的看法。^①

但在我们看来，把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折衷起来的观点也将不会成为性别理论的基础。但是对于性别的基本文化特征以及身体，我们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我们似乎需要寻找另一途径来思考这一问题。

不能回避的身体

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感觉是性别的文化解释的中心（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这一认识也许可以作为一条新思路的开始。所谓男性化的性别是对皮肤、某些肌肉的形状和力度、某些姿势以及行动方式、和某些可能的性行为的感受。在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记忆中，身体的体验常常占据中心位置。下面是一个选自生活的例子，其中性是一个主题。

休·特里劳尼是一个记者，同性恋，大约 30 岁。他记得他最早的性经验是在 14 岁。异乎寻常的是他声称在手淫之前，先有了性交经验。休多年来清晰地记得那个有着完美高潮的神奇一周，他第一次在旅馆里的饮酒，以及他的“生活的开始”：

^① 关于多元化男性特质，参见威廉斯 1986，特卢姆巴赫 1991。关于性科学观念的历史，参见拉科尔 1990。

那个女孩才18岁，是一个在 MAROUBRA 海滩流浪的小丫头。糟糕的是她想与我做任何事而我却不知道怎么办。她一定是稍微迟疑了一下、如果不是出于理智就是出于感情。我猜测她也是刚刚想像过那种事，你知道，那时我已是一个留着长发的小痞子。我记得当时我在她身上但不知把“它”放到那里去。当时我想，哇，下面的路怎么那么长……当我终于让“它”进去时，“它”开始只是进去了一点点，我当时觉得还远远不够。接着，她肯定是把腿稍微挪开了一些，“它”就进得深了一些。当时我想，天哪，这就对了！接着我一定是在里面抽动了五到六下，我想那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当时想我快要死了……后来，在那一周里，我对自己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期待着——但到底在期待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开始企盼有一头更时髦的头发，或是我的那个东西长得更大些。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周。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干那事了。

这个故事叙述的就是那种人们熟悉的、性觉醒年龄的事情。几乎在每个细节中，都显示出身体和社会过程的相互作用。正如休重述的那样，选择和激励是由社会提供的（那个“流浪的小丫头”，那个“小痞子”）。所需要的行动则是肉体性的（让“它”进去）。虽然年轻的休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巧，但是随着他的性伙伴的反应（“她一定是把腿稍稍挪开了一些”），他的技巧也在互动中相应提高。肉体对高潮的感觉也马上被意识到了（“我想我快要死了”）。它引发了一个熟悉的符号系列——死亡、新生和新的成长。

反之，在进入性成熟期时，休已完成的社会性转变马上转化成了身体的幻想（“更时髦的头发”，“那个东西长得更大些”）。

休开玩笑似的体现了那种阴茎代表男性气质的隐喻，这正是我在第一章所讨论的阉割焦虑以及男性气质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但是休的记忆所揭示的还不只这一点。他的第一次性经验发生在一个娱乐运动背景下：那个有着完美高潮的一周，以及令人情绪波动的文化。在最近的历史时期，体育已变成了大众文化中男性气质的主要标志。体育提供了一个在运动中连续展示男人身体的机会。精心设计和严密监督的规则使得男人们的身体进入一种规范化的互相竞争状态。在竞争中，超强的力量（来源于比赛的规模、适当性和团队工作）与高超的技能（来源于计划、实践活动和直觉）结合在一起，将使一方获得胜利。^①

运动中的男性气质的化身涉及一整套开发和运用身体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器官的模式。高超的技巧当然包括在内。例如，板球运动中的外曲线投球——也就是胳膊肘伸直，同时用一个抬腿的动作反手把球投出以迷惑对手，——一定是全部人类技能中最奇异的表演之一。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哪怕是只要能做好一个动作也算是奇才了。在竞技体育最伟大的典范中，为人所称道的是整个身体协调动作、能够出色的做好一系列动作的才能，杰出的人物如：棒球运动中的巴比·卢斯，板球运动中的加菲尔德·索博斯以及拳击运动中的穆罕默德·阿里。

^① 明确地说是男性的身体造成了体育运动的大众参与，在媒体中的女性体育运动成为陪衬；邓肯等人的著作 1990。我在这里的讨论引自梅斯纳和萨博 1990 年主编的研究论文集。

体育的制度化组织嵌入了明确的社会关系：男人间的竞争和等级以及对女人的排斥或统治。性别的这些社会关系在身体的展示中得以实现和符号化。这样一来，男人非凡的运动技能就变成了一个极度反女性主义的证据，成为男人的优越性和统治权利的符号象征。

与此同时，身体的表演被整合进这些结构。在这些结构之外的跑、投、跳或拳击竟然都不再是体育。这些身体表演同时既是象征性的又是运动性的，既是社会性的又是身体性的，并且这些方面互相依赖。

通过身体的表演来建构男性气质意味着当身体的表演不能再继续时，性别就变得脆弱起来——比如说，当身体出现残疾时。托马斯·格希克和亚当·米勒对美国男人因病或事故致残后努力应付此类事件的情形做了一个小型但特别有趣的研究。他们归结出男人的三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克服身体的困难，加倍努力来达到支配性男性气质标准，比如说通过竭力使性伴侣精疲力竭来证明自己仍有性能力。另一种反应是，虽然还是追求具有男性气质特征如独立和控制，但是重新框定了男性气质标准，使它尽可能接近自己的实际能力。第三种是拒绝把把支配性男性气质当作自己的包袱——他们批判身体的老套观念，推动一种反对性别歧视的政策，这个计划我将在第五章谈到。所以说，当由身体表现的男性气质受到伤害时，会有众多的不同反应。而男人们惟一不可能做的就是忽略它。^①

^① 格希克和米勒 1993。

体力工人更不能忽略它。他们通过劳动来定义男性气质，这是由他们的特殊境遇决定的。沉重的体力工作需要力量、耐力、一定程度的麻木和粗鲁，以及集体的团结。在阶级剥削关系中，工业劳动强调男性气质的必要性。男性气质不仅一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宣扬男人优于妇女的工具。

这种强调反映出一种经济现实。迈克·唐纳森在收集了有关工厂劳动的种种资料后指出，男工人的体力就是他们的经济财富，也就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赖以交换的东西。但是这种财富是会变化的。工业劳动在追逐利润的制度下榨干了工人们的身心，他们在疲劳、伤害以及机器式的磨损中衰弱下去。体力的下降、失去收入和失去工作本身的危险可以由技能的增长所弥补，一直到某个极限。“除非他特别幸运，否则，那个极限也就意味着一个男人的劳动的日子结束了。”

体力和技能的结合就这样为变化提供了可能。在那些临时雇佣和不需要技能的工作场所，劳动阶级的男人们日益被看作是只拥有体力的人。这种情形在那些阶级剥削与种族歧视相结合的地方如种族隔离下的南非特别严重（毫不夸张地说，种族隔离的经济把技术工作留给白人，而大量的黑人劳力只能做临时性工作）。相反，中产阶级的男人日益被看作是技能的拥有者。这种定义为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历史变化，即文凭主义的增长所支持，它是与根据阶层界线进行选拔人才的较高教育体系相关联的。^①

^① 唐纳森 1991：10。关于南非，参见纳特拉斯 1992；关于“新阶级”和教育，参见古尔德纳 1979。

这种阶级状况改变了男性气质与机器的常见关系。新信息技术要求更多的坐着敲击键盘的工作，这种工作最初是分给女人做的（键盘操作员）。但是个人电脑市场的开拓，使得这种工作中的一部分被重新定义，成为一个充满竞争和权力的舞台——它是一个男性化的、技术性的和非工人阶级的领域。这种被修正的含义正在电脑杂志的文本和图片中，在制造商强调自己“实力”的广告中（如苹果计算机公司把它的膝上电脑命名为“强力笔记本”），在蓬勃发展的暴力电脑游戏中盛行起来。现在，人们发现，按照旧的阶级划分从体力劳动中分化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男性身体的力量在现代控制论的男人/机器系统（这个具有性别的语言是完全合适的）中惊人地展现出来。

总之，身体对于男性气质的建构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种不可缺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身体的过程加入到社会过程中去，变成历史（不管是个人的或集体的）的一部分和政治的可能对象。但是，这一点还不能使我们回到身体是图景的观点上去。身体有许多种方式来反抗社会符号论以及社会对它的控制。下面我将转到这个问题上来。

污垢或血的复合体

W.B. 耶茨在他优美的诗作《拜占廷》中想像了一只金子做的机器鸟，它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技巧发达的象征。通过这只鸟，作者嘲笑了“所有污垢或血做的复合体”。与遥远而抽象的机器鸟相对照的是“单纯的复合体，也就是人类性情中的狂躁和污

秽”。^①所谓“单纯”是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精确地说，正是身体的多样性和顽固赋予了耶茨讽刺的力量。

哲学和社会理论经常说到身体，但是身体是无比多的（在1994年就大约有5.4亿个）而且差别非常大。有的块头大，有的块头小；有的总是沾满了泥和油，有的永远躬着腰俯身在桌前，有的却有着一双保养良好的手。这些身体中的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每一个在它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都必然会有所改变，吞没和供养它的社会过程当然也会改变。

一般来说，凡是身体发生的事情都会在男性身体上出现。男人们的身体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随着成长和成熟区别就更大。在一篇较早的关于“男人的身体”的散文中，我理想化的写到，身体的男性气质就是体育所象征的体力和技能的结合。我还评论到：

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毫无疑问是要占据空间的，也就是要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在世界上出现。当我在街头散步时，我抬起肩膀，偷偷地把自己与其他人相比。当夜深走过一群小流氓身边时，我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显得足够高大。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我打量着警察们并想如果出现冲突，我是否比他们还要高大和强壮——虽然考虑到控制集体行动和群众需要实际技巧。我知道这是一个天真可笑的想法，但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自动的反应。^②

那是在十年以前。十年后的今天，我的身体快50岁了，头

^① 《拜占廷》，见耶茨1950：280-1。

^② 康奈尔1983：19。

有点光秃了，腰明显的弯了，身体所占据的空间也明显地缩小了，在街头陷入棘手境地的可能性更小了。

不但男人的身体有差别，会变化，它们也是能够积极反抗的。人们提出了身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很多方法，但身体则常常拒绝。这里是两个从生活史访谈中摘取的例子：

我在上面已经引述过休·特瑟里劳尼的首次性经验故事。他是在学生时代走上那条人们十分熟悉的道路的。休决心做一个传奇式人物，于是他终日沉浸于狂喝滥饮、毒品和性中，成为他大学中“那一年度的动物”。两年以后，已成为老师的他因酗酒得了重病。他离开了他的工作，陷入一种毒瘾引发的情绪危机中并因此进入了一家戒毒中心。休的身体与社会耻辱感打击了他的骄傲，“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是一个一流的橄榄球选手”，他说。

蒂普·萨塞恩出身名门望族，他背叛得更厉害。他所在的私立学校的同伙称他们自己为“病态巡逻队”，他们穿得稀奇古怪，扰乱人家的各种聚会并取而代之，大量吸食毒品。

我们是一群相当激进、有着反叛精神、脾气暴躁的年轻男人，抱有使命感，但是整天都在聚会中。直到最后，使命感变得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有的只是一次接着一次的狂欢……我们身体充满了酒精，已经吃不消了，我们一直都在招来抱怨；我们是那样的精力充沛，所以即使是真的喝得

烂醉，也还能够控制自己。当你在那个年龄，有着大把的未来，你是不会停止的。

离开私立学校，上了大学，情况变得更严重：那是“真正狂野的聚会”，斗殴拌着工业酒精、乱糟糟的食物和迷幻剂。一段时间后，蒂朴的家庭和他的身体都不再能经受得起了。

我试着去找工作。“你都能干什么呢？”人们问。什么也不能干。我连一件好衣服都没有，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在糟蹋它们……所以，我没能找到工作。我认为我那时看起来不像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以一般观点看，我那时很营养不良，大量吸毒、吃迷幻药，喝酒。我的这张照片就是那时我藏在房间里拍的，从它你可以想象我最糟糕的情景：大大的空洞浮肿的红眼睛、眼里有个硕大的麦粒肿，以及简直是乏味无比的脸。我一直喝得太多，吸的是真正低级的毒品、真正肮脏的迷幻药。唉！真的是深陷其中。终于，我觉得我必须干点果断的事了。

如上的危机故事显示出压力下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迈克尔·梅斯纳在采访美国前体育运动员中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高度竞争性运动的压力使得职业运动员把他们的身体当成机器，甚至是生存斗争的武器。正如梅斯纳所指出的，“把身体当作武器最终导致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暴力伤害。”运动中的伤害、事故、药物的使用以及持续的压力击跨了甚至是最适宜、最强壮的身体。蒂莫西·柯里最近对一位美国摔跤选手的案例研究显示了运

动伤害是怎样变成了一个正常的职业预期的。身体实际上是在所谓男性气质和成功的名义下被戕害了。退役的体育运动员经常是带着有伤的身体、慢性的疼痛生活着，并早早死去。^①

这些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主要的内容可以运用到更常规的情形，如上面讨论过的工业中的工作场所。身体不能被理解成是一个中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媒介。它们的物质性很关键。它们愿意做某些事情而不愿做另外一些。在体育运动、劳动和性等社会实践活动中，身体是实在的。

有些身体不仅具有反抗性，它们还破坏和推翻投身其中的社会安排。正如居伊·奥康让所指出的，同性恋的欲望并不是一种特殊身体的产物。它毫无疑问是一种身体事实，是一种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反叛。^②

更令人震惊的是性别变换的事件，在这里，身体越过了现代性别秩序为它们设定的最基本的边界。医学一向把同性恋者的绝望和奇怪装扮定性为“易装癖”。但是这种界定已经受到社会科学家和后现代理论家的适度批判。“酷儿”理论欢呼变性是对性别分类系统的符号性破坏。但是医学的意识形态和批评家神通一气，认为对变性行为而言，文化是主动的，而身体是被动的，只是陪衬而已。变性甚至还被看作是符号对肉体的最终胜利，因为变性手术把人的身体按照文化的要求雕刻成了它们所采纳的符号身份的形状。

① 梅斯纳 1992，柯里 1992。

② 奥康让 1978。

那些进行变性的人的解释却没有表现出他们的身体是受符号控制的。凯瑟琳·卡姆斯是一位头脑清醒、机智诙谐的澳大利亚的性别游移者，她在自传中谈到了一个不好理解但是不可否认的肉体需求，符号性的自我和社会关系都必须向这种需求让步。加里·凯茨在重新检查 18 世纪后期埃翁德博蒙的经典变性故事时发现，埃翁德博蒙虽然被确信是一位女性，却并不喜欢女性服装的象征主义和实用性。她只是为法国政治当局所迫时才穿上它们，心里却是抗拒的。

以上这些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在性别分类的边界线上，身体也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游走。在那种异性身体的幻觉下——这些幻觉有些是暂时的，有些则是永久的，这种游走的动力是如此之大，竟可以连本体的意识都改变了。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戴维”的例子中，R.D. 莱恩写到，“有一个女人隐藏在他的身体内部，并且总是似乎要跑出来”。我猜想这是一个身体的面并非仅仅是心理的经验，两种不同性别的身体体验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了。它似乎说明，身体并不仅仅是颠覆分子，它们也可能是搞笑者。^①

班戈的幽灵：反身实践

身体有时就象班戈的幽灵，它拒绝只留在自然王国，而是不

^① 卡姆斯 1992 的文章谈到自己：来自坟墓的埃翁德博蒙，参见凯茨 1991；关于戴维德，参见莱恩 1960：73。

请自来地重现在社会王国里。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该怎样理解呢？社会科学的主流对此无能为力。正如布赖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很久以来，身体就在社会理论中走失了。社会理论的主流仍局限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在知识、理性的头脑以及机械的、无理性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裂痕。种种话语理论也没能弥合这条裂痕：它们把身体变成了符号实践和权力的对象而不是参与者。

为了打破这种思想体系，仅仅强调身体的显著的差异是不够的，尽管这一点正如近来女性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那样也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坚持身体在社会过程中的行动性，也就是“能动性”的本来意义。本章上面几个危机故事显示出身体会对某种压力进行反抗。这是一种效力，但不是充分的能动性。我想讨论一种更具理论性的情形，即认为身体参与了社会的能动性、参与了产生和型塑社会行为的过程^①。

唐·梅雷迪思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他讲述了他年轻时寻找第一次性交的漫长戏剧性的传奇经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目标，发生了关系，但随之却发现自己不会射精。但是他很快就变得更精于此道：

“我是一个很适于肛交的人。那是在与一个女人发生关系时偶然发现的，我真是很喜欢这种方式。当时，她把手指

^① 特纳 1984。罗德 1990 年的著作，介绍了近来美国女性主义中的不同思想观点。

插进我的肛门时，我就想‘我的天，这真有趣！’这甚至像我在手淫时的情况，我经常是抚摩着那一区域但从来也没有真正进去过。但是我想那触发了这一次的感受。当这个年轻女人做这些时，我就像触了电一样，我发现和她在一起时，从来就没有射精的困难。她确实是触到了我的真正的敏感点。所以我想，我现在真正喜欢的是与一位男士发生性关系，在那种关系中，我将可以享受肛交的快乐。它真是使我激动。这就是我对它的整个观点。”

在这里，身体的觉醒和行动交织在社会行动中。唐通过互动体验到了他的身体及其机能。进一步讲，他在互动中发现了自己的身体。事实上，他是被他的性伴侣引导到自己的肛门上来的。他的第一次性交高潮同时就是身体的一种感觉，也是唐漫长童贞故事的高潮，就像他所感叹的“哇！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身体活动的社会性不是围绕生理活动的社会架构。它是一种更私密性的联系，特别是以幻想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在唐的童贞故事中有细微体现，在他对新的社会关系的幻想——“在那种关系中，我将可以享受肛交的快乐”中则更直接地表现出来。

这种幻想始于手指插进肛门的性交体验。它是在一个社会性的互动中被唤起的，但它也完全是一种身体的体验。这种身体反应后来直接影响到唐的性行为。如果说唐的括约肌、前列腺、和勃起组织能够“能动”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过分。

有关体育的研究一直侧重于研究产生性别的身体规训实践，

但还没有捕捉到身体的一面。比如说，跑步当然是一个社会性的身体规训活动。每天早上那一刻，当我挣扎着起床，穿上运动鞋时，我都告诉自己这一点。但是，每年八月在悉尼的“城市冲浪”跑步活动中，有40000双腿同时愉快地迈出，沿着威廉大街跑向邦迪大街。群众跑步的例证可以有力地说明，通过共享的身体活动可以获得社交的愉快。

“抵制规训实践”的观点不能说明当纪律的铁笼轰然倒地折弯的时候发生的情形。两天前，我乘公共汽车去大学，我坐在一个年轻女人的对面，她穿着运动鞋、运动袜，运动裤和一件真丝上衣，戴着长长的银耳环，有着一头经过精心梳理吹干的头发。她不是正同时受着运动与时尚两个纪律体制的控制，其中任何一个都在腰部周围的某个部位放弃了控制吗？最起码，她正在做些机智的事情对付这两种控制，她能够操纵它们。

鉴于身体同时是实践的对象和行动者，实践本身型塑了定义与约束身体的结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超越现有社会理论的模式。这个模式也许可以称为身体的反身实践。

唐·梅雷迪思的“触电”解释了事情发生的顺序：首先，手指插入肛门所产生的肉体快乐来自于对前列腺和肛门括约肌以及直肠的刺激。接着它产生了社会影响，其表现为对新的社会关系的幻想，其中一个幻想是与男人发展性关系，“在那种关系中，我将可以享受肛门被插入的快乐。它真是使我激动。”

这种激动违反了唐的初衷。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者。当他渴望打破自己的童贞的时候，他曾经拒绝了一个同性恋男人的建议。“我用一个帐篷柱把他打跑了”，他说。但是现在，肛门被

插入的身体体验使他有了建立同性性关系的幻想，并且很快有了真正的同性恋经历。（唐运气不好。在他探险式的同性恋性交中，他的性伙伴不能够勃起。）

就导致男人括约肌的松弛和前列腺的刺激来说，并没有与男人建立性关系的必要。女人也照样可以做得很好。是社会把肛门插入和男性伙伴之间关系等同起来的意识为唐对身体的幻想提供了结构框架。肛交是西方男同性恋者的主要符号标志，虽然艾滋病研究显示，它实际发生的次数要比其符号的重要性所暗示的要少得多。

这个例子的事情发生顺序从身体的接触与身体的经验开始，接着产生了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身体幻想（涉及支配性的和受压抑的性的文化建构），然后到主要由新的身体接触中所体现的新型性关系的建构。这不是社会意义和分类系统影响唐身体的简单事件，尽管它们对所发生的事来说是很关键的。反身实践才是社会意义和分类系统产生作用的原因，正是身体的体验——惊人的快乐，促成了全部事件的发生。^①

亚当·辛格回忆起受到他父亲伤害的那一刻：

他给我的兄弟买了一个板球拍作为圣诞节礼物却不给我买。他说我不会玩板球。很多事情就像扔球，一个男人扔球的样子和一个女人是不同的。我不想在父亲面前扔球，因为

^① 杰克·莫林 1986 年的著作作为那些愿意尝试的人提供了技术细节。奥康让在 1978 年的著作中努力地发展了这一文化意义；康奈尔和基帕克斯 1990 年的著作提供了有关于实践的细枝末节。

我知道它看起来会不大对劲，它不像一个健壮的男孩子应该扔的那样子。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很勇敢的把球扔了出去，父亲取笑说，我扔得像一个小女孩。

这里，整个事件都发生在短暂的时间里。那种流行的性别意义即刻与身体的行动以及人际关系的情感混合在一起。尽管如此，还有一种分裂开的知觉。辛格已经学会如何既在他的身体内（扔球），又在他的身体外观察着身体的性别表现（“我知道它看起来不大对劲”）。

在辛格的故事中，进行运动的反身实践表明身体和性别之间存在着差异（“他取笑……”），伴随着差异的是背后父子关系的情感责备。很快，辛格得到了更多的表明存在着差异的证据。最后，他故意与一个男人发展关系以发现自己是否是同性恋者——也就是说，在性别秩序中发现“勇敢”的身体所属的地方。

史蒂夫·多诺霍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清楚。他是冲浪运动的全国冠军，靠得奖、赞助和广告过着富裕的生活。他有一个优异的体格，每天训练4到5小时。他的身体能够完成具有惊人精度和耐力的表演。

我的体力可以支撑4个小时以上的比赛而不会累倒，它用不着慢慢发动。我可以随时随地发动和结束。我过去游泳时，经常一次游200米，4圈，每圈50米。我可以快速发动，每个50米都游得相当好，每圈的时间误差只有1/10秒，我甚至用不着看表。

就像其他精于体育运动的人一样，多诺霍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它的能力、它的需要和它的极限。

这里所说的反身实践是为人所熟悉的，但是人们对性别所带来的后果可能知之较少。多诺霍，这个海边的年轻人，陷入了需要维持多诺霍——这个著名的男性气质范例的实践圈套。他不能酒后开车，当被推来推去时也不能打架（怕破坏公众形象）。他不能豪饮（因为要训练），也不能有较多的性生活（他的教练反对这一点，并且女人还必须配合他的训练计划）。换句话说，他的贵族文化的许多限定像男性气质的定义一样限制了他的生活。

确实，建构多诺霍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反身实践也会破坏支配性男性气质本身，因为多诺霍的社交和心理生活都集中于他的身体，造就一个冠军的重要竞争因素被内化了。他的教练鼓励他憎恨自己的竞争对手，但他没有。相反，他谈到“精神的磨难”和他“控制痛苦”的能力，他认为，这些将“使我的身体相信我不会像我所受到的伤害那样伤害它。”

简单的说，多诺霍被驱入自我崇拜中——而同时，当代澳大利亚文化中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结构是外向的，它排斥所有私人的情感。幸运的是自我崇拜不可能仅安于自我欣赏和身体愉快，否则，多诺霍赖以生活的身体表演就被毁掉了。

在多诺霍对竞争的看法中，决定性的胜利是高于身体的。他的出色体格只有与胜利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意义。获胜的愿望并不是来自于个人的“动力”——这个体育谈话中的常见词汇，但多诺霍却竟然没有用到过它。动力是由体育比赛的社会结构给予

他的，冠军对他才是意义所在。

多诺霍的反身实践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它要经过商业体育的制度化体系、海滩产品的生产和广告、大众传媒到个人的训练和比赛活动。这个过程远不是连贯一致的。事实上，它包含着巨大的矛盾，经常为多诺霍生活中所出现的对立的男性气质所扰乱。如果这一点对于像多诺霍这样的男性气质范例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大多数男人的反身实践的发展过程就更不能是连贯一致的了。

反身实践，正如我们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内在于个人的东西。它们涉及种种社会关系和符号系统，也可能涉及宏观的社会制度。各种典型的男性气质是做为有意义的身体和形象化的意义建构起来的。通过反身实践，不仅个人的生活得以形成，而且一个社会世界也得以形成。

形构世界

通过反身实践，社会活动塑造了身体并使之具有了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一直是身体自身。它不会变成话语中的象征、符号或话语中的位置。它的物质性（包括种种物质能力，如产生性别意识，生育、喂奶、行经、张开、插入和射精等）是去不掉的，它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性别的社会过程包括孩子的生和养、年轻和成熟、运动和性的快乐、劳动、伤害和死于艾滋病等等。

性别的社会符号学强调意义的无穷作用、话语的多元性以及

从属状态的多样性，它对于克服生物决定论的僵化一直相当重要。但它不应给人一种性别像秋天的树叶随风飘舞的印象。身体的反身实践活动型塑着结构同时也被结构型塑着——结构是有其历史惯性和坚韧性的。社会有着它自己的实在。

当1970年前后女性主义把“男权制”作为人类历史中的统治模式时，争论蜂起。但是这一观点很好地捕捉到了社会关系这一巨大结构的力量和难以驾驭：这是一个涉及国家、经济、文化和交流以及亲属关系、孩子的养育和性等各个方面的结构。

实践活动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它总是对某一状态的回应。而这种状态是通过接受某些可能性而不是另外一些建构起来的。实践也不会驶入一个真空。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行动中，我们改变了初始的状态，造就了新的状态。实践建构了并重构着结构。用捷克哲学家卡雷尔·科希克难懂的术语来说，人类的实践具有构成性，是实践创造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①

在这个意义上，构造男性气质的实践也具有构成性。它们作为反身实践，建构了一个身体维度上的，但并不是被生物性决定的世界。由于这个新世界并不是由身体的物理性机理所决定的，它可能并不适合身体的物理性存在。萨塞恩和特里劳尼体现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种种行为在这个方面就是与身体敌对的——用一句澳大利亚俚语称呼一个酒鬼的话来说，他们是“自作自受”。确切地说，那些不安全的性实践活动，在艾滋病流行的背景下，是一件更为可怕的事。

^① 科希克 1976。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萨瑟恩和特里劳尼都开始改变他们的男性气质——从身体的改变到关系方面的改变。特里劳尼进了一家戒毒中心，并决定在行动上来一个“根本的改变”。他决心少些竞争心，对别人更加开放，把女人当作一般人而不是一次性游戏的对象。这些改变的结果将在第七章中介绍。萨瑟恩戒了毒并找到了一份室外体力活，这有助于他恢复健康。他还第一次和一个年轻女人建立了长期关系。

当然，两个故事并不能代表男人争取改变的所有尝试。在第五章我们还将看到有不同的道路。不管怎样，这两个故事所表明的是一个对于任何改变计划来说都不可逃避的事实。对于男人们来说，就像对于女人们一样，这个由性别的反身实践所建构的世界是一个政治的世界——到处都是在不平等的背景下争夺利益的斗争。性别政治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政治，这个体现男性气质的政治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将是本书其余部分的讨论主题。

3. 男性气质的社会组织

第一章追溯了 20 世纪各主流学派，并说明了它们都没能成功地发展出一种连贯一致的男性气质的科学。这一结果凸显了研究工作的困难而掩饰了科学家的失误。“男性气质”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人们能从中发展出概括性科学的客体。但是从各种理论反应出的问题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连贯一致的知识。如果扩展一下视野，我们就可以看清，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孤立的客体而是一个大结构的一部分。

这就要求对这个大结构以及男性气质是如何被嵌入其中的作一些说明解释。本章的任务就是在当代性别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将提供一个途径，来区分男性气质的不同类型，理解它们变化的动力。

但是，我们在讨论中所用到的基本术语的定义还从来没有很清晰过。所以，有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要搞清楚。

男性气质的界定

所有的社会都有对性别的文化解释，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

有“男性气质”这一概念。在男性气质的现代用法中，这一术语假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来源于某种类型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男性气质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性格平和而不暴烈、柔顺而没有支配性、几乎不会踢足球、对性的征服不感兴趣，诸如此类。

这种观念的前提是相信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个人的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建立在现代早期欧洲的个人主义观念之上的，这一观念是随着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第八章中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男性气质这个概念也是与其他概念存在天然关联的。如果没有“女性气质”相对照，它也就不会存在。在一种认为男人和女人不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类型的载体的文化中，（至少在原则上），就不会有现代欧美文化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概念。

历史研究表明，这种情形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化中就存在。那时，女人虽然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与男人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在同一性格特征中某种不完善或低下的意义上来说的（例如，女人较少理性推理的才能）。女人和男人并不被视为存在质的差异的性格载体。男性气质这种观念是伴随19世纪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①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男性气质观念似乎是相当近代的产物，至多也就几百年。后来，我们又在对男性气质的讨论中，以一种文化的特有方式“创造着性别”。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① 布洛克1978，概括了有关英国和北美新教中产阶级的讨论。拉康1990，以同样方式对有关身体的观点做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讨论。

对于任何声称发现了有关自然性男人气质与习得性男性气质的悠久历史性真理的说法都要审慎对待。

男性气质的定义大多是采用我们的文化标准想当然地定义的，但是其背后的各种策略都是要概括具有男性气质的一类人。主要的策略有4种，根据它们的逻辑很容易区分开来，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人们经常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本质主义的定义经常是抽取一个特征作为男性气质的核心，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男人们的生活。弗洛伊德曾把主动性与男性气质相提并论，并与被动的女性气质相比较——虽然他最终认为这种等同过于简单了，打算放弃本质主义定义。后来，作家们试图把握男性气质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些努力的结果真是丰富多彩：爱冒险、有责任感、无责任感、富有攻击性、宙斯一样的能量……。也许最好的算是社会生物学家莱昂内尔·泰格的观点，他认为，隐藏在男性的联合和战争之下的真正的自然男性气质是被“艰苦和沉重的事件”逼出来的。^①许多铁杆儿摇滚歌迷都会同意他的观点。

本质主义视角的弱点是明显的：本质的选择是相当任意的。本质论者无法找到共同认可的本质，事实上也是如此。所谓存在一个普遍的男性气质的基础的各种说法除了表明它们自身的存在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

^① 泰格（1969：211）。继续暗示说战争有可能是“男性特质美”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像高速驾车奔驰一样……该段文字还是值得一读的；布莱的《铁人约翰》，就像一个由于男性特质出现了问题而引起思维混乱的惊人例子，这种情形曾被C. 赖特·米尔斯戏称为“狂想家的现实主义”。

强调发现事实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思潮对男性气质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男性气质就是男人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定义是心理学中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量表的逻辑基础，心理学的术语都是通过显示男女群体之间的统计差异得以验证的。这个定义还是民族志学对于男性气质的讨论的基础，他们往往描述某种文化下的男人生活的模式，并且不管它是什么，就称它为典型的男性气质。^①

这里有三处困难。第一，如现代认识论所认为的那样，不存在任何无理论的描述。这些定义所赖以建立的描述，表面上是中立的，但其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性别的某种假定上的。很明显，为了设计一张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量表，一个人必须在设计有关术语时，就有一些想法：应该计算些什么或列举些什么。

第二，要列举男人和女人都做些什么，就需要先把人分成男女两类。这一点正如苏珊·凯斯勒和温迪·麦克纳应用经典人类学方法对性别的研究那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应用常识性性别分类进行社会归纳的过程。这样，实证主义的研究程序就依赖于那些特别的分类，这些分类被设想为是建立在对性别的调查结果上的。

第三，把男性气质定义为“男人在经验意义上是什么”，就会废除术语的应用，而我们常常会使用术语，说一些女性有“男人气”，一些男性有“女人气”，或者一些动作或姿态是“男人

^① M/F量表的深层混乱逻辑在康斯坦丁诺普西1973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有赤裸裸表现。民族志中对男性特质问题上的实证主义在古尔摩1990年的著作中表现得最差，他摇摆于规范理论和实证主义实践之间。

气”或“女人气”的而不管行动者的性别。术语的应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考虑人格中的冲突就至关重要。

确实，术语对性别的基本分析是基本的。如果我们只是谈论男性作为群体与女性作为群体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一点也用不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术语了。我们可以仅仅说“男人的”和“女人的”，或者“男性”和“女性”就够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术语表明了，在男女类别之间的性别差异之上，存在着在男人内部的男性间的差异以及在女人内部的女性间的差异，它们都与性别有关。^①

规范性的定义承认这些差别的存在并给出了一个标准：男性气质就是男人应该是什么。这一定义经常出现在媒体的研究中，以及对一些典范人物如约翰·韦恩或文艺流派如恐怖电影的讨论中。严格的性角色理论认为，男性气质准确地说就是男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实际上，男性性角色的理论经常是把规范性定义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混合在一起，就像被广为引用的罗伯特·布兰农对“我们文化中的男性标准”的说明：不带女人气的人、声名显赫的人、坚毅果敢的人以及严厉教训对手的人。^②

规范性的定义允许不同的男人不同程度地接近这一标准。但是这很快就产生出自相矛盾的观点，其中有一些在早期的男人解放运动的作品中就被意识到了。实际上，很少有男人能够符合上面的“标准”或者是表现出如韦恩、博加特以及伊斯特伍德一样

^① 凯斯勒和麦克纳 1978 年对有关“性别属性的首要地位”讨论的重大发展。关于有男性气质的女人的争论，参见德沃尔 1989。

^② 伊斯特霍普 1986；布兰农 1976。

的坚强和独立。(电影本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闪亮的马鞍》和《山姆，再来一次》等影片中进行了嘲讽)。对于几乎没有人能达到的规范来说，到底什么是“规范的”呢？我们难道能说大多数的男人是不具有男性气质的吗？对那种抵制严格的规范所体现的坚毅，或者那种表明男同性恋身份的英雄主义又如何评价呢？

一个更加敏感的困难是，纯粹的规范性定义不能在个性层次上把握男性气质。约瑟夫·普莱克正确地意识到，规范性定义存在一种未经确认的角色与身份相一致的假定。我认为，这种假定是性角色理论家经常滑向本质主义的原因。

符号学的视角抛开了个性层次，它通过一个有男女符号差异的系统来定义男性气质，在这个系统中，男性和女性的位置是对立的。男性气质实际上被定义为非女性气质。

这种做法来源于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在结构语言学中，言语的元素是根据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来定义的。这种视角广泛应用于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性别的文化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以及符号主义的研究中。它提出了不止一个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抽象对应理论，并且体现在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质量表中。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符号性对立中，男性气质是一个无记号的概念，处于符号权威的位置。阴茎是男性气质的首要标志，女性气质的符号定义就是无阴茎。

这种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在文化分析中一直影响很大。它避开了本质主义的武断性以及实证主义和规范性定义的自相矛盾。但是，它的应用范围也是有限的——除非像后现代理论家所断言的

那样，话语就是我们在社会分析中可以谈论的一切。为了解决有关男性气质的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些方法来讨论其他类型的关系：不同性别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位置、在社会机构和自然环境中的位置、在社会和军事斗争中的位置。^①

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的是联系的原则。一个符号只有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中才能被理解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只有在一个性别关系的系统中，才会出现所谓的男性气质。

与试图把男性气质定义为一种客体（如一种自然的性格类型、一种行为的一般标准和一种规范）的做法不同，我们需要关注那些过程和关系，正是在这些过程和关系中，男性和女性过着不同性别的生活。如果“男性气质”能够简明定义的话，那么它既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种位置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

性别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结构

在这一部分，我将尽可能简要地对支撑本书讨论的性别概念进行分析。

性别是一种规定社会实践秩序的方式。在形成性别的过程中，生活的日常行为是根据生育领域进行组织的，是由人类的身

^① 在男性文学中，严格的符号主义视角是不普遍的；这种视角大多表现在更一般的性别治疗中。但是，萨科1992年为这种视角进行了非常鲜明的辩护，这种视角的潜力在收录她的文章汇编中有所显示，参见克莱格1992。

体结构和生育过程所限定的。生育领域包括性欲和性交，孩子的出生和婴儿的抚育，以及身体的生理性别的差异和相似。

我之所以称此为“生育领域”而不是“生物基础”，是想强调第二章的观点：我们是在讨论一种涉及身体的历史性过程而不是一组固定的生物决定因素。性别是那种始终与身体和身体做什么有关，但不能还原为身体的社会实践。还原主义揭示的正好与实际情况相反了。从社会性而非生物性决定的这点上来说，性别确实存在着。它标志着转型的一个内容，即历史性的过程取代生物进化成为演变的形式。从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性别的存在是一种丑闻，一种暴行。社会生物学家们正不断试图通过证明人类社会制度不过是进化规则的一个反映来消灭性别。

社会实践是具有创造性和发明性的，但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回应着种种特殊情况，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性别关系，这种通过生育领域组织起来的在人以及群体当中都存在的关系，是所有已知社会的一个主要结构。

与这一结构有关的实践，是在人以及群体把握他们的历史状况时产生的，它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行动组成的。行动是在一个个大的群体中成形的，所以当我们说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时，我们就是在说性别实践的形构。

“形构”可能是一个过于静态的术语，重要的是形成形构的实践过程。（萨特在《寻找一种方法》中谈到“行动中方法的统一”。）从实践组织化的动态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作为性别工程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性别工程是经过时间的构形实践的过程，它改变了性别结构的起始状态。在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

中，我将把几组男性群体的生活作为这种意义上的性别工程来进行分析。^①

不管我们怎样划分我们的社会世界，也不管我们选取什么样的分析单位，我们都可以发现实践的性别的形构实践。人们最熟悉的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它是我们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常识性观念的基础。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形构就是心理学家一向所说的“个性”或“性格”。第一章中所讨论的精神分析的观点都是近乎完全地集中在这一方面。

观点的集中可能会夸大表现在任一方面的实践的一致性。因此，精神分析从关注矛盾开始，最后滑向“身份”的观念就毫不奇怪了。心理学中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批判家如温迪·霍尔韦强调说，由于在任何个人生活中都交织着多元化的话语，所以性别身份是不统一和处于变化中的。^② 这一观点突出了另一方面，即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一面。也就是说，性别是在符号实践中被组织起来的，这种符号实践活动可能比任何个人的生活都延续得长久（例如，在史诗中的英雄主义男性气质的构建，医学理论中性焦虑或性变态的构建）。

第一章已提到社会科学是如何最终认识到性别形构的第三个场所的，也就是国家、工作场所和学校等机构。很多人发现他们难于接受机构不仅仅是在形而上学上，而且是在实质上具有性别特征的。但是这一点是关键。

① 萨特 1968：159-60。

② 霍尔韦 1984。

例如，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机构。这不是说机构多少沾染上了政府高层男领导人的个性。而是想说明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有组织的实践活动是与性别结构的再生产息息有关的。绝大多数高层政府官员是男性，是因为有一个人员招募和升迁的性别形构和一个国内劳动分工和控制体系的性别形构，一个制定政策、实践路线以及激发人民快乐和满意的方式的性别形构。^①

实践的性别建构与生物性的生育毫无关系。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社会因素。这一点在遇到挑战时就清楚了。一个例子是近来在国内围绕“军队中的男同性恋”问题的斗争，其焦点就是有关开除那些性行为对象的性别选择不符合常规的士兵和海员的规定。在斗争最激烈的美国，批评家从个人自由和军队的效率原则出发使这一事件有了转机。他们争论说，事实上，性行为对象的性别选择与战斗能力关系很小。那些舰队司令和将军们以各种各样的虚假理由为军队的现行规定辩护。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为维持现代武装力量的脆弱的内聚力，维护特定男性气质的文化意义的重要作用。

自从朱丽叶·米切尔和盖尔·鲁宾 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工作以后，性别是一个内部复杂的结构、其中蕴涵着许多不同的逻辑这一事实就变得清楚了。对于男性气质的分析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像一种实践的形构一样，任何一种男性气质都是同时处于众多关系结构之中的，它们可能有着不同的历史轨

^① 弗兰茨威等合著 1989。格兰特和坦克雷德 1992。

迹。因而，男性气质像女性气质一样常常易于遭受内部矛盾的影响和历史性的中断。

我们需要至少一个三重的性别结构模型，它分成（1）权利、（2）生产和（3）精力投入（情绪依附）三个关系层次。这是一个暂定的模型，但它对男性气质问题有一些价值。^①

1. 权利关系

在当代欧洲/美国的性别秩序中，权利关系的主轴是女性的整体从属性地位与男性的统治，这一结构也就是妇女解放运动所说的男权制。这一普遍性的结构虽然在许多局部发生了变化（例如，女人当家作主、男学生女教师等），但还存在着。尽管它遭到各种各样的反抗，如女性主义所做的那样，但还维系着。这些变化和反对意味着男权制的权力遇到了连续不断的困难。它们提出了对于男性政治来说至关重要的合法性问题。

2. 生产关系

在工作的分配形式方面，性别的劳动分工是常见的，有时甚至达到了特别细微的程度（例如，在社会学家波林·亨特研究的英国乡村中，就有一种习俗是女人负责擦洗窗户的里面，男人负责擦洗窗户的外面）。应引起同等注意的是性别分工的经济后果，即男人从社会劳动的产品中获取的不平等份额。男女不平等的争论经常是围绕着男女工资的比例，但是资本的性别特征也应引起注意。通过性别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可避免的是一个

^① 米切尔 1971，鲁宾 1975。三重结构模型在康纳尔 1987 年的文章中有详细解释。

积累性别差异的过程。所以它不是一个统计性的事件，而是社会建构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其结果就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控制着主要的公司和大笔私人财产。虽然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财富的积累确实已通过性别的社会关系紧紧地与生产领域联系在一起。^①

3. 精力投入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性欲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以至于它一般被排除在社会理论之外。但是，当我们把弗洛伊德概念中的欲望看作是附着于客体的情感能量的时候，它的性别特征是明显的。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异性恋的欲望，也适用于同性恋的欲望（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认为无明确性别选择的双性恋是病态和不稳定的）。由此，型塑和实现欲望的实践活动是性别秩序的一个方面。相应的，我们可以对所涉及的性关系提一些政治性的问题：他们是双方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快乐是平等的给予和接受的吗？在女性主义关于性的分析中，这些已变成在异性恋与男性社会统治地位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尖锐问题。^②

由于性别是一个建构社会实践的一般方式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实践类型，所以它不可避免的涉及其他的社会结构。现在，普遍的说法是性别与种族和阶级互相关联，或者用一种更好的说法是

① 亨特 1980。但是，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在发展前进中，这些要点引自米斯 1986，韦林 1988，H. 阿姆斯特朗和 P. 阿姆斯特朗 1990。

② 有关异性恋政治的最好作品来自加拿大：瓦尔韦德 1985，布林宾德等 1987。这里所说的理性视角概念由康纳尔和多塞特于 1992 年提出。

互相作用。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点说，性别与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互相作用。

这一事实也给男性气质的分析带来有力影响。例如，白人男性气质的建构不但与白人有关，还与黑人有关。在二十多年前，保罗·霍克在《白英雄，黑野兽》中就直指西方有关男性气质的话语中流行的种族形象。白人对黑人暴力的恐惧有着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状态下的长期历史。白人在宗主国对政治、法庭和监狱的控制是黑人对白人暴政恐惧的一个持续基础，这种暴政曾经在殖民主义时代出现过。美国黑人男性在美国监狱里占绝大多数，就像土族人在澳大利亚的监狱里占大多数一样。这种情形在美国黑人的表达中被惊人地浓缩为“男人”，这个词汇把白人的男性气质与国家机构的权利融合在一起。正如黑人打击乐歌手爱斯-特所指出的：

不管你是否在监狱里，都没什么区别。犹太人区、监狱，一切都是制度化了的，由白人控制着……自从1976年以来，他们就不再试图恢复黑人的权力。现在，严厉的制裁代替了一切。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再是更多的教育，而是更多的监狱。白人说我们不再教育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了事。所以当你要从那里出来，你就完全死心了，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你永远突破不了的圆圈。^①

^① 对爱斯-特的访谈，见《City on a Hill Press》1993.1.21.；霍克1979。

同样的，如果不充分理解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性别政治，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形成。这一点在历史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如索亚·罗斯描写19世纪工业化英国的著作《有限的生活》中就有生动的表现。理想的工人阶级的男子气概和自尊是在顺应阶级剥削和家长制的管理方式中建构起来的，同时，它们还被定义为是与工人阶级女性相对立的。从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家庭收入”策略，在20世纪的经济领域中长期剥夺着女性的工资。^①

因此，为了理解性别，我们必须不断地超越性别。反之也一样。如果没有对性别不断深入的理解，我们也不能理解阶级、种族和全球性的不平等。性别关系是整体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性别政治则是我们集体命运的主要决定力量之一。

男性气质中的关系： 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与边缘性

随着对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不断认识，人们普遍认识到男性气质的多样性：黑人与白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都具有男性气质。这是值得欢迎的意识，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危险。这个框架容易使人认为有一种黑人的男性气质或者有一种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

^① 参见罗斯 1992，特别是第6章。

认识到男性气质的多样性仅仅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审视。更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揭开男性气质的阶级和种族背景并仔细看一看性别关系在男性气质中的作用。毕竟男人有不同类型，既有黑人同性恋者也有女人气的男工人，更不用说那些中产阶级的强奸犯和打扮得不男不女的资产阶级了。

对男性中的性别关系的关注需要动态的分析，以免对多元男性气质的认识蜕变为一种性格类型学，就像埃里克·弗洛姆在他的《权威性格》一文中所犯的错误那样。“支配性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一样的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一定的性别模式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男性气质，但是地位总是会竞争变化的。

对关系的关注也有利于对现实的了解。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认识到存在多种多样的男性气质，就可以像消费者选择商品一样，尝试符合自己生活方式的男性气质。从性别关系的视角出发人们容易认识到那种对性别形构影响巨大的强制力，以及在性别经验中的痛苦和欢乐。

按照这些准则，让我们来考察建构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

支配性

“支配性”的概念来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希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它是指那种文化动力，凭借着这种动力，一个集团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在任一给定的时间内，总有一种男性气质为文化所称颂。可以把支配性男性气质定义为性别实践的

形构，这种形构就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或说是用来保证）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①

但这并不是说最明显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人都是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们可能是偶像，如电影演员，或者甚至是幻想中的形象，如电影中的角色。拥有机构权力或大笔财富的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可能离支配性模式相差很远。（20世纪50年代，在悉尼就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商界男人，由于他的财富以及他在政治迫害和警察侵扰的冷战气氛中所提供的庇护，使他成为同性恋/易装癖者社交圈中的一个核心人物）。^②

但无论如何，支配性只有当文化的理想与组织机构的权力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时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种权力可能是个人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所以，商界、军队和政府的高层提供了将上述两者合二为一的男性气质，它是一种令人十分信服的样板，到现在还没怎么为女性主义者和一些持有异议的男士所动摇。与直接的暴力相比，这种男性气质更容易获得支配性的标志——权威性（虽然权威经常由暴力支撑或支持着）。

我想强调的是，支配性的男性气质体现了“目前广为接受的”策略。当维护男权制的条件变化了的时候，特定男性气质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也就随之动摇了。新的集团可能会挑战旧的模式并建

① 我想强调的是葛兰西的支配性概念的动态特征，它并不是文化再生产的实用主义理论经常描述的那样。葛兰西一直不忘在历史变迁中有一个争取领导权的社会斗争。

② 沃塞斯鹿1991（第三章）描写了这种气氛，并且谨慎地避免提到个人。

立起新的霸权。任何群体的男性统治都可能遭到女性的挑战。这样，男性霸权就会是一种历史性的可以变化的关系。它的兴衰是本书所提到的男性气质的一个核心要素。我将在第八章探索它的长期发展历史，并在第九章和第十章讨论近来对它的有关争论。

从属性

支配性与整个社会中的主导文化有关。在这个总框架中，还存在着不同男性群体之间的具体的统治与从属的性别关系。

在当代欧洲/美国社会中，突出的情形是异性恋男性处于统治地位以及同性恋男性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情形比起文化对同性恋或是男同性恋身份的蔑视还要严重。大量重要的实践使同性恋男性屈从于异性恋男性。

这些实践被列举在早期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著作中，如丹尼斯·阿尔特曼的《同性恋：压迫与解放》。它们已在有关的研究中被详细记录下来，如 NSW 反歧视委员会 1982 年的报告“歧视和同性恋”。这些实践现在仍是男同性恋者每日都要经历到的事件。它们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排挤，文化上的污蔑（在美国，男同性恋者现在已经变成了宗教攻击的主要象征性靶子），合法的暴力（例如依照鸡奸法律条文规定的监禁），街头暴力（从恐吓到谋杀），经济上的歧视以及对个人的联合抵制。难怪一位在憎恶同性恋的文化中长大的澳大利亚男工人，基于他的体验，要这样评论：

你知道，我完全不知道男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我的意思

是它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①

压迫使得同性恋男性处于男性中的性别等级结构的底层。在男权制的意识形态中，所有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符号体系所排斥的特征在男同性恋那里都可以找到，它们包括从对房屋装饰过分讲究的品味到肛交快感。因而，从支配性男性气质来看，男同性恋类似于女性。在一些男同性恋理论家认为，这正是同性恋被猛烈攻击的原因。

男同性恋男性气质的从属地位是最明显的，但它还不是惟一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气质。有一些异性恋的男人和男孩也被从合法性的男性气质圈中驱逐出去，他们被冠以一系列丰富的贬义词：王八、女人腔、胆小鬼、驴子、软蛋、软骨头、奶油包、恋母者、没有丈夫气的男人、妈妈的小男孩、四只眼、软耳朵、戏子、傻子、懦夫……等等。这里所列词汇的象征意义与女性气质的联系是明显的。

共谋性

正如我所指出的，男性气质的规范定义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男性符合某种规范标准。这一点也适用于支配性男性气质。能够在各方面严格实践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是相当少的。但是大多数男人从支配性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都可以从

^① 阿尔特曼 1972；反歧视委员会 1982。康纳尔，M. 戴维斯和多塞特 1993：122。

男权制中获得利益，这是男人们普遍从女性的整体依附中获得的。

正如第一章所显示的，对男性气质的解释一般是与综合特征和类型而不是与人数联系起来的。但是，在思考社会整体的动力时，人数的多少就有关系了。性政治学是大众的政治学，我们就要思考大量人群的情况。如果大量的男性与男权制有某种联系但又没有具体表现出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我们就需要一种理论方法来说明他们的具体情形。

通过认识男性群体中的另一种关系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关系就是他们与男权制的共谋关系。某些人一方面谋取权利的利益，一方面又避开男权制推行者所经历的风险，这类人的气质就是共谋性男性气质。

共谋性男性气质的男人容易被曲解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人中的懒汉——认为他们只是在电视机前欢呼足球比赛的男人与跑出去制造麻烦的男人之间的区别。但是经常有比这种情况更加确定和精心策划的共谋性男性气质。婚姻、父道以及社区生活经常要与女人做出广泛的妥协，而不是赤裸裸的统治或者说一不二的演示。^①许许多多从男权制中获得好处的男人也同样尊重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从不对女性动粗，做着他们习惯了的一份家务，把工资交给家里，他们的行为很容易使人相信女性主义者一定是过于左倾激进了。

边缘性

支配性、从属性和共谋性如刚才所定义的那样与性别秩序有

^① 参见鲁宾 1996 年描写的美国白人家庭。

着内在的联系。性别与其他结构如阶级和种族的相互作用发展出各种男性气质之间的进一步的关系。

我曾在第二章提到信息科学推动了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的重新定义，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劳动意义也引起了争论。这不是一个固定的中产阶级男性气质对抗固定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问题。他们双方的男性气质都被社会动力重新改变了，在社会动力系统中，阶级和性别关系一起发挥着作用。

种族关系也可能变成不同男性气质相互作用的一个主要部分。在一个白人统治的背景下，黑人的男性气质对于白人的性别结构只起到符号性的作用。例如，黑人体育明星成为粗犷的男性气质的偶像，但同时黑人强奸犯的想像形象在白人的性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一种为美国右翼政治所广泛利用的角色。相反，白人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保持了制度压迫和肉体摧残的威慑作用，它们影响了黑人社会中的男性气质构成。

罗伯特·斯特普尔思在《黑人的男性气质》一书中对国内殖民主义的讨论显示了阶级和种族关系同时对男性气质的影响。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美国，黑人暴力的程度只能从黑人劳动力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变化以及用于控制黑人暴力的暴力方式上才能理解。大量的失业和城市贫困现在已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强烈地相互作用着，共同影响着黑人男性气质的形成。^①

① 斯特普尔思 1982。更近一点的有关黑人男性特质的美国文学作品，例如梅杰斯和戈登 1994 年的著作，已经令人担心地从斯特普尔思的结构分析退回性角色理论；作者倾心的政治策略是劝告黑人青年重新社会化，这点并不令人惊异。

虽然“边缘性”这个概念还不理想，但我找不出比它更好的词来表达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种族集团的边缘性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的关系。边缘性男性气质总是与统治集团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威性相联系着。这样，在美国个别的黑人运动员就有可能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典范。但是个别明星的声望和财富不会对下层造成影响，它一般不会给男性黑人们带来社会威望。

在从属性男性气质之间，也可能有权威与边缘的高下之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奥斯卡·王尔德的被捕和判罪。他是第一个被现代反同性恋法绳之以法的人。王尔德是因为他与同性恋的青年工人们的关系被抓的，本来这种活动是不成问题的，后因他与一个有钱贵族的法律官司，才以同性恋的罪名被捕。^①

这两种类型的关系——一方面是支配或统治与从属和共谋的关系，一方面是边缘与权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用来进行具体男性气质分析的框架（这是一个松散的框架，但是学者应该不辞辛苦去建立社会学理论。）我曾强调“支配性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不是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变化的关系结构中特殊情形下产生的性别实践的形构。任何有价值的男性气质理论都必须对这种变化的过程给出说明。

历史动力学、暴力和危机倾向

为了认识作为一种社会模式的性别，我们需要把性别看作是

^① 埃尔曼 1987。

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营造者。在第二章中，我把性别定义为是形成的实践和建构的实在。这一点是社会实在随时间动态发展的这一观点的关键部分。我们习惯于把社会想像成是比生物的存在较少真实性的东西，习惯于认为变化的东西比稳定的东西较少真实性。但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实在，它就是人类生活的形态，正是它使我们成为人类。在历史上，没有其他的种群能够像人类那样生产和生活，用完全新的演变决定因素来代替器官的进化。

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看作是历史性的，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用或无价值的东西，而是要把它们牢牢地定位在社会能动性的世界之中。这样对于它们的历史性，就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

性别关系的结构是随着时间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历史记载中，这种变化普遍被认为是来自社会，性别外部——技术或阶级等动因。但是变化也会从性别关系内部产生。这种变化的动力和性别关系一样的久远。但是，在最近两个世纪中，随着性别和性的公共政治的出现，这种变化的动力已变得更加明确。

伴随着妇女选举权运动和早期的同性恋运动，蕴涵在性别关系中的利益冲突也变得清晰可见。在任何不平等的结构中都会形成一定的利益，结果必然会造就一些不同的集团，通过维持或改变这种结构，这些集团得到或失去利益。一个男性统治女性的性别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防卫性的男性利益集团和求变性的女性利益集团。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它与男人们作为个体是爱女性还是恨女性或者说是相信女性是平等的还是卑劣的无关，它也与女性目前是否追求变化无关。

谈到男权制的获利，就正好引发了这种利益问题。男性从男权制中得到的好处是种种与荣誉、威望和控制权力有关的东西。他们还获得了物质性的好处。在那些富裕资本主义国家中，男性的平均收入大约是女性的两倍（我们熟悉的全职工作的工资比例能很好地体现实际收入中的性别差异）。男性担任大公司的总裁或老板，控制大笔资本的机会更是大得多。例如，1992年美国55家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企业中只有五家主要是由女性掌握——并且这五家企业除一家外，其余的都是从男性那里继承来的。

男性更有可能掌握国家权力：例如，男性当上国会议员掌管部门的机会比女性多10倍（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平均数）。难道是男性做了大多数工作吗？不对。时间概算研究表明，在富裕国家中，女性和男性一年中的平均工作时间几乎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工作的报酬）。^①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性别的战争”绝不是玩笑。如此规模的不平等必然会引发社会斗争。它说明男性气质的政治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生活和身份的问题，它还必须考虑社会公正问题。

这种规模上的不平等结构涉及一个重大强占社会资源的问题，难以想像其中没有暴力的参与。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占统治地

^① 关于财富模式，参见《Forbes》杂志1992年10月第19期的美国百万富翁调查。关于国会，参见《旧金山新闻》1993年12月第12期发表的1993年国内议会法规协会的调查报告，以及美国发展规划1992年：145。时间预算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引起一些读者的惊异；参见比特曼1991。

位的性别在控制和运用着种种暴力手段。男人们远比女人更经常的被武装起来。确实，在许多存在性别区分的政体中，妇女被禁止携带和使用武器（惊人的是，甚至在军队中也有此类规定）。男权制对女性气质的定义（依赖、胆怯）相当于一种文化裁军，它可能与实质上的解除武装一样相当有效。在家庭暴力事件中，经常发现受到虐待的女人，她们在身体上还能够抚慰自己，但心理上已经接受了施虐者对她们的定义，认为自己是无能和无用的。^①

从这种状态中产生出两种暴力形式。首先是特权集团的许多成员利用暴力维护他们的统治。对妇女的威胁涉及一个相当广泛的范围，从街头的嚎叫、办公室的骚扰、强奸和家庭暴行，到被男权制下的“拥有者”如前夫谋杀。身体的攻击常常伴随着污秽言语的侮辱（如在近来倡导殴打妇女的流行音乐中，经常使用妓女和母狗等口头语）。虽然大多数男人都不会攻击和骚扰妇女，但那些攻击和骚扰妇女的人却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不正常的。相反，他们还常常觉得自己是很公正的，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意识授予了他们如此行为的权利。

其次是暴力在男人的性别政治中变得重要起来。主要的暴力事件（包括军事格斗、杀人和武装袭击）都是男人干的。恐怖活动被用作划分界线和驱除异己的手段，例如，同性恋者对同性恋男人的暴力活动。在集团斗争中，暴力能够变成一种主张或宣扬

^① 这里的讨论引自黛安娜·罗素 1982，康纳尔 1985，普塔切克 1988，史密斯 1989。

男性气质的方式。当一个被压迫集团获得暴力手段时，暴力是一个促发的过程——当代南非和美国黑人的暴力活动就是一个例证。在国内的城市中，街头青年的团伙暴力是一个以张扬边缘性男性气质来对抗其他男性的突出例子，它是在对妇女实施性暴力中张扬的男性气质的继续。^①

就像在美国近来出现的对堕胎服务提供者的攻击和屠杀一样，暴力可以被用来加强反动的性别政治。还必须说明的是，男人中的集体性暴力也有可能给性别关系的进步带来机会。本世纪的两次全球战争就对妇女就业带来了重要变化，动摇了性别的意识形态，加速了同性恋团体的形成。

暴力是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统治体系检测自身不完善性的一个手段。一个完全合法的等级制度会较少地借助胁迫手段。当代暴力的规模暴露了现代性别秩序中的种种危机倾向（借用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一个术语）。

危机倾向的概念需要与人们说的“男性气质危机”区别开来。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危机”预先假设了一个紧密结合的系统的存在，这个系统被危机的后果所破坏或修补。男性气质，正如讨论中已经显示的，不是这种意义的系统，而是一种处在一系列性别关系中的实践形构。我们不能合乎逻辑地说一种形构出现了危机，只能说它瓦解或变形了。但是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说性别秩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危机，可以说它有一种危机倾向。^②

^① 梅塞施密特 1993：105~17。

^② 关于一般的危机倾向概念，参见哈贝马斯 1976，奥康纳 1987；关于它与性别的关联，参见康纳尔 1987：158~63。

这样一些危机倾向总是牵涉到所有的男性气质，虽然并不一定破坏它们。例如，危机倾向也可能会促使某些人试图恢复统治性的男性气质。迈克尔·金梅尔曾经指出在世纪交替时期的这种变化动力。当时在美国，由于对妇女选举运动的恐惧，引起了男人们对流浪汉的狂热崇拜。克劳斯·特维赖特在《男性的幻想》一书中，追溯了法西斯主义性别政治在妇女选举运动和二战德国战败后更加野蛮的产生过程。更近一点的例子是在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越南战争的失利激发了对真正男性气质的新狂热崇拜，从暴力“惊险”影片如“第一滴血”系列，到武器崇拜的扩展以及威廉·吉布森在他最近令人恐惧的研究中所说的“准军事化的文化”^①都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为了理解当代男性气质的形成，我们需要描绘一下性别秩序的危机倾向。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但是，用本章前面所定义的性别关系的三重结构框架开个头是有可能的。

权力关系的变革提供了危机倾向的最明显的证据：男权制权力合法性的历史性崩溃，以及一个全球性的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的潜在矛盾所引发的，另一方面是由现代国家结构和市场关系的全球化所促成的。

由于公民社会的机构特别是家庭无力解决危机从而引发了范围广泛但又不是连贯一致的政府行动（从家庭法到人口政策），后者又变成了政治动荡不安的焦点。围绕这场危机，各种男性气质在为合法化的斗争以及男人对女性主义的分歧性反应中被重新

^① 希梅尔 1987，特维赖特 1987，吉布森 1994。

形构起来（见第五章）。这场危机引导一些男人转向对刚刚提到的男性气质的崇拜，使其他一些人则支持女性主义的改革。^①

生产关系也一直是大规模制度变革的领域。最显著的是战后在富裕国家中已婚妇女就业的大规模增长，在贫穷国家中更大规模的妇女劳动力加入到挣钱的行列。

在男性和女性对生产的平等贡献之间和对社会劳动产品的不同占有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男权制对财富的控制为继承制度所支持，但是它也使得一些妇女成为财产所有人。这种性别化的财富积累过程的紊乱在男人们获益的机会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紧张和不平等。例如，有些男人由于失业被排除在继承制之外，而有些人则由于他们与新的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联系获得了优势地位（见第七章）。

精力投入的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已经成为在异性恋秩序中可以公开选择的生活方式而稳定下来（见第六章）。这种变化为妇女要求得到性快乐和控制她们自己身体的广泛呼声所支持，其影响已经涉及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实践活动。

男权制禁止由男权制社会本身生产的种种形式的情感、爱慕和快乐。各种紧张关系正围绕着性生活中的不平等和男人在婚姻中的权利，围绕着社会对同性恋感情的禁止（正是男权制不断地生产着同性的社会机构）以及围绕着性自由对社会秩序威胁，而产生出来。

^① 金梅尔和莫斯米勒 1992，作了详细的文字回应。

本文对危机倾向的描绘只是对一个巨大主题的非常简要的说明。但它可能已足以显示出男性气质的变化的真实图景，这张构图比现代男性性角色的图景要宽广得多，或者说它揭示了深层的男性气质。在这张构图中经济、国家和全球性的关系以及家庭事务和个人间的关系都包含在内了。

全球性的性别关系的巨大变化带来了实践中的极其复杂的变化，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奋力把握住这种变化，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场变化中充当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我们都参与了一个性别关系世界的建构。这个世界是怎样形成的，不同的群体追求什么样的策略，以及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政治问题。男人和妇女一样不再为他们所继承来的性别模式所束缚。男人们也可以做出政治选择来建立一个新的性别关系世界。但是这些选择总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下做出的，社会环境限制了人类的企图，并且选择的结果也是不容易控制的。

理解如此深度和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理论探索的任务。它需要具体的研究，需要更加精确、更加全面、能够说明那种巨大动力机制的研究。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计划。



第二部分

男性气质动力学的四项研究



欲
乎
知

如
覺

PDG

概 述

第三章提出了研究男性气质的框架，以下四章将应用这一框架，对澳大利亚四个男性群体的生活史进行研究，以探求男性气质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收集生活史素材是社会科学最古老的方法之一。生活史能提供个人经验、意识形态和主观感受的丰富资料。肯·普卢默在《生命文献》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运用这种方法的合理性。生活史也记录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和制度。也就是说，这些素材不仅提供了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且是丰富的非个人的和集体过程的证据。

让-保罗·萨特在《寻找方法》一书中的哲学观点有助于解释生活史的重要性。生活史是一项投入，是穿越时间的实践的统合（参阅前面第一章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讨论）。这一由生活史所记录的投入，本身就是决定实践的社会环境和实践产生的未来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生活史方法一直关注穿越时间的社会生活的形成。生活史是真实的历史。

这就使生活史成为研究社会变迁的最好方法。威廉·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克的著作《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是经验

社会学早期的一本经典著作，作者使用了生活史方法；社会科学家仍在运用这一方法，例如，鲍勃·布劳内的《白人生活，黑人生活》就是经历了三个十年的调查，对美国种族关系的独特研究。不过，这种方法与费用有关。作为社会科学中最昂贵的一种方法，生活史方法又属于时间耗费最多之列。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大规模社会变迁需要在研究深度和研究范围之间进行权衡。例如，一项男性气质的生活史研究，如果要想获得对特定情况的深入理解，就不可能应用对大规模男性人口的抽样调查。^①

我决定与其空泛地研究，不如集中在可获得丰富理论成果的一些个案调查。通过对性别秩序的危机倾向的分析（第三章），我试图了解那些在男性气质建构或整合时处于压力之下的男人^②。我重点选择了4组男人，理由如下。

权力关系中的危机倾向直接威胁到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在性别等级体系失去了全部合法性的环境中，男人与女性主义者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他们生活中的危机倾向会非常突出，激进的环保运动就是这样的环境。这种运动中的男性必须以不同方式重

① 为了捍卫生活史方法，请参阅普卢默 1983，麦考尔和威特纳 1990。关于社会变迁，请参阅托马斯和兹纳涅克 1927，布劳内 1989。生活史方法最重要的理论化成果，即萨特关于“渐进的回归”的探讨请参阅萨特 1968，这部著作在社会科学界知者寥寥。我觉得萨特的研究是性别化的；我在应用他的理论时，参考了后结构主义者关于主动性和性的有关著作，参见威登 1987。

② 与其说是代表性的样本，不如说是策略性的样本。这一方法在口述史中经常运用。在社会学中，这一方法再平常不过，就像格拉泽和斯特劳斯（1967）关于“基础理论”的说明中的“理论抽样”。

构男性气质。

在已建立的性别秩序中，精力投入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异性恋夫妇来体现的。这是大众文化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爱”的意涵，这一意涵还得到强大的制度性支持。对那些对其他男性有性趣的男性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其男性气质肯定有问题。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需要处理比环保主义者还要严重的性别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构成不同。

个人的男性气质与宿主是否为家计负担者有关。对于那些无法养家糊口的男性来说，男性气质将会受到压力。目前结构性失业对于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来说是真实的，尤其是青年工人。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阶级青年男性因此被选定为访谈的第三种群体。

其他的危机倾向出现在新贵人群中。支配性男性气质在文化意义上与权威和理性相链接，两者的基础是男权制的合法性。不过，如果经济关系和技术发生变化，权威和理性可能会分离。中产阶级男性的职业基于技术性知识，但是缺乏资产及传统职业所具有的社会性权威——正如一些理论家所提出的“新阶级”的男性——他们会给予我们深入研究支配性模式变化的机会。

访谈根据同一计划进行，但每次访谈具有丰富的弹性。采访者要求受访者叙述自己生活中的经历，重点放在关系得以构建的那些实践上，也就是说，人们在生活的各种环境中的实际作为。我们要求受访者提供每一次单位（例如进入高等学府）的变更，并叙述每一单位——如家庭和工作场所——内的关系。我们从生命的不同时期来探寻性别的不同结构（权力，工作和精力投入）

的迹象。实地访谈本身不太可能发现无意识动机。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询问幼年记忆，家庭格局，关系危机和对未来的企求，来寻找情感动力的线索。

在大多数场合中，以上内容的录音访谈，可以得到丰富和令人着迷的资料。最近对方法的探讨有一种趋势，即：研究人员应该将所有故事视为虚构；要通过“阅读”故事来发现话语的修辞手段、有意的沉默及叙述的策略，讲话的人可以凭借这些技巧像作家那样创造意味深长的故事。所有严肃认真的研究者运用生活史方法时都必须意识到材料的这些特性。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语言上就事论事，那么就会失去生活史的要点，并摒弃了回答者说出真相的努力。自传就是大大超出本身语言的证据。这一证据并不一定容易使用，得耗费时间和精力去从不同角度检验故事并同其他证据做比较。我对这些生活史材料的研究是通过以下步骤展开的：

在分析的第一阶段，我听磁带，读记录，做索引，并将每次访谈作为一项个案研究进行详细记录。在每项个案研究中，访谈总体上由三方面来检验：（1）事件的叙述顺序；（2）结构分析，使用性别关系的三种结构所提供的一种网络；（3）动力分析，追溯男性气质的形成和消失，试图把握所涉及的性别图景。对每一个案的详述既是描绘个人肖像的尝试，也是对个人形象的意义的反思，可以作为社会变迁的论据。

在第二阶段，我将个案研究置于群体框架下做再分析。其目的是寻求特定社会位置上的男性生活轨迹之中的异同，并且了解在大规模社会变迁中他们的集体性定位。我在此使用了性别理论

的定义，以求这些比较分析系统化。我对个案做了摘要和再索引，这样，在对每个主题做出分析时，整个群体就凸显出来了。而个案生活的叙述形态都得以保存。我对每个群体都分别写出了分析报告，试图得到特定变迁过程中男性的集体性图像。这些报告构成了以下章节的基础。

我对这一步履维艰的程序做了详细说明，而不是直接跳到访谈上去，是为了强调以后的论述已经有一个系统的基础^①。生活史异彩纷呈，生动的人物和有趣的情节很容易喧宾夺主。因此，我遵循的程序将重点放在公共的背景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常规上。这会让人感到乏味，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话，就必须如此。

这四项研究本身并不是要作为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图景，其目的是阐明特殊情形——对于已经说明的原因，这些情形可能是很

① 更进一步的例子：1985~1986年在新南威尔士收集的口述史材料，大部分来自悉尼。其中一些不属于这里讨论的四个群体。访谈时间持续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而且使用磁带录音。参与者被告知我们的研究目的，即探究男性气质和男性生活中的变迁。我们使用了“焦点访谈”形式，提供了访谈话题和适当顺序的明确提纲，同时也给访谈者完全的灵活性，以决定如何进入这些话题。一共有三位访谈者参加，一位女士和两位男士。（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我做的访谈最少。）访谈录音被完整地转录成文字。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准备过程中，我同时使用了记录和磁带，以求获得对意义和情感的充分理解。一共完成了36个个案研究，到1988年年底我才写成论文。这四个群体的研究和一些着重于特殊主题的论文，是在1989年到1992年写成的。在写作这些群体研究时我不仅以社会科学家使用生活史材料的作品为范本，比如戴维·里斯曼的《群体中的面孔》（1952年），也参照了描写生活交互影响的小说家，尤其是海因里希·伯尔精彩的《女士与众生相》（1973年）。

关键的。在这一基础上，我使用了这些资材去探讨更为广泛的主题，这些研究当然也将有助于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

本项目的所有成果并非都具有解释力；研究不可能预先对其结果担保。正如这项调查所证明的那样，一些人认为我们的研究课题不值得放在第一位去探索。实地调查是由澳大利亚研究基金委员会——即当时的国家研究基金会提供经费的。在任何研究成果还没有出版之前，这一项目就受到联邦议会的自由主义者和执政党组成（保守党联合阵线）的“威斯特沃奇委员会”的责难，声称这是对公共基金的公然浪费。

我很乐于由读者来判断他们英明与否。

欲
乎
知
如
覺

4. 过把瘾就死

最近有关男性气质变迁的讨论集中在中产阶级职业男性身上。大部分的讨论都认为工人阶级或“蓝领”男性在性政治方面即使不是公开反动的，也是保守的。

可是，朱迪思·斯泰西指出美国工人阶级首创了新的家庭模式。正如林恩·西格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和劳工政党一般来说在性别政治方面，与那些将政治基础定位在富裕阶层的政党相比，更为先进^①。与这些观察相符的是，对工人阶级男性气质更具鉴赏力的文章都是出自那些受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理论影响的作家之手。

他们的论点强调体力劳动，工作场所的关系和工资。例如，安德鲁·托尔森争辩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对男性气质的关注焦点就是工资。有些不协调的是，他将商业场所中的斗争作为他对男性情感及政治态度的分析中心。保罗·威利斯将车间（工厂）文化和工资形式同男性气质联系起来。迈克·唐纳森最近强调“家庭

^① 斯泰西 1990；西格尔 1990：294～319。

和工作场所的经验是男性劳动者的意识形成的关键因素”，两者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男性气质的营造和毁灭^①。

由于男性在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中工作，其环境无疑影响男性气质的建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保障就业。据估计，在70年代经济低靡时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有30000000人失业。经济疲软所造成的失业是长期的。大量青年在对稳定工作不抱期望的环境中长大。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熟悉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各种模式出现了。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处于长时间的间断性就业和经济边缘的窘境，并且在短时期内经常遭受严重剥削。在这样的环境中，男性气质的营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群体和背景

这一节的讨论对象是五个青年，他们通过同一失业青年职业介绍所而相识了：杰克·哈里（22岁），“鳗鲡”（21岁），帕特里克·文森特（17岁），艾伦·鲁宾（29岁），马尔·沃尔顿（21岁）。他们全都依赖救济，顶多具有间断性受雇的经历。他们在15岁或16岁离开学校，一个被开除，两个在过多的逃学之后也如此，一个是文盲，另一个也差不多是文盲。他们总体上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

他们与政府发生冲突，多数憎恶学校，和老师的关系是敌对

^① 托尔森 1977：58-81；威利斯 1979；唐纳森 1991。

的，有时是暴力的。五人中的四人曾经被捕过，其中两个在监管下至少度过了一年。虽然具有澳洲英裔的背景，就个人作风和经历而言，他们不属于“值得尊重的”工人阶级。有三个人骑摩托车，对其中的两个来说，飚车是发泄激情的主要方式。

我将把他们的经历和三个具有相似年龄和阶级背景的女性做比较，这三个人如今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斯图尔特·哈代（24岁）是一家银行的电脑实习生；丹尼·泰勒（23岁）是一个环保组织的办公人员；保罗·格雷（26岁）是一家福利代理公司的临时办公人员。

这八个人都是制造业工人的孩子，其中几个是在非常贫寒的家庭中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负担家计者/家庭主妇的划分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大多数个案中，当男孩们年幼时，他们的母亲都有工作。在其中几个个案中——收入适度的上升和急剧的下降不时打断这些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家庭生活——母亲变成家庭的主要收入者。这很容易被受访者接受；八个人中只有一个对于女人养家感到不舒服。

这里，性别的工具型/表达型的划分也失去了意义。像林利·沃克对工人阶级女孩的分析那样，这些年轻男性不把妇女看成是情感专家，或者是与男人不同的富于表现力的，以个人取向为中心的异类^①。

他们成长的家庭有两种差别悬殊的经济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家庭的运转依靠密切联系的合作。斯图尔特·哈代的父亲是

^① 沃克 1989。

一个万能工具式的内地工人，不断变换地点以谋求工作。他的妻子和他一起迁徙，扩大劳动投入，例如，在他工作的农庄干洗涤衣物的活。当斯图尔特读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在一起当合同清洁工，斯图尔特也加入他们的工作。

马尔·沃尔顿的父母完全是另一种模式。他从没见过父亲，父亲在母亲怀上他时遗弃了家庭。他母亲先在工厂，后在一个旅游公园工作，依靠薪水来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儿子。

就像斯泰西对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分析那样，这些家庭看上去都是后现代的，先于中产阶级家庭而改变了。这些模式并非是作为一种家庭类形而被有意选择的。有一些人认为，两个挣钱人固然更好，但是有时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挣钱人。在沃尔顿夫人的家庭中，当她的情人抛妻别子与她同居后，两个挣钱人的模式又形成了。马尔拒绝接受母亲的情人为养父，虽然他会听从祖母的规劝。

抽象劳动

访谈充分记录了这一群体与性别关系中的各种结构的遭遇。让我们从生产关系说起。生活史所揭示的关键一点是男性气质的型塑与特定工作场所无关，而是与作为总体的劳动力市场有关，后者形塑了他们就业和失业的经验。个人历史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

艾伦·鲁宾是群体中的年长者，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工作经验。他在连续逃学以后，于15岁离开学校，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他

在一家装订书籍的商店里得到工作，可能是由他母亲安排的。后来，由于认识当地政府中的一些人，他找到一份差事，为本地的委员会工作。而后他跑到新西兰去冲浪，花光了钱，在一家汽车装配工厂找到工作。他憎恶这家工厂——他说不是因为讨厌体力劳动，而是这个地方有如集中营，由一群白痴管理，并且被一堆“机器蚂蚁”操纵。回到澳大利亚以后他一度和一些职业赌徒四处周游，然后做了邮件分拣员；他辛辣地说道，那是“我显示智力的工作”。后来，他干了两年给集装箱刷油漆的工作，并攒够了去欧洲旅行的钱。回到澳大利亚以后他继续走老路，没什么起色，大部分时间靠救济活着，偶尔也有工作，但没有一个长久。他和父母住在一块，为的是能省点钱。

虽然这是最长的工作经历，但其内容是典型的。艾伦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任何职业资格或者社会地位，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优势。他所能交换的正是马克思精确定义的抽象劳动，即：最低级的公分母——几乎所有人都具备的能力：

“他转换成素朴的、单一的生产力，这一生产力不必剧烈地耗费全部体力或智力才能。他的劳动成为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劳动。因此，在他的上面有四面八方的拥挤的竞争者。”^①

从雇主的观点来看，艾伦可以同任何其他工人进行对换。从

^① 马克思 1969 [1849]: 171。

艾伦的观点来看，任何工作都是可以和其他工作互换的——至少，目前的工作就可以。但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人际关系可能不一样。他已经干了一系列户内和室外的的工作。他对这些工作的描述表现出完全厌倦的味道，这是一种让人恨不得用刀子去捅死的异化。

当非人的劳动力市场和对个体工人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的雇主使谋生变得困难的时候，艾伦这样的反应不会让人吃惊。正如布鲁斯·威尔森和约翰娜·温在他们的《墨尔本研究》中揭示的那样，对于工人阶级青少年来说，谋生是根本问题。^①这一经验对他们加入工人阶级必定具有强烈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艰难”是上流社会的用语，但这一用语对于那些青年和过着类似生活的其他人来说，才是完全真实的。

例如，杰克·哈里曾经剪过羊毛，干过重体力活，印刷工，酒吧招待员和卡车司机。他并不试图去扩展自己的技能，这是因为首先他就对学习技能不以为然。所有工作都是短期的；他只做那些他能做的活。他“事实上”的妻子艾尔莎在一个乡下小镇做报务员。电信使信息交流自动化后，她失业了，后在一家商店中找到工作。三个月后，生意变得不景气，她又被解雇了。

杰克的朋友伊尔（“鳗鲡”）从做学徒开始，就极力试图脱离抽象劳动的世界。他的第一个雇主，在支付低薪的三个月实习期结束时，除了留下一个以外，解雇了其他全部学徒。伊尔不是那个幸运儿。他又在另一个小老板手下干活，解雇的事情继续发

^① 威尔森和温 1987。

生。三年的学徒生涯之后，公司倒闭了。由于伊尔不能在学徒法规定的六周期限内找到相同的工作，他只好离开这一行业。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不可能对收入抱有信心和乐观的态度。杰克·哈里从来没有得到一份持续的工作，也没有期望会得到。他只是期望以救济为生，同时对工作持守株待兔的态度。他发现联邦职业服务中心毫无帮助，它的全体职员都是“猪猡”，对没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不感兴趣。哈里得到的帮助大多来自家庭和朋友。

人们通过个人关系，在非人格的劳动力市场里求生存。就像提到过的，艾伦·鲁宾最初的两份工作是依靠亲属得来的。杰克为他妻子的姑妈工作，做酒吧招待员，然后是为岳父干活，在一个周游乡下的家庭团体中做羊毛合同工。他自己的父亲带他驾驶摩托车环游澳大利亚，并在菲尔巴拉矿区替他找到一份重体力劳动的临时工作。几乎这一群体中所有人的工作史都显示出在劳动力市场中个人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家庭关系。

不仅如此，杰克逐渐形成了谋生的方式，有人文雅的称之为激进实用主义。即使妻子获得一份比他的工作更好的差事，他也丝毫不在意。他以完全相同的口吻说，如果他在领取救济的时候得到一份工作，那一定是他用化名得到的（如果他被捕，这会被定为一种罪行）。他加入工会只是权宜之计。他喜欢运输工会，但是由于失去了驾驶执照而失业。他讨厌剪羊毛工工会，因为它的成员老是争吵不休，他又失去了工作。因为“需要钱”，他在一家印刷厂获得了因罢工而空闲出来的工作，如今被工会禁止从事印刷业工作。

五人中没有一个人信仰工会主义。如果工会主义依靠的是行业中基础群众的团结，那么就不难看出它为什么会持续发展。作为动员工人阶级的一种形式，主流工会主义本质上是与那些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人不相关的。

对该群体的几个人来说，激进实用主义导致了犯罪。犯罪包含刺激和娱乐的成分，尤其是对较年轻的窃车贼而言。但是就其部分而言，犯罪是一种工作。马尔·沃尔顿描述他的早期经历，以及导致毁灭性后果的交易：

“我习惯到处去弄不正当的钱。我们对汽车来个破窗而入并大干一场——我确实度过了一个弄立体声音响来卖的时期。我们经常这样做，为什么呢？我在离开学校前还好没有染上毒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讨厌无事可做。我没有工作——对不起，我有工作，但是两周后我丢掉了那份活。我们习惯到处弄音响，好的立体声音响，那东西能值500美国左右。我们只会把音响拿给我们那儿的毒品贩子，说‘拿去，给我们一份大麻烟’，或者是‘给我们两份大麻烟’，等等。我们习惯经常这样干。我们非常幸运，没有失手。被逮捕过几次，但是都逃脱了，从来没有被抓到。就那么一次，我在偷一本烹饪书的时候被逮住了。”

很明显，做黑市贩子是更好的主意。这个群体中至少有一个是贩子，他声称自己每周能借此获得300美国圆（就其特定的生活标准而言，数目看上去颇为可观；可以让他过上最好的一周）。

另外两个人可能从事数目较小的交易。他们并不看重毒品交易。那基本上是另外一种挣钱的方式，跟工作一样，偶尔为之。伴随政府禁毒攻势（1986年进行的一项打着军事头衔的国家运动，效仿美国反毒品运动）所展开的道德抨击与这三个人的行为完全不搭界。我们可以对二手家具贩子也来上一次攻势。

暴力和国家

这一群体对权力关系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暴力。对我这样一个躲在象牙塔中的学术观察者来说，他们的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暴力。在访谈中他们不断提到暴力：学校里的欺凌弱小和大打出手，殴打老师，和父母及兄弟姐妹对抗，在操场和集会上破口大骂，被捕，感化院和监狱里的斗殴，痛揍女人和同性恋男子，个人的打斗和舞刀弄枪。疯狂驾驶汽车、卡车或者摩托车是另一种形式的恫吓，至少有一个警察在后面追捕，设置路障，最终是严重的撞车事故。

帕特·文森特对暴力的记忆是从他的家庭开始的。他父亲经常痛打他，虽然他仍然害怕“老人的重揍”，但并不怨恨。他的大姐也用同样的方式待他：“如果你惹麻烦，我会揍扁你的脑袋”。也许是受到过这样粗暴的对待，帕特对教师采取挑衅的姿态，“给他们一堆（辱骂）”，从而疏远了他所喜欢的两位老师。最终他将一把椅子扔到教师身上，被学校开除。

根据他的说法，他和同伙一样充满暴力——大概12岁时，他在一所天主教中学度过的头一年里，每天都要打架。他感到学

校一点也不关心他，而他“想要做个人，被学校除名总比什么都不是要强”。“我不是无名鼠辈”。他甚至在男孩中获得了一些威信：“如果你在一次斗殴中获胜，那你就是一个英雄”。

但是这种威信是有限的。帕特似乎没有成为同龄群体的头目。他看上去也许太过暴力，尤其当同龄群体长大一些以后。打架的次数逐渐下降，最终他“丢掉了干仗的习惯”。现在也许他会回避打架，尤其是面对某个“能把你打出屎来”的家伙。但是在因为偷车被送到一所青少年管教所以后，他打了两次架，把对手“揍成熊样”，或许他想要借此树立危险人物的名声。

帕特·文森特，杰克·哈里和伊尔陈述了他们在类似时期对于斗殴的信念，在他们的关系网络中这显然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主题：正当的暴力是对的，如果是对方首先挑起事端，反击总是正当的。伊尔甚至把暴力草拟为法律：

“我反对不必要的暴力。暴力是愤怒的产物，谁把暴力招致到自己身上，他应承受它。”

这是一种伦理，是回应暴力的一种积极的责任。但是他们在对向妇女施加暴力上存在分歧。伊尔兴趣盎然地讲述他的飞车团伙如何摆脱一个自以为是的女人：

“人不多，也不是很少。有我的老婆，她的姐姐，另外两个小家伙都带着女朋友，这就是全部。你知道，所有人都被团伙接受。大多数人都能保持适度的安静。一个大嘴巴娘

子，一天晚上她挨揍了，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见过她。她把我的一个哥们烦得要死。他说，如果你还不闭上臭嘴，小心我抽你。她根本不放在眼里，那我哥们就不客气了。她对此勃然大怒，一个坏小子上来从那女人身后打我哥们，我们乘机甩掉了他们。”

这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群体里妇女不多。在美国的男性至上的飞车团伙中，也有类似对待妇女的记录。^①

然而，帕特·文森特不赞成这种行为。在他看来，“男人揍小鸡”，她们根本无力自卫，所以痛打女人的男子是“懦夫”，这个称谓表示极度的不赞赏。女性被假定无法在充满暴力的男性世界中抗争，而且女性参与身体之间的互殴也不合理。发生在家庭内的暴力行为，或者对女朋友和“事实上”的妻子的暴力，屡见不鲜。但这些事情根本不值得骄傲。

制度性权力和组织化的暴力以国家的形式结合起来了。在保罗·格雷的幼年记忆中，这种结合给人的感觉是压迫性的。他的家庭总是在圣诞节将孤儿院的男孩带回家，以共享快乐。有一次，当保罗六七岁的时候，他们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在树丛中隐藏着一个骑着摩托车身着制服的警察。他（这个孤儿）看到警察，用尽全部肺活量大喊：‘嗨，猪猡！’。我们被警察追随，后来我们溜进路旁一家供富人光顾的汽车旅馆——那警察笔直开过去了”。

^① 霍珀和摩尔 1990。

但是穷人可以成功地假冒富翁的机会不多，而国家的强制力量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通过学校这一形式与国家遭遇。这一遭遇所产生的驱动力将影响他们的一生，也会导致公共教育体系的失败。

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学校教育根本没有他们行使权力的机会。他们遭遇校方权威，把它当成外部力量，然后开始从反对校方权威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男性气质。在一些情况中（比如袭击老师）直接导致警方和法庭的干预。在其他情况中他们逃学，被开除或者说被学校“轰掉”，林利·沃克曾用这一术语来分析没有任何资历的工人阶级年轻女性。学校对待无权无势的青年经常采用这种手段，比如，米歇尔·法恩研究的纽约高中。^①

帕特·文森特，因为暴力行为，被两所学校开除，在10年级就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失业后，他开始吸毒，还因为父母不许他晚上外出而与他们争吵。他父亲是一个锻钎工，最后送他去做学徒（由于这是一项没有正式的学徒规定的职业，因而学徒可能是非正式的培训）。帕特对接下来的事情作了描述：

“干了多久？”

“七周。”

“发生了什么事？”

“我被抓起来，所以失业了。”

^① 沃克 1989，法恩 1991。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捕的？”

“撬车并且破窗而入，然后失手。”

“你被送到哪里？”

“阿尔法（青少年管教中心），我在那儿呆了一周半，然后逃跑了。后来我又被捕，去了贝塔（更保险的拘留所），在里面呆了四到五周，然后被送去做 CSO（社区服务，一项可供选择的判罚）。”

“那是因为你的年龄吗？”

“不，那是因为——我被抓过好几次，要面对 16 项指控……出走（越狱）按规定有 3 个月刑期（的判罚）……我要求去做社区服务，然后如愿以偿。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任何麻烦。一直呆在外头。”

这样简单的陈述包括了一年的经历，脱离管教和逃跑，两次被捕，违反保释条件，被监管，合法协议，以及在青少年犯罪司法体系和拘留所中受到的专业和社会习俗的速成教育。

帕特不恨警察。第一次被捕时，他正开着一辆偷来的汽车，他想：“糟糕，完蛋了！我想他们会杀了我”。但是警方并不像他想的那样严厉，拘留所的看管也是一样。他没有受到谣传的奸污或痛殴。他声称，在贝塔管教所“就像过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小妞”。实际上，这是面子问题——或者用简单的英语来讲，就是吹牛——为了表现刚毅。帕特常常如此，这是他的作风。他正在学习适度地表现男子汉气概。他马上就要过 18 岁生日了，从那以后他就得面对成人监狱，一个完全两样的世界。所以从那时

起他一直避免惹上麻烦。

但是，管教已经使帕特失去了一些东西。在拘留所里他给家里写了一封很伤感情的信，他母亲直到今天还不愿意和他说话。帕特的母亲是一个工厂工人，领取固定工资，协助工厂管理，而且可能（帕特没有说清楚）还是工会代表。她似乎一直在努力让孩子们走上正轨，还要让家庭免受饥寒之苦。帕特执迷不悟地与法律对抗，对家庭大发牢骚，还被学校开除，这都太令她失望。他大哥收留了他。

其他人的经历在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一致。杰克·哈里由青少年管教所走向监狱。马尔·沃尔顿因盗窃被捕，交保释金后被放出来。伊尔至少有过一次被捕，而后警察成为他那酒气熏天的聚会的常客。在失业者中，只有艾伦·鲁宾没有提到被捕或上法厅的事；他看上去最擅长谋略。在就业的人中，保罗·格雷和杰克·哈里有类似的经历，由于被指控吸毒而从青少年管教所走向监狱。

在阶级环境里，国家权力不是抽象的，它在青年人的生活中是实实在在的。虽然最初帕特·文森特是那样回应国家力量，但是国家权力不像同龄群体之间的暴力那样，是可以交换的。警察是街头政治的重要力量，不管一个人有多厉害，也不可能个人与国家进行正面交锋中全身而退。需要学习的策略就是——保罗·格雷的父母在高速公路上的即兴创作所印证的一个术语——逃避。因此男孩们会尽力躲避警察，从福利体系分一杯羹，以及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沦为懦夫的形象。

五个失业者全部认为国家在任何实质性方面都一无是处，但

是就业的那个群体中有一个人持不同见解。斯图尔特·哈代在离开学校来到城市以后，认为父母在需要职业资格上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主动去了一所技术专科学校，获得高等教育文凭，并且已经参加了第三期培训。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斯图尔特采取了利用教育体系，而不是与之对抗的态度。他的取向源自高中时期。斯图尔特曾经一度是“小恶棍”，但是他没有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在青春期中期，他与老师建立了更为和睦的关系。此后，斯图尔特就走上职业轨道，并且建构了以知识和审慎为本的非对抗性的男性气质。

男性被迫的异性恋

11岁的时候，帕特·文森特有了性意识；他现在认为那是“小孩的事情”。他不记得跟谁学过，似乎天生就会。他记得13岁的初次性交：“遇到一个小妞，分手时我什么都干了。以后我就一直这么干”。性似乎是随意的和容易的，一种可以随时得到的东西。性也是帕特自我形象的重要部分，而对艾伦·鲁宾来说显然次要得多，他模仿“你——这样——干过吗？——你——那样——干过吗？——你还是想——这样——干？”的腔调来嘲讽那些气喘吁吁的男孩，同时回忆起自己15岁的初次性交：

“你想听听我对它的看法？”

“是的。”

“那有什么呢！……结果就是让人厌烦。”

这只是少数人的看法。伊尔对性行为的热情与帕特如出一辙，虽然他的性行为开始得晚一些，是在17岁。他的初次性交是与一位年长的妇女进行的，她“教了我很多”。以后他开始了与同龄妇女的关系：

“我正在和一个小姐约会，后来她搬到伽马（另一个城市）去了。她住在那儿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互往来。后来我打算做一次旅行去看她，你知道，在那儿呆上一个月，看看她过得怎么样，等等。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现在的小姐。只是性伴侣，你知道。我就要去伽马的一周前，她来告诉我她怀孕了。本来我不过是想跟她玩玩的。我只好去了伽马，不打算回来。最终我还是回来了，我和伽马城的那个女人呆了两个月就分手了。因为孩子，我一直和现在的女友在一起”。

伊尔对妇女的敌视是不加掩饰的。他猛烈抨击他母亲，“她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她”；骂他父亲的新伴侣是“婊子”；骂他的岳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婊子”；还有他的妻子：

“不错，她是我老婆，不过，我最大的幸事就是能甩掉她，她应该滚蛋”

“为什么？”

“哦，我没办法跟她一块过。我为什么要跟她一块过呢，三年了，她总把我逼到绝境。”

“她做了什么？”

“哦……她说的话，她办事的方式，她做起事来总是笨得像猪……因为我没有带她出去逛，总是牢骚不断。”

为什么女性要容忍这样对待她们？毫无疑问，性行为中包含刺激和快感，但是关键在于缺乏可以选择的模式。盖尔·鲁宾的《义不容辞的异性爱》和安德里安娜·里奇的《强制性的异性爱》指出，文化和社会压力，使妇女成为男子的性工具，无论男性用什么方式去获取。还应该指出为这些生活史所印证的事实，即男性也受到强制性的异性爱的压力。^①

强制性异性爱甚至影响到他们和自己身体的关系。马尔·沃尔顿偶然学会了手淫，感觉好极了：

“那以后我开始经常手淫——实际上非常频繁。它使你着迷。确实如此。我在一本书里读到，如果你手淫很厉害，那是因为你的手比阴道要粗糙，而且你习惯它的粗糙。当你和一个姑娘干那事时就没有快感，你不会喜欢。

“在你身上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吗？”

“是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完全放弃了和女人做爱。现在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做。自从我发现和女人不行以后，就再也没有，就是这样。那会让我不正常。”

由此可以看出，男孩要经过规训才能成为异性恋者。其结果

^① 鲁宾 1975，里奇 1980。

就是，男人认为别人的躯体和自己的躯体别无两样。伊尔有一个朋友盖瑞，他“多少像一个兄弟……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一块蹲班房，一起颓废，一块去参加聚会”。一天晚上，伊尔侮辱了盖瑞的前女友，在一场醉醺醺的争吵之后，盖瑞差一点用点22径的来复枪杀死伊尔。但是在整顿男性性行为方面他们是同一阵线的：

我很难容忍同性恋……我和盖瑞，还有其他几个小伙子经常在克劳斯和其他地方痛打同性恋。（在悉尼，男同性恋的社会生活中心就在皇家克劳斯附近。）

由于他的大哥“变成同性恋”，伊尔在这条阵线上陷入困境。伊尔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讲述了他大哥控制一场反同性恋风波的技巧：

他的所有伙伴都是些时髦青年和雅反士，一堆同性恋。他来看我和妈妈。我的哥们都来了——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正常人。当周围都是我的朋友时，他在妈妈家里就像我在他那儿一样不知所措。但是他确实善于应付，他应付得很好。如果他不得势了，就会两边讨好。如果我的哥们没来，他就是正常的自我。而我的哥们来时他不会露出本来面目。因此，他们就不会为难他，他也不会挑衅，我和妈妈也落个清净。

这位兄长和伊尔一样，是在同一所具有好斗风气的学校里长大的，但是发育得更高大威猛：“如果我骂他一句，他就会抓起我痛揍一顿——真疼！”所以伊尔不再去皇家克劳斯。“只要他们不叫我看见，我就不会臭骂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最好别挡住我的路”。

这五个人承认的性行为都是与异性的。但是正如艾滋病预防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工人阶级在生活中也有成为同性恋的很大可能性。^① 保罗·格雷很早就印证了这种可能性，在小学里他就和一个男同学玩性游戏。他的初次性交和最初关系是和一个女孩，结果是拙劣的和不满的：“插入、拔出、插入、拔出、然后泄了，就那么回事儿”。而后他发现了一些地方，在那里男性匿名搞同性恋：

“后来我发现了卫生间，我看到墙壁上写着：性就是——卫生间。不错，这样我就发现了性的另一面。它还挺不赖的，我一直都很喜欢。但是干完了我就想溜，我可不想到处转悠，消磨整个晚上”。

他或许从中赚钱，这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和很多男性有关系，他却从来没有将自己定位于同性恋这一社会身份。因此他也不可能同性恋男性气质。最终他发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法，这将在下面讨论。

^① 康奈尔，戴维斯和多塞特 1993。

作为集体实践的男性气质

这些男性的生活环境是集体性的，但和单独生活差不多。这在伊尔关于他的摩托车兄弟会的讲述中可见端倪：

“它不是一个团伙。”

“你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群堕落天使？”

“不是，根本不是。但是我们聚会时像堕落天使。我们名声不好，你知道。只能偃旗息鼓地进行。我们习惯去搞周末赛车，白天的飞车，晚上的飞车，以及聚会，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每个人都吸毒，而且醉醺醺的？”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聚会。我们常常弄点毒品，像两克麻黄碱什么的放在碗里吸食。偶尔也会有人弄来一些海洛因或者类似的东西，我们把白粉放在华夫卷筒的顶部吸食，真傻。我租来的房子被弄得乱七八糟，完全毁掉了它。聚会太多了，每晚都有聚会。我常常溜出家，跟一个有工作的小伙子呆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和另外一个小伙子，以及几个马子在一起。后来我们被从住的地方赶出来，这样我们就搬到德尔塔路。那里也是夜夜笙歌。经常有人带酒或白粉来。是的，警察常常坐在我们门前，拿走我们的机车注册证。每个晚上都有20辆摩托车那样的东西停在我的房前，一周7天都是这样。那是真正的大聚会，因为那

时我们大多数都失业，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

聚会经常演变成暴力斗殴。我已经引用过伊尔他们在一次聚会时用武力对付一个“大嘴巴婊子”的描述。男性之间常常争吵。

暴力不是一种失控的精神失常的行为，而是由社会规定甚至操纵的举动。伊尔和他的同伴痛殴过于惹是生非的人，为的是在群体中保持良好气氛：

“人们在团体里相处得怎么样？”

“都很不错，一般来说关系是很美好的。你会遇上一些不速之客，这些家伙，张开臭嘴，使劲叫唤，瞎折腾。你得立马把他们给赶出去。其他时候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现在仍旧很好。”

大多数真实发生的暴力局限于群体内部，不会招致警方的干预。直接对外的暴力主要是象征性的，就像伊尔所说的那样：

“你们参加了很多斗殴吗？”

“根本不是这样，其实很少。大多数人也就是看上我们一眼就走开了。没有大的斗殴。个别胆子大的人跳出来，结果还是灰溜溜地滚回去。”

“那只是因为从纯粹的人数，或者是人们或者是……”

“不，我想这种事很多都是因为外表。对他们来说，我

们看上去不是好惹的，我们戴的耳坠，还有刺青，足以吓跑那些最厉害的狗杂碎。所以很多真刀真枪的干仗是在我们内部个人之间——合不来嘛，你知道。”

例外的斗殴是远征去痛揍同性恋，还有可能去打亚裔移民。

伊尔确切地指出他的团伙不是堕落天使，更不是考曼切诺斯或班迪多斯，这两个俱乐部卷入了在悉尼远郊米尔佩拿的1984年“父亲节大屠杀”。但是伊尔的团伙当然也是由“非法”摩托车团伙组成的同一网络中的一员。和美国一样，这些团伙是澳大利亚在战后几十年内兴起的。克里斯·坎恩宁和罗布·林奇跟踪研究这些团体和警方愈演愈烈的冲突，例如，在年度动乱中占据首位的巴瑟斯特摩托车赛引起的冲突。他们对激起这些冲突的国家权力的分析，和生活史的研究结果非常贴近。^①

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越来越认识到男性气质的集体维度，而且材料也支持这一点。当然，男性气质的形成也需要个人实践。伊尔戴着耳坠，脑后蓄着长发，双臂有文身，驾驶摩托车。在他自己看来，这不代表什么。基本上，群体才是男性气质的载体。在一个不同的群体中，伊尔会感到失落。他目前正在一所技术专科学校进修短期课程，他在那儿的经验也是证明环境重要性的一个范例。

“的确，我发现和女人交谈有相当困难，你知道，特别

^① 坎恩宁和林奇 1988；霍珀和摩尔论美国，1983。

是那些技术培训班上的女人。有件事我不愿意干，我不喜欢说错话，你知道，因为我什么也不懂……完全两样的一群小姐……经常让我不知所措。我送她和其他小姐（以及一个朋友）回家，其他人先到了，她是我去干活路上最后送到家的，我们会在车里呆上15分钟，不说一个字儿。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这是与他在感觉舒服的环境里找到“性伴侣”不同的事。

在其他个案，没有如此紧密联系的同龄群体。例如，帕特·文森特不骑摩托车，和朋友保持松散的联络。他和最好的朋友相处融洽，一起去冲浪，跑出去“搞恶作剧”，还花时间闲聊——虽然帕特认真地说明，“那不是一堆个人的事情”。他们之间似乎是一种仪式化的关系，其中存在一种可以接受的男性气质。帕特是一个厌恶同性恋的人（“应该给他们一顿好打”）。因此他和他的伙伴小心翼翼，不让他们的友谊变成同性恋的关系。

访谈表明这些青年在不同环境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性意识处于明显的紧张状态。一种性意识对女性轻佻诋毁，基本上把妇女当成可以随便使用的精子储容器，而另一种则以尊敬赞美眼光对待女性力量。有时这两种性意识共存于同一头脑之中。他们普遍患有同性恐惧症，但有例外。一些年轻男性轻易地步入了生活和养育的轨道。做父亲是可怕的，因为这意味着履行责任，但他们又渴望当父亲，尤其当婴儿是男孩的时候。对女朋友怀孕的担心——这些男孩从不责备自己的过失——与女友一起生活共同抚养小孩的实际愿望相互矛盾。我们原以为大多数受访者会仪式性

地谴责激进女性主义，可是他们竟然坦率地支持性别平等。例如，帕特·文森特不知道“女性主义运动”是什么；但是在访谈者解释之后，他表示衷心赞成：

“我认为女人应该拥有平等权利。我想她们会的。虽然周围有很多带有偏见的小伙子，他们说女人这也干不好，那也干不好。我想女人能够做我们所做的一切。”

性意识的紧张因人而异，与社会地位没有明显关系。集体性实践似乎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抗争性男性气质

现在转入个性层面，我将分析生活史中的情感模式。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此并无助益。如果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孩子与母亲的最初认同不大可能发生，但是我们也看不到孩子与父亲认同的清晰模式。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本来期望的男性气质在性别差异上的情感投入根本就不存在。

例如，杰克·哈里是一个有暴力史和犯罪前科的飞车族，如果他妻子能找到一份比他更好的工作，他对呆在家里照看小孩不会感到不舒服。他的几个同伴也是如此。他希望能受训干酒吧的工作。他对此情有独钟的原因是那儿是人们聚集的地方，可以结识人并聆听他们诉苦。显然这不是男子汉干的事，而是女性的工

作，即酒吧女招待的经典功能。

这里显现的是两者的联合，即明确的性别界线和（从中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在心理上对性别的明显冷漠。性别的差异局限于性和暴力，这两者直接是躯体的功能。杰克讨厌同性恋，害怕这个世界涌现比以前更多的男、女同性恋。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男性想成为女性（意味着变性手术），那么和男性发生性行为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同性恋方式是不行的。

杰克的性别差异的观点倒是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让我们较为详细地考查一下个人生活轨迹。

马尔·沃尔顿是受访者中惟一还没有出生就被父亲遗弃的孩子。直到最近以前，他还和母亲和祖母住在一起：

“谈谈在你母亲及祖母的照管下长大的生活。”

“艰难。”

“为什么？”

“两个女人——那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摸过我的屁股。我一直过的很开心，你知道，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有一个爸爸，你知道，他会踢我的屁股，说“你做错了”。这是因为我总是对着干。我曾踢过妈妈的屁股，说到，“不，我就想那样干”。

母亲让他尊重继父的权威，但是遭到绝拒。他只听祖母一个人的话。他母亲说，他在青春期早期是无法控制的，整晚在外和女孩子过夜。他在学校除了野蛮斗殴之外，没有任何成功之处。

马尔不念书，被当作破坏分子，并且做为差等生，被分在一个特殊班。他越来越逃学。一等到法律许可时，他还没有学会阅读就立即离开学校。这使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对劳动中介和雇主极力隐瞒他不会阅读的事实。

还是少年的时候，马尔就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离开学校以后他从事更为严重的盗窃以换取毒资。他在15岁时被捕，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释放，那以后他尽量远离法庭。在依靠救济漂泊了三年以后，他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干了不少临时的体力活，并且挣了一些“黑钱”。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摩托车和纹身。他骑摩托车飚车，发生一次撞车事故，受了重伤。他现在正和一个女朋友同居，是他离开母亲的家以后组建的第一个家庭。他因此而面临窘境，负债达2000美元。他正在想办法去找一个违法的工作来偿还债务。

对帕特·文森特，杰克·哈里，伊尔和保罗·格雷来说（一直到青春期中期），他们的性别实践基本上是一样的：暴力，反抗校方，未成年人犯罪，滥用毒品/酗酒，临时的重体力活，开摩托车或汽车，短暂的异性关系。他们的行为有狂乱和卖弄的成份。正如保罗·威利斯在他对英国飞车少年的个案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人表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男性气质。^①比如马尔不关注体育运动，他觉得那“很烦人”，帕特·文森特持同样的观点。伊尔不是这样——他的绰号来源于他在孩童时期是帕拉马塔橄榄球联盟的“鳗鲡队”的狂热支持者。

^① 威利斯 1978。

他们的性别实践与阿德勒所命名的“男性气质抗争”有很多共同之处。根据阿德勒的概念（在上面第一章讨论过），一种动机产生于孩童时期的无权经验，导致了他们对权力的过份要求，欧洲文化将这种过份要求赋予了男性气质。在这些年轻男性中间也存在对无权的回应，对性别权力地位的要求，以及压力之下的传统男性气质的过份张扬（痛打同性恋，疯狂飙车）。

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男青年对权力的过份要求来源于集体性实践而非出自个人内心。工人阶级的集体性实践，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和街头团伙的行为，显示出非常类似的模式。^① 这里似乎没有走向同一模式的任何标准的路径，除了贫穷和暴力氛围产生的紧张之外。通过这一环境中的互动，正在成长的男孩将紧张浮夸的外表集于一身，对权力提出要求，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获得权力的任何真实资源。

受访者对脸面很关心，他们做了许多工作维护自己的脸面。对于帕特里克·文森特，我感觉到一个虚假的自我体系，一种顺从环境要求的明显僵硬的人格，在那后面根本没有形成任何个性。他让我恐惧。伊尔和马尔·沃尔顿都谈到如果他们有一点积蓄，就要参加大规模狂欢。伊尔对他自己感到恐惧：

“在两个月里面我花掉了3000美国，都用在吸毒上。真是糟糕，浪费了两个月。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喜欢那样吗？”

^① 梅塞施密特 1993，第四章。

“我喜欢，是的，我仍旧会喜欢，但是我不会在这种事上越陷越深。”

“为什么要改变？”

“在这两个月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的变化。脾气真的暴躁极了。还有心情——要是有一字是假的，我立马掉到深渊里去。在房子里揍人和扔东西，砸墙壁，乱戳，打烂窗子和日常用品，就这样……。”

这一意义上的抗争性男性气质并不是简单的、因循老套的男性角色。它表现在以下方面：对妇女的尊重和关心（马尔·沃尔顿——与伊尔的厌恶妇女截然相反），对性别的平等主义观点（帕特·文森特），对小孩的关心（杰克·哈里），以及一种从传统的角色定位来看绝对是女性才有的虚荣心。马尔·沃尔顿就是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他的身体用纹身来装饰。就像对时髦服装的喜爱那样，纹身是他倾心计划了几年才实现的。

其他生活轨迹

艾伦·鲁宾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脱离了控制，开始逃学，并于15岁离开学校。他和刚才讨论的那些男性处在同一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但是他建构了懒散、揶揄、机智的“吉普赛人的”（他的原话）个人风格。他严厉批评“小痞子”和“粗鲁的澳大利亚人”，而对同性恋没有任何不满。我想，他已经很清楚抗争性男性气质，并且自觉的与之保持距离。

斯图尔特·哈代被中断的教育过程已经大致描述过了。他父亲是一个“斗士”，除了斯图尔特到酒馆里向他要钱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斯图尔特和母亲更亲近，但是也和她对抗。当父亲喝醉的时候，斯图尔特会和他顶撞。

斯图尔特发现呆在家里毫无价值，于是找了一个在社会和地理上完全不同的地方去构筑自己的生活。他曾一度染指学校那些粗暴团伙的好战风格，随后便与之保持距离。接着，宗教给了他一条出路。在两个年轻妇女的帮助下，他加入原教旨主义教派。数年间他将精力完全投入宗教，与那些粗鲁的同学彻底分手了。他最终去了大城市。在那里他得到一份白领工作，丢掉了宗教信仰，迷上了计算机，进入技术专科学校，目前正在准备进入综合性大学。他和一个比他小6岁但性经验更老到的女孩交往。但是女友伙伴的世故练达令他困窘，他很忧郁的想知道她们都在他背后说些什么。

保罗·格雷和丹尼·泰勒最开始也是十分靠近抗争性男性气质的轨迹。保罗以其家庭暴力、盗窃、进入青少年管教所和监狱而做好了进入这条轨迹的准备。丹尼的男性气质中包含的传统更多一些，和“足球疯子”兄弟以及父亲相处融洽。他们就像斯图尔特·哈代那样，离开了这一轨迹，但是更彻底，这表现在他们试图否定支配性男性气质，并完全摆脱它的束缚。丹尼的道路将在第五章中讨论，所以我在这里说得简单一点。他重新和母亲和好，后来他深深陷入一场失败的恋爱中，为了治愈心理创伤，他参与了“绿色”政治。一个环境保护组织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尝试在个人层面上接受女性主义对男性厌女症的批评。

保罗·格雷的道路更令人惊讶。他的早早退学，卷入未成年犯罪，被捕和拘留，对母亲和姐姐的好战风格，以及和一个女孩的初次性交，都与杰克·哈里，帕特里克·文森特和马尔·沃尔顿的经历非常相似。不过保罗也在同性恋聚集地邂逅了同性恋者。在青春期后期，他处在同性恋世界的边缘、暗地里男扮女装的同时，也怀念异性恋关系。他环游了澳大利亚，因持有毒品在监狱服刑时差一点被人鸡奸；最终他还是和一个妇女建立了关系，他们一起过了两年后，他出国旅行去了。

回到澳大利亚以后，保罗开始正式的男扮女装，并且现在正尽力像一个女人那样生活。正如他所说的，这样使他解决了“混乱”。男扮女装使他从“紧张”中得到解脱，但是非常明显，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巨大努力：

“你还出入公众场合吗？”

“是的，在最近的一年半，是这样，我出去的时候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女人。”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喔，是的，因为不一样，我变得更加警惕我周围的人。这还是很难做下去。但这就是迫使我这么做的原因。而且我有一条规矩，就是一旦走出前门，就不再回头，直到成功，黑夜过去。是的，不过我的意思是，我主要是去同性恋酒吧和那种地方。我看过很多电影，去过很多餐馆和那样的地方。我的大多数朋友，绝大多数，都知道这个事儿。跟我一块工作的一个家伙差不多是上周才知道的，告诉他的时候真

是太好笑了。

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即使他不是做的太过火（很少有男扮女装者这样做），也会冒身体和社会的风险。进一步说，如果他的伙伴不接受他那样做的话，就会毁掉他们的长期关系。

心理学将易装癖和易性癖视为病态综合症，与患者幼年成长过程中某些反常行为有关。^① 保罗·格雷肯定有一个冷漠的父亲。但是这一群体中其他半数人也是如此。他幼年所处的环境是相当正常的。在青春期中期，他并没有认同女性核心身份，而是忙于暴力冲突、不太严重的犯罪以及同女孩做爱。传统的有关性别的精神病理学遗漏了结构问题和这类经历中的媒介。保罗生活中的矛盾关系和情感是很难预先确定的。保罗将结果做为实践来建构，因此他就不得不继续建构并不断为此付出代价。

不同的男性气质和性别政治

生活史显示，即使起点基本一样，运动轨迹也会不同。受访者的男性气质分别为第三章定义的两类型。抗争性男性气质属于边缘的男性气质，具有抗争性男性气质的人在社会中基本上承袭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主要部分，并将其在贫困环境中重构。斯图尔特·哈代和艾伦·鲁宾以不同的方式建构了共谋性男性气质，他们与直接的权力宣泄保持距离，但是接受了性别特权。

^① 斯托勒 1968；参照上面第一章的评论。

丹尼·泰勒和保罗·格雷拒绝接受这一特权。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没有直接去做变性手术。他不愿做“手术”；只想在日常生活中“像一个女人那样活着”。他走的首先是一条脱离男性气质的路径。在这一点上——虽然在外表上有明显的不同——与丹尼摆脱男性意识的努力在逻辑上是非常相似性。这两例个案打破了男性气质分类的界线。我们不能用男性气质的类型来界定他们的个性，但是在男性气质政治的意义上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所做所为。

性别主要形成于和环境斗争的能动过程，以及在该环境中建构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的政治特性，是造成这些年青年人形态各异的关键因素。

他们的男性气质都是由阶级剥夺这一事实所形塑的。他们出生于贫困家庭，没有机会可以获得文化或经济资源，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建构了性别。飙车党对“正经人物”的愤怒是一种阶级仇恨和男性集体力量的展示。斯图尔特·哈代对抗争性男性气质的拒斥是与他艰苦获得的社会地位升迁密切相关的，他创造的阶级实践力图在教育、宗教和就业上获得优势。

艾伦·鲁宾没有参与抗争性男性气质的宣泄，比起那些飞车党，他更憎恶传统和权威。他把政治和经济体系形容为“彻底的腐败”，还将宗教视为“迷信的崇拜”。他痛斥“塑料人”，即那些昏昏噩噩只是“活着”的人。艾伦拒绝在“从我认为白痴的人那里接受工作指令”的地方工作，并反对为那些百万富翁赚钱。他的报复原则——“谁叫我难受，我就叫他难受”——作为阶级宣言，显示了相当的深度。不过艾伦在实践中并没有反抗。

在一部经典的研究著作中，理查德·森尼特和乔纳森·科布揭示了美国男性的“阶级暗伤”。^① 这里也有大量的阶级暗伤，即：有限的选择及被限制的实践，还有阶级仇恨。

尽管在教育上获得了深造，斯图尔特·哈代仍然憎恶同性恋和妇女。在现实生活的异性关系中，他对待妇女的方式是操纵性的。他对女性主义的反应是冗长混乱的，并且基本上是憎恶的。与帕特·文森特及杰克·哈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妻子的收入可以比丈夫多的观点持有传统的敌意，因为这会伤及他的自尊。

虽然他们也想获得男性优势地位带来的利益，但是斯图尔特和艾伦也不在意付出自己的全部。他们退出了身体对抗、感情用事以及同龄人的生活。他们藐视那些本地的“没有教养的澳大利亚男人”和“一些杂种”——就像伊尔和帕特里克那样的人——在性别政治中干的龌龊不堪的事。

因此，虽然艾伦和斯图尔特真诚地和支配性男性气质保持距离，但是也很难说他们参与了抵制。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男性气质是男权制集体中的一员。的确，因为像他们这样的男性在维护男权制方面付出的较少，所以，与持抗争姿态的男性相比，他们的实践更不可能对抗和改革男权制。

在边际的阶级环境中，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力占有欲由于经济和文化的不不断衰弱而减退，于是抗争性男性气质就在那儿发展起来了。虽然，马尔·沃尔顿身体强壮，纹身吓人，但他不会阅读。伊尔可能是他的同伴中最强硬的刺儿头，但是作为制度化身

^① 森尼特和科布 1973。

的警方比他们都加在一起还要强硬，他们明白这一点。

由于阶级环境和实践（例如，在学校里）的原因，这些男性失去了大部分男权制带来的利益。例如，他们失去了以下好处：在工作中自然而然的超过妇女的收入，更好的晋升机会，更好的工种。如果他们接受这一损失，他们就在接受自己被剥夺的正当性。如果他们想采取直接行动使双方都不受损失，那么国家权力就会挡住他们的去路。

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办法就是将各种男人的境遇都展示出来，包括那些处于边际和进退维谷的男人境遇，并说明它们的原因。在个人层面上，解决办法就要依靠男人的自尊和可信度。这一定会保护传统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例如已经提到过的杰克·哈里，他不在意他的女人比他挣更多的钱。但是如果把别人的孩子硬塞给他说是他亲生的，或者是他的女人红杏出墙，他会非常生气。他注重的是做一名可信的报仇的人，通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免受伤害。访谈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他的原则是：“他们要是插我一刀，我也会插他们一刀”。

在群体层面上，男性气质的集体性实践也成为表演。伊尔的聚会有目击证人——沉默的女性和屋外的警察，正像飞车党出去飙车也有目击证人——正经人一样。无论剧本如何，人们不得不承认演出是一部演技和场景都很到位的小制作。

问题在于这样的表演不管在那里，都没有什么用。他们差不多都一样，五人中没有一个人对个人或对共享的未来想得更多一些。伊尔正在研读计算机方面的短期课程，并希望能在上面有所作为，不过幻想很快破灭了：

“我没有认真想过将来，我只是按部就班，一天天的过。我希望最终有一天我能够成为计算机系统分析员。如果这次培训的东西都学到手，那以后就设法开个头，首先成为一个操作员，然后是程序员，最后是系统分析员。不这样，我40岁的时候就完了。”

“从何做起？”

“不知道。不过，过把瘾就死之类的事儿……我喜欢我的摩托车。我要一直骑摩托车骑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将死在摩托车上。我不打算停止聚会。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吗？这叫做塔法里教。我是这一教派的信徒。”

这些评论并不像听上去那样随意。死亡，尤其是死于摩托车，是国际摩托车文化的一个大问题。^①

与伊尔生动有趣的访谈相比，对帕特·文森特和马尔·沃尔顿的访谈就逊色了。谈话总是停留在他们可能传给下一代什么东西上面。帕特幻想生一个男孩，他的培养方式就是教会他拳击和进行力量训练，这样，男孩在18岁之前，就可以把胆敢抬杠的任何人揍个半死。马尔也想要个男孩来继承他的姓氏，女孩也可以（“因为你可以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希望这个男孩能完成他办不到的事。他也要传授自己最有价值的知识。以下就是他最有价值的知识：

^① 康登 1975，威利斯 1978。

“如果他想要抽白粉，可以，只要他跟我一块抽。如果我不抽，他也要在我身旁抽。其实我不喜欢，我不希望他真的沾上毒品——像有些人那样，弄来可卡因，然后用玻璃碎片来切它，有一些人是那么干的，然后不用过滤就静脉注射，那他会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我希望他到我这儿来，说，‘看，爸爸，我想试试白粉’或者是‘我想抽点大麻’，或者是‘我想喝酒’。只要他在我身边做那些事，我知道就行，我知道他晓得他在干什么和滋味如何就行。”

抗争性男性气质看上去就像走入了死胡同。它当然是对环境的能动回应，而且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伦理规范之上的。但正是这种团结使这一群体和工人阶级的其他分子分道扬镳了。男性权威丧失了经济基础就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分裂——平等主义和憎恶妇女——而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方向。

丹尼·泰勒和保罗·格雷远离了支配性男性气质，他们的人生轨迹和飙车族的一样富于戏剧性。所不同的是，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丹尼通过个人的探索直接否定支配性男性气质，重新营造了单纯而非两种男性气质混合的自我。

保罗甚至更加沉溺于自我之中。他刚刚尝试了男扮女装去上班，现在又为这样出去探亲访友而忐忑不安。他正打算身着女装出现在公共场所，以便探究像女性那样生活对他的性别生活意味着什么，并且重新解释他的过去。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变性者，^①

^① 例如，像博林 1988 的群体研究中定义的那样。

而且没有发表经典的声明：他是一个“真实的女人”。在他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分裂了——不是彻底的——他的男性气质感。他至多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在建构中的女人，而且男性形象和具备男性生殖器的女性形象在他对未来的幻想中互相抵触。然而，在改变男性气质的工作完全个性化之后这一矛盾解决了。

飙车族衰落了，而保罗的性别实践却详细阐述了性别的文化维度。过去几年中，保罗在性别关系中的多元定位存在一些很难具体化的、隐含的政治可能性。性别政治似乎要把表达或体现性别的领域变得更复杂、更多彩，而不是缩小它。

丹尼的环保激进主义或是保罗的高跟鞋都不可能是工人阶级青年发动大规模运动的前兆。具有更宽广前景的社会条件被抗争性男性气质掩盖了，但是出现在失业男性的生活史中。这些条件是：支撑平等家庭的经济逻辑，对女性力量的个人体验，以及一些男性对孩子的兴趣（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体验过父爱）。它们显示了存在于家庭之内的性别平等，这是与街头和聚会场景中展示的阳刚之气完全不同的。

这里存在一些引人入胜的、也许非常重要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能否实现，依赖于对工人阶级男性所表现出来的性别问题的更加明确的政治性回应。就像北美钢铁工人联合会（加拿大）和建筑工人总会（澳大利亚）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回应可能来自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工会。^①但是在一个工联主义式微的时代，在绝大多数斗争都是为了保护就业的情况下，很难出现更广泛的回应。

^① 科尔曼，勒克斯顿，利文斯通和塞科姆 1993，伯格曼 1980。

5. 全新的世界

本章将讨论完全不同于抗争性男性气质的一种气质类型。这种类型的人试图矫正他们的男性气质，其原因部分源于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他们正是那些被神话诗般的男性举止和其他男性气质的复兴运动者们所藐视的“懦弱”男性。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他们的矫正之路十分艰难，他们的故事也很有趣，远不是懦弱的人。

第四章指出了从同一环境中产生的性别理论的分歧。由于各家理论所关注的男性的性别历程基本上是类似的，所以本章将仅分析一种理论。但我们将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并对这一理论的内部矛盾投以更多的关注。

首先必须讲述与女性主义遭遇的背景。正如在美国，澳大利亚的一种反文化运动紧随学生运动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场回归土地的运动创建了遍布东部州邦的农村社区和反文化家庭网络。然而反文化运动的主体仍在城市。

7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激进主义的衰落，反文化生活的重心转向反省和人际关系。80年代早期出现了致力于个人成长和康复的一种发展得很好的治疗方法。在素食主义和整体论哲学思想

的影响下，反省与关注自然联系起来了^①。

同时，关注环保问题的新激进主义正在发展。反对开采铀矿的运动、地球的朋友、绿色和平组织及各种特定的运动群体成为青年激进主义的传播媒介。他们激励已创建的群体如澳大利亚保护基金会采取更富于战斗性的行动。到80年代早期这场运动变得如此强大，足以长期封锁塔斯马尼亚州偏僻的富兰克林河上的大坝水电厂。此次高度公开化且极为普及的保护荒芜土地的行动帮助打败了参加1983年竞选的保守的联邦政府^②。

20世纪60年代末发端于校园激进主义的一场女性解放运动产生了，取代了已创建的女性组织，并在规模和可见度上飞快发展。到1975年的国际妇女年，新的女性主义成为媒体关注的主题。7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在女性服务业，官僚机构，学术生活，学生之间及反文化运动中得到强化^③。

女性主义对80年代早期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是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派别在全世界出现，与批评破坏性发展的绿色思潮产生了共鸣。她们与参加环保行动的男性产生了一些冲突，然而许多男性都接纳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在澳大利亚政治中，这是女性主义施加影响最成功的领域。参与环保的男性无论他们的个人历史如何，都无法回避女性主义界定的性别政治。

① 澳大利亚反文化背景见史密斯和罗斯利 1975。

② 富兰克林大坝行动的资料见《荒野社会》1983。澳大利亚环境保护运动见赫顿 1987；有关策略和农村现实的出色研究见沃森 1990。

③ 运动的历史见柯瑟伊斯 1988。

本章讨论的六位男性都卷入了环境保护运动，其中多数有反文化运动的丰富经历。他们是：巴里·瑞安，22岁，实习护士；丹尼·泰勒，23岁，环保行动群体的工作人员；比尔·林德曼，28岁，不定期受雇的摄影师；奈杰尔·罗伯茨31岁，失业者；蒂姆·马尼耶，33岁，公务员；彼得·格迪斯，50岁，不定期受雇的记者。

所有人都是异性恋者，两人有小孩，都是城市背景。但由于他们的环保或反文化的政治活动，多数曾在农场或丛林中生活过一段时期。其中三人直接卷入了富兰克林大坝行动。六个人都参加了本国其他地方的环境保护运动，如雨林保护行动。

结合环节

我们从男人对初期的回忆和对家庭关系的描述中了解到他们常规的童年经历。在所有六人的情况中，主要的抚育工作都是母亲做的。其中五人的母亲在男孩还小时都是全日制的家庭主妇。因此，他们对母亲的前俄狄浦斯认同比第四章讨论的大多数男性更为明显，这无疑反映了他们中的多数家庭生活较宽裕。

女性主义的客体-关系理论（第一章）警告我们注意强迫分离母子关系对儿童产生的压力，这些压力可在这一群体多数人的童年回忆中发现，常常直接与父亲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发现对强有力的、冷漠的父亲认同的一种典型的后俄狄浦斯模式。巴里是其中与父亲最具认同性的人，蒂姆其次。两人的父亲都是专业人员，具有公认的社会权威，他们的儿子在介绍他们时多少有

些冷漠。但即使如此，认同也不能决定一切。当巴里 12 岁时，他的父母分开了。不同于他的哥哥姐姐们，巴里选择了与父亲生活，而不是与母亲，这表明环境因素影响俄狄浦斯欲望的趋势，是认同的基础。

其他人的生活显示，我们必须超越母亲、父亲和儿子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这一狭窄范畴。在小男孩的视野范围内父亲不是惟一的男性气质拥有者。事实上在某些家庭结构中，父亲可能不如哥哥显著。丹尼的兄长就是照顾他，教他性知识的人，他是丹尼童年后期和青少年早期的“最好朋友”。“我们一起出门，所有时间都在一起玩耍，我们曾拥有同一间房子，共同分享很多东西。”所以他的兄长成为他发展男性气质的榜样。因为他的兄长是一位足球明星，所以他们那位“足球狂”父亲就鼓吹支配性男性气质。于是丹尼也开始玩足球。

从表面上看，这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社会再生产的两种形式：父亲传给儿子，哥哥传给弟弟。这些事件在精神分析术语中可能被解读为认同，或在性角色术语中是成功的社会学习。但这些解读方式过于机械化了。人们在对所提供的东西会积极地占有，有目的地构建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

我将把这种占有界定为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结合环节，此刻，男孩将支配性男性气质视为己有而开始实施。这一环节在六人的生活史中都出现过。所以说这些男性没有哪一个生来就是女性主义者。每个人都采取了发展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实质性行动。在他们的生活史中，都出现了竞争、职业取向、情感压抑和同性恐惧症这些熟悉的内容。

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男性气质的身体感觉对社会过程至关重要。因为身体感觉的存在，结合环节的关键部分才能形成身体的一种特定体验和一种特定的生理敏感性。巴里现在正在接受护士培训，他说他开始尊重“女性”特征如敏感性、表现性和关心他人，并开始排斥他在学校接受的“男性气质”教育。但同时：

我仍然是真正的男性，我明确感觉到自己的男性特征，我也喜欢它。我喜欢男性的某些方面，肉体的力量是我真正所喜欢的，我实在是很喜欢我的身体；喜欢男性通过学习拥有的那种精神力量，借此他们能选择在一段时间内撇开他们的感情，这真是妙极了。

男性化的过程扩展到感性认知和性。它将界定女性为他者的身体体验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并且将欲望塑造为对他者的欲望，从而第四章讨论的强制性异性恋在身体体验的层次上作为知觉的一种方式 and 一种感知能力而形成，（例如性觉醒仅是对女性的回应）。我称这种模式为“异性恋敏感性”，虽不得体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男性的异性恋敏感性可表示为建构女性气质的社会实践内的知觉的对立面。这可由巴里意识到自己是男护士而得到证明。对于男性更普遍的是，异性恋敏感性是建构男性气质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它与身体的男性体验紧密结合，是人们感觉异性恋是自然的主要原因。

到了青春期，异性恋的建构是通过集体实践，一般是在同龄群体中进行的。在青年研究中这是常见的，无需过多的评论。彼得·格迪斯嘲弄地回忆了澳大利亚男性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技巧：

当十多岁时，你出去喝醉了以至于你感觉不到害怕、羞涩或紧张。你抓住任何，事实上是任何女孩，特别是最漂亮的女孩，但如果没有找到漂亮女孩也无妨，只要是愿意性交的女孩就行……我少年时代的性生活和大部分已婚生活都是如此：在我通常酩酊大醉的地方，我达到目的，获得性高潮……我说“谢谢你，很愉快，晚安”，然后回到家倒头便睡。

他们的家庭和同龄群体为男孩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结合和它的欲望构建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疏 远

然而同样的关系充满了张力，可能将青年人引导到其他方向。例如，丹尼·泰勒进入成年的途径并不像开始时那样顺利。这一点可以从他试图仿效他的哥哥和男性气质得到证明。

他踢足球为了给父亲留下好的印象，但这一举动没有起作用。哥哥和父亲的关系太紧密了。丹尼强烈嫉妒哥哥，开始憎恨他对自己的统治。他转向母亲，她留意所发生的一切并给予他特别“亲爱的关注”。当他到青春期的中期时——丹尼精确的注明

是15岁时——情感联系已被重新形构，家人分成派系，关系紧张：

仅仅几个月前，我和哥哥发生了争论，他说——不过是突然的，与此无关——“哦，妈妈认为你的屁眼都好得不行”。所有那些情感都涌上心头。我们有了裂缝，父亲和哥哥与母亲和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母亲和哥哥间有着真正的痛苦……父亲和我的关系是可怕的。我过去常常抱怨他，如果他攻击我母亲或对母亲生气，那么我就会认为他也是冲着我的。而且，如果父亲挑剔我任何事情——有时也许是合理的——母亲也会冲过来保护我。

看来，男孩与母亲的俄狄浦斯分离可以重新考虑，在分离以后的实践中，母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会再度亲合。这不是一种表面的改变。丹尼将他与母亲这种重修的团结发展为同其他女性的团结甚至是认同。丹尼的生活史强烈暗示他青春期时的家庭关系的重新形构是他成年早期持不同性别政见的情感基础。

这种与男性的疏远在其他人的生活中也能发现，即使不那么引人注目。比尔·林德曼对父亲相当亲切但却可怜他。在谈及父亲“悲惨的”生活历程时，比尔说“花35年时间赚钱从而耗尽了整个一生”。奈杰尔·罗伯茨对他父亲更尖刻，把父亲描述为“从未成为一个男人”的无力的、失败的人。虽然——做为学生积极分子，奈杰尔曾与警察搏斗，抗拒逮捕，但他维持不了这样好斗的性格。事实上，他形容自己不是硬派男子汉，在青春期后

阶段无法与女孩建立关系，但又不知道其他表现自己的方式。

这些当事人都未主动转向男性气质的其他类型，他们对其他类型的男性气质持否定态度，起码是在可接受的性别框架内的疏远态度。奈杰尔·罗伯茨说他父亲不具有男子气概，这种抱怨就是充分的证据。

但性别秩序本身是矛盾的，实践经验可能会破坏男权制的传统。六人中有五人描述了在他们的个体形成过程中与女性力量密切的接触。例如，彼得·格迪斯的父亲在二战后无法适应，他似乎被妻子抛弃了。彼得憎恨母亲的势利但又承认她是家庭的力量。奈杰尔·罗伯茨离开学校后不知所措，只能依附于女友，逡巡于乡村反文化运动之中。当他们后来遇到女性主义时，体现妇女力量的女性主义形象能引起他们自己经历中的某种共鸣。

环境保护运动

这六人从不同的途径走向了绿色政治。奈杰尔·罗伯茨的环保激进主义是他早期激进主义的一个方面。对彼得·格迪斯而言，绿色政治是长期冒险旅行的终结，旅行始于他在新闻业的职业危机。对于比尔·林德曼来说，对环境的兴趣源于他的家庭爱好丛林和节假日野营的实践。

蒂姆·马尼耶是从管理而不是运动方面知晓环保问题的，他的家庭成员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进步自由主义分子，他与一群女性主义妇女同住一集体户。他“受够了开计程车，多半是在夜晚载着大醉的男人”的生活。一位朋友提供了他一份在环

保研究机构的兼职工作，后来变成了全日制工作，这工作现在已“改变了我的生活”。

丹尼·泰勒是在性生活发生危机后寻求治疗时把环保问题当做研究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就巴里·瑞安而言，像比尔·林德曼一样，环境保护主义的同情心可能是家庭和社会中进步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当加入富兰克林河流行动的机会到来时，他正与一位男性朋友骑摩托车漫游澳大利亚，于是就参加了。

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男性们发现了人际关系和文化理想的有效结合。绿色政治在多个层次上参与了他们的生活并迎合了他们多种需求：与他人的团结，精神上的明确性，个人价值意识。这种参与对性别政治的产生是重要的。可以说，这一运动对参与者的情感生活起了杠杆作用。

从巴里·瑞安对自己入社的描述中可看出此点：

我们到处旅行，在塔斯马尼亚州停下了。富兰克林河流那儿正在实行封锁。我正好去那儿几周；我到达时发现那里所有的人关系极好，很愉快，还做某些有价值的事情，也学会了許多。我想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能错过。所以就留在那儿了……

我在塔斯马尼亚州停留了六个月。花了大量时间在丛林中拍摄大坝工程，参与了一点封锁活动（如与大坝的建筑工人和运输机对抗），和办公室的工作，真是妙极了。这是我生活中的最好时光……

我发现了在团体中工作和拥有关系的某种真正好的方

式。我在那儿和女性有了第一次关系，我想这是有价值的……真正好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她们是具有相当自我意识的人，并很自信——你不得不卷入某些类似的关系中——她们大多数人也比我年长……六个月过后，我与女性有了某种真正好的友谊和性关系。我开始觉察到了我多数的友谊实际上是和女性建立的，我和男性建立友谊的兴趣差一些。

当然其他形式的政治激进主义也含有情感，并满足了一系列的个人需求。然而环境保护运动是以下列方式做到的：通过它自己的时代思潮和组织实践对支配性男性气质提出挑战。

这一挑战在访谈中隐含在环保运动的几种意识形态中：

(1) 实践和平等的意识 运动的共识包括这些原则：没有人应该是老板；工作场所民主地运行；没有那个群体有高于其他群体的权利；决定须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尖锐的批判等级制度和权威主义。

(2) 强调集体主义和团结 巴里·瑞安称富兰克林河的“群体内工作是好方式”不是偶然的。比尔·林德曼回忆了它们形成的过程：

我是非暴力车间的一个训练员，也就是我要在小群体中对人做大量工作。真是好极了，工作需要与众多的人建立关系，与人交往的感觉很好……很快就创造了一类我们需要的车间，并且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学习。在那儿工作没有名利。我们阅读所有来自州邦的甘地书籍和为建立新社会而奋斗

斗的书籍，我们把这看成基础。但我们必须适应和发展与他人工作的方式方法，帮助人们以个体或群体为环境，为封锁而有效地斗争。

(3) 个人成长的实践和意识 所有这六人都把参与环保政治看做是他们成长为更好、更明智的人的一部分。对于彼得·格迪斯和丹尼·泰勒，寻求个人发展是主要的，环境保护观念是随之而产生的。范围较广泛的反文化运动提供了沉思和个人发展的方法。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被比尔·林德曼称为“营造社会关系”，它通过相互批判和尝试来改革现存性关系、友谊和工作关系。这种环境保护激进主义创立的方法还融合了有利于个人成长的群体治疗和研讨会。

(4) 有机整体的意识 这种意识在反文化运动中很普遍，以批判异化的和机械的西方文明为特点。对于环境保护者而言，它强调和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彼得·格迪斯和比尔·林德曼，在丛林中生活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种直觉的体验。正如比尔·林德曼所说的：

孤独的体验，流浪的体验，做事情的体验，鉴赏事物的体验和享受美好地方的体验能真正给予我一种令人愉快的清新、纯洁的感觉。

药物是惟一使这种体验黯然失色的东西。虽然这些男性都使用过作用于精神的药物，但大多数已经放弃了。饮食是与自然关

系的重要部分。彼得·格迪斯创建了一家健康食品店；丹尼肯定是素食主义者，其他人可能也是。

即使没有女性主义，绿色政治和文化的这些意识形态至少在观念层次上将支配性男性气质提出某种挑战。专制受到来自平等和参与性民主的意识的抗争。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受到集体工作方式的对抗。有机的意识不一定是反性别主义的，许多反文化妇女可以证实这一点，她们被定义为大地之母，负责照看婴孩和洗涤工作。对个人成长的强调会冲破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防御，尤其是它对情感的牢牢控制。

因此环境保护运动是滋生男性气质政治的沃土。但它没有提出性别问题，也没有独立的产生一门明确的男性气质政治。那需要女性主义的影响。

遭遇女性主义

这六个人中的大多数在反文化或环保行动群体中初次直接的与女性主义遭遇。巴里·瑞安例外。他从女性主义的母亲和学校反性别歧视的课程那里学到了性别政治，这制约了他分享青春期间同龄人的男性气质。即使如此，他参与女性主义实践也是环保政治起了关键作用。

假如一个人本来就具备支配性男性气质，他与女性主义的遭遇必定是紧张的。巴里·瑞安回忆了他阅读女性主义书籍的情景：

大学后我就能读懂学术性的文学作品，我读了一些大部

头，这使我在长时期内对生为男性而感到恐怖。我记得我发现身为男性真的很艰难因为存在那些矛盾的需求。我需要性，需要与女人的关系，那么我就需要抛弃我的理想（也就是欲望）以及我自己的性别歧视，我无法调和这些，所以我承受了许许多多的罪恶感。

罪恶感起了关键作用。巴里因此站在了女性主义一边控诉男性的罪恶。他所学的性别政治以“性别歧视”为中心，通过它，他了解了男性对女性的个人态度。为了响应女性主义，他要改变他的思想，采取对女性更为支持的态度并批评其他男性的态度。

巴里的女性主义观点受到这一群体内其他男性的广泛赞同。例如，比尔·林德曼谈到女性主义妇女“感觉到她们自身的力量”，从而变得“坚强、独立、积极”。这6个人对女性主义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与其他群体形成对比。然而他们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是有限的。

这一点从奈杰尔·罗伯茨描述他的女性主义经历可以证明。他回忆直到他开始同一位女性主义妇女生活时，女性主义才变得非常真实。

以前我阅读过一点书，进行了思考，对女性主义有所了解。作为人类，女人与男人不同并有缺陷，这种认识在逻辑上似乎是不合理的，毫无意义。所以凯瑟和我做了像交换角色一类的事情——她出去长时间工作而我呆在家里……我做所有家务活，事实上我喜欢做这些。因而我在实践的层次上

认识了女性主义。通过与人交谈，通过共识就了解到了它。你知道的，我从不接受社会规范性的规则，所以我不必同它们抗争……我通过实践而不是阅读有关读物认识了女性主义，这可能使它更为真实得多，也更为中肯得多。就我而言与女性主义接触是一个大的转变因为它使我认识到生活在另一面。我没有体验过或没考虑过女性的生活，（这涉及）为他人做贡献，照顾他人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一段是男性对女性主义和性别政治典型的谈论。他们着重于期望和态度，个人风格和面对面的互动，极少注意经济不平等和制度化的男权制，或极少把女性主义看做是一场政治运动。

分离环节

就其本身而言，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是一种有效力量。环保激进主义的思潮和大量个人事件的结合足以发动这些男性实施改革计划，将他们自己与他们熟悉的主流男性气质分离，重构个性，塑造一个新的、非性别歧视的自我。

以对男性气质的负罪感为主题的性别政治是个人转变这一更大主题的组成部分。新自我的概念不是花哨的语言。六人中的三人曾受到个人危机感或无价值感的困扰。如奈杰尔·罗伯茨在20岁时在教育、家庭关系、性和政治活动上有一种强烈的“在任何事情上的挫折感”，这说明男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彻底改变。

这种彻底改变与反文化运动中关于青年成长和个人改变的一

般观念高度一致，这通常需要个人否定传统社会。在反文化运动的许多部分，新自我的核心是精神上的，这常常与医治者有重要关系——如一位瑜伽教师或针灸医生——这部分人中许多是女性。个人改变是全面的；新自我表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日常实践要表达出内心的真实，正如比尔·林德曼所解释的：

我已经在道德规范、做事方式、社会态度和饮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发生了变化。我希望那些改变尽可能多地来自我所感觉到的事物……我认为经常了解自己的身体——通过饮食、锻炼、干净的空气及此类物质——的感觉是重要的。

当这种方法被用来重构男性气质时，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做到放弃。彼得·格迪斯 30 岁时放弃了成功的事业和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

我们上午 9 点和下午 4 点走出旅馆。站在海滩上注视出租飞机离去。我妻子穿着高跟鞋和套装，我们向飞机告别，然后钻进自己的卡车，开到我们的小木屋。我们没有电。那是全新世界的开始。

比尔·林德曼和蒂姆·马尼耶放弃职业培训或刚刚开始的事业以及奈杰尔·罗伯茨放弃上大学的资格考试，他们的行为虽然较少戏剧性但却是严肃的。

这样做产生了实践和符号的结果。放弃事业意味着人和传统工作场所的男性气质的分离，第一章对此有所探讨。辞职导致了较低的收入，对于维持一个常规的家庭是困难的。因而生存依赖于集体户中实行收入平均。弃权也是一种放弃，它意味着放弃平常的男性特权和互动方式，例如，有意识地不支配讨论和决定。

弃权对性和情感的表达也产生了重要的后果。由于男权制的核心被理解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的态度和行为，所以男性能做的主要贡献就是抑制任何性别歧视的行为或言语。巴里·瑞安把抑制视为他的性别政治的核心。当他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建立性关系时，意料不到的考验出现了。

就男女关系而言，弃权可能使男性对采取性主动，即另一种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感到内疚。奈杰尔·罗伯茨和巴里·瑞安二人，直到偶遇到那些采取主动并有效控制这种关系的异性恋女性主义妇女时，他们才在性关系上感到自在。奈杰尔与一位充满激情和精力的女性一起生活，这位女性设法给他一点决断权，让他在两天内决定是否抚养一个婴儿。

选择被动性是同支配性男性气质分离的要素之一。由于所有这些男性本来都具备支配性和独断性男性气质，所以这一选择可能困难。丹尼·泰勒在评论改变自己性别歧视的“费时费力的工作”时说，“有时不具攻击性是很难的”。同时，男性对被动性的根深蒂固的渴望，通常被支配性男性气质压抑了（尽管被坚决否认），弃权又使这种可望表面化了。这里的问题错综复杂，人们的不同行为说明了这一点。彼得·格迪斯放弃男性的职业是一项高度男性的举动。他直到买了农场才告诉他妻子离职的事情。弃

权是个人意志力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行为本身要否定的男性自我。

而且，弃权和否定不是目的，而是要提供新的个体品质可以发展的空间。这六人仰慕并希望发展的品质基本一致。

有两种品质是重要的。一是能够表达内心的真实感情，尤其在涉及感情时。丹尼·泰勒讲述了一个故事阐明他的坦率：

我坦率得多，并且确实非常非常的诚实。人们总告诉我“你非常坦率，你不设防”……（对一个新的工人，一个“性格外向者”）。当她第一次来时，我后退了一点，保持我的距离。其他人都和她非常融洽，我没有。她迁入后不久我开始同她讲话。我把那天的感受很坦率的告诉她，以及困扰我的事情、问题等——还有我的快乐（笑）。哦上帝，她也把一切都和盘托出。她真是毫无戒心，因为我刚刚丢掉表面的矫揉造作，而直接进入核心——心灵。现在她和我的关系比对她那儿的其他人更亲近。

另一种最受赞誉的品质是能够表达有价值的感情：敏感、深度的情感、对他人和自然的关怀。丛林中的孤独经历是其中一方面。在政治活动、家庭和工作场所或性中牵挂同伴是另一方面。男性最尖刻的批评是针对没有爱心的人，举例说就是那些操纵工作场所或家庭的集体活动为自己谋利的人。

假设这些坦率和关怀的品质在新模式的人际关系中实行，那么在与女性有了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要“非

常小心”以免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支配谈话和使用性别歧视的语言。访谈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约定：男性应仿效女性主义者的温柔举止，在女性中应谨慎地行走——也就是在一定环境中，多数时候都必须这样做。

更明显的麻烦是与新的行为模式和男性的关系。六人中多数表示渴望与男性有更好的关系，但表示这较困难。比尔·林德曼描述了某种进步：

我一直发现接触女性比接触男性更容易。我不能就说“好的，我将开始接触男性”因为那不会起作用。所以就我而言这意味着一个过程，选择男友共度时光，即使在开始时效果并不显著。如此持续六个多月或一年，就会改变许多。从与其他男性的友谊那儿我得到了更多。现在对我来说与男性的友谊比同女性的友谊更为重要。

你怎样改变了你同男性的关系？

更多——更多的坦诚、更接近、更信任、更关心、身体上多照顾、多接触和多拥抱。

男同性恋者之间的友谊的传统障碍是同性恐惧症。所有六人都是异性恋。澳大利亚文化中支配性异性恋的一个标准就是敌视男同性恋者及害怕被称为同性恋。第四章表明了工人阶级青年中这种情况的结束。绿色激进主义者中，三人提及了短暂的同性恋经历，他们对此都不感兴趣，并且其中一人还表现了某种厌恶。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不反对同性恋，一些人描述了与男同性恋者的

亲切友谊，但也有几个人表现了一点同性恐惧症。他们拥护直接挑战“性别歧视”的女性主义但对于男性中的同性恋还没有明确认识，转变的实践没有给他们身体的异性恋敏感性带来麻烦，所以他们不会关注男性间新模式关系中所涉及的困难。

他们改造身体的计划是沿着比尔·林德曼描述的路线进行的：关注来自身体的信息或应用健康食品，减少压力以便更好地对待身体。虽然他们重构身体的尝试可以被看成是要获取一种女性气质，但他们的计划没有涉及第二章的内容：男性气质通过实践根植于身体之中。

而且，他们把身体视为自然客体，认为它与自然的其他部分是完美和谐的。当比尔·林德曼谈论“我的身体”和“我”时就好像两个分开的人在通过电话交谈，他的言论很能说明问题。他们没有把革新的自我理解为具有形体的“我”，同时把男性气质与身体分割开。于是男性气质成为社会习俗，可以抛弃，但身体的自然特性则不能。男性的行为与性角色理论相符，所以他们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对那些在与女性的关系上采取有原则的被动性的男性而言，坦率和诚实还涉及另一个问题。诚实要求有时说话要严厉，愤怒通常是由同事关系、性关系和运动中的张力所引起的，没有什么女性主义原则或团体情感能阻止这些。随着男性被强迫以一种原则表达情感并以另一种原则压抑它们时，双重困境就产生了。

这种僵局在多数此类访谈中被模糊的远景所强化。虽然男性明白他们要发展什么样的个人品质，但他们却不太清楚重构所导致的未来结果。放弃顺利的事业已经去掉了生活中的传统形象，

但似乎没有替代它们的形象。

消除男性气质

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分离有时看来是纯意志的一种行动。男性重塑自我在面临其他男性的嘲笑以及女性主义者的同性恐惧症和矛盾心理时，肯定需要极大的意志力。然而意志力不是惟一的，它还涉及男性气质最初形成时的各种关系和情感。在这些关系和情感中动机支持新的情感工作，并限定情感工作的类型和范围。

在童年早期，所有这六人都按传统的性别分工由母亲照顾，我们可以推论他们会对母亲产生最初认同。之后他们在父亲、兄弟或象征性的男权制的影响下都经历了（在不同的结构中）俄狄浦斯男性化的过程。在一些个案中，当事人又再度与母亲联盟或因为对女性力量的认可和仰慕而同支配性男性气质保持某种疏远。但一般而言到青春期后阶段，这些男性的多数似乎完全站在了支配性或至少是同谋性男性气质的轨道上。

但是，他们都经历了旨在消除俄狄浦斯男性化影响的重塑自我的过程。重塑自我似乎受到前俄狄浦斯关系的情感遗存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母亲的最初关系。

个性中的这些陈旧的直接证据难以得到，但在我们的访谈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迹象。例如，与彼得·格迪斯访谈的前阶段，他在回答问题和陈述一个生动的、按时间顺序发展的故事时，给予了清晰如新闻记者般的叙述。访谈的后阶段中，当他谈到反文化

生活并解释自我的重构时，他的语言风格发生了变化。他的回答变得无停顿、时间错乱、主次不分，观点、事件和解释一股脑全倒出来。朱莉娅·柯里斯蒂娃认为：同母亲的分开和俄狄浦斯阉割知觉的来临是与语言的特定阶段相连的，在此阶段，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命题或评价出现了（“西蒂斯”阶段）。按照她的理论，彼得言语的转变作为试图消除俄狄浦斯男性气质的一个征兆是有道理的^①。

这些男性中的多数把整体论哲学奉为他们的反文化观或环保观的组成部分。对无分化的整体的强调，特别是对包容一切的大自然应持被动—接受态度的强调，是对与母亲最初关系深刻记忆的反映，反文化文学表明了这一点。比尔·林德曼与自然交流的“清新、纯洁的美妙情感”是对“海洋的”情感的回忆，弗洛伊德提出这种情感来源于生活的最初时期^②。在放弃男性气质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对被动的渴望也可能来自这种幸福的母子关系。

同样，坦率、真诚和情感脆弱的原因，就是要排除障碍，改变分隔和分化，重建初始关系，也就是说，退回到俄狄浦斯男性气质形成之前。努力与一位采取主动并提供活力的女强人建立关系来解决权力和性别间张力的行为也明显与母亲的早期关系有关。

我指出这些联系，不是要强调环保激进主义或重构男性气质

① 柯里斯蒂娃 1984。

② 弗洛伊德 1961 1930：65~8。

的改革计划意味着心理退化。即便是，这些联系也是衡量计划严肃性的标准。这些男性不是暂时假装成“敏感的新男性”。他们对真正的，意义深远的个性政治负有责任。我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改革采取的特定形式受到来自个性中以往情感的支持。

到成年时，这些情感涉及相当的风险。坦率和非武断性的自我要冒毫无自我的危险，它招致毁灭。奈杰尔·罗伯茨谈及他和一位女性主义妇女的关系时说“我感觉好像我正在失去我的中心”。丹尼·泰勒与一位令人仰慕的女性建立了一种被动的依赖性关系，她将他置于女性主义者长期批评的妇女地位上。

“我确实很吃惊她喜欢我，我猜想我暂时有点像条哈叭狗……我好像把自己与她视为一体，她的所有成就就是我的成就，她的成功都是我的成功。我没有任何自我。我感到一旦这种关系结束，我将束手无策只得走开。”

这种关系确实以糟糕的分离而结束，给丹尼留下的是永久的愧疚。

对这些男性来说消除男性气质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恐惧。俄狄浦斯男性气质建构了这个世界，在性别化的术语中自我对他们而言正如它对多数男性一样。消除男性气质会招致个性结构的丢失，这可能导致相当可怕的后果：性别眩晕症。

阻止结构遗失的强烈动机因而出现。它表现为：在放弃男性气质的行动中强调男性自我的必要性，或者是维护异性恋敏感性和异性恋的客体选择。

性别眩晕症可能驱使男性寻求建构世界的另一途径。在这里，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关系的一种敏锐的观点是重要的。他说“完全的”恋母情结涉及性吸引和性恐惧两种模式的叠印。一种导致与父亲的认同，另一种选择父亲作为性目标，并与母亲认同，争夺父亲。

我们不必接受弗洛伊德泛性论而同意男权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和情感依赖可能造成与母亲的俄狄浦斯认同——一种区别于最初认同的模式并在性别政治中扮演一种不同的角色。这是一种性别化的关系，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关系，因而也是对眩晕症的一种可能回答。与母亲重新认同可能是共同的情感脆弱性而非母亲万能意识造成的，正如卡伦·霍尼和多萝西·迪内斯泰因描述最初认同时所强调的^①。它可能是与母亲竞争父亲的好感而不单纯是和母亲的一种团结。之前我注意到巴里·瑞安在家庭破裂时，回来和父亲生活。在成年阶段，巴里仍寻求父亲的好感，甚于研究中的多数男性。

无论它出现在哪里，与母亲的俄狄浦斯认同为在消除男性气质过程中个性结构的丧失提供了情感基础。一个人可以自信地宣称他与母亲亲近，与男性，特别是传统男性疏远。这些情感在访谈中常见。

这六例中的证据是清晰的，团结女性需要完全的女性化。他们不是变性者。相反，与母亲的俄狄浦斯认同和俄狄浦斯男性化作为一对矛盾可以在无意识中共存。

^① 霍尼 1932，迪内斯泰因 1976。

成人性别政治触发了这一矛盾，尤其是围绕内疚这一主题。在古典精神分析中，男性的内疚被认为是与未能俄狄浦斯男性化紧密相连的，认同父亲是超我的基础。而我们的案例中至少有两份素材是与这种模式相反的。虽然他们有极大的内疚感，但原因是乐意履行而不是违反父亲的规定。巴里·瑞安仅仅因为“是男性”而感到内疚。比尔·林德曼对不平等友谊中的一个特定情节感到内疚（他用双关语说“我利用她”），也对一般的男性攻击性感到内疚。

巴里和比尔于80年代早期仔细阅读过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在关注性暴力、色情文学和战争的同时严厉批判了男性。我认为每个人的内疚感一定与俄狄浦斯男性化和对母亲的俄狄浦斯认同之间的矛盾有关，这一矛盾新近被政治背景激化了。

并非所受访者都公开了大量的内疚情感。奈杰尔·罗伯茨接触了同样的文学作品，他的反应较为冷静。事实上他批判了内疚感所导致的柔弱行为。

我认为许多赞成女性主义的男性仍沉浸在评价其他男性、评价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方式，就像女性主义者所做的。当你了解了女性主义的真相，你将经历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你不想做男人，不喜欢其他男性，仅仅聆听女性，只想在她们周围。在某种意义上，你仍然感到其他男性的威胁，他们和你一样，都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所以你有点不希望他们是女性主义者。

奈杰尔没有带着内疚对待女性主义，这也许存在特殊原因。他的家庭和他青春期的性生活减弱了性别差异的影响。因而他个性中的任何认同的矛盾将可能比其他人较弱。

相反的，女性主义让奈杰尔似乎感到不安，好像他被置于一种不利地位。他承认性别不平等的事实，也接受性别平等的原则。他开始重新评价“生活的女性方面”的价值。但他不能将此评价转变成一种可行的计划。他感到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我的中心”），或者处于失控的危险之中，所以他避免与女性主义妇女冒险。男性转变为女性主义者会失去原来的个性结构（他比同组中的任何人参与的时间都长），这似乎使他随波逐流或失去了中心。他没有找到一种通过认同女性或认同女性化的男性而重新树立中心的方式。

概言之，男性气质的再造可能是很多类型的情感构形。它们中没有一种是没问题的或特别稳定的。我认为原因在于个性上的情感困境没有得到解决。为了进一步寻求性别的重构需要转移到新的地域，在那儿，可直接研究情感矛盾的结构来源。这就需要转到集体实践。

竞争环节

性别问题的社会特性和个体化实践之间不符，反文化运动一般只关注个体化实践。改革个性的相应治疗方法把个体视为被革新的单位，并随着治疗方法的进行建议个体需要有更多的个性，以便寻求一个“真正的自我”或“真实的自我”。

既然如此，重塑自我的计划就不会改变而只能容忍男权制性别秩序。例如，丹尼·泰勒没有忽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事实。他清晰地描述它们，指出女性是“奴隶的奴隶”。但他的工作只是使他的头脑发生了变化，根本不会导致一场奴隶革命。丹尼可能成功地找到了他的新自我，可能创造了一种男性气质，适应他所寻求的对女性的体贴、情感的坦率和性被动。这种男性气质可能在一种再造的男权制秩序之中找到它的位置，但不可否认它不是主要的男性气质，而是处于一种组织得很好并安全可靠的次要位置。

变革个体男性气质的政治风险最终将有助于男权制的现代化而不是废除它。敏感性新男性已成为一种媒体形象，第一世界的广告商们利用他们推销拿最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妇女制作的服装^①。许多女性主义妇女怀疑女性主义的男性，认为他们的变革只是粉饰门面而已。

另一种观点似乎是要男性与女性主义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内疚、敌视男性和完全从属于妇女运动——一种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娇柔主义”的观点^②。它接受个体化的逻辑，这种逻辑将压迫的来源置于男性的个体性别歧视之中，并提出一种道德的而不是应用的变革。以上引用了奈杰尔·罗伯茨对娇柔主义的批评。他复述当今常听到的玩笑：竞相成为最佳的女性主义者是多么具有男子气概的举动。他的评论更为深刻的指出男性间的敌对

^① 这并非夸大其词。国际服装行业的工资和环境见芬特斯和埃伦赖希 1983，恩勒 1990。

^② 见《娇柔主义宣言》；丹斯基、克内贝尔和皮奇福德 1977。

破坏了他们对女性主义的思考，其中，男性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道德化的个人主义之上。

六位男性中有二人的政治实践超越了重塑自我和批评男性。巴里·瑞安正在接受护士培训。正如我们所预料到的，任何一个医院和强调性别的组织一样，在那儿，他遇到了大量的男权制意识和实践^①。他呆在那儿以破坏男性气质的传统为乐。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场所继续精心地增强自我意识感：

作为一个成年的学生，那时我的职责是组织学生并作一些教务以及你们所知道的那些。我做一些事情如向人们指出这样的事实：男性在群体中谈话较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巴里感到这种集体工作需要他停止极端的个人重建计划。因而他乐意满足于一种较温和的、可行的女性主义。

比尔·林德曼也将精力投入重塑他与男性的关系之中，采取了一种超越个人主义的方式。他形容他的实践：

在与那些正试图以同样方式改变的男性接触时，我感到精力充沛，因而就加入了男性提高自我意识的群体和其他类似的群体。我阅读了少量由男性作家为带有‘改革’问题的

^① 澳大利亚医院的情况见盖姆和普林格尔 1983。对于在医院工作男性的卓越探讨见威廉斯 1989。

男性所写的书。我还阅读了大量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我将女性主义——在与女性关系中女性主义给我的感觉——看成改变我的一种真正强有力的催化剂。（停顿）我读了许多，收获很大。

比尔试图将他的男性反性别歧视群体的角色与环保激进主义相结合。并寻找其他具有类似特点的男性，与自己一起采用摄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为改革男性气质而奋斗。但这是不容易的：

寻找那种情感（也就是，希望改变男性气质）并从事绿色环保问题的男性……我感到能够密切合作的人太少了。因此这一计划实行起来很慢，也存在很多很多的障碍。

兼具两种角色的人显然在数量上有限。在访谈时，巴里·瑞安仍在接受护士培训。他试图以一个学生，甚至是一个成年学生的身份来影响培训程序，这不会有很大的前景。比尔·林德曼所做的尝试成功的机会较大，但他把能与之合作的人界定为那些同时是两种政治运动的成员。结果，他的直接行动的领域事实上很狭窄。

然而，虽然他们的行动是开创性的、小规模，但就逻辑而言，它们代表了变革计划中的新环节。男性试图背离传统男性气质的个体化姿态为政治取向所代替。这是向男权制社会秩序挑战的转变过程。

在以下的章节中，我将着眼于与男权制的性别秩序相对抗的

其他形式。对于我们要进行的讨论，以上两例个案显然是不够的，然而我想强调他们转变的重要意义。男性气质的集体性转变在社会层次上进行，就要触及社会的制度秩序以及个性的社会组织，并创建比个体大的单位（从而面对面的工作团体到社会运动）。在这些方面，与男权制社会秩序的抗争非常不同于重构自我的计划。

我也将再次强调环境保护运动作为助产士为性别政治服务的方式。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男性因为环境保护行动中女性主义的存在而参与了集体行动，这一运动对传统男性气质产生了影响。像富兰克林大坝行动中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过程体现了高度政治化的模式。

然而环境保护运动的文化历史限制了男性气质的转变，即使它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时也是如此。环境保护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试图在非性别化的基础上行动。它甚至试图去除性别所指，取消性别差异。它最普遍的理想是女性原则和男性原则的结合。在我们的研究中每一位男性都将某种雌雄同体看成是他们的目标。

问题是在一个仍是男权制的社会里去除性别实践虽然有进步意义，但会使男性望而却步。对主流男性气质的简单否定或排斥不一定会转变为社会改革。当反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面对此章所例举的性别眩晕症时，他们似乎需要在性别化的反性别歧视政治的指导下才能进步。这部分内容将在第十章中讨论。

6. 一种真正彻底的同性恋

在当代西方世界，没有哪种人际关系像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那样承载了更多的象征重负。这是一种集体间的关系，而不只是个人关系。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对性别产生影响。本章将探讨它对男性气质形成的重要意义。

男权制文化对男同性恋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缺乏男性气质。这个观点以超乎寻常的大量方式被表述过，从种种“柔软的手腕”、“脂粉气的男人”的过时笑话，到针对儿童时期同性恋的“本原”的复杂的精神病学调查。这个解释明显与另一个假设相关联：我们的文化通常将性意识神秘化，这反而令其更具吸引力。如果有人被男性阳刚所吸引，那么这个人一定具有女子气——如果不是在身体上，那么多少在精神上如此。

这些认识并不特别连贯（例如，在解释男同性恋者互相吸引这一事实上就存在困难），但它们随处可见。于是，对那些被其他男人所吸引的男人们而言，它们造成一个有关男性气质的困境。

这个困境随着富裕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同性恋社区的出现而大量涌现在公众面前。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的研究显示了这些同性恋社区的历史根源，以及早几代人里面给一些男同性恋者提供支持、多少带些地下性质的网络。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出现戏剧性转变：性意识化更多出现在大众文化中；美国民权运动、新左派和非主流文化运动对正统的公然挑战；妇女解放运动的到来；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政治动员等等。

在这些运动所开创的空间中，位于城市某个区域的同性恋聚居地（其中最著名的是环绕旧金山卡斯特罗大街和纽约克里斯托弗大街的那些区域）发展起来，并逐渐制度化。他们获得一定范围内的商业经营权（酒吧、商店、夜总会和桑拿），就像那些政治群体（同性恋解放运动组织，同性恋文化政治组织，艾滋病行动团体）一样。作为一个男同性恋者现在可以说意味着——而且越来越肯定地意味着——受某个同性恋社区影响。^①

同样，社会科学中有关男同性恋的观点也在改变——这并不令人惊讶。这种改变始于精神病学家们对病原和治疗的专注，始于社会学家们把同性恋视为一种和口吃、酗酒以及伪造支票等相同的“反常”行为。美国最近出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把同性恋视为一种“认同”，并追踪研究了这种认同建立和与自我整合的轨迹。这与社会学中的一种新视角结合了起来，尝试把同性恋看作“亚文化”。它为新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成员所支持（正如一个多

^① 有关这几个国家的研究，可参见维克斯 1997，德里米欧 1983，金斯曼 1987，沃塞斯庇 1991。

元社会中的其他文化一样)，并与主流社会妥协达成边界关系。^①

这些趋势导致对男同性恋更为友好的叙述文本；而30年前他们在科学的视角里还是精神扭曲、变态越轨这样一幅带有敌意的图景。但专注于身份认同和亚文化的美国人已经把视线从性政治和性别政治上转移开来。同性恋社区是导致文化颠覆和变迁的先锋，也是性别保守主义的堡垒，这在英国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论。格雷格·布拉谢福德认为同性恋带来的是某种抵制，而不是明显的挑战——对整个社会的男性霸权文化而言。对社会秩序采取后结构主义看法的杰弗里·维克斯认为，性亚文化形式的多样化，导致更多变迁的可能。^②

这些争议远未了结，部分原因在于艾滋病传染。为了抵御新的偏见潮流，人们动员各种资源来护理、治疗和预防艾滋病；于是，有关性别的理论问题就变得次要了。然而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它们确实与理解社会对艾滋病的回应具有密切关联。

本章内容建立在对八个男人访谈的基础上，这些人与悉尼的同性恋社区均有关系。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其他的男人有过同性恋经历（其中包括第五章讨论过的三个，至少有第四章的两个），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同性恋社会网络的成员，只有一个与这些社会支持网络有关（保罗·格雷，他穿着异性服装到同性恋聚居地寻求安全庇护）。

这八个人是：马克·理查兹（20年代早期），实习护士；迪

① 关于“认同”，参见特罗伊登1989，卡斯1990；关于“亚文化”，参见爱泼斯坦1987，赫特1992。

② 布拉谢福德1981，维克斯1986

安·卡林顿（20年代中期），重型机车司机；艾伦·安德鲁斯（20年代后期），户外交易市场技术员；乔纳森·汉普登（20年代后期），商店售货员；达米安·乌思怀特（30年代早期），失业者，偶尔开计程车；亚当·辛格（30年代早期），一个大型组织驻城市机关的专职工作者；戈登·安德森（40年代早期），公司经理；格里·拉蒙特（40年代后期），职业私人教练。

上述这些人中，目前只有一个仅与男人有性关系，大多数都与女人有过性关系。其中两个已有了孩子，其他人认为他们也将会有。有三个来自农村（其中一个来自国外），他们迁入大城市的过程是与他们进入同性恋社会网络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有劳工阶级背景，其中几个已经向上流动了。有一个出生于特权家庭并且在贵族式私立学校接受教育。

结合环节

更早一些的同性恋理论执著于同性恋的起源。现代性学的奠基者，理查德·冯·克拉福特—埃宾，把同性恋定义为一种“性本能……个体所属的性主流的严格对立面”，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遗传上的退化。本世纪的精神病学假定不断发展的变态心理是同性恋的致因，而关于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变态人们还在激烈地辩论。过去的传统精神分析学家归咎于家庭病态，归咎于与孩子关系疏远的父亲和放荡的母亲。最近金西学院的圣弗朗西斯科研究小组发现，所谓放荡的母亲/懦弱的父亲这一论点没有多少支持证据；而在男同性恋中却发现童年时期普遍存在的性别倒错经

历。^①

本源说无法阐明这项研究中的生活史。所有这个小组中的男人都成长于具有传统劳动分工和传统权力结构的家庭。迪安·卡林顿开玩笑说他父亲是“维多利亚式男人”（译注：指陈腐伪善，爱面子且偏执的男人）；有半数的父亲们支配他们的妻子，甚至达到使用暴力的程度。母亲们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有几个偶尔工作赚点钱。简而言之，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的家庭普遍是传统社会的类型。^②

男孩中存在大量性倒错的事实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生活史。这些传统家庭是男性化实践的场所，这和异性恋生活史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母亲给他们穿的是长裤而不是裙子，父亲们教他们踢足球，他们了解性差异。脱离家庭后，他们被引导加入通常的同龄群体，接受一般非正式的性教育，而且服从充斥学校生活的男女有别规定。马克·理查兹卷入一个暴力同龄群体，有过轻微的犯罪行为；乔纳森·汉普登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格里·拉蒙特在烂醉的父亲虐待母亲时，勇敢地制止了他。

参加工作后，大多数人保留了社会性的男性气质。例如，乔纳森·汉普登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制造行业很舒适地工作。迪安·卡林顿——前面曾提到有关他“维多利亚式男人”的

① 克拉克福特—埃宾 1965 [1886]，比伯等人于 1962 年，弗里德曼于 1988 年都提出了精神分析学转向的观点。圣弗朗西斯科研究是贝尔等人于 1981 年进行的。

② 这一点为此研究中对其他群体的访谈所确认，同时在几项历史研究中得到证明，如盖姆与普林格尔 1979，吉尔丁 1991。

父亲这个满怀深情的笑话——是重型机车的司机。尽管偏好男性，他还是把男性气质界定为性动力，即：采取积极、主动行为的东西。戈登·安德森在传统的老板/秘书行业中就职，访谈时他那剪裁得体的浅灰色制服显示了谨慎克制而不失权威的风度。戈登是一个娴熟的商业战略家，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政治评论员。

这样就存在一个与他们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的结合环节，正如在第五章讨论过的环境主义者之中的结合一样。归根结底，那就是主导男性气质的支配性质所期望的：它影响了所有其他的人。

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五章所述的一些家庭变动时，这些关系——通过它们的性别得以建构——保留了其他可能性。家庭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械体系。它们是一些关系场域，其中，性别是妥协产物。它们的构型随时间而变化，就像联盟聚合分裂、人们进去离开一样。

在一个具有传统劳动分工的家庭，男孩们与母亲和姐妹的关系是他们识别性差异的最初途径，而且也是他们认同父亲的选择性资源。传统男权制的家庭结构必然地开启了情感联系和性别建构的多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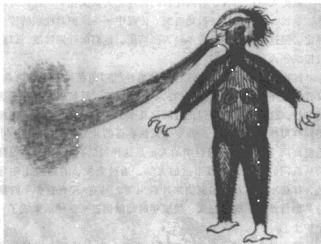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发现，在乔纳森·汉普登的案例中，既有对他父亲的强烈认同，也存在对他姐姐的独特认同。随着父亲的影响不断削弱，姐弟关系不断增强。后来，乔纳森毅然断绝了与姐姐的关系。艾伦·安德鲁斯，一个与达米安·乌思怀特相似的乡村男孩，一直与母亲关系亲密，他童年时的朋友大多是女孩，并且一般说

来总是仰慕和亲近女人。艾伦的母亲不得不有意使他脱离自己的爱巢。达米安费尽心思挣脱母亲的控制并逃向城市，但是在感情上与她仍然藕断丝连。

就更大范围而言，引人注目的男性化大众文化——在同龄群体，学校，工作场所，运动组织，传媒中——维护对性别的传统界定。但这一传统界定被年轻人所利用，他们向性别挑战，以此抗拒成年人和权威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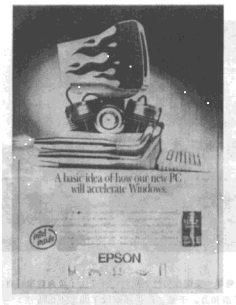
抗拒有可能意味着扮演过度的男性气质角色，这是乔纳森·汉普登少年时期曾经实践过的：抽烟，打架，反抗以统治者自居的学校；这正如第四章讨论过的那几个工人阶级青年一样。但抗拒同样可能意味着去干一些令人无法容忍的非男性气质的事。小组里面两个即将步出青春期的正是这样做的。达米安·乌思怀特从沉闷的乡村进入城市里的大学，通过染发，着嬉皮士牛仔装，抹指甲油以及戴编制物来冲破束缚。马克·理查兹少年时期总是激情难抑、满腔怒火，快成年时却颠倒过来，他后来成了一个护士。

这个结合环节于是就具有了复杂性。在上述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能发现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结合。其后果从完全接受支配性男性气质到冥思狂想不等，但它们一直存在。受访者的同性恋倾向绝非建立在虚无和性别真空之上。而男性气质的建构远非是通过单一关系完成的。性别的能动性不仅强大，而且充满复杂性和矛盾，它通过多种途径被扭曲。在这些男人的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扭曲通常尾随一段性经历——对性的探索，或者在性行为中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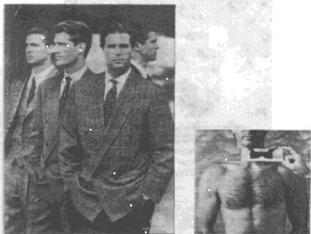
意象的教训 现代神话诗般的男人运动将“多毛的男人”尊崇为具有深层男性气质的原形。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意象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从19世纪50年代起，中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痛苦的时期。当时除了鸦片之外，欧洲人还将西方贸易和文化强加于中国人。这张图画就是中国人眼中的欧洲海员，并称其为“老毛子”。

（资料来源：赫尔顿。多伊奇博物馆，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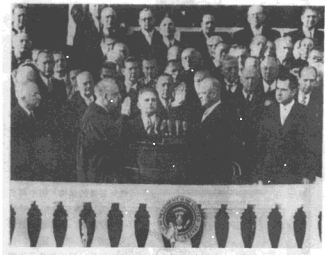
作为文化过程的男性气质 这张广告没有提及性别，但是可以让人联想到男性“体育运动”（拉力赛），进而购买这一品牌的电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广告将平淡的办公室工作与记忆或想像中的危险，速度和喧闹的世界联系起来把个人电脑界定为男性权力的领域。

（资料来源：西铁城爱普生公司，1992年爱普生美国分公司。）



男性气质符号学 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广告产生了负面效果：自我陶醉的形象失去了亲和力。于是，广告业采取了两种表现手法。一种是(左图)：用大量朴实的形象强调自我克制的能力；另一种是(右图)：运用幽默手法，说明形象乃人造之物。

资料来源：加拿大航空杂志和悉尼晨报广告增刊，1987。）



男性的国家 公共场所被象征地界定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领域，真实的男人占据了真实的空间。图片反映了1953年1月20日男权制继续的一刻。前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在场的（除其他男人外）还有哈里·杜鲁门和理查德·尼克松。

（资料来源：美联社，伦敦。）

Available now

Connecting the future

PLESSEY

Head Office: 42/521 Perth, WA 2000
 Syd 808 7122, Adls 320 4114, Bkw 854 1300
 Taking about Plessey. The connected to the future system? They are. Talk about the future and you're not ready for tomorrow's telephone receptionist's job a dream. Advanced business telephone systems make the difference very hard to up-market, high-tech. They love it because Plessey makes it enjoyable. The

Girls love it

性别差异的建构 图中两名办公室人员在做相同的事——打电话，但是他们的情感壤各异。除了服装、化妆，胡须、发型和鼻子轮廓不同之外，女性职工被称做“女孩”，男性职工牢固有力的握着听筒。谁是这主宰者在此一目了然。

(资料来源：悉尼晨报广告，1986年8月21日。)

6. 一种真正彻底的同性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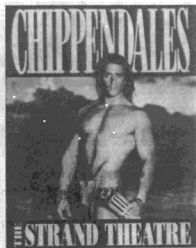


作为范示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 刚毅勇敢的架线工成为公司服务承诺的象征。

(资料来源：煤矿工人报，1949年1月15日。)

作为性欲目标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照片中裸体男性广告是为招徕异性恋女性而设计的，但是很像男同性恋的色情画像。男人身上的饰物表现了原始野性意味，然而，像其他旅游宣传品一样，这位男性被驯化的气质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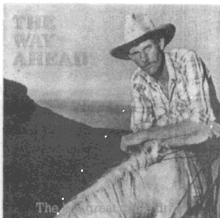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切宾代尔世界戏剧团演出海报，女宾专场。)





右翼男性气质政治 这是纳粹掌权后的一幅宣传画，它将法西斯主义描绘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楷模。画中无个性，几乎一模一样的突击队员被描绘为勇士，其中一些已在战斗中负伤。希特勒（被高度粉饰为经验丰富的军人）既是勇士，又是预言家。在画的右下角，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军人正在驱赶怯懦和腐败的罪恶分子（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分子）。

（资料来源：魏玛档案馆。）



边疆开拓者 澳大利亚二百周年纪念广告的标志是“路在前方”。画面中的形象应该是过去顽强定居在澳大利亚的白人农场主，可是这位骑手却穿着美式花格子衬衫。这就像澳大利亚的乡村音乐是来自(美国的)纳什维尔而非(澳大利亚的)乌德纳德塔一样滑稽。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二百周年纪念发行的广告——“二百周年纪念‘88’，1986.10。)

支配性男性气质和军队
世界大战征兵广告上的士
兵的英雄形象。

(资料来源：谢尔马克公司
印制的明信片，取材于纽约
米汉军事广告。)





取笑性别 像片摄于旧金山黑特大街的万圣节，上面的人物将男性身体与女性服饰结合起来，用以讽刺性别。

(资料来源：旧金山圆顶硬礼帽公司出版的明信片。)



重组性别 画作强调男人与婴儿在一起时的快乐。父亲沉浸在大海般的情感中，似乎摆脱了身心的全部束缚，只是腕上的手表还留有余味。

(资料来源：油画《酷热中的纳凉》作者诺埃耳·布彻，1985，《墨尔本信使》杂志。)

一盘散沙：性

对该群体半数以上的人来说，他们最开始主要的性关系是异性恋的关系。有两个人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其他人即将结婚。迪安·卡林顿的第一次感情经历有着良好的性生活以及彼此相互的爱护，那是“一次美好的关系，我们至今还是好朋友”。他回忆道，他们俩没有什么困难就可以步入婚姻殿堂。对在农村长大的艾伦·安德鲁斯来说，性实际上被界定为与女孩的关系。他母亲以及他的同龄群体向他施加压力，让他找个女朋友。他的同事们曾试图为他物色一个。他讲了一个滑稽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和同龄伙伴在丛林中野营时，他被推入女孩的帐篷并且抓错了女孩。正如我们在其他群体中所看到的，强制性异性恋是成长中理所当然的一环。

男孩们到了16或17岁时如果还是处男，就会被施加很多压力，而我就是一个处男。所以我总认为如果我遇到一个合适的姑娘，那真的会很好。可现在碰巧是个男孩。

正如艾伦暗示过的，公共舆论认为异性恋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实践中异性恋的强制性不一定被意识到。叙述者们对童年的描述中，既有与异性相处的经历，也有与同性相处的经历。

亚当·辛格回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有了性意识”。他讲述他和两种性别的伙伴们在小学和中学时玩过的性游戏的详尽细

节，其中包括小学男孩们在学校围墙外的丛林中建立的“裸体主义者殖民地”这样有趣的花絮。乔纳森·汉普登也回忆了童年时与男孩女孩们玩过的性游戏，尽管没有那么栩栩如生。他和隔壁一个7岁的女孩玩耍时被发现了。后来，他加入男孩“团伙”（可能意味着集体性自慰），意识到对同性恋的禁忌，开始有了罪恶感。还有一个人童年时初尝禁果，与一个成年女亲戚发生性关系，这件事很是轰动一时。

无论是在异性恋，还是在同性恋成年人的生活史中，都能找到他们童年时期与男女伙伴发生性行为的经历。早期与男孩或男人的性接触实际上没有妨碍异性恋性意识。在其他一些国家的调查证据表明，比起那些完全是或主要是同性恋的男人，年青时有过同性性接触的男人在数量上要多的多。年轻人的性意识是一个可能性场域，而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系统。弗洛伊德指出过形式多样的儿童性意识（他的一个著名笑话是关于儿童的“多形态反常性格”），但仅仅把它限于儿童时期。类似亚当·辛格和乔纳森·汉普登的案例表明，多形态的性意识扩大并延伸到了青春期。^①

成年人同性恋，类似于成年人异性恋，是这个场域的终结。那是不经意中发生的事，是一些通过特定的实践所发生的事，而不是预先决定的。多样性的终结牵涉到对目标的选择。这一点可以在访谈——尽管不是全部——中找到踪迹。

^① 有关早期混合性意识的其他证据，见金西等人 1948：168，斯科菲尔德 1965：58。近来的调查研究可参见特纳 1989。弗洛伊德的阶段论来自《三篇论文》，1905。

就马克·理查兹而言，他在青春期早期经历过难以忍受的不愉快，以及对权威的坚决反抗；那时他被送入一个清一色男孩的寄宿学校，并爱上了一个同班同学。他称之为“一个经典的寄宿房屋故事……一段极为亲密的友谊，此外，……也是十分牢固的性关系。”那是偷偷摸摸的，却是真心实意的：

我们没有被发现——而且我们没干那事——我的意思是说，在集会大厅，楼梯下的那些地方。就因为我上音乐课，他也跟着上，在那些共处的日子里我们会一起出游……

学校里的人知道这些吗？

哦不，上帝。不。绝对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确实如此。

从那时起，马克不再有任何顾虑的选择男人为性对象。

这不是马克围绕对象特征的拜物性顾恋，而是他围绕关系的性实践的强化，这创造了一个马克全部转移到后来的恋爱中的结构。马克的性生活因此被几种相对长期的关系所主导。他拒绝一时的性冲动，而且带着强烈的讽刺提到艾滋病的“美妙后果”，“要禁止任何人随处乱搞”。

多形态的性可能结束，这在马克的案例中就发生了，中间没有任何对同性恋认同或对同性恋的社会界定的考虑。他与男人的关系本身就是基础。亚当·辛格童年时达到极端的形式多样的性意识，后来也围绕情感关系整合了起来，他不是排除了与女人的关系，而是把重心更多放在男人上。高中时亚当开始在性意识中

感觉到高中生的男性氛围：“他们都是像我一样的学生，但他们的男性特质非常，非常的明显”。作为成人，他能够诙谐而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欲望：“一个我可以紧贴着他睡觉的魁梧强壮的男人；我喜欢被人细心呵护。”在这里对对象的选择是通过相互矛盾的性别意象（“强壮”/“呵护”）进行的，而且这个矛盾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相比之下，那个亚当设想某天与其生养孩子的“合适的女人”的形象则模糊不清。

这里，“同性恋认同”或“同性恋角色”这些概念不能说明社会过程。正如第二章讨论过的异性恋案例一样，性实践和性意象都关系到性别化的身体。已发生的事实是身体对快感的给予和索取。社会过程主要是通过触摸被引导的。毫无疑问，同性恋是社会过程，一个被巨大性别结构所支配的个体交互实践。

迪安·卡林顿的情况是一个相似的模式，他也一样，既与男人，也与女人有性关系。当被问及其中差别时，他给出一个强调身体感受的回答，这个回答引人注目，值得仔细推敲：

在传统意义上它是一样的。我指的是肛交，或其他任何事情：接吻、抚摸、口交和舔舐，整个作爱过程都是肉体感官上的。但我决定考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能多出不少兴奋感。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刺激一个男人。我知道我很喜欢被刺激。那样很不错，真是难以置信。实际上我还和很多人发生性关系。但我爱人贝蒂从来不说。她喜欢一切，但她不会坚持说“我要你这样做，我要你承担压力，或者做某一件事情，或者穿什么衣裳……”

我感到我可以和一个男人有更多的关系，因为他的身体和我的一样……和男人作爱，我可以发现我的感觉更好，实际上我在发掘有关我身体的更多的东西……我作了隆胸，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它们斜翘着，不是很大，也很平坦，但它们很优美。我已经错过了那么多东西。真是羞愧，真是该死的浪费。

迪安的情况和其他人的既相似又有区别。很明显他与他人的性活动没有体验到同性和异性的差异，也没有尝试不同的实践。他的回答与悉尼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性行为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① 最普遍的男人与男人的性实践（接吻、性感的拥抱等等）在女人与男人的性实践中同样常见。迪安阐明了和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身体的“格式塔”：一种型构，其共性是既让人烦乱又让人恢复信心。这种共性使下述情况成为可能：把对他人身体的探索作为探索自己身体的一种途径。

成为同性恋：认同与关系

一种性别化的性，如资料所暗示的，有可能是渐进和临时的建构。但作为同性恋的社会认同是另外一回事。同性恋身份界定清楚，使用方便，以至于它可以被强行施加于人——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达米安·乌思怀特作为一个即将成年的青少年反叛者一

^① 康奈尔和基帕克斯 1990。

度经历过这些，那时他仍然对女人有积极的兴趣：

大学时有个家伙一下认定我是同性恋，他常常就这件事对我喋喋不休……常常指认我作为同性恋才会做的那些事。其中之一即在他们入学时我是第一个穿嬉皮士牛仔服的人——他认为那是同性恋的作为。另外一件我做过的、是过去我经常用双肩背包装书——他认为那更是典型的同性恋表现。

后来，达米安接受了对自己的这个界定，并在苦闷中——丢掉两个工作——不断涉足同性恋社会网络，进一步确认了这个界定。

现在同性恋特性是如此具体，以至于男人们可以轻易的体验这样一个过程，即采纳这个社会界定来发现他们自己的真相。戈登·安德森提到他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同性恋；艾伦·安德鲁斯用了同样一个词语。

艾伦提供了一个经历六个阶段的经典口述文本。史前阶段：在一个边陲小镇上长大；生活在一个松散，保守的家庭；没有特别的紧张关系。酝酿阶段：青春期不确定性——喜欢和女孩泡在一起，但没有交上女朋友；和一个男孩朋友玩性游戏，男孩后来回避了。接触阶段：19岁，他磕磕绊绊穿过一条老街（半公开的同性恋者聚集地，类似于美国的“茶室”），和男人做爱。此后他四处寻找老街，对它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就像度过性狂欢的“精彩”的海滨假日一样。认知阶段：20岁，“我最终得出结论：

我是个同性恋，我参加了第一次同性恋舞会。”沉溺阶段：不需要人引导而单独进出酒吧，建立广泛的联系。强化阶段：22岁，遇见赖特先生，两人建立稳固的关系；结识更多的同性恋男友，加入一些同性恋组织，脱离了父母亲。

这一切听起来井井有条，颇像社会精神分析学家设计的“同性恋认同形态”的阶段模型。但这个条理清楚的次序是靠不住的，结果也不是那些阶段模型所依赖的自我心理学暗示过的同性恋认同。

艾伦在老街上的第一次性经历令他失望。他花了些时间才使自己技巧熟练，从而获得较多的快感。在他偶然闯入悉尼的酒吧后——“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很冷酷的地方”——他已经筋疲力尽。一个魁梧，英俊，说话慢条斯理的乡村男孩，他在悉尼的酒吧地带一定是个人物，也不缺少伴侣。他一直在寻找爱和抚慰，但他的伙伴们要的只是性。他感到自己被两个人“强暴”了，“我被迫让他们肛交。”他开始对性伙伴挑剔起来，把他们丰富的性技巧看作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补偿。他知道在同性恋群体中掩饰自己的感情，去偷偷摸摸调情。摆脱他父母的约束是艰难的，而且没有成功。他母亲完全绝望了，父亲则拒绝和他交谈。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让艾伦的弟弟接近他，惟恐跟他学坏。艾伦对父母倒没什么敌意，一家人还能不伤感情平安度日。

在这样的故事中，“摆脱”实际上意味着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同性恋社会环境。在同性恋理论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受福柯理论影响的人之间，一直存在有关这种社会环境所维系的集体认

同的争论：是否这种社会管理的方式最终会成为一种压制。^①当然，达米安·乌思怀特的经历——由于其牛仔装和背包而被人指手划脚说成同性恋特征——可以那样解读。更微妙的是，艾伦·安德鲁斯盘桓于老街和酒吧的经历也可以这样解读。马克·理查兹让自己远离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同性恋亚文化，也远离女子气和性变态。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同性恋世界的内在一致性的批判。

然而毫无疑问，达米安、艾伦和马克也曾把他们的同性恋性欲作为一种自由、一种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的能力来体验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虚假性欲而不予理会。迪安·卡林顿用最鲜明的语言表达了狂欢的内容，如下所示：

狂热，狂热，狂热！你压抑了25年没做的任何事情现在干吧。让我们好好干它一番，尽情消受。到外头聚会、跳舞、喝酒去。

这是同性恋解放运动最初经历的关键内容，在出现艾滋病后仍然如此，正如同性恋狂欢节持续的成功所表明的那样——这个狂欢节是悉尼每年度最大的群众集会之一。对戈登·安德森来说，由于一些充分的理由他仍然私下里搞同性恋（他当然会丢掉工作，如果他挣脱束缚的话，还可能与孩子们疏远），同性恋性行为 and 友谊网络不那么惹眼。但他只有在生活中其他部分的严格约束之外，才能与男伴享受自由与快乐。

^① 参见萨金特 1983 年和维克斯 1986 年的讨论。

性自由，“聚会”或是“踢一个人的脚后跟”（戈登·安德森的用语），这些固然重要，但它没有界定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种联系。亚当·辛格称他和一个男人的第一次性经历“不是某种关系，而是一次性邂逅。”其他大多数人赞同这个区别，也同意亚当的这一观点：他们远远更为重视“关系”。

他们共同的理念是长期的二人关系，可能不排除偶遇的性伙伴，但是强调与最初伙伴的关系。用艾伦·安德鲁斯的话来说，在这一关系中他们既重视性快感，也重视“诚实……互相照顾、分享和学习”。其他人提到彼此的感情投入，共同的兴趣以及仅仅作为同性恋伴侣坐下来互相倾听。

这个愿望如何转化为实践？这是访谈材料中最难处理的一部分，也是一些参与者谈起来最困难的一部分。小组中的三个人目前长期与男性爱人住在一起，其中一对已经持续了11年。这些关系中，最麻烦的恐怕是那种年龄差异太大的关系，这种关系中要想达到相互适应可能最为艰难。

其他三个在有意识的寻找长期性关系，无论是通过重新燃起旧情人的激情，还是通过寻找新的伴侣。同时他们也在利用一些“偶遇”或者正如其中一个所说的，坐等长期性关系的到来。还有一个主要专注于与男人的短期关系（和女人们的则是长期关系），现在正为这些关系的伦理而苦恼。八个人里仅有一个在感情上谨慎的偏向于临时性关系。他一直试图把他大部分的同性恋性生活和他与孩子的母亲所构成的持续的家庭关系融合在一起。

正如在异性恋世界里的情况一样，这些同性恋男人知道让人更乐于接受的模式是牢固的长期二人关系。但这样的关系可遇而

不可求。老街或酒吧中的临时性关系仍然是整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有这八个人都有过短期性关系。对一些人来说这是进入同性恋性行为的途径，甚至在二人关系建立之后“偶遇”发生的可能性还很显著。

这些男人大多数与女人和男人都有过性关系。他们表面上是双性恋。但只有乔纳森·汉普登声称那是他的性认同，他随即把它形容为：“带偏好[对男人]的双性恋”。格里·拉蒙特不太把“双性恋”这个词当回事，然而对他而言这是拒绝同性恋认同的主要方式，他一直对那种认同有所保留。他把同性恋与失去控制同等看待。

此时此地，双性恋没有积极的社会范畴，没有一个男人们可以接受的定义明确的中间身份。应该说，双性恋是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替代物，或是通过把其中之一屈从于另一个而使二者兼而有之的长期身份。在其他文化中有界定更清楚的中间位置。^①但在当今欧美社会中，性偏好的分立以及双性恋的不稳定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更为普遍。

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

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一种男性气质的建构与其他男性气质和作为整体的性别关系结构是相关联的。这些关联不仅是差异的界定，也涉及身体的实践。历史上支配性男性气质和同性恋男性

^① 关于这点，可参见威廉斯1986年的经典讨论。

气质之间的关系牵涉到对男同性恋的歧视，恐吓以及违反法律的暴力。

就在我结束本章第一稿时（悉尼，1991年），一群高中青年学生打电话把一男同性恋者诱骗到一个城市公园，然后将他暴力殴打致死，施暴者因此而被判有罪。戴维·麦克马斯特在对这次袭击的分析中指出，要打死一个人并不容易；这次事件的殴打过程包括用力踢打头部，突然殴打生殖器，袭击者以全身重量飞扑在受害者躯体上从而折断其肋骨。对同性恋者的袭击如此普遍，以至这足以构成悉尼城市政治的一个问题。在悉尼内城，青年文化中的同性恋恐惧症的深度在詹姆斯·沃克的人种学研究中可以见到。^①

本次研究中接受访谈的男人们都没挨过打，但有几个被吓过。在谈话中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生活在同性恋恐惧症环境中。达米安·乌思怀特失去工作。亚当·辛格和一个他并不太感兴趣的外交官住在一起，部分原因是这对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比较安全。戈登·安德森不敢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因为他害怕失去工作和孩子们。

我不想放弃我正在做的工作，我不想放弃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形象，我永远不会公开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那会付出代价。

① 关于针对同性恋的暴力，我的想法受到麦克马斯特1991年著作的影响。他对这个谋杀中的伤害细节的描述被我采纳和解释。有关地方青年文化，参见沃克1988。

戈登精彩的描述了为了取悦登门造访的商人，他是如何扮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形象的。每次他的女性朋友都会前来冒充女主人。一次“女主人”问及胡椒粉放在何处，差点让表演穿帮。

当同性恋者日常与异性恋者接触时，就会遭遇支配性男性气质，受到潜在威胁。他们的小心谨慎，有节制的暴露以及转入同性恋社会网络，都是常见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合法。在同性恋者眼中，男异性恋者也可能是可怜的过时观念和乏味生活方式的拥有者。迪安·卡林顿回到他童年的乡村小镇时：

我看到了朋友们，比如过去和我一起上学的老伙计……他现在 25 岁，有三个孩子，已经过上枯燥乏味的居家生活。我回去看望了他。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回到家乡了；天哪，真是大开眼界！所有这些都长大了，我还没结婚，而他们都成家了。他们都做了“适当的事情”，这里得加引号。

艾伦·安德鲁斯看到他异性恋的弟弟渐渐变成一个粗鲁的醉汉时，做出和迪安同样的反应。和异性恋的图景相比，同性恋男性气质是高级和现代的。因此，同性恋者谋求与异性恋者妥协便存在一个文化上，并经常是身体上的距离。

个人关系并未削弱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支配性男性气质也会在集体实践中作为一个制度和文化的存在而被遭遇到。乔纳森·汉普登所在学校的足球狂热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狂热是由学校规章和制度化的身体冲撞及侵害来维护的。工厂中男性气

质化的权威对达米安·乌思怀特和马克·理查兹来说是冲突的根源。亚当·辛格和格里·拉蒙特让自己远离男性气质化的职业。

然而支配性男性气质具有社会权威，公然向它挑战并不容易。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作用之一是塑造了同性恋者的观念。例如，主张逃避策略的戈登·安德森批评了那些“夸耀”同性恋特征的男人——他认为那是澳大利亚同性恋者所特有的（在美国，“郊区同性恋者”们也持相同观点）。^① 亚当·辛格，达米安·乌思怀特和马克·理查兹都反对过度男性气质，但也表示讨厌假女人，即那些女人气的男同性恋者。马克简要地说道：

如果你是个男人为什么举止不像男人？你不是一个女人，不要扮女人样。那一点相当重要。什么性变态呀，什么诸如此类的喧闹怪诞的行为呀，我想我就是不理解它。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是一个真正彻底的同性恋者。

马克在这里指称的性/文化动力学很重要。以男人为性对象的选择不仅仅是对一个具有阴茎的身体的选择，它还是对一种具体的男性气质的选择。男性气质的文化涵义通常是同性恋文化整体的一个部分。大多数同性恋者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彻底”。这不单是一个中产阶级体面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束不久，在同一国家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同性恋社区外的工人阶级男同性恋

^① 林奇 1992。

者也采取相似的立场。^①

然而在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人看来，这种彻底的同性恋者完全被错误的目标选择颠倒了。于是，具有异性恋男性气质的同性恋者也被视为腰肢柔软的假女人。这种颠倒在男权制社会中被认为是同性恋的结构特征；它独立于像马克那样的同性恋者的个人风格或认同之外。因此，那些认为同性恋者必然具有女人气的同性恋理论家们也有其理由，如果他们不是人云亦云的话。如果是这样，即使像马克·理查兹那样的同性恋男性气质目前在城市男性同性恋者中是普遍的、甚至居于统治地位，也是不稳定的。^②

面临变迁

变迁是生活经历的中心主题，它以往来于不同环境之间的运动的特定形式出现。对以下几个人来说这个巨大的转变是从保守的乡村到灯红酒绿的城市。迪安·卡林顿的那些已经“做适当的事”的童年伙伴们的故事说的就是小镇生活和男性气质。迪安来到了悉尼，立即开始和男人们发生性关系，并以同性恋的面目公开出现，在酒吧和夜总会里“尽情宣泄”。对其他人来说，环境的变动主要在城市之内，但是两种社会环境仍然很不搭界——中产阶级学校与激进的家庭之间（马克·理查兹），商业工作场所与同性恋社会网络之间（戈登·安德森），平稳的事业生活与不断发

^① 康奈尔、戴维斯和多塞特 1993。

^② 见米耶利 1980。

展的抗议运动之间（格里·拉蒙特）。

逐步显露公开的过程，即个体在同性恋恐惧症的世界中把自己作为同性恋建构起来的过程，几乎必然的赋予叙述者这个迁移结构。生活史是作为迁移，作为一段从异地到当前所在地的旅程来体验的。和那些视同性恋认同为规则的论者相反，我更强调这个旅程中的游移不定的个人能动性。迪安·卡林顿把迁移描述为既是逃避，也是自我探索：

这是导致我来（悉尼）的几件大事之一，这样我可以脱离我父母，去揣摩，去发现我究竟是谁，我究竟想要什么，还有这些年来我为什么干这些事情，我为什么一直在改变，我一直在躲避什么。

与传统精神病学归咎于混乱的亲子关系的观念相反，这些案例中大多数显示出稳定的自我发展，这使得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和父母分离。大多数人在他们父母许可的程度内维持了与双亲足够良好的关系。

迪安·卡林顿的叙述中坦露出的对个人转变的愿望可能导致对男性气质、对第五章讨论过的那类男性气质的蓄意革新。达米安·乌思怀特在这条路上走得最远。他在努力克服自身的“争强好胜”和支配欲。他参与反性别主义的男运动，并试图追寻男人之间非性关系和肉体上的亲密关系。乔纳森·汉普登尽管对素食主义者的咖啡有难以抑制的嫌恶，但一直住在一户素食的家庭中，以便进行重获“新生”的治疗。现在他“梦想”建立一个性

教育中心。

对男性气质中的变迁的要求并不需要反主流文化的支持。乔纳森·汉普登的故事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之一是他父亲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他那位高权重、对家庭已无情感的父亲影响了乔纳森的成长：

他坐下来，说：“我做错了什么？”他第一次公开面对这个问题，他的确真正打开了心扉说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显然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我以为努力工作提供一切，你们就能得到所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姐姐和母亲对他不依不饶。我不得不开。因为我了解这个人，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那样骄傲，我不能眼看着他的骄傲被撕成碎片。她们把话说白了，“瞧，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告诉你，我们不要你的钱，要的只是你的人。”谈话最后僵住了，轮到他了……他只是说他感到糟透了，他想不干了。我们都不相信。

一年之后他死于心脏病。乔纳森认为这个心脏病可能第一次暗示了男性气质的危机。

如果乔纳森是对的，那么要打碎汉普登先生生活中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堡垒，就要在死亡的威胁和女人们（而不是乔纳森，他“不得不开”）的巨大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才行。大多数男人的生活中缺少威胁和压力，也没什么紧迫感。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人感到转变的必要，并且普遍认为性差异无论如何正在减少，男人越来越接近女人，或者说越来越喜欢她们。

达米安·乌思怀特也指出了同性恋男性气质中的转变。他通过一个年轻的外省男同性恋者举办一次聚会的故事说明这点。那年轻人邀请了一些女人，她们一来到聚会，那些年纪大的男同性恋者随即走开。他们的社会网络把女人排除在外，他们对女人的态度就是厌恶——然而对那些年轻人来说情况就并非如此了。与此相一致，参与访谈的群体中最年轻的三个，马克·理查兹、迪安·卡林顿和艾伦·安德鲁斯，也属于最重视与女人的友谊、为此投入最多精力的那些人。

然而这种转变的意识并没有产生什么政治效果。正如德尼斯·奥特曼所指出的，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政治向申明同性恋身份和强化同性恋社团的转变有一种负面效果。^① 这个群体中的男人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命运与宏大的改革运动相连。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他们对自我以外的实践有任何介入的话，那就是帮助其他男人进行个体改良的治疗实践（格里·拉蒙特的工作室，乔纳森·汉普登的性教育中心）。

政治意识的缺乏充分体现在这个群体对女性主义的态度上。他们通常的立场是支持女性主义，但不赞成那些过于极端的人：

我受不了那些认为男人是狗屎的假男人。（马克·理查兹）

我从来没有和女性主义发生个人冲突。我不喜欢任何极端主义——烧乳罩这样的事有些做过了头。（戈登·安德森）

^① 奥特曼（Altman）1982。

这种态度——对女权运动的无知程度——与参与访谈的大多数异性恋男人对女性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

作为工程和历史的同性恋男性气质

人们熟悉的对同性恋的各种解释——包括传统的“正常/反常”划分和新近的“主流文化/亚文化”划分，——在这些男人们的现实生活面前都显得呆板僵化。他们的性行为来自在形形色色舞台中多方面的妥协：家庭的和性交易市场中的情感关系；经济往来和同事关系；权力关系和友情谊。这些关系所带来的压力经常向不同方向展开，导致多种多样的后果。

强调这个复杂性并不是为了否认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也不是说我们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轮廓。同样的内容可以见诸于所有这些叙述中，尽管细节变化多端。它们是（1）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约束；（2）将性行为限制在男人之间；（3）参与同性恋社团的集体性实践。

我提出的这几点并不是同性恋认同形成的新的普遍模型。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同性恋认同，也不存在普遍的异性恋认同。许多和男人有性关系的男人从来没有进入过同性恋社团。那些进入过社区的男人有了明显不同的性行为建构——诸如马克·理查兹提到过的“穿皮衣，唱摇滚诸如此类的喧闹怪诞行为”。^①

^① 对于这个案例的后继事件——即性变态的产生——的详细说明，参见 M. 汤普森 1991。

相反，这些后果界定了这一特定背景中可以记录的形象，界定了作为一种同性恋男性气质的生成，这种同性恋男性气质是在历史上实现了的实践构形。它们与第五章探讨过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再建构具有可比性，而且确实拥有共同的出发点。

界定同性恋男性气质的不是以上三点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它们的交互联系。因为他们最初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结合——无论结合的束缚多有限，同性恋者将性领域封闭在同性之间的行为有它自己的特征，在选择新的欲望对象上，男同性恋者并不比异性恋男人来得容易。他们的欲望被现存性别秩序所限定。亚当·辛格全力关注的不是男性身体，而是行事女人气的阳刚之躯。迪安·卡林顿的性欲是用性别标准来解读身体的性别（也就是说，不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解读身体的差异和相似；引起他注意的是乳房，我们文化中的一个主要性别象征）。这种性别化的性欲是城市同性恋社团的形成基础，这些男人不得不寄身于该社团——有时它带来困难，例如，艾伦·安德鲁斯在酒吧的经历；有时它带来解脱——因为它是同性恋男性的主要标志。

假如一种男性气质按照这种方式被建构，它的历史方向是什么？它开启或是抹去了那些可能性？

人们更容易把这些男人看作历史的造物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同性恋者私人化的政治对性别关系状态几乎没有影响。在他们看来，迪安·卡林顿加入同性恋社团是不同环境之间的一段旅程，这段生命历程只是预设的一种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卡林顿经历的环境已经形成。这些男人处于接纳、谋求或是拒绝同性恋认同、同性恋交易、同性恋性网络和社会网络，所有这些

他们遇到的事先已经有了。十年后，他们继承的是由同性恋解放者和20世纪70年代的“红色资本家”造就的世界，那一代人如今叫艾滋病给毁了。他们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感觉，或者说没有投身于这段历史的感觉。

这幅图景和布拉谢福尔德用理论语言表述的受控空间确实相似。他认为同性恋政治完成的社会变迁是极其有限的。这些男人的性别化的性欲，其中大多数人保持的男性气质的社会存在，他们对隐秘的二人关系的关注以及他们所缺乏的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所有这些均指向同一方向。这里没有对性别秩序的公开挑战。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通过其他的两种方式，同性恋开启了变迁的可能性。首先，通常作为社会控制形式被理论化的同性恋意识的真正具体化，对这些男人来说是一种自由。他们需要这种自由来抵消无处不在的、干扰他们生活的强制性异性恋观念。这使他们能够享受被禁止的快乐，体验他们性行为中的喜庆成份以及和其他男同性恋者建立长期关系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访谈群体中的长期性二人关系开始于一条老街，那是典型的寻找临时性幽会的地方。）

尽管这些男人中的大多数都有过和女人之间的性体验，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既不承认自己是双性恋，也不接受社会给予的这一定位。无论是个体人格还是对象选择，他们的参照点都是男性气质。

主流文化将男同性恋者定义为女人气。就我们这里访谈的男人而言，这个定义显然是错误的，这些人大部分的确“表现得像

个男人”。但是说他们对支配性男性气质大为愤怒却是事实。

他们选择对象的标准是男性气质，这一点改变了他们性格和社会存在的男性气质。这个改变是男权制社会中同性恋意识的结构性特征。在该社会中，支配性男性气质被界定为惟一的异性恋，其支配主义深入到对男孩们的培育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不打碎这种支配主义，一个人就难以成为同性恋。因此，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在主流男性气质的内容中，还混入了另外一些内容，比如达米安·乌思怀特艳丽的指甲，马克·理查兹的护士职业，艾伦·安德鲁斯和乔纳森·汉普登对女人的认同。

同性恋男性气质对结构化的性别秩序来说是一个悖论，正如当代西方体制是个悖论一样。这些生活史证据（以及其他类似的）表明，这个可能性的悖论已经被实现了，甚至成为惯常事物。这个群体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本身也显示出支配性男性气质之外另一种公共男性气质的稳定性。他们不必像前几代人那样，得为自己作为男同性恋者的真实存在而抗争。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在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构架中开始的。

性行为是同性恋和支配性男性气质之间的分水岭，性关系领域正处于潜在的激进变革之中。与异性恋关系相对的是，男同性恋的性关系显示出值得注意的互惠性。^①当然会有例外，但互惠性是作为理想被强调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实践。

互惠的条件是复杂的。它们包括伴侣们相差不大的年纪，共

^① 这项观察归功于苏·基帕克斯；对此康奈尔和基帕克斯（1990）提供了一些证据。

同的阶级地位（这两个条件艾伦·安德鲁斯的酒吧经历都缺乏），以及整个性别结构中共同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立最宝贵的那种关系——即长期的二人关系——的困难，也可能构成对性文化中的互惠的压力。最后，在性实践中身体被牵连到一种特定的方式：爱者与被爱者的镜像被迪安·卡林顿有力、无邪地表达出来，那里面，对他者身体的探索变成对自己身体的探索。

我们的访谈对象当然不是一伙革命者，但也不是完全的唯唯诺诺的人。这些“真正彻底的同性恋者”是性别政治中的异数。较年轻的男人们在他们工作单位和家庭里与年轻女性建立的友好、平和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性关系中的互惠意识，都预示了这些“异数”能够产生的变迁。

7. 理性的男人

第四章和第六章探讨了边缘性和从属性男性气质的有关内容。这一章我们将集中讨论共谋性和支配性男性气质，尤其是它们与理性相关联的变迁的可能性问题。

我们都很熟悉在男权制意识形态中，男性被认为是理性的，而女性则是情感性的。在欧洲哲学中这种假定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同时在性角色理论中这种认识也以工具和情感表现的二分对立形式出现，并且做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观念，广泛传播于大众文化的领域中。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和技术是进步的动力，在文化上这二者是男性的王国。支配性男性气质通过宣称体现了理性力量并因此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其实将支配性男性气质纯粹与身体侵犯等同起来是个错误。维克托·塞德勒对男权制文化的论述强调身体与精神的二分，以及男性权威的非理性一面——这一论断消除了第二章所讨论的男性体现理性的矛盾。^①

① 关于理性、男性气质和欧洲哲学的问题，参见塞德勒 1989 年的论著，关于工具和情感表现的二分参见帕森斯和巴勒斯 1956 年的作品，关于科学和技术文化的男性化过程参见伊斯利 1981，1983 年的作品。

迈克尔·温特和埃伦·罗伯特的文章开创性地提出男性和理性之间的结合是产生变革的关键。先进资本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商业理性的增长，而且整个文化也日益被技术理性所统治，技术理性关注手段的效率而非最终的结果。（美国的电视产业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证，它的令人眩目的技术以及巨大的资源只是制造了电视垃圾）。

温特和罗伯特认为当今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是被技术的生产组织合法化的，而非来自宗教或者强加的武力。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男性气质就被形塑以适应集体工作。反过来，公司及其训服文化将再次塑造整体的男性气质：

我们渐渐发现男性气质等同于一些特质，这种特质表现了个人的技术理性形式的内化，因为正是技术理性本身构成了当代社会抑制的主要形式。^①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理性化是现代文明史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清了它与性别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温特与罗伯特从技术理性的支配性入手，研究职业领域的方法显然是合理的。

但是他们的论题过于概括了；在现实中的职业世界比他们的想像更为复杂。在历史上有一个关于男性气质类形的重要区分，一种是直接支配类型（如集体管理，军事命令）；另一种是

^① 温特和罗伯特，1980，270。

技术知识类型（如专业，科学）。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秩序中，后者已经挑战了前者的霸权地位，当然现在还没有大获全胜。两者在支配性男性气质中或互相迁就或以一方为主而共存下来。

技术知识类型的男性气质在某些领域占统治地位，尤其是在相互对立的理论中提到的“新中产阶级”或新阶级、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以及技术结构和新的小资产阶级的职业世界。这些理论的共同主题都是讨论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兴起，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证书的倍增，专业和技能的影响及其职业文化。^① 在这里我建议理论应关注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男性，探讨理性的危机倾向，这些男性群体具备专门的技术但是缺乏财富、旧的专业地位或公司权利所赋予的社会权威。

以下的论述主要基于九个男性生命史的资料。他们的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其职业分别为：会计、建筑师、计算机技师、记者、图书管理员、飞行员、心理学家、教师和福利署的官员。他们中有四个人与妻子或情人住在一起，另外一个将要结婚，两个最近刚刚离婚，其余两位长期单身。

与前面的章节比起来，这一章选取了职业各异的研究对象。个案研究总是难于进行概括；我也意识到个案的选择过于任意了，但是我希望有充足的内容展开讨论。

^① 关于新中产阶级的著述颇丰，我觉得古尔德纳的观点十分有用，他强调高等教育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另外还可以参看夏普1983年的著作。

男性气质的建构

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与第五和第六章中的男性一样，从小生活在传统的家庭中。家里当雇员的父亲拥有权威，母亲呆在家里抚育子女，并处理家里的情感生活。（唐·梅雷迪思的情况是个例外，他的母亲与父亲离异，独自抚养孩子）。在这些个案中几乎没有一位双亲的婚姻似乎是温情的或相互支持的。

克里斯·阿吉里斯家的状况处于九个家庭的中间位置。“爸爸是个国王”，总是很冲动（却不怎么粗暴），在家里他是权威，属于那种“支配着你的生活”的人。妈妈则是“柔顺、充满慈爱的，总是很平静，给我们带来快乐。”妈妈站在幕后，是代理权威，她总说“我会告诉你们的父亲！”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阿吉里斯越来越觉得妈妈是个聪明人，十分善于左右形势；是父亲的贤内助。但是作为一个孩子他不可能怀疑到男性与女性的两极对立。

他站在了男性这一边，变成了学校里充满激情的成功的高中足球运动员，在同龄人中他总是表现得十分豪爽，还有些虚张声势。他认为自己只是不想过分地围着女人转。他有几个兄弟，他上了男子学校，以打球取乐。原则上他反对运动领域以外的任何暴力行动，成年以后他仍然关心足球。

保罗·保罗则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看待这些同龄人群体的。他是惟一的一位辛勤工作的、贫穷的工人阶级移民的子女。在他的家庭里始终是丈夫支配着妻子、母亲命令孩子的冷漠的等级式

的状况。他从父亲那里习得了对母亲的轻蔑。

他的父母亲试图让他通过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总是强迫他长时间地学习。在一个以运动为主的中学里这使他变得越来越孤立。他发现自己只有在同种族内才能获得一些支持。在那里他常嘲笑美国白人的男孩子们“故意地要装做一个男人——总是在女孩子面前炫耀他们的男人气。”保罗把美国白人与地中海人种对比，固执的认为美国人的生活“不是欧洲人生活方式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对男性气质的主要文化界定持有异议，那么他就远离了对于自己男性气质的批判。他现在准备娶本族社区里的一个年轻妇女为妻，并希望自己的妻子呆在家里照看孩子们，自己出外谋生。当然他偶尔也会洗洗尿布什么的，帮妻子一把。在他看来，这源于男人和女人在自然上的差异：

我相信一位女性从身体上和心理上更适合于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持家的小问题。当然，男性并不一定都十分强壮……但是……大多数都更渴望（不是过分要求）工作；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给家里带面包回来。

保罗对美国白人同龄群体的评论证明了另一个论题：反面范例的重要性。调查群体中有一半人都主动谈到了令他们感到不愉快，或者希望与之保持距离的“男人”或“男性气质”。休·特里劳尼的叙述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样的反面范例。这些人包括在学校里总得A的“讨厌鬼”，中学里一个同性恋举重运动员，解决自己生活问题都有困难的“没用的家伙”，“嬉皮士”（当他是

个冲浪迷的时候)，同性恋者，或者那些女人气的男孩，也包括在大学里与他一同打球的脑子比较笨的球员。

我从来没有被足球俱乐部这类的团体完全接纳，他们都是些身体强壮但沉默寡言的人。通常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你该怎么做事，如何谈论自己以及其他等等。我跟不踢球的家伙们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大部分时间都醉醺醺的，但他们十分机智且喜欢讽刺和挖苦，他们诋毁球员，骂他们是一群傻瓜。局外人也是一样，有些人会不同。但是，也会有一些像我一样（如你所知，根本不是笨蛋）的男孩踢球。因此我至少还感到有一些人与自己比较亲近。

休对各种人物形象的刻划极好地说明了男性气质的各种界定之间存在着关系。保罗的评论印证了这一点，也显示了个人的男性气质界定不是一个孤立的，而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建构。在他的例子中是青少年时代种族的同龄群体，以及直接与他的婚姻相关联的整个种族网络建构了他的男性气质。

唐·梅雷迪思叙述了一群寄宿学校的男性职工建构性别的情况。

教员一般都非常喜欢运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曾经有一个一流的球手，他是那种对人非常友好，十分易于接近的人，大家都很喜欢与他交往。但是他是个极端的性别歧视主义者。人们似乎都受了他的影响，并且影响了整个教工宿舍

的气氛。人们喜欢开玩笑，喜欢寻欢作乐而且太过于……谈到国家的文化方面，他们确实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妇女，他们非常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有性别歧视。他们喜欢和女人调情，与女人闹着玩儿——他们认为我不是可以和他们做那种事的人。

这个一流球手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可以依赖于世俗的、甚至是妇女的支持。唐与性别歧视者不和，那些人认为他“太严肃”了。

被访者的叙述揭示了男性化过程的不同后果。查尔斯·劳伦斯向上流动到一个高技术的工厂，他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安排几乎是其父亲的翻版。他对于性别二分有一种完全传统的观念：“我从来没能理解一个女性，真的，也不知道她们的想法。”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对妻子评价的可信度，她说她是“一个极其有奉献精神的女子与母亲。”

其他的受访者在重建支配性男性气质时都遇到了麻烦。彼得·布拉克回忆他来到新学校时的感受：

他们期望你将成为男人领袖以及诸如此类的瞎话。有人明确的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大礼堂彩旗飘扬，这些旗子属于过去那些血痕累累的殖民地与国家。各种纪念物表达了对那些死于战争中的年轻人、110和115集团军的将领、最伟大的战争辩护人和发言人的崇敬，在他们看来，这才是一种经典的澳大利亚模式，一个公立英语学校的礼堂就应该是这

样，我的确不喜欢这些东西。

彼得也是一个足球选手，他的不同政见来自激进主义——这是在越战时期——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家庭中，因此养成了不介入的习惯，能够从感情上疏远传统政治的影响。直到成年以后他仍然飘忽不定，只是在一段时间参与过一个学生组织的活动。

理性的建构

对中产阶级的讨论强调指出，作为文化和制度体系的一部分，正式教育的比重日益加大。我所研究的这个群体中的男性都接受了中学毕业后的训练，大多数都上了大学。考虑到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的选拔性，他们都可以算做中学时代，高中生中的佼佼者。然而有两种界定专业能力的不同标准。

格雷格·布鲁克现在是计算机技师，回忆初中时代的表现时，他说自己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不停地吸收知识，在班里总是遥遥领先。后来被选进了重点班，这样的班级在高年级选出来，班里的学生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高中上大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升迁。他的母亲是个酒吧女招待，父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因为缺钱买一个商店，所以只能在货车上卖东西赚钱。

这就是格雷格如何进入职业世界的个人故事。从制度的角度看，它揭示了教育系统做了将“有智慧的”少数人提拔上来的安排。这就是重点班和选拔人才进入大学的所有内容。格雷格能成

为一名技术工人，以及作为一个人的成长是由这种制度界定他是天才的结果。他将这种原则带到了自己的性别关系中，一向对于女人十分“挑剔”，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他最欣赏女孩子的聪明，认为智慧是女性的一种吸引力。在格雷格的眼中，人们在关系市场中受到检验和评估：

至于我个人，我想自己比一般人优秀一点，我也在寻找那些高于一般人的东西。我的水平可能越来越高——尽量如此。

查尔斯·劳伦斯不同，他在校期间涉足了許多运动，但是并不出色。他急切的希望当一个飞行员。他申请了飞行职业培训，因为没有学习成绩而未被录取。家里人逼着他去上大学，他没认真学，却攒够了去飞行学校的钱。后来终于成了合格的飞行员，但由于经济衰退很快失业了，不得已又回到大学度过了几个月不愉快的学生生活，“最终，我决定如果我要飞，我就会飞”，他进了空军坚持飞行训练。

在空军里他发现了一种不同的教育，这种教育把受训者与制度和技術以粗暴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你正生活和呼吸在飞行中，在空军队伍里。”他对此持冷淡态度，虽然不喜欢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好像很有效。受训者从前的知识结构被忽视。在那里有许多压力，许多负面的反馈，也有一种被选中为精英的感觉——只有 1/5 的人能通过。同时受训者要与他人、与长官搞好关系，时刻保持热情，长时间工作、遵守空军的各项规定。军队

希望他们统统在基地周围结婚、生活，以家长式的思路持家，妻子也一同嫁给工作。

查尔斯拒绝空军这种全面的管束。他与肤浅的友谊保持距离，很快离开了空军去了民航工作。他现在升了级，正在工作中接受培训，有望提升为机长。

这两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专业技能的界定与获得的不同方式。格雷格是主流的教育评估系统对一般知识天才进行鼓励的受益者。只要拥有他的学校记录就可以在任何领域接受训练，找到工作。具体到哪一个领域是不重要的，在访谈中，他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具体的工作领域对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影响。

相反，查尔斯有一种强烈的职业意识。他整个人都卷了进去，然而这也与社会脱不了干系，它包含了一个家庭的活动。母亲为他设法找了一所飞行学校，父亲则为他付学费。一旦走进飞行世界中，尤其是参加了空军，他就进入到了严格的选拔过程，这一过程把他推入了制度的模式中。

特殊技能与一般技能在内容和制度基础上都有所不同。查尔斯与其他的回答人不同，他表现了对正式教育的公开怀疑。他将自己与学校中那些“真正聪明的小伙子”相区别，并且坚信像他父亲那样的“才智”只是一般的资质和行为，并不重要。

但是查尔斯对于飞行的经验和技術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将“对飞行很有用”。空军飞行员群体与他们的飞行同呼吸共命运。空军也努力地培植这种关系，以保持军人们的热情并促使他们学习技能。军队是个严重男性化和异性恋的群体（直到1992年同性恋者一经暴露都要从军队中除名）。尽管查尔斯极力不让自己完全

纳入到这种环境中去，但是他的技术背景显然有利于他转入民航系统。他现在十分认同于自己所在的航班技术小群体，这些人在一起交往，与“机组成员”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性别的。在查尔斯眼中，机组成员由妇女和女性化的男人组成，他要与他们保持距离。

技术群体的模式维护了专业技能强烈的男性气质属性，在其他产业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辛西娅·科伯恩所做的英国新工程技术的研究。^①查尔斯的职业世界几乎是工具理性的原形表现，重构男性气质在这里没什么压力。实际上，关注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工具理性限制了理性分析的能力，这就使性别关系免于批判。

然而，职业知识不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不断产生。彼得·斯特雷克福斯是一个为人们提供咨询的心理学家，在进行了专业学习之后他又经过了再训练。他始终朝着心理学的人文关怀努力。在这方面许多革新和实验不断涌现。他参与了第五章和第六章提到的成长运动。

成长运动为斯特雷克福斯这样有自己专业的人提供了技术同龄群体。这些群体有自己专门的制度和场所，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各种理念和技术争相传播。这个群体不像查尔斯的群体那样男性化。许多治疗师都是女性，因此群体在思想上是赞成女性主义的。而且，对于性别有一定的反思。性和性别关系是治疗和工作场所中的主题。治疗师的工作经常将技术运用到对男性气质

^① 科伯恩 1985。

的改革中。因此技术理性可以用于改革。

职业与工作场所

哈贝马斯已经讨论过文化的理性化将给资本主义带来一种动机的危机，这将破坏经济运转和政治承诺的文化理性。^①通过性别的刺激作用，支配性和共谋性男性气质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大约一半的被调查者有情感上极为投入的职业。查尔斯和斯特雷克福斯就是例证，斯特雷克福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转过向，可能更为典型。

另外半数的男性虽有职业，但是相比较而言其情感上是空虚的。彼得解释说他的工作并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依赖的东西：

我知道自己不喜欢教书，也清楚自己不想做一个私人企业的雇员，更不指望在公共服务中爬上什么可笑的高位。

因此，他当了图书管理员。克莱德·沃森根本没有“选择”从事会计的工作，他父亲在那里挣钱，他就到那儿工作。他现在正在攻读商业学位，对他来说，这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上的困难，更不面临道德上的挑战。其间，他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目标”而学会了一些管理上的行话，克莱德用这个来解释他与女人们没什

^① 哈贝马斯，1976，第二部分，第七章。

么亲近关系（他们之间的个人目标是互不相容的）和他的哥哥很没用的原因（他不会激励自己）。除此之外，他的精神生活非常贫乏。

如果这是商业教育的一个任意的例子，人们可以推论说动机危机正大行其道。但是哈贝马斯的论述低估了机构在集体水平上组织实践的能力。在不过多涉及个人动机的情况下，理性依然可以通过工作场所的结构获得，访谈记录表明这种情况有两种类型。

查尔斯在一个有严格分工和层次清楚的等级机构中工作得非常愉快。在他们那儿，技术组与机组成员，二副/大副/机长都分得一清二楚。彼得·布拉克曾在驾驶员座舱的外面工作过一阵，后来他开始飞行工作后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反文化的震撼。

从一个留长发，蓄胡子，吸毒，吃着蘑菇的地方到一个保守的世界中，在那儿你的胡子不能超过嘴角，还得一天24小时飞。真是紧张啊。

在这种官僚组织机构中，高级知识水准应该集中在顶层，正式权威和严格的社会控制保证组织的理性。

第二种类型的工作场所关注共同目标，而非正式的命令。克里斯·阿吉里斯开始时在税务局公共服务部工作，他烦极了。现在他管理的那个小的福利部强调员工之间随意、平等以及共享资源。这一举措希望能提供更好的方略和服务。这与第五章提到的环保运动办公室的风格很相像。克里斯在集体的大家庭中学会了

这种模式，在福利机构中使之强化。但是这种风格很容易被沉重的工作压力破坏（克里斯被逼得要“疯了”，不得不一周工作4天），监督委员会也要求克里斯的部门像正式部门一样，提交账目统计。

这种工作场所的风格决不仅仅限于那些进步组织。克莱德·沃森为处在金融产业边缘的一个小公司做账。在采访中，他详细描述了这个公司，认为它是自由运转的、流动的、“放松的”理想工作场所。在那儿几乎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有很细微的劳动区分，每一项任务和安排都协商解决。克莱德为了强调他个人的重要性可能夸大了这个组织的流动性，从他讲的几个故事里，我们很容易发现那儿有老板，克莱德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但是他叙述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在这个公司中有一种反官僚的管理方式，指令含糊，地位也是可商讨的。在投机行为盛行的80年代，金融业中的杰出人士通常采用这种管理方式。克莱德的故事与苹果计算机公司早期的情况很类似，不同的是规模，苹果当初是一个由迈克尔·米尔肯掌握的低档债券企业。^①

回答人对工作场所的管理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令人有些吃惊的是，大多数回答人对专家与权威之间的关系总是有同样的见解。无论是查尔斯如何拒绝忍受空军长官的重压，还是克里斯在税务局中生死挣扎，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能否避开权威或者与其保持距离。回答人对权威的一般态度是批判性的，有些被访者甚至

^① 关于苹果电脑公司的情况，参见罗萨克1986年的作品；有关低档债券公司的情况，见怀思和科尔1991年的作品。

精心编撰了一些有关权威和严厉老板的恐怖故事。

但是这些人大都是职业结构中的男人。如果没有死亡或破产，他们会及时地往上爬，获得对其他工人的权威。其中几位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在一个查尔斯工作的那样的等级组织中，这是非常自然的，别的地方情况未必是这样。

彼得·布拉克是一个有意冒犯成规的人，是学生时代的激进派，蓄着胡子，做为空中服务员虽然有一些小动作但还没有碰到什么麻烦。现在他是图书管员，管理着一些职工。他不喜欢劳动分工，因为有等级关系的缘故他也不喜欢用秘书。他正在如何监督其他职员的问题上大伤脑筋，努力想让他实际的权威和他的信念相协调。目前他的结论是，需要强调“沟通和交往”。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专长和工厂中的等级制关系是所有回答人面对的难题。技术理性似乎没有完全整合到等级制的社会秩序中来。彼得的艰难妥协或许是可能的出路。

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当工作场所的男性权威的技术理性不和谐时，知识型男性异性恋者会在一些问题上分裂为不同派别。妇女平等受雇机会的权利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就管理理性而言，应该把合适的人才放在适当的岗位上。但是妇女们进入从前是男性俱乐部的地方，就破坏了技术工场的男性文化。男性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派别会导致各种政治，这是很有意义的。

非理性

由此看来，工作场所的理性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有问题的。

在其他生活领域中，那种将男性气质与理性等同的观点更是受到挑战。我们不能回避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具体行为，尤其是性行为，传统的观点将之视为界定男性气质的重要依据和对理性控制的严重威胁。

被调查群体中的男性都成长在强制异性恋的环境中，与他们的访谈记录了强烈异性恋的文化对人身的压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并非鲜见的同性恋经验就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孩提时代性好奇的和成年以后的同性恋经验。实际上，这个群体成员的性经验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有一些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有了非常活跃的性生活，比如，休·特里劳尼在大学时的“情欲旺盛的时期”。其他人没有童年时代情欲旺盛的回忆，他们直到现在都对性生活非常节制。有一些人的性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例行公事，例如保罗·查尔斯。另一些人如斯特雷克福斯经历了性行为的转向并视其为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尽管个人的性实践各有不同，但他们都经历了同一种性文化。作为成长在一个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的男孩子都感受过对性的压制态度。他们的父母大都没有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他们最多是在教堂里聆听有关性方面的禁律。如果他们在童年时有主动的性生活，也是小心谨慎、遮遮掩掩的从中取乐。

性通常变成了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紧张和焦虑的源泉。唐·梅雷迪思总是在晚上偷听父亲与女管家做爱。高中时，他迷恋女孩子但在汽车上从不坐在她们身旁。大学时代，他非常崇拜那些年轻的女性主义者，但是从来不敢接近她们：“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能吸引女人。”唐在失去童贞之前的性关系没有令他彻底

绝望，他在回忆的时候用一种滑稽的但精心组织的方式进行叙述。即使有了成功的性行为之后，他仍然没有脱离困境，他发现自己不能射精，对此非常着急，甚至考虑进行催眠治疗，他在提到分手的女伴时说：“这个对她好像无所谓。”

性行为本身并不是产生情感破裂（非理性的）的根源，但是它可能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这在个人生命史中非常常见。

潜在的情感破裂可以通过不同的反身策略加以解决。比如，在生命的一个时期内将性行为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预先制止非理性的产生。保罗就是这么干的，前面提到过，他就要结婚了。由于自己种族社区的压力，他有责任在婚前保证自己和未婚妻的贞洁不遭破坏，放纵性欲是“丢人的”事。尽管他们两个人有过相互抚摸的狂热场面，但是那女孩儿总是在一切都发生之前打断它。这种困境和解决办法是集体实践的结果。

性行为也可以通过协商，产生新的互动模式。唐失去了童贞以后，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性模式。他努力地考虑对方的感受，延长前戏和事后交谈的时间，并加入手交的性技巧。

强调协商和男女之间的相互取悦是被访群体共同的性规范。格雷格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总是尽可能地让对方高兴，很少粗暴的进入并且说：“这回该我了，该死……这次看我的，下星期是你的。”有趣的是，我找的女人大都也这样。

在最近刚刚结束的关系里，他觉得沟通不够，现在他试着进

一步改善：

我和上一位女士的关系就是如此。我决定要好好地干，如果我爱她，我会不时地告诉她我的感受，别等上一个月、一个星期哪怕是一天，该说的时候随时把它说出来。这么干我觉得挺不错，我想自己变得更诚实了，所以得到了更多积极的回应。由于我的诚实，对方也突然诚实起来。如果她们不这么做，我不会忽略此事，而是和她们断绝交往。

其实很难达到均衡的状态。商量可能包含性伙伴之间的激烈争执。斯特雷克福斯在 70 年代中期性解放的影响下，要求他的妻子安同意“开放婚姻”。安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他总是先和她性交，然后再征求她的同意。后来，安不干了，于是“一切乱套了”。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斯特雷克福斯就开始与安的女友交往，“为此她特别伤心”。他们经过彻夜的讨论，其结果是订了以下几条规矩：不许在家里与其他人偷情；必须让对方知道事情的进展。后来这样的事慢慢销声匿迹了。斯特雷克福斯说自己现在很“孤独”。

最后，性行为可能会变得具体化。休·特里劳尼自己弄出来的伤口和他准备改变的计划在第二章已经提到过了，现在他的部分时间为一家色情杂志工作。特里劳尼为自己辩解说“我想是有一点冒险”但是也能从中得到乐趣。其他人对他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在聚会里有人问他有没有与模特们上过床。

刚开始这份好奇有点儿刺激。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烦了。

在他的工作场所，性行为被日常工作和玩笑搞的不那么令人兴奋了。休强调自己工作的新闻性质，努力把它办成一般的新闻报道。

休对自我判断的明显不安情绪显示了工具理性力量的限度。他一直有一种认识：觉得我们不应该如此对待作为人类经验领域之一的性关系。在这里，理性化过程遇到了它还没能克服的道德秩序问题。^①

在性关系之外的其他领域，我们也同样看到了理性化的局限，甚至是被非理性完全取代，最突出的例子来自查尔斯·劳伦斯。这个在高度理性化的航天工业中负责技术的专家经常非常地迷信。他给大家举过去千里眼的例子，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运气”，经常买彩票，在某些时候还非常的宿命（讲到这儿，我想起了自己最近一次乘坐美国航班，他们的飞行手册上包含了各种星象算命的内容）。看起来好像技术体现的理性已经被挤出了行动者的意识，留下的是一个由机缘和神秘力量控制的世界。

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中当然存在广泛的非理性主义潮流。星相学是其始祖。新世纪崇拜的扩散和原教旨宗教的复兴是当代美国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以及支持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人数增多也同样令人瞩目。神话诗般的男人运动

^① 普尔（1991）对此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就是这一现象的一部分，它与新世纪崇拜交叠在一起，反对理性，试图重获男性的原初情感。被访问群体中没有与这些运动有关联的人，因为在澳大利亚这种运动还不明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受访者的言行找到它在其他国家里从中产阶级中获得听众的答案。

理性和变迁

在这些受访者生活的某些方面，理性是受限制的或者说是有争议的。我们没有发现支配性男性气质和先进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的职业之间存在直接的协调关系。

实际上，受访者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明显的抵制变迁的情绪。比如查尔斯·劳伦斯和保罗·尼古拉奥就反对性别关系的变化，坚持一种由传统的劳动分工和婚姻制度支撑的保守的性意识。其他人被迫在工作场所重新协商自己的男性地位，当然这种协商不是一帆风顺的。像查尔斯和保罗一样，格雷格·布鲁克有一种天生的性别意识。

我觉得女性主义运动走得太远了。因为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必须是女人。那些顽固的女性主义者走过了头，把妇女变成了非实体的东西。她们不再是女人了。

格雷格表示，他在各方面都可以容忍同龄的（真正）女性和同性恋者，只要“他们中规中矩”。

与查尔斯和保罗不同的是，格雷格不得不面对自己工作中的女性权威。他在自己姐姐的公司里任职，他的姐姐总是端着老板架子，在经营问题上从不听他的劝告。紧张的关系已经存在：

我完全僵住了，全身的肌肉都被锁定了，我要疯了。那时我在女朋友的房子外边，像往常一样坐在车里。突然，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上肢动不了了。我的手粘在了方向盘上，一小时的时间过去了，不能动弹一下。我没办法放松。我的女朋友说：“来，放松，别紧张，如果你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想做什么都行，放松一点，你感觉怎么样，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塞住了。”

这是很多因素——男性气质在身体上的记忆、性别分工在情感上的反应，冲突对象的转移——凑在了一起的缘故。格雷格情感危机锁定在汽车方向盘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在汽车与青年男性气质之间存在某种象征性联系，而且他的姐姐拒绝了他掌管公司业务的企图。

纯粹的经济理性与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权威是不兼容的。这也是男女机会平等在职业改革中遇到的困境。工作场所的工具理性是唯一能够改变性别关系模式的力量。从格雷格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消除支配性男性气质没有其他的途径。

所有受访者都认识到，无论他们抵制还是欢迎，性别关系已经并继续发生着改变。有些人勉强接受了这种变化。彼得·斯特雷克福斯说他现在已经承担了更多的家务：

我干了不少过去是女人干的事，打扫房间，煮饭，洗衣服等等。

但是他指责自己的妻子并没有做那些男人做的事，比如劈柴，修机器。他十分不满女性主义者：

现在我非常厌恶在那些女人们中间流行的她们如何包揽了所有的事，如何相信平等之类的胡言乱语。她们根本不知道量杆在引擎的什么地方，老兄，她们也不想找到它。我要抱怨的就是这些。

在某些情况下，拥护男性气质改革也是通向理性的途径。休·特里劳尼就是这样。在经历了严重的身体和情感危机之后，他感到自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我重新考察了自己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我的竞争性的地位意识。尤其是重新思考了与妇女相处的问题。我觉得自己丧失了对以下两种观点的批判：一个是自动的将女性看作低人一等，另一个是女性不应该得到同等的报酬。在灵魂深处，我其实是个沙文主义者。我还把性/爱之类的事当作游戏，可笑的游戏，和足球差不多。

因此休开始改变自己，决定更多的聆听别人说话，培养同情心，重新构建和别人的关系，对其他他人更开放一些，平和一些，

少点儿竞争性。

我走出自己的老路，不再锋芒毕露，我要做我自己，做一个人。人们仍在寻找我的弱点，我也努力让他们多提意见。我要做一个人而不是机器。过去我的目的几乎是非人性的，因为做到非人性就可以免去生活中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些普通情感问题，像机器一样的东西是没有这种麻烦的。

休的方式方法和第五章提到的改革男性气质的思路一样。但是实践中，休做得并不那么彻底。他还是坚持“一夜情”，拒绝承担责任（还是个逃兵），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清楚同龄的女性有很多。他意识到了女性主义者对他这样的男性的批评，对此他很反感并反对。他认为只要自己不欺骗女人，他的所做所为就是正当的。他把性革命和女性主义分开，诋毁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那是要杀掉所有的男人。

休也不赞成同性恋解放运动，称那些人是“肛交痞”。接着他又赶紧补充说他觉得同性恋们做的事没什么不好。后来他对那些关心窗帘颜色的女人味的男同性恋者发了一大通牢骚。他赞成改变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反对男性的“竞争……一些人就是因为参与竞争而令人厌恶。”由于为色情杂志工作，无论他的个人意向如何，他所做的都篡改了女性的性行为，使男人的掠夺性异性恋合法化。

从我的记叙可以看出，在休的身上，良好的意图、晦涩的语言、恐惧、谴责、糟糕的信仰混为一体。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源明

显在于他试图在不触动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改变社会结构造就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在文章的开头，我提到过理性是现代家长制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关键的部分。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合法性。我们从以上个人生命史获得的证据足以证明理性在性别关系中是一个扰动因素。其社会形式（如市场理性和法律平等）破坏了性别等级关系，为女性要求平等地位提供了支持。在知识为基础的工作场所，理性的制度化侵蚀了权威的地位，造成了支配性男性气质内的紧张。尽管技术理性没有言明它的最终目标，但是它可能被发动起来改革性别关系。

总而言之，支配性和共谋性的男性气质并不比边缘性和从属性男性气质更稳固。在这些个案中，尽管只是反应了他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我们还是看到了家庭男权制和新型的性关系之间的冲突，以及一般的和特殊的专家之间的差异；平等的和等级制的工作场所的矛盾，支持和敌视女性主义观念之间的对立。我们甚至看到了公认的改革男性气质和使之现代化的种种尝试，尽管它们只是出现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第三部分我试图解释男性气质政治的变迁，因此读者有必要记住这些复杂的情况。

第三部分

历史和政治

詠
乎
知
覺

PDG

詠
乎
知
覺

PDG

8. 男性气质的历史

我已经强调了男性气质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形成，而且总是顺应变迁的。概言之，男性气质是历史性的，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充分的表述，他们的工作在第一章里讨论过。但是迄今为止尚缺乏历史深度和适当规模。

为了理解男性气质的现行模式，我们需要回顾它得以形成的整个时间段。由于男性气质只能存在于性别关系的总体结构中，所以总体上讲，我们需要将之定位在现代的性别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一个延续了四个世纪的过程。近期出版的关于男性气质的地区性历史提供了实质性的细节，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进行扩展性的探讨。

将这一主题的重点和至关重要的联系做出了明晰分析的主要是民族志对以下方面的研究：欧洲和北美势力的空前扩张，全球性帝国的构建和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不同性别秩序在殖民地世界的不平等碰撞。我说的是“联系”而非“背景”，是因为男性气质不仅仅由帝国的扩张得以形成，而且也在这一扩张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后者的形成有所助益。

大众文化不加提示地告诉我们这一点：男性气质的范例，不

论是传说的还是真实的——从加拿大的保罗·班扬（传说中的伐木巨匠，具有超人的能力——译者注），美国的大卫·克劳克特，到英国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经常是屹立在战场上的男性。我在澳大利亚参加过的一个游戏，其中我担当一个男孩的角色，这个游戏极不寻常，重现了在北美的帝国扩张时期，“牛仔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边疆战争。它以喜剧形式和好莱坞男性形象横渡太平洋，传入澳洲。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也是全球性的联系，我们就不可能从个人层面上清楚男性气质和暴力之间的联系。欧洲/北美的各种男性气质都与世界范围的暴力密切相关，通过这种暴力，欧洲/北美文化得以占据支配地位。

接下去只能是一段庞杂历史的概述。但是了解男性气质大致的历史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与我们现在的境遇有显著的关系。

在现代的性别秩序形成过程中 男性气质的产生

大约在1450~1650年这一段时期（“漫长”的1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劳代尔的一个很有用的术语），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北大西洋为核心的地带形成，而现代性别秩序也在这一地区开始成型。对于我们现在称为“男性气质”的社会实践的形成而言，有四项发展似乎是相当重要的。

第一项发展是文化变迁，它导致了欧洲大城市对性和人格的新的理解。当中世纪天主教已为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的扩展而陷

入混乱之时，长时期形成的关于个人生活的权威观念也同样面临困境。禁欲制度崩溃了，控制理性世界和规范日常生活的宗教力量开始了缓慢的、不乏反抗的，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衰落。

一方面，这一变迁为日益增长的强调配偶家庭的文化开启了道路——马丁·路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是一位结婚的修士。作为性行为最光荣的形式，异性婚姻推翻了修道院对它的否定。紧随这一变化之后，强制性的异性性行为成为权威文化。

另一方面，强调个性表达和个人与上帝直接联系导致了个人主义和自主的自我。这二者是男性气质观念的文化先决条件，正如在第三章里详细说明的那样，有一种类型的人，其性别特性正是他（或她——具有男子气概的女性）行动的原因。正如维克托·塞德勒所指出的，从康德到笛卡儿的经典哲学，都是站在自然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对立面，阐述理智和科学的。随着男性气质被定义为体现理性的性格结构，以及西方文明被界定为蒙昧世界的启蒙者，男权制的合法性与帝国的合法性之间的文化关联形成了^①。

第二项发展是由大西洋沿岸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法国和英国建立的跨洋帝国。（俄国和美国的陆上帝国；以及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跨洋帝国，是在帝国主义扩展的第二波中形成的。）

帝国作为男性职业——从军和贸易——的产物，从一开始就

^① 关于原因，男性气质和经典哲学，请参阅塞德勒 1989，第二章。弗洛姆（1942）率先探讨了这里简略论述的一些主题。

带有性别的特点。去往殖民地的欧洲妇女基本上都是男性控制下的家庭内的妻子和佣人。除了少数君主（特别是伊莎贝拉和伊丽莎白），统治新帝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元首完全是男性，他们制定的国策依赖于组织起来的男性身体提供的力量。

正如他们在西班牙的称呼那样——“征服者”，这些在殖民地边陲提供力量的男性，也许是第一个可以在作为男性文化类型的现代意涵上定义的群体。征服者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关系的形象，经常在夺取土地、黄金和强迫土著的宗教皈依过程中使用极度暴力，帝国政府对他们也难于控制（皇室和墨西哥征服者西班牙人赫尔南·科特斯之间的敌视是臭名昭著的）。在帝国历史中，对边境控制的丧失是不断重现的主题，而且与征服者的男性气质类型紧密关联。

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与征服的伦理道德的冲突以及控制局势的需要。巴特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他的《印第安人灭绝的简要论述》中指出，大屠杀源于西班牙征服者失去控制的力量，他的著名论断对男性气质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从全世界来看，最大的、不知足的贪婪和野心是他们的罪行的根源。”拉斯卡萨斯的修辞从文学上来说是有恰当的。征服者的暴行是世界上的新事物，而且他的著作是对一个正在浮现的性别行为最早的拓展性批评^①。

第三项关键的发展是作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成长，

^① 拉斯·卡萨斯 1992, [1552]: 31。并不是说他的批评运用了性别术语；性别是在天主教福音传道和政治道德的语言中出现的。

如著名的安特卫普、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为日常生活创造了新环境。与边陲或乡村比较，城市更富有条理性，但失去了个性。

这一变迁导致的重要性别后果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才能察觉，但是我要在这里简要提一下。日常生活状况的变化可能产生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通过贸易、奴隶和殖民地获得的财富积累的过程中，相应的计算理性开始渗进城市文化。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是“新教理论”的发展，从他的文章中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性别特质是有趣的。韦伯的第一个范例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且引用了他的一段文字：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 5 点或晚上 8 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

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男人。企业家文化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将男性气质形式制度化，创建了到账房、仓库和交易中性别化的劳动和权利，并加以合法化。

但是在商业城市里，这并非性别的惟一变化。同一时期出现了性的亚文化。最好的例子是 18 世纪伦敦的莫莉屋，“莫莉”成为一个俚语，用来形容女人气的男性，他们在特殊的房屋和酒馆里碰头，而且他们的性别实践包括穿异性服装，一起跳舞和彼此之间的性行为。

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记录了医学上有关性别观念的一个变

化，在较早时期，性变态被随意地归结为雌雄同体。到了较近的时期，一种针对身体的清晰的两分法成为假定，性变态因此被看作性别的异常现象。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有个人身份，作为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而非简单地社会秩序中，作为一个雄性或雌性（或雌雄同体）的身体，这一要求在欧洲文化中定型。18世纪末，与男性的认识相反，玛丽·沃斯托克拉夫特对女性性别特性的社会基础的理解，为她的《为妇女权利辩护》一书提供了中心论点^①。

第四项发展是大规模欧洲内战的肇始。16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逐渐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王朝战争所取代，并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不是少数几个国王和主教的重新排位。这些战争动摇了性别秩序的合法性。革命斗争导致的阶级秩序的天翻地覆，同样可能发生在性别秩序中。在英语国家中，贵格会信徒最先公开保卫妇女的宗教平等权利，这是一个宗教政治流派，源于英国内战产生的剧变。他们不但声明这一原则，而且在实践中确实赋予妇女意义重大的、有组织的角色。

这一挑战没有成功（尽管有关历史流传下来）。通过欧洲战争的另一个成果——强大的中央政权——父权制秩序被巩固。在绝对君主时代，政权对男性力量加以大规模的制度化，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宗教和王朝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的征服战争中职

^① 对富兰克林的引证，请参阅书伯 1976，[1904~5]；49。关于莫莉屋，请参阅布雷 1984，第四章。关于身体与性别，请参阅特卢姆巴赫 1991；关于固定身份，请参阅福柯 1980b；关于性别化特征的形成，请参阅沃斯托克拉夫特 1975，[1792]。

业军队建立了。作为荣誉的标准，好战在中世纪的欧洲是骑士阶级的特征——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中对此进行了嘲讽。好战逐渐成为男性气质和民族主义的特征，在莎士比亚最富沙文主义的一出戏剧中可以看出这一转变：

冲呀，冲呀，你们最高贵的英国人，
在你们的血管里，流着久经沙场的祖先的热血！
就在这一带，你们的祖先，一个个都是盖世英雄，从早
厮杀到晚，
直到再找不见对手，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①

（《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到18世纪，至少在欧洲沿海国家和北美，我们可以说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男性气质——界定为与女性主义对立并在经济和国家中制度化的个人性别特性——的性别秩序已经产生并稳定下来。在这一时期，我们甚至可以界定一种支配性男性气质，并描

① 《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场。亨利五世的演讲是带阶级色彩的，这一演讲体现了他的角色在于关注贵族阶级。从此，“最高贵的”就是“贵族气”，有“贵族身份”的含义。就像塞万提斯那样，莎士比亚也擅长让豪迈气概黯然失色：

“荣誉能够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重装一条手臂吗？不。能够接触一个伤口的痛楚吗？不。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什么是荣誉？两个字。那两个字荣誉又是什么？一阵空气。好聪明的算计！”（《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一场——根据《莎士比亚全集》第五集朱生豪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译者注）

关于贵格会会员的故事，请参阅培根（1986，第一章）。

述一些它与从属性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

18世纪城市的文化变迁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注意，而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重要角色是一个世袭的地主贵族阶级，它在18世纪统治着北大西洋世界。乔治·华盛顿是这一阶级及其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著名范例。基于土地所有权，贵族男性气质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市场生产，提取租金），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商人那样严格的、理性的计算品质。

贵族男性气质也没有建立在以个人为单位的基础之上。土地所有权深深嵌入血缘关系之中；世系和个人一样是社会单元。例如，沃尔波尔（Walpole, 1676~1745年，英国政治家，第一任财政部大臣和国库秘书 1715~1717年和 1721~1742年，领导辉格党政府，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位首相，虽然直到1905年该职务才被正式承认——译者注）和皮特（Pitt, 1759~1806年，1783~1801年和 1804~1806年曾任英国首相。1800年他完成了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的联盟法案，但在为取得天主教徒释放的努力中失败——译者注）时代的英国政治大体上遵循家族的旨意，大家族通过赞助控制国家机构。英国在印度和北美的统治是在同样的方式下进行的。

贵族男性气质与政权密切整合。贵族提供地方管理（在英国政体中通过治安法官进行），并充实军事机构。贵族提供陆军和海军军官，而且经常亲自入伍。在直接卷入暴力和家族荣誉的交叉点上出现了决斗机制。情愿在一场具有潜在的致命后果的一对一战斗中面对敌手，是一项对贵族男性气质的重要考验。决斗是在名誉被冒犯时才会出现的对峙。

在这一意义上贵族男性气质是决然的、暴力的，但是他们在性别秩序整体上并不像后来那样受到严格管束。因此一个法国绅士德·伊昂可以从男性变为女性的性别，而无须担心社会的诮讽（虽然她的余生仍是外界猎奇的对象）。性关系，特别是与下层妇女的性关系是与地位相关的特权，曾经一度为“浪子”所庆幸。在萨德侯爵的作品中同性恋关系大体上还只是某些浪子的行为，由于他们被界定为男性的一种特殊类型，同性恋关系似乎逐渐被理解。

贵族男性气质还表现为对妇女的家庭权威，虽然妇女们积极从事于建立和维系贵族联盟的网络——简·奥斯丁的小说钟情于分析妇女这方面的谋略。

贵族男性气质涉及残酷对待含有大量人口的农业劳动力。尊严只属于贵族，社会阶层由此一分为二。控制是通过驱逐、监禁、鞭笞、流放和绞刑来实施的。这一暴力并非专门化的职业，从英格兰农村，乔治·华盛顿在维吉尼亚的奴隶庄园，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新殖民地——在那里，“鞭打牧师”萨缪尔·马斯登成为一个著名的治安法官——它只是地方管理的一个平常内容。^①

^① 对贵族男性气质的概述来自非常广泛的出处，但是以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主。关于德·伊昂，请参阅凯茨 1991；关于决斗，请参阅基尔南（1988）。关于贵族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劳动力的关系，请参阅康奈尔和欧文 1992，第二章。有意思的是，以放荡而最为著名的理论家德·萨德也是贵族阶级一分子。他把对鸡奸的老套观点表述为对邪恶的概括性狂热 1966，[1785]。

变 革

跨越最近 200 年历史的欧洲/美国男性气质可以广泛地理解为贵族男性气质破裂的产物，它逐渐被新的支配性形式所取代，并衍生出一系列从属性和边缘性的男性气质。这些变迁的原因庞杂晦涩，但是我要提出三个主要原因：女性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工业资本主义中性别分化的积聚过程，以及帝国的权力关系。

现在，来自女性的挑战已经得到很好的描述。19 世纪目睹了性别政治的一项历史性变迁，它表现为一种群众政治形式的女性运动的兴起——一项在公共领域进行的为了女性权利的动员，特别是参政权。这是与自由国家的成长及其对公民概念的信赖相关联的。

但是女性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并没有局限于参政运动，后者仅涉及有限的范畴。19 世纪初期，贵族和中产阶级妇女积极参与道德和家庭习俗的改革，向贵族男性的性特权进行激烈抗争。当工厂体系形成后，工人阶级妇女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赖。19 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妇女通过节欲运动，再一次向男性的性特权发出挑战。男权制得以维系的环境由于这些挑战而变迁，因此，支配性男性气质也会相应地变化。

随着工业经济和官僚制政府（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独裁的）的发展，拥有土地的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衰落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贵族进行了有效的最后抵抗。例如，普鲁士贵族——容克将德国政权把持到 20 世纪。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贵

族男性气质的一些形式传递给资产阶级男性。历史学家罗伯特·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证据：以决斗为代表的令人不快的社会礼法传递给法国资产阶级。在 19 世纪晚期，法国的决斗数量确实有所上升，而且一项作为决斗教师的职业得到发展，他们促使男性接受社会礼法并学习击剑技巧。^①

虽然一些男性死于决斗，但基本上这是通过暴力对男性气质的象征性界定。真实的战争越来越多。用于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大批部队开始成为常规军队，永久性的军官阶层也随之出现。军官最初从贵族中招募，成为男性气质的贵族标志的储藏室，普鲁士军官团成为其中最著名的范例。（20 世纪 40 年代，希特勒的将军们基本上还是来自这一背景。）但是其社会背景改变了。新的军官集团是职业化的，在军校里接受训练。

这样，暴力与理性、科层制的组织方法，以及武器和运输领域的持续技术进展相结合了。为了将武装力量置于以技术知识为中心的控制之下，武装力量被重组，总参谋部是一个普鲁士人创造的机构，而且为胆战心惊的列强所仿效。如果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可以被视为有关现代早期男性气质的关键性文献，那么 19 世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名著《战争论》也许应该一并待之。这部著作显示了一种在最大可能程度上的、理性化的暴力的社会技术。克劳塞维茨是创建普鲁士新式军队的革新者之一。^②

像先进武器一样，这种科层制理性化的暴力的社会技术使得

① 奈 1993。

② 克劳塞维茨 1976，[1832]。关于普鲁士军官团，请参阅惠勒·贝内特 1953，关于总参谋部的概念，请参阅杜普伊 1977。

欧洲国家和殖民者在 19 世纪的殖民战争中所向披靡。但是这一技术也冒着摧毁其赖以维系的社会的风险。世界大战的空前毁灭性导致 1917 年至 1923 年的革命剧变。之后，又经历了十年的斗争，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秩序依靠法西斯运动才稳定下来。

在性别领域，法西斯主义就是对社会中男性霸权赤裸裸的重申，以反对妇女的平等权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新形象，颂扬非理性（与“血统”相联系的、“意志”的胜利）以及前线士兵的无限制暴力。其后果不久就导致一场新的、更具毁灭性的全球战争。^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失败，终止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回潮。但是这当然没有结束暴力科层制的制度化。希特勒曾亲自将其武装力量加以现代化，而且是一个高科技武器的狂热者；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支持理性化。1945 年取得胜利的红军和盟军的武装力量，在核武库建立之后，继续发展它们的毁灭性力量。在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智利和美洲大部分地区，技术进展相对较弱的军队仍然是这些政权的政治基础。目前世界武装力量大概有 20000000 万人，绝大部分是男性，以北大西洋武装力量组织的军队为典范。

随着经济其他部门的技术专家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增长，19 世纪目睹了大规模初级学校的建立，而 20 世纪又有了公

^① 关于男性气质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起源中的意象，请参阅斯威赖特 1987；关于其在纳粹领导下的发展，请参阅曼维尔和弗伦克尔 1960。

共领域的中学和大学体系。研究所出现了，大公司和政府部门的研究能力大为扩展。由于对各种职业的专家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革。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目前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中的一个 是电脑程序专家，我正使用该公司设计的电脑操作系统撰写这篇文章（其他数百万电脑也在使用同一系统）。^①

这些潮流造成了支配性男性气质再一次分裂。围绕统治组织起来的实践，与围绕专门技术知识组织起来的实践越来越势不两立。管理从职业中分离出来，在管理和其他职业之间的关系在大公司和政府中逐渐成为一个长久的问题。（对专家的正确使用——“随叫随到或是置以高位”——是管理科学的一个经典主题，虽然“管理科学”术语本身展示了专家的特权。）在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共产主义精英中，都存在派系。一些派别（保守主义者/拒不妥协者）意图压制工人，另一些派别（自由主义者/革新者）意图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力量作出让步。

因此支配性男性气质发展为统治和技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男性气质都无法成功取代对方。目前它们并存为性别的实践，时而对立，时而啮合。作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替代名称，它们分别被广告或政治运动称之为“治安铁拳”和“信息高速公路”，以树立目前美国政治中的典范。在第七章中探讨过的新阶级的生活史，显示了这两种气质引起的一些张力。^②

① 比尔·盖茨，微软公司的股东，被福布斯杂志（1992年10月19日）评估为身家资产63亿美元。

② 这些派系的分割在许多地方探讨过；一个著名的范例是加尔布雷思 1967。

当大都市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更趋于理性化，暴力和特许象征性地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被推向殖民地。在白人殖民者的边陲地带，管理是无效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而且生活条件艰苦。像采矿这样的工业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但要冒很大风险。极其不平衡的性别比例使得边陲文化男性气质化。

第一章中探讨过的乔克·菲利普斯对新西兰的研究比较了两种群体的男性及男性气质的文化特点的差异：喧闹的未婚拓边男性和最早定居下来的已婚农夫。这种差异也出现在北美的西部边界。一个惊人的事实是，甚至在边界关闭之前，随着土著的军事溃败和横跨大洲的白人拓边者的扩张，拓边男性就被激励做男性气质的表率。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小说和布法罗·比尔·科迪的著作《狂野西部》成为最早描述西部的电影素材。这类电影表现了对沉默寡言的男性英雄主义的自觉崇拜。历史学家约翰·麦肯齐专注于19世纪晚期大英帝国对狩猎的类似崇拜。荒野、狩猎和丛林生存技巧与一种出类拔萃的男子气概结合起来，培养这种男性气概的人物是男孩童子军运动发起者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①

童子军运动是为庆祝前线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大都市男孩的运动。通过一系列长期的努力，童子军运动在男孩中培育了特定形式的男性气质。这一历史的其他事件包括在阿诺

^① 菲利普斯 1987；关于在美国的类似主题，请参阅施泰因 1984。关于“猎人”，请参阅麦肯齐 1987。马什（1990）告诫说，这一意象可能与大都市生活的现实相去甚远。

德博士之后的英国精英公立学校的改革；由工人阶级青年组成的英国国教童子军；世纪之交的德国青年运动；希特勒青年团——在纳粹掌握德国政权时成为庞大的机构；以及由军校生实施的中学男生军训的普遍尝试，1960年我读高中时澳大利亚还在这样做。（我晋升到下士军衔，还学会使用李-恩菲尔德式步枪，一种布尔战争时期的尖端武器。）

关于这些运动的惊人事实不在于它们有限的成果，而在于男权制思想家力图通过这些运动来控制和指导男性气质的再生产。这无疑成为性别政治的一个严重问题。^①

为什么呢？正如杰弗里·汉托韦在一项对美国童子军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世纪之交的一些思想家表达了对男孩由于受到妇女过多影响而会女性化的恐惧。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向家庭生活组织的变化。来自妇女的反对贵族男性气质的压力一直是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它导致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内容——“分离领域”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形成。分离领域定义为妇女在家庭内的行动领域，与男性的经济与政治领域相对照。

这一分离为一种强调男女生理差异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它不但受到男性思想家推崇（例如，它是法国决斗崇拜的主题），而且也为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所接受。在日常实践中，妇女的领域服从于男性的领域。但是在中产阶级妇女的领域之内，她们也可以像仆人的主人和业务经理人（在像碧铎夫人那样的顾问协助下）那样行动，还可能经常享受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另外抚养幼

^① 这些运动中的一部分被曼根和沃尔温（1987）记录下来。

儿也属这个领域。^①

与此同时，支配性男性气质在性领域内被清除了。正如研究同性恋的历史学家所展示的那样，正是在19世纪晚期“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类型被明确界定。在更早的历史时期，鸡奸被官方认定为一种只有堕落到恶魔的人才可能去实施的行为。现在同性恋被界定为一种特殊类型男性的行为，从最普通的医学观点来看是“颠倒的”性行为。新的法律以新的界定量刑（英国1885年的兰布切利修正案称同性恋为“粗俗下流”行为），对“反常”进行监控，成为警方的例行公事。

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角度来看，潜在的同性恋快感是从男性气质中被驱逐出去的，属于不正常群体的行为，这些人被象征性地比作女人或畜生。“异性恋”绝对没有相反的类型。更确切的说，异性性欲是男子气概的必要组成部分。此种定义的男性气质与法西斯军事和准军事群体中男性情感生活的真实情况发生严重冲突，它有助于判定——而且可能激励——希特勒在1934年谋杀恩斯特·罗姆为正当行为，后者是纳粹突击队员的同性恋领袖。^②

在宗主国，贵族逐渐被商人和官僚取代，与此平行发展的是农业人口向城市工业工人阶级转变。这一转变也包含性别方面。

① 汉托韦 1978。这里关于意识形态和“分裂的领域”的实践的概述当然是庞杂而又过度简化的；关于英国中产阶级的复杂细节，请参阅达维多夫和霍尔（1987）精彩的研究。

② 维克斯 1977，德米利欧和弗雷德曼 1988。奥尔洛夫记录了清洗罗姆的性政治 1969, 1973；第三章。

工厂体系意味着居所与工作场所的彻底分离，货币工资的突出地位改变了家庭内部的经济关系。工业生产的进展目睹了挣工资者围绕挣钱能力、机械工作技能、家庭内部的男权制和团结战斗而表现出来的各种男性气质。

事实上，妇女最初在工业革命后的纺织工厂中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也出现在煤矿开采、印刷业和炼钢业的工人队伍里。她们加入工业斗争之中，有时成为罢工的领导者，就像玛丽·布鲁伊特向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织工展示的那样。妇女从重工业中被驱逐出去，正是工人阶级男性气质形成的一个关键过程，这一过程还与家庭收入的策略和资产阶级分离领域的意识形态相关联。同业工会运动可以视为此类男性气质的关键性的制度化结果。^①

但是仅仅一部分工人阶级有钱加入工会。正如辩证法预示的那样，这种高尚的、有序的男性气质的构建，也促使它的对立面的形成，即边缘“危险阶级”的粗暴的男性气质。甚至社会主义革命者也清醒地看到这一危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对城市贫民严厉地评论到：

“城市贫民，从所有阶级中清除出来的元素组成的这种渣滓，总部就设在大城市，是所有可能的盟军中最糟糕的部分。这些乌合之众是绝对惟利是图的，也是绝对厚颜无耻

^① 布鲁伊特 1990。关于家庭工资和妇女从工业中被逐出的情况，请参阅塞科姆 1986，科伯恩 1983。

的……工人的任何领导者，使用这些恶棍来作为护卫，或者是依靠他们获取支持，单凭这种行为就可以证明他自己是工人运动的叛徒。”

研究性别的历史学家一向不大关注这样的群体，但是它们被研究阶级的历史学家记录在以下著作：《被遗弃的伦敦》，19世纪晚期《新工会主义》以及对诸如码头和市场这样雇佣短工的工作场所的研究中。^①

城市以外，帝国的经济逻辑导致巨大人口的流动，使他们从一个大陆迁移到另一个大陆。除了在其他许多场合中的暴力奴役和强制雇佣，这意味“自由”移民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阿根廷定居了。其他场合包括通过海上运输将非洲奴隶劳动力送到加勒比海和北美；把契约制劳动力从印度运到加勒比，非洲的一部分，马来亚半岛和斐济；将中国劳动力送去建造北美的铁路；以及从英国和爱尔兰将强制性劳动力运到澳大利亚。

一般而言，这些人口迁移的合法性依据的就是种族等级秩序，这对于——既是象征性地，也是实际地——构建男性气质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在第三章中着重指出的那样，在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中，黑人男性气质一般被描绘为对性和社会的威胁。这种性别意识形态为从美国到南非以及当代法国的严厉治安政策和种族主义政治加油添火。

^① 恩格斯（1969，1870：163）。斯特德曼1971年的著作是关于城市贫民的阶级分析的经典，他对城市贫民的观点不像恩格斯那样严厉，他注意到贫民看上去像可以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候选人。

在劳动力迁徙的过程中，定居环境塑造了男性气质的本体，前者涉及贫困和繁重的劳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瓦解。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复杂性可以在钱德拉·贾雅瓦德纳对 20 世纪 50 年代英属圭亚那糖业工人的研究中看出，这些工人是在 19 世纪晚期从印度移民过来的劳动力的后裔。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着重于权利平等和社会团结，或是伙伴关系。酗酒——总是群体行为——表达了这种社会团结。在这些男性中间，当名誉受到侵犯时，他们用“眼神”表示反抗；但是他们的逻辑与法国资产阶级决斗方式的对抗完全不同。他们的方式不是为了张扬个性而是集体性反对个性的表露，这可能会瓦解穷苦劳动者社区。在这里，表现男性气质是为了平等，而不是竞争。^①

在拉丁美洲大部，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一些在方，被征服的土著没有被取代或杀戮，而是沦为从属性劳动力。在殖民者的压力下，西方的性别意识重塑了本土文化。在印度的英国人为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不同民族构建了不同的男性气质，例如，帕坦人（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讲普什图语的一支，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译者注）和印度锡克教徒被誉为刚毅男性，而孟加拉人被诋毁为带女人气的男人。就像先前对白人军队中的男性气质的探讨那样，这类形象可能在招募新兵和社会控制中发挥作用。

拉丁美洲的男子气概是处于殖民主义压制之下的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这是众所周知的看法。征服者引起土著人的愤

^① 卓亚瓦德纳 1963。

怒。例如，西班牙天主教提供了排斥女人气质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实施经济压制，以遏制男性的其他权力。正如沃尔特·威廉斯所展示的那样，西班牙殖民主义也参与了针对土著文化中的同性恋习俗的持续暴力攻击。这对现代男性气质表达都还有影响。例如在墨西哥，男性气质的公开表现是一种好斗的异性恋，虽然性实践经常是双性恋^①。

很明显，男性气质的历史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是线性的。这里绝对没有任何一种男性气质成为发展的主线，使得其他类型成为从属，也绝对没有从“传统的男性气质”到“现代的男性气质”的简单转换。我们更应看到，在欧洲帝国创建的世界里性别关系结构的复杂性，其中主要的、次要的和边缘化的男性气质始终处在互动之中，改变了彼此赖以存在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它们自身。

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到现代，以上的历史回顾虽然有些老套，但确实是必要的。

现在时

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生存在传统男性角色正在弱化的时代，另一种观点认为真实的、自然的男性气质正在回潮。这两种观点都

^① 关于英国对孟加拉男性气质的建构，请参阅辛哈 1987。关于“男子气概”，请参阅前面第一章的讨论。关于西班牙殖民者对北美印第安人男性的异装癖者或同性恋者的袭击，以及导致的长时期后果，请参阅威廉斯 1986，第七章。

极不恰当，它们都忽视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想要把握全世界的性别结构及其关系，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

在全球范围内，欧洲/美国的性别秩序向殖民地世界的输出引起了最为深远的变化。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变化趋势正在加速。当世界资产阶级秩序愈发完善的时候，当更多的本土生产体系与世界市场相链接的时候，当本地劳动力进入工资体系的时候，西方男权制制度的各种本土版本创立了。它们出现在公司，官僚制政府，军队，以及大规模的教育系统。我已经指出过现代世界建立了西方模式的军队规模，它们的教育部门的规模更大一些（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看，大约 140 名教师对 100 名士兵），公司的数量则更为庞大。

这就为性别意识形态、性别形象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欧洲/美国的性别意识形态的输出，可以在发展中世界的大众媒体中看到。一个值得关注的范例就是巴西的伊克塞茜娅——一个金发碧眼的模特，借助面向儿童的电视节目而大出风头，变得非常富有，并且被塑造为女性气质的偶像。（就在同一个国家，没有电视机看的街头流浪儿经常被死神一样的男性警察谋杀。）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性别也处在变迁之中。例如，本地原来的各种同性恋习俗相互差异之大，有如巴西和爪哇距离之远，但都收敛为西方都市“同性恋身份”一种类型。^①

本土的性别多样性在历史上首次被西方的制度和压力推

^① 关于伊克塞茜娅的值得注意的故事，请参阅辛普森 1993。关于巴西同性恋身份的出现，请参阅巴尔克 1985。关于爪哇同性恋认同的出现，请参阅乌托莫 1990。

毁了。一些性别形构已经消失。一个例子是中国儒家关于男同性恋的传说——“断袖之癖”（这来自一个故事：一位国君宁可砍断被熟睡的情人压住的衣袖，也不愿意惊醒他）。另一个例子是玻利尼西亚夏威夷的习俗，即异性之间的纵欲和妇女的性自由。要说它们消失了未免过于轻描淡写，这些传统形构是被西方人的同性恐怖主义和清教教义精心消灭的。^①

性别秩序的多样性正在被协调性不断增强的全球性性别秩序所取代。欧洲/美国的性别秩序在这一体系中占据优势。东欧的近期历史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实证案例。当斯大林体制崩溃，市场经济建立的时候，伴随的是西方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建立，以及妇女失去权利平等的官方保证（虽然有些实际作用，但从未认真执行过）。

不过，全球性的性别秩序不是同质的，并非仅仅是从欧洲/美国文化克隆的产物。女性主义者对全球各国女性工作者的调查表明，她们已经跻身于分化的工作岗位，例如，马来西亚的电子装配工人，菲律宾和泰国的妓女，墨西哥的服装制造业工人。^②

尽管研究较少，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男性。例如，19世纪晚期，日本明治政权的现代化纲领导致教育系统大规模扩展和谋求行政及文职工作的竞争。这又反过来造成“薪水男人”的出现，即恭顺而又充满竞争的、为主宰日本经济的联合寡头统治服务的人。（这一称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虽然在近20年英

① 欣施 1990；奥特纳 1981。

② 芬特思和伊尔伦琴 1983。

语国家才注意到。)这是一种具有阶级特质的男性气质类型的显著例子，这种男性气质只有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中才可能存在，但是也不乏文化和政治特性。^①

我们也应该注意反抗西方性别秩序的力量。近 20 年最引人注目的反抗发生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些地区，在那里伴随政治独立的是重申男性的男权制权威。那些强迫妇女佩戴面纱并退出公共场合的男性，正在以反殖民主义政治的同一姿态，谋求一种性别政治。(这并非伊斯兰教必须的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就不在乎妇女是否佩戴面纱。)^②

总体上，超级大国的男性是当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惊人的特征是拥有控制自然界和占有他人劳动的历史上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把积累和集中的财富传送给他们。集中的程度应该记录下来。最新数据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 1/5 人口占据全球收益的 83%；最贫困的 1/5 仅仅获得 1.4%。(而国家层面的研究表明财富的分布实质上比全球收益的分布更加不平等。)^③

通过许多方面可以了解这一巨大的力量。在资源(诸如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和矿物)消费方面，这种力量支撑了一种以往贵族才能享用的物质消费水平。在技术的投资方面，这种力量清除了富国生产过程中最繁重的劳动，而且正如第七章中提到的那样，重建了职业的科层系统。在这些国家男性身体的物质享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① 金曼斯 1981。

②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对抗性态势，请参阅克瑞斯 1987。

③ 关于这些评估，请参阅联合国发展计划 1992。

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的财富支撑了分工细致的服务产业。在这些产业中，男性气质的象征性意义被详尽表达——特别是在大众媒体，商业性的体育运动，以及交通工具之中（在各种意义上，快速轿车和重型卡车成为男性气质的表达媒介）。超级大国的财富和技术还支撑了男性化的武装力量，其毁灭能力达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并且时常攻击第三世界的反抗者（越南、高棉、阿富汗和伊拉克）。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富国男性对性别普遍怀有变迁意识，我们就不会吃惊。在第二部分讨论过的所有澳大利亚群体中，变迁意识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发现深刻变迁的影响。也许更惊人的影响在于性别的失控和错位。这种情况也很普遍。^①

我认为，超级大国男性的物质力量的巨大增长加剧了性别秩序的危机。我在第三章提出了一个理解这些危机倾向的框架。很清楚，男权制合法性的丧失是危机倾向产生的根源。各种男人群体正在以不同的方法处理男权制面临的困境。

男权制丧失合法性的明显标志以及目前富国性别秩序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女性主义对男人特权的挑战。由于这些国家的富庶和大众媒体的传播能力，女性主义的挑战一经产生便迅速波及全球。但是挑战的方式不一样。西方女性主义正在与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协商如何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遗留的问题进行斗争。^②

① 海特 1981 年的著作记录了研究的所有片段；就像第一章讨论了男人书和第九章讨论了男性气质治疗的全部类型一样，不过运用了另一种方式。

② 关于协商的内容，请参阅布尔贝克 1988。

正如我已指出的，男女同性恋运动对支配性异性恋的挑战在逻辑上和女性主义对男人权力的挑战一样深刻，只是传播范围有限。大多数异性恋男人认为挑战只涉及少数人，与他们无关。

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运动开启了建立多种新型性别关系的可能性。杰弗里·维克思等人指出了目前性别亚文化和性别身份的多样性。我在第六章中强调，在大都市，同性恋运动和同性恋身份的稳定存在表明在性别二分的秩序中出现了永久的第三者。可以确信，坚定的同性恋者不会改变他们的身份，支配性异性恋者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否认第三者的存在。^①

当今性别实践的多形态不仅营造了多种可能性，而且开启了对性别和性的理想主义思考，这在更长远的意义上为各种历史性的性别实践创造了条件。像女性主义这类派别的学术想像听起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但是与过去（仍在继续）一直统治学术想像的西方男性优越论相比，就不难看出两者的差距。对性别和性的理想主义思考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电影、绘画、诗歌和通俗音乐等。^②

富国的男人正处于窘迫的历史时刻，因为不止一个范畴的人群集体拥有了形构未来的能力（累积的资源以及物质的和社会的技术）。女性主义和性解放运动通过理想主义的思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可能的前景。

然而，富国的男人不会考虑和选择新的历史方向。由于世界

^① 维克思 1986。同性恋稳定性的进一步证据请参阅赫特 1992。

^② 我记得有诸如勒·奎恩（1973）和皮尔斯（1976）的作品。

各国之间和富国内部男女之间的资源不平等分布，富国男人全都享受着某种利益，尽管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他们会维护现状，反对理想的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身的性别也成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男性气质的意义，多样性和再生产，性别的本质和不平等全部处于激烈争论之中。我认为，当前人们越来越关注男性气质不是偶然的。虽然大众媒体对奇异的神话诗般的男人运动会失去兴趣，但是男性气质问题不会离开人们的视线。

这些情况产生了比以往更多种类的男性气质政治以及对男性气质的界定，控制和再生产的尝试。下一章我将进一步分析各种类型的男性气质政治。

9. 男性气质政治

男人政治和男性气质政治

几乎在所有意义上，公共政治就是男人政治，男人把持了内阁、总参谋部、上层行政部门、政党、压力集团和大公司的决策层。政府的领导人是通过男人网络遴选出来的，其中极少数的女性，如英迪拉·甘地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是利用了男人而非妇女网络，走上权力宝座的。

在世界范围只有斯堪迪那维亚地区是例外。在那儿，众多的妇女跻身于上层权力地位。例如，芬兰的国会议员中 39% 是女性。挪威女性国会议员占总数的 36%（1993 年）。在其他地区，1990 年的数据反应了较为普遍的情况：在意大利，国会议会中 15% 为女性，在美国为 7%。日本是强国中男权制最为森严的国家。国会议员中只有 2% 是妇女。近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日本

502名高级官僚中，只有三位是女性，不到总数的1%^①。

这就是所谓“平等机会”的真实情况。在审视男性权力时最好把上述数据反过来看：日本国会议员中98%为男性，美国为93%，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男权制政治比发展中国家还要严重，两者男性议员所占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86%和67%（1990年）。

政治是男人的领地，如果妇女想从中分得一份权力，就会遇到男人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往往表现为各种障碍：从合法的排挤，如经验、资质和功绩等难于企及的获选标准，到有利于男人的大量非正式的偏见和假说。除了这些权力大门之外的障碍，掌握权力的精英们在上层权力的领域里还实施着外人很难觉察到的复制自我的策略，他们大搞权钱交易，挑选接班人，为助手和伙伴出谋划策，顽固推举男人执掌权力。

除了斯塔迪那维亚地区之外，妇女对权力结构的挑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75~1985年是联合国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力的十年。三年之后，在世界范围，男人在国会议员中仍占85%，五年之后的1993年，这一数字又上升至90%。

但是，妇女的挑战触动了现状，使之成为实践和学术的研究主题，出现了国家即是男权制机构的理论。^②正如我在第八章结尾说到的，近20年来，作为政治的基础，男人在性别关系中的

① 国会代表资料来源与于国际国会联合会。见1993年9月12日《旧金山记录》和1992年《联合国发展计划》报告。日本参议员的情况参见金的文章（1988）。

② 我对此做过总结，见康奈尔1992。

优势地位已经成为政治学的关注对象。

我将把这些运动和斗争定义为“男性气质政治”，其中心内容是男性性别的意义以及男人在性别关系中的地位。在这样的政治中，男性气质是重要的议题，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

上述的统计数据表明，男性气质政治的中心议题就是权力——男人通过性别关系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权力造就的社会存在。男性的权力很大，超过了目前大多数讨论对它的认识。男人对资源的控制及维护当然不是造就世界的惟一力量，但是对诸如暴力、不平等、技术、污染和世界发展等问题施加了重大影响，男性气质政治关注性别权力的形成，而男性权力就是在以上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力量，男性权力是当代一些最严重问题的幕后根源。

如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的那样，男性气质不是单一的模式。因此，男性政治也具有多种形式，但种类是有限的。在当前一些富有的国家中，男性政治主要表现为四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与性别关系的总体结构有着确定的关系。在本章中，我将逐一讲述这四种形式，审视男性在每种形式中的实际情况，以及它们在性别关系中的结构基础和在整个性别公正问题中的意义。^①

男性气质治疗

有关男性气质政治的话题，目前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利用改善

^① 我在本章只讨论男人的男性气质政治，妇女也有男性气质政治，我在第一章论述了女性对此的观点。

性别关系的方法医治异性恋男人的情感伤病。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其根源要回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当时新左派衰落，代之兴起的是反文化治疗流派，由精神医生和心理医生开拓的治疗方法超越了医学范畴、获得了广泛的拥护。随着反文化治疗学的发展，后继者们又创造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和不同的学派。例如，交往分析、草药、“东方”宗教、婚姻艺术、生物动力学、按摩术、新荣格精神分析以及随后出现的各种新时代神话学和 12 步康复法。这一运动的根在美国，同时也在其他富国发展起来，澳大利亚的情况我们已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讲述了。

社会治疗方法的主要技术是个人向治疗专家请教，在其指导下冥思，然后参加由一位收费的热心人组织的小组和讨论班。在小组和讨论班里，参与者倾诉个人的情感和经历，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获得了小组成员的赞许。^①

20 世纪 70 年代男性气质和男性角色一经妇女解放运动作为社会问题提出，就被划入了治疗学的范畴。70 年代，研究“男性与女性主义”、“男性的性”、“男性解放”和“男人问题”的学习小组、讨论班和顾问曾经风行一时。70 年代后期，治疗专家以治疗经验为素材撰写的书籍也曾在出版物中独占鳌头。“男人的遭遇”、“性与被解放的男人”、“温柔就是力量”和“演变中的男人”等著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像“超人的安魂曲”这样的文

① 这段内容部分来自第五章和第七章的访谈，部分援引美国已发表的资料。我在访谈中遇到的一位治疗小组举办人是我最好的信息来源，他的个人情况与其他人相同，因此没有引用他的材料。

章也出现在精神治疗学的杂志上。^①

这表明男性治疗首次和女性主义，或退一步说，与自由女性主义密切结合了。早期的男子治疗小组被称作“提高觉悟小组”，对“传统男性角色”进行批判。治疗的原理是男人需要治疗师帮助他们冲破男性角色的束缚，成为更敏感和情感丰富的人。例如，精神病学者肯尼斯·所罗门清楚明确地规定了“性别角色治疗”的目标，即：把患者改造为“双性”的人。

这对治疗师来说并非易事，舍瑞尔·贝尔和她的同事在1979年撰文指出，精神病治疗师常常忽视社会因素，对性别持保守态度，要求病人采取守旧的行为模式。因此，贝尔强调治疗师有必要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

四年后，杰克·考夫曼和理查德·蒂默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男性治疗学的重大转变，贝尔等人的观点也因此而被束之高阁。考夫曼和蒂默斯援引了一群提倡女性主义的男性治疗师，他们在寻找男性气质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失去了某些本性。治疗师利用熟悉的群体治疗技术和诗人罗伯特·布莱创造的新形象去克服患者对“阳刚之气”即深层男性特质的抵触。一旦患者发现了的某种男性气质，就会启发其他成员领悟这种气质^②。

80年代男性治疗的主要方向就是试图恢复在社会变革中失去或受损的男性气质。美国在这方面非常突出。布莱的著作“铁

① 戈德伯格 1976，埃利斯 1976，莱昂 1977，所罗门和利维 1982（这些著作揭示了作者们对官方精神病治疗方法的最初回应以及随后的符合），西尔克伯格 1984。

② 贝尔等 1979，考夫曼和蒂默斯 1983。

人约翰”在1990~1991年一直畅销不衰，其他类似的书刊也火暴一时。从4本基于男性气质治疗的有关男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鼓吹恢复男性气质的思想和共同背景。^①

沃伦·法雷尔“男人行为的根源”一书就像他的处女作“被解放的男人”系列丛书一样尖酸刻薄，70年代初期，法雷尔为美国最大的女性主义组织“NOW”建立了一个男人的声援网络。他为男人建立了许多提高觉悟的小组，鼓励男人公开支持妇女的事业。他猛烈抨击“男性气质的价值体系”和束缚男人的男性角色。在早期的文章里，法雷尔将男人直呼为“统治阶级”，要求他们放弃特权地位。

十年之后法雷尔一改初衷，转而强调人们过于注重妇女无权的经验，而忽略了男人无权的感受，这与他在70年代注意的事实大相径庭。为了自圆其说，法雷尔将视角从公众世界转移到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仔细地重新定义了权力的意义。由于男人在感情上没有感觉到他们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没有权力。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男人不必自责，因为女人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妇女希望男人改变，她们应该改变在情感上对男人的期望，这样才有助于男人改变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法雷尔对此不抱希望，他发现男女在心理上截然不同，他（她）们的基本幻想就揭示了这一点（男人幻想与众多美人欢爱，而妇女幻想拥有安全的家）。

^① 法雷尔 1986 和 1993，戈德伯格 1988，布莱 1990，基恩 1991。其他类似的文章：法雷尔 1871~2，法雷尔 1974，戈德伯格 1976。我在 1992 年写了一篇批判布莱的较长的文章。

我在撰写此书时，法雷尔又出版了一部新作，题目是《男性权力的神话》。在书中，他再次鲜明地申述了以上观点，同时激烈反对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差异的生物基础，并且理所当然地对罗伯特·布莱和男性礼仪称颂了一番。

与他在70年代的著作《男性的危险》相比，赫布·戈德堡在《男性的内心》一书中的态度也转了一百八十度，正如《男性的危险》一书的副标题《男性特权神话的复活》所示，在70年代，戈德堡和法雷尔的思想是一致的。到了80年代，他们的观点又汇合了，戈德堡也劝告男人，要他们的不必为男女不平等而自责。曾经兴起并最终失败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男人困惑并自责，但是失败的结局正是这场运动否认男女的情感差异。戈德堡认为，情感差别就是极化了的下意识气质，即：阳刚和娇柔气质。这种“潜在的性别差别”意识破坏了任何有意识的政治变革。心理治疗有助于解除男女各自的戒心，使他们能较好地互相交流。然而，戈德堡不清楚心理治疗是否能解决更严重的问题，他只是寄希望治疗师对个别人的指导能起到扩散的作用。

但是，戈德堡对于如何否定过去的立场却是一清二楚的。他过去在书中曾经将女性主义尊崇为社会积极变革的源泉，而在《男性的内心》一书中这些赞美的语言不见了。该书赋予“解放了的”妇女及其男性追随者一连串充满敌意、令人触目惊心的称谓：“女性中的男子汉玛莉莲、解放了的冷酷皇后安、解放了的失落者凯文、彻底解放运动的疯狂发起人爱丽斯和极权主义的人性学者本杰明”。戈德堡承认，这些个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他之所以把这些人说得如此不堪，目的就是要显示他的“观点和信

仰”，即：“解放了的”人都是缺乏进取心和虚伪的。对流行心理学的认识论好奇的读者而言，戈德堡的言论是必读的教材。^①

罗伯特·布莱的《铁人约翰》被广泛认为是一部惊世之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它与早期的男人之书共同之处。像法雷尔和戈德堡一样，布莱认为，女性主义对男人的谴责是不公正的，男人不必接受谴责，他们应该承认并且庆贺他们与妇女的差异。他也像法雷尔和戈德堡那样，反对实行社会平等政治，强调情感的性别差异，对种族、性、文化差异、阶级等问题不感兴趣。布莱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父亲是造成情感损伤的根源，因此男人应该与父亲分离。他强调男人应有原始的男性气质，而非介于男女之间的变型。

总之，布莱对性别的诸多问题仍主张男性气质的治疗。他的折衷象征主义、对男性气质原型的寻求以及在媒体眼中他倡导的运动的荒诞怪异（装腔作势、只说不做）都只是表面现象。他的“神话诗般的男人运动”在实质上就是人们熟悉的治疗环境中的小组技术。例如，由治疗师主办研讨会，每位与会者倾诉他们的情感和经验并得到其他所有的人肯定。在过去二十年中，流行的治疗学派在实施这种治疗的时候，通常把小组的领导者的面具和特定的礼仪与行话隐语也考虑在内。在《铁人约翰》出版的十年前，布莱在研讨会和其他会议上就开始应用这些技术了。

在《胸中的火焰》一书中，萨姆·吉恩像布莱一样，松散的运用荣格有关男性气质的概念，作为植根于男性气质原型的情感

^① 戈德伯格 1988：186～7。

体系。吉恩也和法雷尔一样，曾经热衷于提高觉悟小组和精神治疗。他也像戈德堡、布莱和法雷尔，关注情感关系，满足于零星的证据和思辨推理的研究方法。吉恩也曾提出了一种治疗受伤的男子气质的方法。布莱想要恢复男子气质的神话原型，吉恩的治疗方法也希冀通过与女性气质的分离，发现更深层次的男性气质。

吉恩认为他的方法是一种精神治疗，而不是要造就分裂主义的男人们。他把男性气质的治疗与地球保护和针对同性恋歧视，种族主义和环境恶化的社会治疗联系起来。简言之，吉恩把男性气质的治疗看作是全面改良计划的一部分，尽管他的论述是形而上学的。

然而，男性气质治疗的主要倾向是取消而非支持政治改良。这与政治环境有关。戈德堡对“解放了的”妇女和男人的恶意诽谤是与里根攻击“自由分子”同时的。法雷尔在他的最新著作中攻击“政治的修正”就是因为所有公共政策都是偏袒妇女的。但是，主要倾向的内部动因则更重要。正如第五章和第七章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女性主义常常使中产阶级的西方男子有负罪感，某些人因为自责而赞成女性主义。早期男人解放运动的辩论更可能加重了他们的负罪感。男性气质治疗在 80 年代的迅速转向解除了男人的心理压力。个人负罪感消除了，但产生罪恶的社会环境却没有改变。

此种男性气质政治的结构基础是与第三章定义的共谋性男性气质一致的，这反映在这些治疗师们的著作中。共谋性气质的男人的确不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载体。但

是，他们也不是被压迫者。法雷尔、戈德堡和布莱简单地推测他们著作的读者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异性恋者，认为他们只是从男权制获得大量的好处，而不会保护它。

这一读者群就是男性气质政治的真正基础。他们花钱参加治疗研讨会和其他会议，购买有关的图书杂志。反过来，他们的利益也就限定了男性气质的治疗内容。这些人愿意校正与妇女的关系，但不想从根本上改革这些关系。因此，他们对女性主义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是肤浅的，向反女性主义的转变也就不难发生了，他们与男性同性恋者的联盟在当时甚至还未出现（克林顿政府曾信誓旦旦，允诺同性恋者可以在军队中工作。但在1993年，政府食言了，而军队并未提出抗议。）。对男性气质的治疗取向把社会问题变为纯粹的精神问题，使患者专注于自身。这一重要后果与读者群体的切身利益联合起来，限制了70年代初爆发的性别关系革命的深度。

为了理解男性气质的治疗作为一种男性气质政治的意义，我们就不能像男性气质治疗那样，仅仅专注男人情感的伤病和治愈过程。对男性气质采取的普遍治疗方法，导致了一个重要后果，即：在将男性气质现代化的过程中，男权制结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虽然布莱等人在著作中表现的怀旧情绪和神话意象是非常反动的，但是，治疗的实际结果在个人水平上调解了男女关系。在这方面，男性气质治疗和下面要谈到的强硬的男性气质政治是有区别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男性气质治疗，甚至荣格的主张并不是惟一的可以用于男性气质政治的方法。英国治疗学家约翰·罗恩于

80年来出版了《带角的上帝》，在书中他提出了其他方法。

像吉雷尔一样，罗恩也关注反性别歧视的男人群体，并且发展了很多治疗方法，但是，他一直在寻找支持男人继续信仰女性主义的资源。“带角的上帝”是一个具有女神意识的形象，罗恩想借此树立一个典型，支持男人与坚强的女人共处，而不是分离。他的治疗目的不在于要恢复男性气质，也不是促进雌雄同体化（被认为是男性和女性二分的男权制的基础），而是要彻底改变男、女关系。基恩的理论特点将在第十章进行讨论。^①

院外反枪械控制集团： 捍卫支配性男性气质

1987年，一名年青男子在墨尔本实施的多起谋杀案震惊了澳大利亚，公众对自动步枪和一般枪械憎恶之极。民意测验表明公众支持更严格的枪械控制。近邻新南威尔士的新工党总理是一位呆板的政治家。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提出了严格控制枪械的法案。他于次年参加大选，但失败了。公众认为，他的失败源于一场支持枪械拥有权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农村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这样的运动在澳大利亚还是第一次。在美国，“院外反枪械控制集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强大组织。1977年，全国来福枪

^① 罗恩 1987。当然，在治疗师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立场，但是自由化男性气质常常最受关注。西尔弗伯格（1984）和基恩（1991）都赞美了男性气质或与男性气质混合的折衷产物。

协会的右翼分子将当时的领导赶下台，并把该协会转变为支持拥有和使用枪械的群众组织。从此，院外反枪械控制集团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通常情况下，来福枪协会用在反枪械控制法案上的费用要比院外枪械控制游说集团多10倍。在《武士的梦想》这部重要著作中，作者威廉·吉布森追述了代表枪械工业的全国来福枪协会与从事暴力训练、企图发动“新战争”的各种妄想狂的组织的关系——这听起来有点玄，但却是不争的事实。^①

枪既是阴茎的象征又是武器，这是老生常谈。枪械组织一般是在文化层面表现男性气质。在狩猎和枪械杂志中，男模特总是身穿格子衬衫和皮靴来表现他们的男性气质，院外反枪械控制集团几乎无需向男人们说明政治家控制枪械就会使他们失去男性气质。在符号和实际生活中，保卫枪支所有权就是保卫支配性男性气质。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保卫男权制不需要依靠明确的男性气质政治，异性恋男人是社会公认的体现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代表，如果这种男人掌管企业或国家，他们在实行日常管理的同时就会保护支配性男性气质。为什么维护支配性男性气质作为工作主旨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看不见的，其关键就在于它已经融于其他工作中了。在大部分时间里，男性气质不需要刻意表现出来，人们所注意到的只是国家安全、企业利润、家庭价值观、真正的宗教教义、个人自由、国际竞争、经济改革或科学进步，当各种机构在

^① 莱迪 1987。他从拥护枪械持有的立场出发，讲述了“全国来福枪协会”（NRA）的历史，并无意中揭示了 NRA 是新右翼政治的一个成功实例。吉布森 1994。

日常工作中捍卫或促进这些项目时，支配性男性气质就取得了统治地位。

然而，动摇性别秩序的危险还是露出了苗头。为了消除隐患，维护支配性男性气质就可能成为工作主旨而凸现出来，反枪械控制的院外集团就应运而生了。各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和鲜明的男性气质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中。我在此只扼要探讨三种情况：男性暴力、示范性男性气质和组织管理。

我曾指出男人中的顽固分子对男同性恋者在公开实施暴力的同时，也表现了对传统道德的忧虑。显然，顽固分子在殴打男同性恋者时，认为自己是代表着社会，惩罚男人形象的背叛者，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那些殴打妻子的丈夫都认为他们在行使权力，维护家庭的正常秩序，惩罚妻子的不良行为——特别是妻子不能恪尽妇道（例如，家务活做得令丈夫不满或是顶撞丈夫）^①

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实施最大规模的暴力。在欧美文化中，任何领域都不如军事行动那样更能体现支配性男子气质。在《勇士的红色勋章》和《西线无战事》这类虚构的战争文学中，对勇敢者的称颂（前者，1895年）和对懦夫的痛斥（后者，1929年）都是在宣扬支配性男性气质。在欧美文化中最能体现男性气质的

^① 男性气质批判的重要标志就是将支配性男性气质与暴力结合起来，这是它与性角色理论的区别，参见法斯托 1974，巴顿和普尔 1985，考夫曼 1993，拉塞尔 1982（婚内强奸）和普塔切克 1988（家庭暴力），这两部著作作为本书论及的合理化提供了证据。

是英雄人物（现代新荣格主义的“勇士”和“英雄”典型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军队总是以英雄形象为号召力招募新兵，“美国军队造就男人”是1917年的招募广告。“男人”是指兼具运动员、技工、正义斗士和士兵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亚利安人。

如果我们相信军事行动真的是以高尚英雄主义为原则的，那就错了。对同一战争的另类描述揭示了虚构与实际的差距。詹姆斯·麦卡登是英国空军最伟大的王牌飞行员，他击落了57架德军飞机。1918年，他在去世前夕完成了他的自传。麦卡登原来是飞机修理工，因此他在自传中对飞行技术表现了极大兴趣，并且对德国人充满了敬意，小心谨慎地描述了战斗过程。汤姆·沃尔夫在《钢筋铁骨》一书中将飞行员塑造为充满阳刚之气的空中武士，这一大众的飞行员形象在麦卡登的笔下不仅全然不见了，而且将沃尔夫的描写斥责为“空中的马术把戏”。但是，爱国的出版商仍将麦卡登的自传取名为《飞行的怒火》。

与麦卡登一样，战壕里的士兵也是小心谨慎的。托尼·阿什沃思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西部战线的很多地方，部队都在限制暴力行动，遵守“自己活着、也让对方活着”的原则。与敌军的默契和根深蒂固的社会道德导致了双方的休战，或者为了敷衍高层指挥官，只实行一些让对方容易躲避的走过场的战斗，保罗·富塞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前线士兵的研究证实了新闻媒体的虚构与现实中小规模的暴力行动（军队戏称之为“鸡粪”）之间的差距。参与真正战斗的人只占少数，对他们而言，每天都是在极度的死亡恐惧和侥幸逃生中度过的。他们中的死者大多数是被炮火击中的，传

统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工业化的战争中毫无用武之地。^①

但是，虚构的体现男性气质的英雄主义在文化上是举足轻重的，军队的团结与整合，或者至少在实施暴力时行动一致是需要某种精神因素的。在性别关系中为获取霸主地位，文化被用做斗争的一种工具，以便在制定标准，争取公众的赞同和打击落伍者等方面起到约束作用。结果，树立示范性男子气质就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政治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伴随着男权制的宗教合法性的动摇，示范性男性气质越来越重要了。商业大众文化的一些重要媒体集中体现了示范性男性气质，例如西方的低级下流和惊险刺激的文艺作品，（以大款明星为出场阵容的）体育转播和好莱坞电影。

在这些媒体中，象征男性气质的表现手法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琼·梅林对美国电影的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初，英雄主义的男性气质一直在狭窄的情感范围内演变发展着，后来好莱坞越来越借助暴力行为体现男性气质。梅林的著作出版于70年代，当时史泰隆和史瓦辛格正在走红，成为大牌新星，这类影星仍将在美国电影上占有重要地位。面对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独特的男性暴力作为力量的象征就成为电影的主题。

当示范性男性气质转变为集体行为时，会产生重要意义。50年代“花花公子”杂志的读者因为能够不断享受心仪的“女孩”

^① 克兰 1925 (1895)，雷马克 1929，麦卡登 1973 (? 1918)，沃尔夫 1980，阿什沃思 1980，富塞尔 1989。

而被吹捧为性英雄，1960年，“花花公子”公司开设了花花公子俱乐部，以谋取双重的商业利益。在俱乐部，读者成为会员，女服务员扮装成怪异的“兔子”。黄色影像业的昌盛不衰说明，示范性男性气质的集体化过程仍在持续发展。^①

在美女杂志和性商业背后的集体化行为涉及了支配性男性气质政治的第三个领域，即男权制组织的经营管理。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除非有人行使权力，彰显组织的权力效果。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例如，第一章提及的迈克尔·罗格斯贝格对美国合法职业形成的研究，以及迈克尔·罗珀对英国制造业中男性权威的演变特征的分析。只有在实践中，权力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实践的方式不同就会导致权利关系的差异。第八章探讨了支配型和专业型男性气质之间的差异。在商业和政治中也同样存在管理者与专业人士、强硬派与自由派、企业家与官僚之间的矛盾，甚至在军队也有军人治军还是专家治军两种不同意见。

这些差异和矛盾掩盖了性别政治的存在，世界上不存在门前旗帜飘扬，高级轿车排列成阵，制订各种策略的男权制司令部。实际上，每个男人群体都在遵循各自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彼此之间的见解并不一致。每年的澳大利亚巴瑟斯特摩托车比赛，警察

^① 梅林在1978年对比伊斯特霍普1983年专著的不经意描述更能体现细微的差异。关于“花花公子公司”，见米勒1984。在1983年的文章中，埃伦赖希将这一情况解释为美国男人“逃避责任”的行为，这就混淆了现实与意识，并且忽略了男性气质的集体建构。

与骑手之间的冲突就是典型的例子。^①

此外，我们需要认识到，同性恋者正在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捍卫支配性男性气质以及他们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性支配的统治地位。此种防御有多种形式，它常常放弃阵地，改变策略；近几十年来，面对历史性挑战，它依靠巨大资源的支持一直常胜不败。防御的后果不仅延缓和阻碍了性别的变革（如议员性别比例和东欧女性每况愈下的例子），而且，稳定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统治地位。这导致了世界范围摧毁性军事技术的发展（不只是核武器的扩散）、环境的长期恶化和经济不平等的日益严重。竞争和支配性男性气质在世界重要国家中长盛不衰，使各种危险更难以逆转。

同性恋解放运动

在西方近代史上，同性恋男性气质是替代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主要形式。同性恋解放运动最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政治态度。

在过去一百年中，同性恋男人采取的大多数形式的政治行动一向谨慎克制，因而严重阻碍了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马格努斯·希施菲尔德于1897年创立了科学人道主义者委员会。该委员会倚重希氏的医生身份，申明他们只是从事科学探讨。其后第二代的同性恋组织，如美国的马塔奇尼协会（1950年）和英国的

^① 坎恩宁和林奇 1988。

同性恋法律修改协会，通过暗中游说议员的方法影响国家政策。杰弗里·维克斯评价它们是“传统中产阶级的、目的单一的压力群体”，以谨小慎微注重名誉为特征。^①

这些组织在追求同性恋政治的同时，又克制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打算回避性别问题（19世纪晚期的大多数理论家都把同性恋者解释为性别中性的人），提倡维护个人权力的无性别政治。

1968年在纽约斯通沃尔街，警察抄查了一个同性恋酒吧，从而引起了骚乱。这场同性恋解放运动彻底告别了以前的谨言慎行。历史学家强调连续性，他们认为同性恋解放运动是城市同性恋协会逐步发展的结果。可是，两者的政治目的却有着重大差异。同性恋解放运动与当时迅猛发展的激进女性主义和60年代挑战权力结构的思潮紧密地联系起来，向支配性男性气质和体现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性别秩序发起了毫不隐讳的攻击。

同性恋解放运动一次次发表声明，指责异性恋男人、男权制、家庭和异性恋主义是同性恋者受压迫的根源。正如丹尼斯·阿尔特曼在《同性恋：压迫与自由》一书中所说：

在很多方面，我们代表了对社会习俗的最严厉的挑战。社会习俗来源于对核心家庭和分化清晰的性别的信仰。^②

① 维克斯 1977：171。美国的这段历史见德里歇 1983，加拿大的这段历史见金斯曼 1987，澳大利亚的这段历史见沃塞斯庞 1991。沃尔夫 1986 年的著作“论希施菲尔德”在史料收集方面不够完整，但是很有用。

② 阿尔特曼 1972：56。

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了某些，特别是欧洲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理论家，他们认为同性恋政治表现了必然的性别激进主义。“必然”的原因是同性恋本来就是传统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只是被压抑了。居伊·奥康让在《同性恋欲望》一书中指出，同性恋最初存在于“正常”人的想象中，当他们处于父权制家庭时，同性恋欲望才会成为异型的欲望，即：俄狄浦斯情结。在异性恋男人的狂妄世界里，女人是惟一合法的性目标，这些阴茎的拥有者们为了财富和权力而勾心斗角，而肛交欲者（男同性恋）与此无关，是清白的。

与奥康让相比。马里奥·米耶利的精神分析不那么前卫，但是他在《同性恋和解放》一书中对性别的认识却更直白。他指出，男人为了维护男性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抑制自身的女人特性，从而直接导致了异性恋男人对同性恋男人的压迫。暴力来源于抑制。男性的同性恋必然包含女性特征，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激进政治必须拥护女人特性。因此米耶利赞扬女性化男人、易装癖者、奇装异服者以及他们的幽默滑稽行为，认为这些人及其言行是具有改革能力的政治的基本成份。戴维·费恩巴赫的著作《螺旋路径》较为平淡但颇具系统性，他指出性别制度才是男、女同性恋者境遇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消除性别必须是同性恋政治的目标。^①

然而，这些对性别的激进挑战并没有成为同性恋社团的生活或政治的主流。70年代晚期同性恋社团的国际领军人物不是女

^① 奥康让 1978，米耶利 1980，费恩巴赫 1981。

性化男子，而是身穿牛仔 T 恤衫、留着胡须、发式怪异的“芝麻街”（美国木偶电视剧——译者注）的克隆人物。形形色色的性场景使皮衣、SM 音乐和双性恋的莽汉大出风头。某些人认为，男性同性恋者一向都有模仿男性超人的癖好。但是，男同性恋的文化已经从女性气质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时，男同性恋社团的政治也在重新形构。由于自由女性主义获得了立足点，并且激进女性主义也分离出去，自成一派，男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联盟减弱了。当男同性恋者在市政府占有了一席之地，男同性恋商人也获得政治地位时，他们制定了新的制度政治。在美国城市中，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革命行动已被某种类似于民俗压力集团的政治所取代，他们努力在体制内争取生存空间，而非试图推翻它。

对这一趋势影响最大的是艾滋病和它的传播。因此，同性恋组织扮演了院外压力集团（改变策略，游说议员以筹措基金）和服务机构（照看、研究和教育）的角色。组织成员出席各种委员会、董事会、咨询会和小组会，向参与者演讲。但是，同性恋团体并非铁板一块，有些组织仍持不同政见，尽管如此，压力集团政治仍是主流，第六章描述的真正彻底的男同性恋者的言行体现了压力集团成员在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中的行为模式。^①

尽管同性恋社团抛弃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理论，憎恶同性恋的政治家却不能释怀。80 年代中期，随着艾滋病的传播，对同

^① 对于同性恋男人的男性气质转变的意义曾有过激烈争论，见汉佛弗莱斯 1985。对于种族政治的争论，见阿尔特曼 1982 和爱泼斯坦 1987。

性恋的憎恶达到了惊人的地步。90年代初，美国仇视同性恋的运动又掀起了新的浪潮，宗教鼓动者将同性恋男人描绘为破坏法律，违反上帝意旨，威胁家庭并进而威胁社会秩序的军队。就我所知，公众对同性恋的厌恶集中在从文字上了解到的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对于其他方面并不在乎。肛交最会使公众反感，因为肛交是男人女性化的标志。异性恋男人对同性恋的憎恶表现在他们的幽默中：同性恋男性被形容为柳腰、莲步、去势的阴阳人。^①

上述的同性恋者的行为确实存在于同性恋文化情景中。尽管很多同性恋者穿着工程靴，易装癖仍然盛行，这种嗜好一直被有效地用作艾滋病教育的反面教材。矫揉造作、女子气的男人和“芝麻街”的克隆人物依然故我。同性恋者的性别和他们的生理性别一样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女性化的装束和理论又复活了。

因此，当代男性同性恋就必然导致男性气质政治的产生。这一政治的结构基础就是当代性别秩序中的从属性男性气质。上述的混乱情况说明，男性气质政治和它的社会基础之间存在着远非一般的复杂关系。如果认为同性恋社团和其他提倡激进性别政治的群体同质，那就错了。

社会基础的组成部分确实需要区分开。如我在第六章说到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性对象的社会界定就与同性恋男性气质的对立，任何变革都不能消除这一矛盾。同性恋社团奉行的令人尊

^① 布赖恩特 1977 年发表了关于同性恋恐惧症运动的自传体文章。阿尔特曼 1986 年出版了对艾滋病引起的同性恋恐惧症政治的调查报告。为了撰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在访谈时收集了公众的同性恋恐惧症的资料。贝尔萨尼 1987 年撰文指出，北美也存在同性恋恐惧症。

重的种族政治必须遵守习俗，它们的代表才能在市政府，银行管理层和医疗委员会中发挥作用，身穿绣花大衣，脚蹬银色高跟鞋的马里奥·米耶利先生不会如愿以偿。就目前的性别关系的结构而言，两种男性气质不可能融合。支配性男性气质禁止肛交并反对融合，在反同性恋的暴力袭击中，不管何种类型的同性恋男人都会毙命。^①

同性恋社团不会自发地产生对抗性的男性气质政治。但是，替代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稳定模式——20世纪最后季度的不可逆转的成就——重新形构了整体的男性气质政治，使性别新观念的永久性存在成为可能。对性别秩序的实践和理论的挑战将不会停止。挑战不一定来自比较温和的同性恋社团，但是一定因为它的生存境遇而起。

出离政治

（抛弃支配性和共谋性男性气质的政治——译者注）

我们说社会行动具有创造力，是暗指它的实践作用，像同性恋者不会机械的反对性别秩序一样，异性恋者也不会机械地保卫它。异性恋男人可能反对男权制并抛弃支配性和共谋性男性气质，这是70年代男人解放运动左翼激进分子的本意。他们的策略是让男人正视并改革他们的男性气质（通常理解为内化的性角

^① 有关长袍和高跟鞋的内容，参见米耶利1980：171。遇难者包括第一次当选的代表——旧金山的哈维·米尔克。

色期望)，以便遵循社会公正政治。第五章阐述了与这一策略相对应的逻辑原理。1980年提交给英国布里斯托尔会议的文件《反对性别主义男人运动的最低限度的自我定义》详细说明了左翼激进政治的范围和含义。文件声明支持女性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强调指出男人对女人的权利也扭曲了男人的生活，改变这一状况需要男人共同参与。男人要建立与子女的新型关系，改变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男人的改变需要创建反性别文化并重塑个人生活。^①

在男人的生活正在受到伤害，需要修改这一意义上，出离政治和早期的男性气质治疗方法有共同的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很大分歧。新的政治将目光聚集在性别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女性的从属地位上，处处带有男性应在理论和行动上辅助妇女运动的色彩。它要求男人在妇女会议期间照看儿童，阅读女性主义书籍并在妇女监督下举办讨论会。

男人充当辅助者的策略是美国人提出的，1973年发表于纽约的卖弄的《女性化宣言》和约翰·施托尔滕贝格近期出版的更为守旧的《拒绝做男人》都是此类作品。施托尔滕贝格对色情文学的猛烈抨击暴露了这一策略的明显问题：男人应该做哪种女性主义的辅助者呢？——因为女性主义者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一种以憎恶男人为主的政治怎么能广泛动员男人参与呢？^②

① 布里斯托尔反性别主义男人大会 1980。

② 丹斯基等人 1977，施托尔滕贝格 1990。女性主义对反色情文学运动的批判，参见西格尔和麦金托什 1993。

即使如此，男人组织在反性别主义政治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仍然令人震惊。乔恩·斯诺德格拉斯在《献给反性别主义的男人》一书中记录了70年代美国人的尝试。安德鲁·托尔森的著作《男性气质的界限》叙述了同时期的英国社团的努力。英国杂志《阿喀琉斯的脚踵》在70年代发表了高质量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格奥尔格·布诺斯卡和格哈德·哈弗纳介绍了德国反性别主义的讨论，迈克尔·考夫曼的著作《砸碎盔甲》反应了加拿大人的经历，澳大利亚曾出现“男人反对男权制”的群体。瑞典也举办过“男人和女性主义”的讲座。近年来美国的大学设置了反对男性气质性别主义的课程。

80年代早期，美国成立了“改变男人的全国组织”(NOCM)。90年代更名为“男人反对性别主义的全国组织”(NOMAS)，更改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凸显其反男权制的特点。该组织在发动男人方面所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是最为出色的。它在组织男人运动和出版的杂志《改变男人》中揭示了出离政治与男性气质治疗学之间的矛盾。该杂志也尝试将反性别主义观点普及化，公开反对治疗学家的主张，同时为文学艺术探索男人问题提供依据。在80年代的情景下，建立和维持NOCM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它的周围始终没有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名后，NOMAS似乎在大学和治疗领域里获得了根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进展。^①

^① 斯诺德格拉斯 1977，托尔森 1977，塞德勒 1991（“阿喀琉斯脚踵”杂志的资料汇编）。布诺斯卡和哈弗纳 1988，考夫曼 1993，本特松和弗吕克曼 1988。

这些个人和组织所做的工作（至少在讲英语的国家）有某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男人有组织的反性别主义运动一般来说规模较小，与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相去甚远，但是，他们的一些特殊运动受到广泛支持。例如，加拿大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反对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白丝带运动”起源于纪念1989年在蒙特利尔工程学校被杀害的妇女，随后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参加者有各个阶层的男人（包括政治和媒体精英）和妇女。

然而，男人组织一般规模较小，也不稳定。保罗·利希特曼认真研究了关注受虐待者、男性气质和暴力行为等政治问题的组织MOVE。他指出男人对男性气质采取批判立场是很难持久的，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会渐渐消失，转面向心理医生咨询，后者应用专业知识治疗男人问题。^①

通常异性恋和同性恋男人在性别主义问题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持反对态度，反性别主义运动一般是在环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激进政治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这些特点说明男人反性别主义组织缺少明确的社会基础。这一点我还会在下面谈到。

以上男人所做的种种努力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女性主义者有时对男人改变男性气质的尝试表示欢迎，但通常对男人组织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公开的敌视，认为他们是反革命骗子。大众媒体一向讽刺他们是“新敏感性男人”。女性主义的男性积极分子更是对他们嗤之以鼻。在坚持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人看来，这些男人

^① 利希特曼 1989。

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他们不过是要把自己变成女人而已。^① 这种看法没错，“拒绝做男人”的另一含义就是抛弃性别，而不是搞另一种性别政治，这在男性气质政治中是少见的。出离政治的实践目的是摧毁现存的男性气质，而非使其现代化或复原。

马里奥·米耶利强调同性恋男人必须女性化，异性恋男人也必须将被压抑的女性潜质表现出来。因此，他提倡“改变性别”的解放策略。重新配置性别元素的“激进易装术”（例如，穿女装而留胡须）就是 70 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策略。

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性恋社团生活的主流已经彻底背离了米耶利的策略。性别暴力从男性气质的出离越来越被定义为两种人群——易装癖者和变性者——的性特征，而非政治策略。医学的性行为学支持这种定义，并依据实践中的表现将此种特征群体的行为命名为综合症，于是，性别的变异行为变成“非同性恋的性别烦躁症”——我在《性行为档案》里发现了这个绝妙的名称。性别的变异类型在医学化后，外科手术就成为判别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标准。仲裁者是异性恋医生，按照他们的性别标准，性欲倒错者必须去势，改造外阴部。支配性男性气质居然掌握着男性气质变革的监管权。^②

① 哈尼施 1975 年的文章是早期女性主义对男人运动充满敌意的回应。西格尔 1990 年著作的第 10 章对男人运动做了较为复杂的评论，他审查了与次有关的策略问题。

② 这段精彩的文字来自布兰查德 1989 年发表的文章。博林 1979 年杰出的研究批驳了雷蒙 1979 年著作中的过分渲染的观点，但是支持了他对医学性别政治的观察。米约 1990 年基于拉康观点的文章指出，外科手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医学外科对性别二分的重申没有消除文化中的性别的混淆，例如戏剧中的男女易装。在《授予的权利》一书中，玛乔里·加伯巧妙地将易装行为归咎为在很多领域——如：侦探小说、电视、大众音乐、人类学杂志——中的悬念和忧虑。拉康的理论支持她的分析，但缺少历史证据。加伯企图将完全不同的情况归纳为同一解释。卡罗尔·克洛弗所做的非常具有历史性的研究也做出了相似的分析。他在《男人、女人和链锯》一书中指出，70和80年代不断发展的恐怖电影是同一时期男性气质动荡的反映。电影使用了两种表现手法，一是角色为两性人或在故事中改变性别的人，二是令人惊讶的将大部公青年观众置于认同女性特征的关系中。^①

这种将性别的混淆解释为文化政治的一种类型而非疾病综合症的理论和米耶利的性政治模式一致。两者都为探讨男人反性别主义政治的根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本章探讨过三种以某一重要类型男性气质为基础的男性气质政治，但文化政治不同，它的产生与性别秩序的总结构有关。这里的要点是，第二章中个案研究界定的男性气质的形成不仅与直接的社会关系而且与性别秩序的整体模式有关。男性气质形构于整体的权力结构（女性屈从于男性）和总体的性别二分的符号象征主义（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对立）。男人的反性别政治是针对前者的变异，性别混淆是针对后者的变异。两种变异不一定结合起来——某些女性主义者因此而

^① 加伯 1992，克洛弗 1992。对各种形式的男女易装，参见柯克和希恩 1984。这些作者不仅对令人眩目的照片感兴趣，而且关注口述史中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暧昧的同性恋易装癖的社会背景，当时诸如综合症的说法还未出现。

反对变性主义，认为它是男权制的表现——尽管它们能结合起来。

出离政治与性别秩序的整体而非局部结构相关联。做为某一男性群体寻求自身具体利益的出离政治是行不通的，因为男人在总体上都在从女性的屈从地位获得利益。因此，出离政治很难传播而成为大众政治。

如果以从属性妇女地位或男女气质二分为中心的人格整合受到抵制，就会产生非整合的人格，即第五章讨论过的性别眩晕症。抵制整合与男性气质治疗学相反，它使当事人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因此，出离政治应运而生，同时与性别秩序结构产生了千丝万缕而无法摆脱的关系。作为激进否定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一种摇摆不定的尝试，出离政治目前活动于大众性别政治的边缘地带。我们很难看出它能为异性恋男人带来光明的未来，但是，未来没有它也不行，与当代其他男性气质政治相比，出离政治更具有改革整体性别秩序的潜质。在最后一章，我将探讨实现这种潜质的各种途径。



10. 实践与乌托邦

五呎深的水底躺着你的父亲，
他的骨骼已经化成了珊瑚，
他的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会受到海水珍奇的变幻；
化成珍宝，富丽而珍贵。

——莎士比亚《暴风雨》

这一章将考察我们已了解的男性气质对于性别关系中的社会公正的意义。社会公正的实现需要考虑在目前和将来的情景中当代的各种男性气质和可能的理想类型。^①

在有关男性的各种著作中，作者已经习惯于从神话和故事中选择原型。我想这是个很好的习惯，还有谁比莎士比亚更会讲故事吗？我引用的这段诗文不是为了唤起对遥远过去的原形的回

^① 我所使用的“乌托邦”是曼海姆(1985 [1929])意义上的，是一种超越了现存社会形势，建立在被压迫群体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框架。

忆，而是对未来理想类型的憧憬。这是精灵安丽儿唱给遇难的青年腓迪南的。像《暴风雨》所有盛大演出的场景一样，歌词所表现的只是幻景。但是像所有的丰富想像一样，幻景只是创造了一个可能性世界，当普罗斯彼罗折断了他的权杖，把书扔到水里时，幻景成为理想中的事物，世俗生活再次申明了自身的存在。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也需要这样的幻景。性别政治中社会公正的实现将一定是“某种丰富和新奇的事物”，不是我们以前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

历史意识

本书第二部分援引的案例研究显示了性别关系中广泛存在着一种骚动和变革的意识。这些澳大利亚人的变革意识不是什么异常的情况。美国研究者于70年代就记录了男性的变迁意识及其矛盾心理。50年代尽管是保守主义盛行的时期，“男性角色”的理论家仍然努力研究性角色的变迁。变迁意识一定是有原由的。其实在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以前已婚妇女的从业水平已经开始上升，尤其是在工业国家。随着避孕药物的可靠性不断提高，异性性行为正在经历某种变化；而生活期望值的提高，离婚率的上扬及低生育率水平的降低，促使家庭结构也在变化。^①

但是其他的方面还没有发生变化。在大都市及其郊区男性继

^① 对70年代的美国男性的讨论，见科马罗夫斯基1973，以及肖斯塔克1977。有关50年代男性性别角色的变迁，见哈克1957。

续从男权制中渔利。例如，在1990年，美国男性收入的中位值是女性收入中位值的197%。20世纪90年代在全世界各个地区，男性实际上控制了企业和国家权力的高层位置。所有阶层的男性都不同程度的要求女性的性服务，他们往往通过买卖、习俗、权力和施加压力达到这一目的。男性实际上仍然控制了武器，控制了大多数的高新技术。很明显，资源的巨大不平等和实践中的权力不平等仍然存在。正如第八章阐述的那样，欧美男权制模式扩展到了全世界，破坏了当地妇女的权威基础。^①

因此人们意识到的变革不是男权制的物质和制度结构的解体，而是在工业社会中男权制合法性的动摇。在第四章我引用了工人阶层的一个年轻男性做例子，他有过暴力、失业和囚禁的记录，他极力主张男女平等，讥讽那些持有相反观点的人是“有偏见的笨蛋”。我认为他的话集中表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男权制的改革意识。

其实男人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数量不多，第五章提到的绿党也只是少数人。但是潜在的争论主题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公共讨论会以及越来越多的私人论坛都认为否认妇女平等和同性恋自由需要有正当的理由。当然，这样的理由一直是有的。在平等的文化前题下，男权制失去了合法性，因此，社会生物学，枪械正当持有论，男性气质的右倾治疗方法和新右翼宗教民粹传统价值观都站不住脚了。

^① 有关收入的不平等，可以参见美国1990年人口局资料。所使用的数字是15岁以上有收入的那些人的中间收入。对地方性别制度以及妇女权威的压力经典范例是皮尔曼1984年对于墨西哥 Mazatec 人所做的研究。

在某些情境下，比如在西方城市里的青年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家庭平等和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已经是共识了。究竟有多少男性从事全职的婴儿照顾工作依赖于（如林恩·西格尔在《慢动作》中指出的）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安排。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家务劳动者认为这么做是一件正确的事。一些制度有助于男女平等的拓展。教育体制考虑到经济因素，设立了有利于男女平等的课程。在男权制国家内有些特殊的组织已经在为妇女的利益工作，例如，它们制定并开展了平等机会计划，为妇女提供服务的措施和防止对妇女暴力的运动。这种地方化的制度变迁加强了性别意识的转变。

这一文化变迁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性别的历史性意识出现了。它比“平等权力”的自由观念更深刻，尽管它常常是通过后者表现出来的。性别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它受社会变革影响，人们对此的认识稍慢于对阶级的认识。但是在19和20世纪期间对性别的认识的确在大都市出现了，其原因不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性别能动作用（我们通常认为的），而且与帝国和土著民族在性别秩序上的巨大差异有关。反过来，对那些“土著民族”而言，性别的真实性显然是靠暴力征服和殖民体制造就出来的。他们不得不接受殖民者的性别统治。

几乎在世界各地，性别的真实性首先表现为有关妇女的话题：19世纪晚期的“妇女问题”、20世纪的“妇女论题”等等。这是男权制文化本身的结构造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性别政治首先在妇女斗争中（为了争取财产权、投票权以及平等纳税的权利）成为大众政治。其后男性问题也出现了，情况要复杂些。我们在

第一章概述的心理分析和性角色理论用科学的语言揭示了一个长期不断发展着的保护男性气质的历史意识。

这一意识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和男人解放运动中被摧毁。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男权制现在可能走到了尽头。技术性条件已经具备，我们自身的意识也正在发生变化。在关于男性解放的著作中，人们已经感觉到面对温和的改良方案和措词含混的观点，一场伟大变革的历史画卷正在展开。70年代的大多数作者隐晦的表明男性气质处在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的存在会推动变迁向前发展。其结果将是一个男性气质被双性气质取代。第九章讨论的“出离政治”表明了男权制正在走向穷途末路，尽管拥护者缄默不语。

70年代早期的自由运动标志着男性气质的文化假设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在男性气质研究领域出现的更为保守的意识形态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有关男性气质的历史意识，但并不是以前陈旧的意识。它们普遍接受了社会改变男性气质的事实。一些学者，包括社会生物学家和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如乔治·吉尔德诋毁这一事实，认为社会已经走得离自然状态太远了^①。其他人则基本上已经接受了性别改变的可能性。例如，男性气质治疗就是一种改变男性气质的社会技术，只不过不同的治疗师和这方面的权威的取向不同罢了。院外政治游说集团也极力恢复已失去的男性气质，这也说明男性气质是可以丧失或者恢复的。没有人假

^① 见吉尔德 1975。这种理念非常具有普遍性：是第一章所讨论的科学霸权下的性别保守主义的一种最简单的习惯表达。

定，也没有人能假定男人和男性气质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种历史意识是当代男性气质政治的突出特征。也是对男性气质的认识水平。但是男人解放运动却相信对男性气质具有历史性的天启认识界定了政治目标——消灭男性气质——我们现在得知，在这种认识水平上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各种政治目标的意图。

政治目标的意图

性别的历史变迁意识，在开启了一种变迁政治的同时，似乎又在限制它。在情景不断变动和群体各异的情况下，这种政治可依赖的普遍原则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很容易得出根本没有什么普遍原则的结论。有两种值得尊重的思潮——自由派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持这种看法。前者是议会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认识到不存在超越个人利益之外的政治基础。改革群体的推动作用构成了政治过程，群体中的个人利益也随之而膨胀。后现代主义有理由质疑先于政治的个人存在，并拒绝接受集体主义或者一种政治“基础”。随着对现代性的“宏伟叙述”变得不足相信，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变成了各种声明和反抗的万花筒，其目的没有人说得清，更不要说预见它的未来了。

这两种思潮都低估了实践的构形——即创造社会实在的——能力。反对并不意味着对抗，它会带来新的社会结构（然而只是部分的）。因此女性主义不是要为女性争取不切实际的地位；女性

主义包括建立新的健康服务，界定新的付酬标准，创造宁静舒适的家庭和合作式的幼儿抚育模式，等等。劳工运动努力创造更加民主的工作场所；反殖民运动则试图建立自治的结构。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并传播了新知识。

大多数这类运动的目的在于实行社会公正的原则，这也是其他运动取得成功的条件。在大多数例子中社会公正意味着社会平等。追求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追求一致，他们一再宣称自己的反平均主义立场。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令人信服地指出，某些“复杂平等”的概念源于当代公正概念的需要。由于生活领域中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公正的问题就要有针对性，不能混为一谈^①。实际上，在任何政治实践中，情况都是复杂的。

在性别关系中平等的复杂性与性别秩序的不同结构有关，这在第三章有所介绍。追求权力关系中的社会公正就是要剥夺男性在国家、专业和管理方面的统治地位，以及结束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这也意味着要改革制度结构，它曾使精英权力和身体对身体的暴力成为可能。追求劳动性别分工中的社会公正意味着要结束货币经济中的男权制利益，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分享平等的教育和受训练的权利（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一不平等仍广泛存在着）。关注结构中的社会公正意味着结束对性差异的困惑和被迫接受的异性恋规范，在相互平等而不是等级制的基础上重建异性恋结构。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条件是要超越社会造成的无知状态，它不仅使性令人恐惧，而且成为疾病的传染源。

^① 见沃尔泽 1983。

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别关系中的社会公正属于大众可接受的利益而不是强制大众采取一致性的原则。复杂的平等准确说来是实践中多样性的需要，也是不断探索人类可能性的条件。后现代主义将平等大同理论视为“恐怖主义”，而社会公正并不是恐怖主义。恰恰相反，它反对诉诸武力（不是演说）的恐怖行为。对公平的追求不会毁灭政治，但它确实为一些领域，如男性气质政治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基线。正如第一章所阐述的，对社会公正的正确认识是构建男性气质知识的基础。

不平等状况的统计数据反应了男性而不是男性气质作为一个优势群体的现实。卡罗尔·佩特曼指出男性其实不是对性别，而是对具体的女性实施权力，是为体现生理性别而施权力^①。这不是词语上的诡辩，而是一个重要的有关政治目标的问题。是否有反对男性优势和权力，或是反对目前男性气质的社会公正政治吗？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基本上反对男性权利的政治，那么大多数由社会建构的男性气质所产生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不是要消灭或者和缓的减少男性气质，而是要拿出具体的手段和办法来改造经济和政治机器。如果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关乎男性气质的，那么结构变迁就应该从个性的重塑做起。但是目前个性转变方案因为忽略了女性个性中的男性气质这一因素（尽管我们经常认识到男性身上的女性气质），所以是很不完善的，个性转变不能局限于男性治疗及其政治方面。

尽管大多数有关男性气质的讨论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

^① 可以参照普林格尔在1992年对这一评论的相关讨论。

还是遵循了精神分析和社会建构的原则，认为妇女也像男人一样，具有男性气质。女孩子可以认同父亲或母亲，她们把母亲视为俄狄普斯欲望的对象，（与前俄狄普斯情结不同的一个过程，在第五章中有所讨论）。女性人格可以像男性人格一样在同样的意义上分层（不一定以相同的模式）。女孩子和妇女参与到男性气质化的制度和实践中来，从官僚机构到体育竞技场到处都有她们的身影。我们注意到性别分离时的一些辉煌时刻（像奥运会女子滑冰冠军），但是如巴里·托尔纳在《性别戏剧》一书中所言，我们却经常忽视了性别整合的幕后规则。这种整合不是建立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整合出现在一个等级制的背景下，其中“男人就是标准”，或者男性气质就是权威。铲除此种男性气质将需要改革女性生活和男性生活。劝阻小姑娘放弃垒球运动或让妇女退出官僚机构是不会获得社会公平的。

但是仅仅把目标集中在通过一种平等权利政治来铲除男性对女性的优势地位，就会丢弃我们的知识，即：这种优势地位是如何再生产和受到保护的，实际上也就抛弃了我们对男性气质作为一种实践的认识，并假定有某种宇宙的偶然性使得具有阳具的身体恰好处于权力的位置上，这些人继续征募他们的男性朋友来接替他们的强势位置。相当多的自由女性主义者认为，一种非理性的偏见把美国妇女排除出了参议院、日本妇女就因被排斥在议会之外，而失去了国家的关注。

男权制的捍卫者很聪明。他们总是把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放在对立位置上，强调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差异，从而捍卫性别关系中的不公正。但是在纯粹逻辑的意义上，这种差异讲不通。

正如第二章所说的那样，身体差异通过反身实践变成了社会事实，在这一过程中性别的社会关系在身体中（性欲的产生和消失，肌肉紧张和心情，舒适和难受）被体验。并且在身体行动中（性行为、运动和劳作等）建立起来。在男权制性别秩序中，这些实践的社会组织建构了诸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差异以及不可避免的等级制度。近二十年来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记载了大量详实的证据。当然在男性气质的观察者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看来，在此之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性别之间的差异和支配与被支配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分离而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权力关系。它涉及一些直接的社会关系和广泛的文化主题。男性在身体实践中可以通过暴力，比如强奸和家庭暴力实施自己的权力。在某些国家，物质水平还非常得低，男孩子可以比女孩子得到更多的食物也是权力的一个基本表现。我们可以回顾在任何时期男性和女性互动的社会情景中，都存在差异/支配的问题。在男孩子和男人占据的大多数街道，妇女在行走时都会遭到威胁；男孩子经常骚扰在操场上玩耍的女孩子；妇女在发言时常常被打断等等^①。这些都是支配性男性气质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情况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支配性而非从属性或边缘性的男性气质在男权制文化中最能体现男性气概。

差异/支配模式深深地嵌入在文化、制度和反身实践中，其

^① 家庭暴力性别模式的讨论可以参考多巴什等人1992年著作。有关发展中的性别基础，请参考埃尔森1991年的著作；泰勒在他1985年的作品中引用了孟加拉共和国、尼泊尔以及博茨瓦纳发生饥荒的证据。最近的有关相互作用的研究是托尔纳1993年所做的。

作用在于制约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变革。如果对支配的批判超过了一定程度就会被认为是否认性别差异而被拒绝，甚至会被污蔑为患有性别眩晕症或遭受暴力攻击。拉康认为，对支配的批判意味着攻击了阴茎，阴茎是男权制文化统治与男性气质的身体体验之间的交叉点。在更为传统的弗洛伊德那里这是阉割暴行。尽管他们的言论近乎于心理学对男性气质的分析，但仍然表现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抵触情绪。在第五章中，环境保护积极分子的情感混乱和负罪感表明了这种抗拒，尽管是在有利于男性气质改造的场合里。在其他场合中，男性气质改造会被认为是要把男人变成女人而遭到拒绝。对同性恋者的暴力是男权制意识形态中对女性化男性的处理方式，它显示了可能激起的仇恨。

做为铲除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尝试，消除性别的策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没有这一策略，去性别的、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公平政治就不可能产生。

去性别和重组

去性别策略不仅适用于文化和制度层次，而且也适用于身体层次——因为男人变成女人是最令人恐惧的，所以身体成为捍卫男权制的基础。变性手术和对性别秩序的最严厉挑战几乎在同一历史时刻出现，这不是巧合。外科手术令人惊讶的成为众所周知的改变性别的方法。变性过程是由一群男性权威在麻醉的身体上完成的。

社会公正的政治需要改变反身实践，这不是通过身体丧失能

动性，而是相反，经由提高身体能动性而达到的改变。麻醉其实是消灭了身体能动性。角色的转变需要男性身体的重新表现，而非消灭男性身体，它包括各种使用、感受和显示男性身体的方法。

例如，身体的重新表现包括早期婴儿养育的劳务分工。正如制度变迁一样，婴儿抚育也涉及重要的身体维度。从喂奶、清理排泄物到不停地摇摆让婴儿入睡，照顾婴儿可获得强烈的触知感。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是发展了男性身体的某种能力，它与在战争、运动和工业劳动中获得的能力不同。照顾婴儿也能体验另一种快乐。我兴趣盎然的看了一些明信片、海报甚至听了一些摇滚乐，其中男性拥抱婴儿的情景表现了强烈的感官愉悦。

去性别化的讨论其实又要涉及一个以前的有关平等和差异的女性主义争论。在70年代晚期，为谋求平等的去性别化策略不仅没有提高女性的地位，反而让她们受到伤害，因为这一策略认为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平等就意味着男女相同，这样女性文化社会完全丧失了。基于对男性气质批评的政策与这种困境无关，但它面对了另一个难题。取消支配性男性气质不仅要面对暴力和仇恨，而且还会抛弃围绕支配性男性气质而创造出来的积极的文化。这包括《罗摩衍那》、《伊里亚特》和《上帝的黎明》等英雄故事，参与邻里垒球游戏而获得的快乐，从田野抽象出如纯粹数学一般的美丽以及为他人而牺牲的美德等等。无论对于女孩子还是妇女，男孩子还是男人，这些是值得保留的遗产（女性文化的丰富遗产也同样值得所有性别的人保留下来）。

保护这些遗产和争取社会公正需要我们打破旧有争论的内容，并同时申明差异的存在和去性别的必要性。这种策略一直不

断地被提出来。马里奥·米耶利在不断变化的即兴发挥中，他的易性同性恋政治学探索了一系列符号——异性恋和同性恋者，女人气质和男人气概。现在的“酷儿理论”与此种策略极为相似，温迪·沙普克斯对妇女外貌政治的探索就提出了一种“朝向更多色彩的革命”的理论，认为应该给快乐、创造力和差异性留出充分的空间^①。他的基本想法是要重组而不是消除性别中的文化因素，因而是一种性别的多元文化主义。

尽管这些策略听起来都有些怪异，然而构成其基础的日常实践却非如此。在第一章讨论的性别差异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表明假设的很多性别特征都为男人和女人所共有。兼备各种性别活动其实是非常可行的：身体塑造者可以在幼儿园锻炼，女同性恋者可以穿着皮夹克，男孩子也能学习做饭。

沙普克斯正确地指出，只有把“包裹在一起的”美丽与身份拆开，才能处理性别的各种因素。重组策略与社会公正密切相关。如果社会公正得以实行，那么男权制文化的各种因素不仅能重新组合，而且可以以新的方式发展起来。例如，英雄主义是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当代大众文化氛围中，把同性恋男子当成英雄来对待是不可能的。社会公正却能够从同性恋的角度颂扬男同性恋者的英雄主义，抵制灭绝同性恋政策，探索这些先驱者的经验，直面艾滋病病毒的传染和艾滋病。英雄主义不一定因此而蒙羞。

^① 见米耶利1980，以及沙普克斯1986。我已经在康奈尔1987年著作的第十三章里勾勒了这个策略的概念背景。

如果重新组合成为可能，人们对大部分去性别和重新塑造的性别世界是不会陌生的。但是我不应该低估那个世界的形构和我们现实世界的形构之间的差异。只要看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种形构，比如英国的所谓“前形构政治”和女性主义的乌托邦神话就可以明白了^①。我们正在走向“丰富和奇异的”未来，因此，恐惧和愿望必然伴我们同行。

行动的形式

在富裕国家中，男性气质政治的行动以提倡“男人运动”为主。70年代这一运动被称为“男人解放运动”，基本上是直接对女性解放运动的模仿，同时带有一点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色彩。它的基础是许多小的自我管理的“男性意识提高小组”，简单称为“男性小组”。这些小组经常在会议或运动中聚在一起讨论一些特殊的论题；但是与60年代新左派的继承人相同，每一个小组都各行其事，整个运动明显没有中心，是分散的。

这一政治模式具有灵活、反权威主义和创造性的特征。如在第九章提到的那样，一个小组可以处理个人生活和公共议程的各种事务^②。在英、美和澳大利亚男性小组已经能够坚持广泛的活动，从讨论自己生活中的性别议题到出版杂志，组织抗议游行，为女性主义会议提供婴儿照顾，组织暴力性环保运动，照看邻里

① “前喻策略”的有关内容可以参看罗伯特姆·西格尔、温赖特 1979：71～78。皮尔西 1976 年的作品是乌托邦式小说的一个著名范例。

② 利希特曼在他 1989 年的著作里对这种群体做出了最好解释。

幼儿游戏群体。

然而由灵活性带来的创造力也引起了政治的转变。保罗·利希特曼的研究指出，美国的小组已经从系统批判男性气质转移到寻求“前男性”。从事治疗学的男性小组为80年代早期美国“神话诗般的”男人运动提供了起点，也为后来十年中广泛的男性治疗运动开辟了道路。现在男性治疗运动比男人解放运动的规模更大。去中心的、反权威的运动证明是一个创新精神和精神病学很容易找到位置的领域。

安德鲁·托尔森基于英国反性别主义的男性小组的经验，清楚地分析了男人解放运动中潜在的问题。解放运动的模式根本不能适用于那些掌握着权力的群体；正如托尔森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反叛的奴隶，但仍然是帝国主义者”^①。正如女性或者同性恋男子的意识提高一样，异性恋男人的意识提高并不会激起群体性响应，在赢得最初目标之后，异性恋小组会走向边缘以及解体。

作为最初出离政治的一种形式，第九章介绍的男人们解放运动针对的是压迫女性的男权制，而非特殊类型的男性气质。其结构基础是女性主义的拥护者，不是社会可界定的男性群体。因此，反性别主义的各种男性妇女运动之间就存在着紧张复杂的关系。

① 见托尔森 1977: 143。

② 对早些阶段的叙述见托尔森的阐述和斯诺德格拉斯 1977 年的著作。贾丁和史密斯 1987 年的作品勾勒了最近的各种回应，尤其极度复杂的一些争论（与后结构注意和文学里的势利行为相重叠）；读者更尊重赫恩和摩根在 1990 年作品里的讨论。

系^②。同样不足为怪的是，反性别的男人运动是不稳定的，很轻易被男性气质治疗运动所替代，后者针对男性气质的特殊类型，解决具体的男性群体关心的问题。

人们一直回避不谈男性反性别主义政治的结构问题，这需要清楚地说明一下。激进政治一般都以共同利益为手段动员人们团结起来，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女性主义和男性同性恋者的解放运动莫不如此。但是，男性反性别主义政治却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因为性别关系中的社会公正目标与他们共享的利益相对立。一般而言，这种政治是男性群体解体而非团结的根源。80年代的各种趋势有一个严格的逻辑，男性群体和他们的领袖越是强调群体团结就越不愿意触及社会公正主题。

如果所有政治行动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正如我在第九章谈到的，异性恋男性和同性恋男性仍继续从事反性别主义政治运动。某些领域（如社会科学）正在积极提倡反性别主义政治。其实，性别关系的结构开辟了其他可能性，允许各种政治不必依赖“运动”的模式。性别秩序的两种一般特征一构建了男性气质的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冲突；以及性别与其他社会结构的互动一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反性别主义策略。

在本书的前几章我已经论述了文化和社会关系中男性气质的多元形式、以及人格中男性气质的矛盾层面和种类。在此重温本书前面的内容是有益处的，第一章和第五章谈到，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认为男性气质的矛盾作用就像一个人承担了矛盾义务一样。第三章和第二部分分别从理论和个案研究的角度对特殊群体以及涉及到所有男性生活的性别关系中的危机倾向进行了论述。

从此可以看出，男性气质的政治改革至少是部分改革，在性别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广泛的基础。因此，男性不断更新反性别主义就很好理解了。我们确信，各种形式的斗争和改革尝试还会不断涌现出来。

然而男性气质政治最好的前景可能出现在纯粹性别政治之外的性别与其他结构相交接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男性为了某些原因会与非男性气质结合，并且有可能支持性别公正事业，尤其是在与女性团结一致的时候。在劳工和社会主义党派、工会、环境运动、社区政治、反殖民抵抗运动、文化民主运动和种族平等运动中都出现了男女团结一致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气质政治在英国受到特别的重视——这是英国男性气质理论具有高质量的原因之一。英国的研究尤其关注劳工运动和阶级。在那里，人们不会看到工人阶级生活预示的一个勇敢的新世界。相反，阶级剥削导致了男性优越的丑恶表演，英国足球流氓的暴力和光头党的种族歧视行为就是证明。除了异化的暴力外，阶级剥削还产生了其他东西。

在英国，从19世纪曼彻斯特弗尔河劳工的罢工运动到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和停工经常是性别政治发展的机会，当时女性的斗争带来了男性工业场所内的性别关系的改变。澳大利亚工党中的男性给予官僚机构中女性的创造力以重要支持，并大力促进了妇女服务业的发展。在最近一届工党执政的联邦政府，出台了一个禁止对女性施暴的国家政策。1979~1980年美洲联合钢铁工人协会成功迫使加拿大汉密尔顿钢铁厂招收女工。再早一些时候新南威尔士的建筑工人联盟倡议女性进入由男性统治的

建筑领域^①。

我援引这些案例，不是要证明男性正式工是妇女的重要助手（另一些案例显示许多工会都排斥女性，澳大利亚工党也有浓厚的男权制色彩），而是为了显示阶级和性别政治相互作用的多种可能性。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男性气质政治是在一个多样的阶级、伦理和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不可能变成一个一致而统一的“男人运动”。一方面，男性气质政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了女性行动的参与。另一方面，在工厂、机构、社区和宗教中的社会斗争不可避免的有不同的逻辑，经常彰显出男性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

我在这儿谈到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男人的运动，而是联盟政治。社会公正的实现依赖于不同群体间交叠的利益（而不是以一个群体的利益为中心，其他群体附合之）。交叠利益可能是暂时的，但是并不一定如此。联盟因此而能长期存在，在政治中这是很常见的。

有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联盟政治意味着多元主义、妥协和包容。好战分子一贯谴责妥协，坚持革命的纯洁性。这种姿态并不新奇，男性反性别主义政治在反色情文学上的表现就是这样^②。我认为多元主义是必要的但是包容却不是。如果男权制只

① 罗宾（Robin）1984年（以青年人的观点）分析了足球暴力；Barnsley 妇女反对1984年关闭煤矿的斗争是煤矿罢工里有关性别的一个内容，还有科尔曼（1993）对钢铁工人的描述以及伯格曼1980年对煤矿罢工的讨论。澳大利亚的策略可参见1992年反暴力攻击妇女国家委员会的有关材料。

② 可能最近的最有名的著作是施托尔滕贝格1990年写成的。

是一种历史结构，而不是男人欺压女人的永久性存在，那么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它迟早都要走向终结。铲除男权制的方法是制造压力，压力的累积将导致整个结构的变迁，结构变迁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不是开始。在早期阶段，任何促使历史变迁的压力都是有价值的。

教 育

尽管学校是一个了解男性气质再生产的丰富场所（从学习劳工到学习性别角色），尽管有很多人从事教育领域内男性气质的研究（做为学者或者学生），但是很少有人讨论男性气质变迁中教育的作用。对“性别和教育”的讨论完全集中在女孩教育和女性气质的问题上。在美国大学中，对于引进“男性研究”课程一直存在争论，当然男孩子也有学习阿诺德博士文学作品的课程。在现代学校体系中，男孩子没有机会在教育中讨论有关男性气质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女孩子和男孩子一起接受男性气质的教育了^①。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是联盟政治的关键场所。男性所做的任何有关男性气质的工作都离不开女性的合作，她们指出了教育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和实际感受。教育课程必须指

^① 耶茨在1993年终止了对女孩教育的优秀的讨论。他指出人们此前对男孩子的教育给予了极少关注，如果改正，将对消除性别不平等带来巨大贡献。参见内城教育中心1995，以及艾斯丘和罗斯1988。有关“男性研究”的讨论，参见法兰特和布罗德1996，以及赫恩和摩根1990。

明男性气质的差异性，以及性别与种族、阶级、民族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要落入一般的赞成还是否定男性气质的无聊选择中去。

男性气质教育的重要性来自性别实践的形构，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表现产生了一种社会实在。教育常常被认为是传播知识，老师们把大量的东西灌输给学生，但那只是整个教育过程的一部分。在更深层次上，教育是实践能力形成的过程^①。教育中的社会公正必须考虑到实践的整体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发展的公平方式和它们发生作用的方式。

因此，教育策略必须从根本上关注学校课程。我在《学校和社会公正》中指出课程的公平意味着站在社会最底层人群的立场上讲授知识^②。这与目前从特权阶层的角度编写知识的社会实际情况相反。我们不是要抛弃现存知识，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组，从而开启当代社会不公平所掩盖的种种可能性。

第一步我们要让授课内容来自多种渠道。这是多元文化的课程逻辑，琼·布莱克本在教材中加入了性别内容，从而发展了这一逻辑^③。第二步用包容性丰富的课程取代内容单一的课程。例如，让中产阶级的学生去学习体现工人阶级孩子利益的知识，而不仅仅是让工人阶级的学生去了解表现中产阶级利益的知识。

在性别关系中推行第二步骤一般是决定性的而且是需要极其细致的。让男孩子学习以女孩子利益为中心的知识，让学生学习

① 见康奈尔 1994。

② 见康奈尔 1993。

③ 见耶茨 1993：89。布莱克本称之为“包含性内容的课程”。

以男女同性恋者利益为中心的知识，培养移情和从别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这需要系统否定支配性男性气质才能做到。我们知道在中学和大学里凡是与性别关系有关的事都很难做。（例如，在校园操场上对女孩子的游戏表现出兴趣的男孩子会受到的奚落，在大学里上性别关系课的人寥寥无几。）然而这一步骤遵循了传统的教育目标——扩展经验，追求平等，全面参与文化——这些都是学生生活的最重要的领域。人们对这一教育目标的兴趣可能很高，但是并不一定支持。许多教师正在课堂上实践教育目标，尽管资源有限，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也没有。关注男性气质的科研人员可以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提供资源和支持。

从劣势群体的角度收集整理知识并不意味着依据劣势群体的经验设置课程（实际上，课程不可能简单地反映任何群体的经验，它总是包括对经验的批判和文化的选择）。社会公正课程需要考察优势群体的经验。实际上，这经常是研究异性恋男人和男孩子的性别问题的切入点——有时甚至是惟一可能的切入点。

对男性气质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重要资源，包含了广泛的可讨论的情境，为探索局部事实提供了可能的模式。例如，第五章讨论了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约束、疏远和分离时刻，这些也存在于其他情景和他人生活中。例如，弗兰克采访的加拿大高等学校的男孩子在面对胁迫时完成了性别分离：

我要确保自己走路不太女人气，以前我做过模特儿，但是如果我还是那么走路，学校里的人就会注意我。我觉得很

烦，他们总是这么取笑我“你觉得自己是男同性恋吗？”^①

只有当他回答“是的”而不会受到攻击时，我们才真正进步了。

前 景

界定一个政治策略和使它发挥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实现政治策略的各种方法。在男人解放运动的初期，活动家们可能相信他们自己正在推动历史变迁的潮流向前发展。当这一浪潮过去之后，岸上其实没有留下任何后继手段的痕迹。我们将男性气质的改革称为“男人运动”的原因，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由于它的某些活动有社会运动的形式。但是如果冷静地思考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情景，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变男性气质的运动基本上完全没有政治力量——没有影响公共政策，没有组织化的资源，没有公众基础，没有体现在大众文化中（除了对男性治疗的过度批判和作为女性主义的注脚以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性恋解放运动转变成了新型同性恋社区政治，后者勇敢面对艾滋病，建立了新的机构，改革了社会实践（通过社区为基础的安全的性政策），并在政治讨论中获得了发言权^②。

^① 见弗兰克 1993: 56。

^② 有关同性恋社团行动以及对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见基帕克斯等人 1993。

简单地从利益角度出发，就不难看出任何反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运动都无足轻重。男性在男权制中的普遍利益都是非常巨大的，性别角色的改革者们完全低估了这一事实，而且今天仍未重视它，这就是我努力在本书中把它提出来的原因^①。

男权制的男性利益全部体现在支配性男性气质中，而且受到所有鼓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文化工具的保护。国家将男性利益制度化，并且异性恋男性通过暴力、胁迫和嘲弄将其在生活中强化——刚才提到的加拿大大学生的经历就是个司空见惯的例子——同时对女性和同性恋者施以暴力。欧美的男权制模式经由文化和经济关系的全球化过程而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在大都市里，示范性男性气质如体育明星的商品化大大加强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影响力，同时院外政治集团和商业媒体勾结起来为男性暴力喝采助威。此外，女性的某些行为，如：对男权制宗教般的忠诚，在浪漫文学中的表现，在抚育孩童的过程中对性别差异和男性支配权的维护，以及对堕胎和同性恋的反对，都为男权制下的男性利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由于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的种种复杂性，男性的巨大利益被弄的四分五裂。在支配性和共谋性男性气质之间存在差异和紧张；支配性与从属性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之间也存在对立。这些实践形构在内部都是分裂的，正如精神分析家指出的那样，人格的分层，即：在人格层次上性别的矛盾冲突，造就了男性气

^① 甚至在政治上最有经验的古德（1982）也认识到了性别关系变迁的复杂性，但是在他的模式里缺乏对暴力、同性恐惧、制度化权力和国家的认识。

质。我们一再看到由于性别与阶级、种族和全球化力量的相互作用，男性气质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各不相同（与文化变迁的都市理论家的想法相反，全球化在都市中心和边缘区营造了不同的环境）。

男权制下的男性利益并不是做为一个同质结构中的统一力量来发挥作用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超越一维的对男权制早期模式的策略性思考^①。在男权制已广泛被认为非法的背景下，男人与妇女和女孩子的福祉相关联的利益可能取代男性的特殊利益，可能形成不再憎恶同性恋的异性恋情感，因此异性恋男性与同性恋政治的联盟成为可能。本章开头讨论了超级大国男权制模式的变迁，这意味着各种熟悉的男性气质会继续产生并制度化，但是组成它们的元素可能在文化上重新形构。因此 80 年代的男性气质政治表现出一种互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强国）国家和大众传媒宣扬反动的性别政治，前女权主义的男人解放运动被男性治疗所取代；另一方面，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很多性别关系有了改进，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批判也达到了准确和经验的新层次。

90 年代没有产生出一个比以前更统一的反对男权制的男人运动。但是，性别关系中的对立和融合使男性继续摆脱男权制的影响，男性气质的重新形构和改革的可能性出现了。发展一种利用这种可能性的政治——不迷信解放的神话，并充分认识到男权

^①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一内容仍出现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中。比如麦金农 1989 年的作品，与沃尔比（1989）和尼克尔森（1990）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照。

制下男性的共享利益，因此不寄希望于以往的男人运动模式——需要新的发明和确切的知识。

我想一种新的男性气质政治将在新的领域发展起来，比如课程政治，围绕艾滋病的工作和反种族主义政治。当然也需要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基于联盟而非男性群体一方的新的工作形式。我想新的男性气质政治比目前的男性气质政治更具国际主义精神，就像其他的民主运动一样，与上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抗争^①。在某种意义上，新的男性气质政治必须超越利益，成为一种可能的纯粹政治。从另一角度来说，新的男性气质政治将体现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利益——共享社会公正和平，并与自然界和谐共处。

① 为了给出这些判断的合理性；以上讨论了课程的政治性。艾滋病传染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是异性恋之间的传染（曼等人 1992）；在这一疾病的蔓延过程中，男性的性政治要对男异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感染负责。吉布森在 1994 年就指出了霸权性的男性气质和他称之为美国“准军事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其中一个发生抵触，必然与另一个也会存在竞争对抗的关系。要求男人和女人联盟的建议可追溯到较早的有关女性中的男性气质和男人中的女性气质的讨论，以及妇女对男权制所做出的贡献。从下而上的全球化，见布雷彻等人 1993。

主题精品图书推荐

性的政治（现代社会学文库）

凯特·米利特 著

大 32 开 定价：29.80 元

1999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699-1/C

本书为 20 世纪女性文学经典，其划时代的意义和引起的反响使本书成为女性主义一个里程碑。作者提出两性关系是政治问题，并运用社会发展观点，从学术角度对文学中“性”这一复杂敏感问题进行分析，对劳伦斯、王尔德等人在作品中对性的处置作出批评。“本书在攻击男性一统的秩序时，旁征博引而又注意分寸，提出问题的方式既严肃又意气风发”。作者因此成为名作家和全美妇女运动代言人。本书是在美国再版 8 次的畅销书。

读者对象：社会学者、文学创作者、爱好者，文学研究工作者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

（现代社会学文库·性社会学译丛）

[美] 安东尼·吉登斯 著

大 32 开 定价：18.00 元

2001年2月出版

ISBN 7-80149-438-5/D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 剑桥皇家学院院士、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前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

本书作者吉登斯试图阐述以下这些问题: 性革命这个富有争议的术语, 在今天能被赋予什么含义? “性态”是如何形式的? 这与已经影响到更大范围的个人生活的变化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这本书旨在为妇女、儿童、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祈求进行辩护, 本书不乏社会学大师理论上的严谨和经济范例运用上的恰如其分。

读者对象: 有关专业研究人员, 社会工作者, 大专院校相关师生

女人的身体 男人的目光——裸乳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文库·性社会学译丛)

[法] 让-克鲁德·考夫曼 著

大32开 定价: 20.00元

2001年4月出版

ISBN 7-80149-515-2/B

让-克鲁德·考夫曼 (Jean-Claude Kaufmann), 法国社会学家, 任职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 索邦巴黎第五大学教授。他善于运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 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进行研究, 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著有《夫妻情节》一书。该书从内衣的角度分析夫妻关系,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目前考夫曼的研究方法和书籍已引起了各国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

本书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 选择了海滩裸乳这种日常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 作者收集了大量资料, 并在海滩上采访了三百多人, 用以研究人们

对女性身体暴露程度的看法，书中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历史的演变；②男人和女人的关系；③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④构建新规范的真实性和⑤常态构成的现实使日常的民主运作成为问题。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社会学调查专业研究人员，社会学爱好者

组织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文库）

[法] 克罗戴特·拉法耶 著

大 32 开 定价：8.00 元

2000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208-0/C

本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组织社会学的历史，研究目标、代表人物、理论基础、指导原则及目前的最新发展，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法国的组织社会学流派和策略分析，指出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就是：理解集体的运转逻辑以及它引起的合作形式。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社会学系师生，企业管理人员

环境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文库）

[日] 饭岛伸子 著

大 32 开 定价：10.00 元

1999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074-6/C

本书作者为日本著名学者、环境社会学创始人。这本书对环境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方法作了探讨，以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公害问题为实例，讨论环境问题的历史和现

状及治理环境的迫切性。环境社会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和自己独特的实证研究，追求人类群体和生存环境的理想存在形态。

读者对象：有关政府部门，环境研究机构，社会学者和关心环保问题的有识之士

健康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文库）

[美] F.D. 沃林斯基 著

大 32 开 定价：30.00 元

1999 年 4 月出版

ISBN 7-80050-248-1/G

本书是当代美国在健康社会学领域最富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主要讨论了当今社会最大的行业——卫生保健系统。书中全面介绍了美国社会医疗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诸多与其相关的学科——卫生经济学、卫生保健伦理学、政治科学等，探讨了医疗体制、医疗模式、卫生政策、保健服务等热点问题。

新
子
知
知
知